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第3卷

# 定性研究：
## 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

诺曼·K·邓津
伊冯娜·S·林肯
主编

风笑天 等
译



封面设计/黄河封面工作室

**这是一部在社会科学定性研究方法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全书约200万字，对定性研究的近40个专题进行了讨论，其中每一个专题的作者都是该领域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其主编诺曼·K·邓津(Norman·K·Denzin)和伊冯娜·S·林肯(Yvonna·S·Lincoln)更是社会科学定性研究方面的国际旗手。即便是这样一个精英的团队，面对这个庞大而意义深远的工程仍然需要艰苦卓绝的工作，正如两位主编在本书的前言中所说：

> 在许多情形下，关于谁应该写作某个章节或者某个章节应该如何写，我们常常不情愿地进入了一场政治斗争……
>
> ……为了最后期限和页数的要求，我们和作者们进行着斗争；关于各章节的理论性以及关于那些我们能够明白但其他人却未必明白的内容，我们也和作者们进行着斗争；关于各章节何时完成，我们还得做斗争；而且，当我们要求更多的修改时，我们是在不断地测试着作者们的耐性。

正是这些一流学者的艰苦和“斗争”，才为我们奉献了这样一个定性研究方面的精神盛宴。为了使国内的学者也能享此盛宴，我们组织来自全国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二十余位学者历时三年完成了本书中文版本的翻译和出版。考虑到读者阅读的方便，我们在征得原出版公司的同意后，将本书中文版以四卷本的形式出版，分别是：

《定性研究（第1卷）：方法论基础》（原书第1、2部分）
《定性研究（第2卷）：策略与艺术》（原书第3部分）
《定性研究（第3卷）：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原书第4部分）
《定性研究（第4卷）：评估、解释与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原书第5、6部分）


ISBN 978-7-5624-3944-8
9 787562 439448 >
定价：45.00元

万卷方法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第3卷

# 定性研究：
## 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

诺曼·K·邓津
伊冯娜·S·林肯
主编

风笑天 周晓春 陈 璇
郝玉章 唐利平 黄 河
龙书芹 聂春雷 罗凌云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版贸渝核字(2003)第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定性研究(第3卷):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美)邓津(Denzin, N. K.),(美)林肯(Lincoln, Y. S.)主编;风笑天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3
(万卷方法)
书名原文: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SBN 978-7-5624-3944-8

Ⅰ.定… Ⅱ.①邓…②林…③风… Ⅲ.定性分析—研究方法 Ⅳ.C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15373号

**定性研究(第3卷):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
诺曼·K·邓津 伊冯娜·S·林肯 主 编
风笑天 等译
责任编辑:雷少波 陈 荟 版式设计:雷少波
责任校对:李定群 责任印制: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张鸽盛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市场营销部)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7.5 字数:362千 插页:16开2页
2007年3月第1版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978-7-5624-3944-8 定价:45.00元

万卷方法 | 系列丛书

总策划：崔 祝 雷少波

**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2004.11出版）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第3版）
By: Robert K.Yin
周海涛等译

**案例研究方法的应用**（2004.11出版）
Applications of Case Study Research（第2版）
By: Robert K.Yin
周海涛等译

**调查研究方法**（2004.11出版）
Survey Research Methods（第3版）
By: Floyd J.Fowler,Jr.
孙振东等译

**量表编制：理论与应用**（2004.11出版）
Scale Development: Theory and Applications（第2版）
By: Robert F.Devellis
李 红等译

**研究设计与写作指导：定性、定量与混合研究的路径**(2007.1出版)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Approaches（第2版）
By: John W.Creswell
崔延强等译

**科学决策方法：从政策分析到政策制订**（2006.7出版）
Communicat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o Policymakers
By: Roger J.Vaughan, Terry F.Buss
沈崇麟等译

**电话调查方法：抽样、选择与督导**（2005.8出版）
Telephone Survey Methods: Sampling, Selecting, and Supervision
By: Paul J.Lavrakas
沈崇麟等译

**解释性交往行动主义**（2004.7出版）
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第2版）
By: Norman K.Denzin
周 勇译

**研究设计与社会测量导引**（2005.2出版）
Handbook of Social Research Design & Social Measurement（第6版）
By:Delbertc. Miller, Neil J.salkind
风笑天 主译

**定性研究（第1卷）：方法论基础**(2007.1出版)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Vol.1)
By: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
风笑天等译

**定性研究（第2卷）：策略与艺术**(2007.1出版)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Vol.2)
By: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
风笑天等译

**定性研究（第3卷）: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2007.1出版)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Vol.3)
By: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
风笑天等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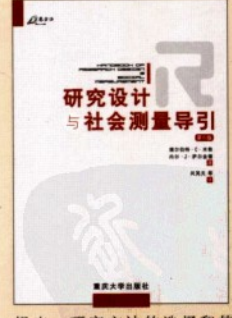
**定性研究（第4卷）:解释、评估与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2007.1出版)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Vol.4)
By: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
风笑天等译






本书是定性研究方法方面极为全面的工具书。全书约150万字，涉及定性研究的发展历史，定性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定性研究的具体方法、策略和艺术，定性研究的未来发展等内容，这些内容分别体现在41个专题之中。本书的56位撰写者来自世界各国，他们均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及定性研究方法的相关领域卓有成效的学者。本书主译风笑天系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其他人员均来自北京大学、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等国内外著名研究与教学机构。

本书第2版的中译本2007.2出版。




本书约65万字，涉及社会科学研究设计的方方面面，包括研究选题的提出、研究方法的选择和使用，以至研究成果的最终呈现和出版等内容。同时，为了给学者们提供更大的方便，本书提供了大量国际著名的社会科学研究和传播机构的简明资料以及国际普遍认可的社会科学研究工具。本书作者分别是来自印第安纳大学社会与商务管理系和坎萨斯大学心理与教育研究系的知名教授。此书由风笑天教授主持翻译。

本书第6版的中译本2004.12出版。

# 本卷目录

## 第Ⅳ部分 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



# 总目录

## 定性研究(第1卷):方法论基础



## 定性研究(第2卷):策略与艺术

## 定性研究(第 3 卷):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



## 定性研究(第 4 卷):解释、评估与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

第Ⅳ部分

# 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

PART Ⅳ METHODS OF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EMPIRICAL MATERIALS

置身于社会之中,研究者通过互动创建了现实,而经验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正是在由这些实物构成的地方进引的。在这些场所,研究者进行解释性的定性研究实践。这些方法论实践展示了从日常生活世界产生经验资料的不同方法。第Ⅳ部分考察了摆弄方法论的定性研究者(researchers-as-methodological-bricoleurs)现在使用的各种分析手段和方法。

## 访　谈

访谈在我们的社会中司空见惯,社会成员似乎都相信通过访谈可以得到有关生活体验及其意义的有用信息。访谈已经成为我们传播大众文化的一个想当然的特色。但是,访谈报告是一个协商性的文本,其中穿插着权力、性别、种族和阶层。在第 24 章中,安德里亚·方塔纳(Andea Fontana)和詹姆斯·弗里(James Frey)追溯了访谈在社会科学中的历史,指明了它的三种主要形式:结构式、非结构式和开放式,并揭示了这种工具在运用过程中是如何塑造和变化的。他们也探讨了小组(或焦点)访谈(参见第 32 章)、口述史访谈、创造性访谈,以及性别的、女权主义的、后现代的或者多音访谈。

访谈即对话,是一种提问和聆听的艺术。它不是一种中立性的工具,因为访谈中至少有两人创造了访谈情境中的现实。在这种情境下,答案是既定的。由此访谈达成了情景性默契,这种默契植根于具体的互动细节中。这种方法受到了访谈者的个体特征影响,如种族、阶层、民族和性别等。

方塔纳和弗里回顾了女权主义研究者在访谈上所做的重要工作,特别是贝哈(Behar)、莱因哈兹(Reinharz)、赫茨(Hertz)、里查德森(Richardson)、克拉夫(Clough)、克林斯(Collins)、史密斯(Smith)和欧克利(Oakley)之间的讨论。英国社会学家欧克利(Oakley,1981)和其他女性主义学者已明确指出了科学实证研究和基于女性主义的访谈之间的一个主要矛盾,前者要求客观和公正,而后者要求开放、投入感

情,以及在访谈者和主题之间发展出一种潜在的长期信任关系。

正如方塔纳和弗里所言,女性主义访谈的伦理对访谈作了重新定位。这种伦理使访谈者和被访者可以对一些彼此相关的,经常是传记式批判的问题进行平等的对话。这种叙述的、讲故事的框架质疑了第 5 章中克里斯琴斯(Christians)所讨论的调查的知情同意和隐瞒模式。不管对应用行动研究(参见第 22 章),还是对临床研究(参见第 23 章)来讲,这种伦理都使访谈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

## 观察方法

进入一个社会场景去观察是收集社会资料的另一种重要方法。在第 25 章中,安格罗西诺(Michael Angrosino)和德普雷(Kimbeily Mays de Perez)主要改写了自然主义观察的方法和操作。所有的观察都与观察者对所观察世界的参与密切相关。所谓纯粹、客观、公正的观察是不存在的,观察者在场的影响是不可消除的。此外,研究对象的殖民化论点(仅仅是研究者注视的客体)不再恰当合适。现在,观察者在一系列询问行动中充当了协作参与者的角色。安格罗西诺和德普雷认为观察互动是暂时性、情境性的过程,它会受到来自性别认同的变动影响以及权力结构的影响。由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是公开的,场景中他人的暗示会对参与者产生影响。最后,在观察过程中,人们呈现出情境性的特征,这些特征在社会和文化中可能都是非主流的。

正如第 5 章克里斯琴斯那样,安格罗西诺和德普雷对制度性审查委员会提出强有力的批评。同时指出实证主义经验社会科学家几乎没有认识到观察性民族志研究者的必要性。在许多大学,制度性审查委员会和实验性的、假设检验的所谓科学范式联系在一起。这种范式为后现代观察者带来不少问题,因为学者成了他们研究世界的一部分。学者们为了获得对自己研究的支持和认可,他们不得不经常采取欺骗手段(制度性审查委员会也不乏类似的例子)。这导致一些民族志研究者宣称自己的研究是可信任,也不会带来危害,然而这类研究者已经被刻板化为不可信任的。当合作式的调查开始实施,研究对象变成“股东”,人们可以左右自己的调查。对所认同的形式以及更广意义上的参与调查形式而言,研究对象的决策能力尚不明确。民族志写作的新颖形式,诸如小说体故事的运用,代表了解决这种道德困境的一种途径。

安格罗西诺和德普雷提出了一种“均衡理性(proportionate reason)”道德体系。这种实用的道德体系试图平衡该领域中的收益、成本和行动后果之间的关系,用最终取得的目标的价值和重要性来说明可采取的手段是否合理。他们掀开了观察方法的神秘面纱,观察再也不是对文化或社会某种宏大分析的关键。相反,观察性研究是一种关注差异的方法,关注那些处于具体且不断变动的人际关系中的特定人群的生活。女性主义道德关怀和义务的重要性和必需性变得越来越明显。

## 阅读物质文化及其记录

无声的证据——即成文的文本和文化产品——客观而有形的存在着,留下了逝去

历史的物质性痕迹。和这些物质性资料进行对话和交谈是不可能的。研究者必须阐释它们,因为可以从中发现对人类生态研究有重要意义的生活文化,而考古学家研究的则是物质文化。在第26章中,全文弥漫着后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敏感性的轻松,作者伊恩·霍德(Ian Holder)会告诉你如何做到这一切。他观点的核心是一种建构主义者的论断,即研究者通过一系列解释性实践生成了他们理论分析所用的材料和证据。今天人们都认识到,各种类型的物质文化都是一种性别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建构。先前的文化理论、进化论以及物质历史正在被重写。过去如何被重构和阐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在如何被建构以及将来如何被记忆。

## 视觉方法的再想象

如今,提倡视觉化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使用照片、电影、互联网、互动式光盘和光盘存储器以及虚拟现实等手段,通过这些途径来锻造人类存在与视觉观念的联系。这些视觉表达形式构成了记录和证明社会生活发展的不同渠道。照片常常被称作记忆镜子,它将研究者带入了日常生活世界。在日常生活世界里,观察者身份、对象的视角和拍摄的主题都被问题化了。在第27章中,哈珀(Douglas Harper)结合虚拟和真实民族志后现代的发展,描述了这种方法的历史。

从历史上看,视觉社会学开始于后实证主义传统,研究者们提供视觉信息以支持传统民族志进行现实性描述。照片是非问题化"事实"的一部分,而非问题化"事实"又构成了这些故事的"真实"。现在,视觉社会学和民族志一样,正处于深刻怀疑和巨大变革时期。哈珀提出视觉社会学必须在新民族志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通过仔细阅读一组自己摄自波洛尼亚街道上的图片的故事性,他投身于这种新的转变。这一组连续的图片是一种视觉叙述,它同时讲述了许多不同的故事。因为它将符号图像、文化意义、观点、地理空间、互动次序和关注的性别视角的转换等混合在一起。哈珀也分析了表达的意识形态方面、图像的社会建构、视觉知识的权威、相机的机械性能、视角框架、印刷技术、编辑以及图像次序等。

哈珀通过图片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视觉叙述和故事把图片和第一人称叙说联系在一起,文化故事通过时间与空间得以展开,而一系列的照片就是通过上述三者得以组合起来。显然,一幅图像只能讲述一个故事,而视觉叙述试图讲述关于文化的、个体的、组织的以及它们之间的故事。图片有助于发掘深层次的东西,详尽阐述故事中的意义。

我们需要学会如何从事带有视觉思考性的实验和没有视觉思考的实验,需要发展一种敏锐的视觉敏感性,同意我们把性别化的物质世界带入不同方式的批判中去,需要质问网络空间及其虚拟现实的逻辑。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更多理解建立连接不同世界事实的规则和方法。

## 自我民族志和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者

个体经历是个体具有的思想流和意识流在即时性情境中的反映。这些经历可能是依惯例行事或者是有问题的。它们发生在个体生命历程中,当人们谈论这些经历时,往往会设想出故事或叙述的形态。我们不能直接研究生活经历,因为语言、言谈和话语系统操纵和限定了特定的经历,而这些经历正是我们所要描述的。我们所研究的是呈现出来的经历,而不是经历本身。我们考察的是人们彼此谈论的自己经历过的故事。这些故事可能是个体经历的叙述或者自我故事,对个人经历的阐释。

现在许多人认为我们只能研究我们自己的经历。研究者成为研究对象,这是自我民族志的要旨。在第 28 章中,艾利丝(Carolyn Ellis)和博克纳(Arthur Bochner)从反思角度提出了对反思性个体叙述写作的争论。事实上,他们的对话文本正是这种类型写作的一个范例,它完成了对自己叙述的反思。艾利丝和博克纳主要回顾了研究个体经历叙述的争议,把他们的文本置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话语下,尤其是罗蒂和里查德森的作品。

他们追溯了这种写作形式的历史,它起源于海恩诺(David Hayano)1979 年对自我民族志术语的介绍。关于自我民族志的意义和用途涉及多种多样的术语和方法论策略。它主要包括个体式叙述、自我叙述、写作故事、自我故事、自我观察、个体民族志、文学故事、评论式自传体、激进经验主义、启发性叙述、反思性民族志、传记式方法、合作建构叙述、本土人类学、人类学诗学分析和表演民族志等。艾利丝和博克纳运用史密斯(Sylvia Smith)———个心理学博士候选人的个案来说明这种写作形式的价值。

接着,他们转向他们自身的智识发展轨迹,展示他们如何形成今天的理解——关于研究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写作必要性的理解。他们表示,推崇这种写作风格绝非易事。它涉及学习如何尝试不同的写作,包括琢磨如何运用个体经验和第一人称作为工具来确立对真理和知识的发言权。这引起了诸多评论,有的针对叙述的真实性、感情记忆以及层叠文本提出质疑,有的质问故事化生活的指向,还有的担心这种传统问题的合法性和可靠性。

当然,自我民族志可以解读为证词的变动形式和第一人称生活史。由此,艾利丝和博克纳的文章是对蒂尔尼(Tierney,第 20 章)和贝弗利(Beverley,第 21 章)关于叙述形式论述的一个补充。

## 数据处理和分析技术

定性经验资料的处理、分析和解释是一个高技术语言和话语系统合成的过程,需要掌握一套特别的阐释惯例和叙述技术。在第 29 章,瑞安(Gery Ryan)和伯纳德(H. Russell Bernard)提出了一个可能是这一过程和话语中最复杂、最全面的模型。

经验资料的处理和分析存在经验主义和建构主义差异的争论:前者预设存在一个

真实的世界,后者预设世界是被建构的。此外,还存在经验主义和非经验主义的争议——分歧在于一个主张将观察转化为词语,而另一个主张将观察结果转化为数字。和其他学者一样,瑞安和伯纳德也区别了对待文本的方法,一种是叙述或语言学的方法,另一种是社会学的方法。叙述的方法把文本作为叙述、交谈、表演和正式分析的对象,而社会学的方法是把文本作为获得经验的窗口,包括分析者处理生成的文本和自由体的文本或叙述。

瑞安和伯纳德着重介绍了社会学传统意义使用的方法,即收集资料(例如自由列表、分类资料、框架引出、三人一组的试验等)的方法和分析技术(如分类法、心智图和因素分析等)。他们也讨论了分析自由体文本的方法,首先把原始文本录入(内容关键词、词汇计数、语义网络分析和认知地图)。然后,他们采取不同方法将文本缩减为编码:扎根理论、图解分析、经典内容分析、内容词典、分析归纳和民族志决策模型。

这是一种影响深远的后实证主义方法,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简洁明确而且系统化等特征,对经验资料进行了严密分析。瑞安和伯纳德对扎根理论、谈话分析和计算机辅助分析模式的处理需要分别和第 19 章、第 31 章、第 30 章所论述的内容结合起来阅读。

## 计算机辅助的定性分析

现在,研究人员运用计算机软件程序来协助分析定性经验资料相对普遍了。李和费尔丁(Lee & Fielding,1998,p.1)将这种程序称作"计算机辅助定性数据分析软件",简称为 CAQDAS。在第 30 章中,维茨曼(Eben Weitzman)提出了一种易懂好用的 CAQDAS 方法,这种方法很快就可以用来支持定性资料分析。他回顾了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一些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帮助研究者记录、存储、索引、交互索引、编码、排序以及交互分析文本资料。当然,它们不能保持方法论的中立(Schwandt,1997,p.18)。这些工具建构了解释的结构,对物质世界预设了一种特定性别主义立场。它们经常将一套理性的、科层制式的、类似线性的和序列框架强加在世界和世界的物质资料上。这给人的印象是数据中确实存在着意义模式,事实上一切都是所采用的软件和分析框架所产生的(在没有使用计算机帮助的情况下,显然研究者自己创造了这种可见的"顺序")。这些工具会使研究者远离田野工作和经验资料,这些方法是以一个客观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基本的认识论为假定前提的。在使用这些方法时,经常把实地记录转化为对文本材料的解释步骤和把假设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维茨曼把最常用的程序分为五个软件系列:文本管理器、编码程序、检索程序、编码理论建立组和概念网络建立组。这些程序具有多重文本处理功能,例如,帮助研究者找到和修改建立在句子和词语上的关键材料,建立概念模型,进行分类排序、关键词编码和文本部分的连接,剥离拒答和有失偏颇的个案以及建立索引。多媒体软件程序刚刚出现,它可以让研究者像研究文本数据一样研究音频文件和视频文件。光盘存储器也可作为存储实地记录和其他民族志视频材料的地方,进而可以进行超文本分析

(Coffey & Atkinson,1996,p. 186)。

如此强大的集图片、影视、声音表现为一体的工具,可以使研究者强化和建立所收集资料的一致性模式。然而,这些工具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包括误以为这样的程序真正可以为研究者建立一套理论(或者个案)。它们甚至提倡暴风骤雨般或者"闪电战"式的研究。编码和检索系统可能会过分强调分类和指标的发掘,而相应不够重视具体情境中经验产生的多重含义(Fielding & Lee,1998,pp. 120-121)。寻求扎根理论会使研究者的注意力从那些在社会世界起作用的阐释理论中转移出来。

对定性研究者而言,软件程序应是互动的,可以产生出各种不同的阐释空间,这些空间连接着意义和经验模式。然而,研究者应避免让计算机和计算机程序决定阐释的形式和内容,这是很重要的。对编码和分类的强调会产生无终止的变量分析,以致不能利用重要的情境和场景因素①。在研究者进行计算机辅助分析时,经常会出现这样一个取向,即分析时将实地资料减少到仅仅可以编码。同样,研究者如果把实地收集的资料交给那些没有亲自参与田野调查和不了解研究进程的人也是不妥当的(Lee & Fielding,1991,p. 12)。

塞德尔(Seidel,1991)提出了一种在使用计算机方法时出现的分析痴迷状态。这种痴迷会使研究者对计算机可以处理的大量数据着迷。此外,研究者还可能加深误解,即数据中生成的模型可能是"他们和数据之间关系的产物"(Seidel,1991,p. 114)。最终研究者可能仅仅重视研究中计算机方法能帮助处理的那些方面(Agar,1991,p. 193)。于是,他们会选择一定的计算机软件来分析所收集到的资料。问题接着就产生了:研究者往往会迎合可采用的软件来从事研究,然后会报告计算机软件组成了他们的研究方法论。这似乎有"舍本求末"之嫌。

最终,计算机程序的使用还会带来伦理道德问题。阿克罗伊德(Akeroyd,1991)认为问题的核心是:建立在个体或团体基础上的私人机密性质的数据库,可能会面临个人隐私泄漏的危险。当涉及隐私的资料进入计算机内,安全性问题就立即产生了。在多人使用的系统里,隐私不能得到保证(Akeroyd,1991,p. 100)。绝对的隐私和绝对的安全再也不会存在。

费尔丁和李(Fielding & Lee,1998,pp. 186-189)推测了 CAQDAS 未来发展图景,他们认为这个领域进入了"分化"时期,一些软件包变得愈加深奥复杂,而其余的自产生以来就保持停滞不前。一些研发人员已经离开这个领域。Windows 操作系统看起来已经"淘汰了一大批倾向于保持编程和发展指令的研究人员"(Fielding & Lee,1998,p. 186)。那些可以将谈话记录直接储存在光盘存储器中的软件继续在发展。在一些程序中,谈话在记录的同时可以听到。这产生了关于阐释所听到的东西和阐释所书写记录的东西之间差别的争议(Fielding & Lee,1998,p. 188)。

互联网的发展也给 CAQDAS 带来变化。大量的项目现在可以通过网址找到。互联网的使用并非没有问题,例如对信息的共同限制,数据加密设备的控制,电子隐私,

① 计算机辅助方法中的变量分析已经开始朝着后实证主义解释模型方向转变。

以及对产生主题的道德协议的发展等(Fielding & Lee,1998, p. 188)。显而易见,计算机技术总体上会继续转变定性研究,使之越来越复杂。

## 谈话分析和文本分析

定性研究者研究记录人类经验的口述记录和书写记录,包括谈话记录、电影、小说和照片。从历史上来看,关于文本话语分析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法主要有三种,每一种方法都和一种悠久的理论研究传统联系在一起。内容分析联系着媒体研究中的定量分析传统,符号学联系着文学批评的结构主义传统,而叙事话语分析联系着阐释理论近期的后结构主义发展传统(Lieblich, Tuval-Mashiach, & Zilber,1998, p. 18)。

西尔弗曼(David Silverman)认为世事皆在谈话中完成。因此,实地资料往往是语言学的资料。他在第31章中,分析了以语言为中介的资料的三种类型:访谈、文本和副本。如同方塔纳和弗里(第24章),古布里厄姆和霍尔斯泰因(第18章)一样,西尔弗曼把访谈材料视为叙事记录而不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图像。他对访谈研究者提出五个问题,其中包括如何运用叙事资料去建构理论。

文本是建立在访谈和其他形式谈话记录基础上的。这些文本是社会事实,它们用社会组织化的方法来产生、分配和使用。西尔弗曼反对那些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文本进行分析的形式。内容分析法将存在于人们话语、观点以及经验中的不成文规定具体化。他认为内容分析使访谈到文本的阐释过程变得模糊不清。

研究者不能把文本形式的文件资料作为其他形式证据的替代物,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些文件是社会产物。它们不是对组织日常事务或者决策过程的清晰呈现。它们是情境建构的,由特定惯例和理解决定的特定类型的表述。这种文件资料适合通过符号、叙事和话语分析方法进行研究。成员归类分析(MCA)是一种有些类似叙事分析的方法。引用萨克斯(Harvey Sacks)的研究成果,西费尔曼阐述了MCA的逻辑(Silverman,1998),研究者使用此方法去询问人们在和他人互动时是如何使用日常用语及其类别的。随后,西费尔曼介绍了谈话的手稿。关于手稿的分析主要有两种社会科学传统,即会话分析(CA)和话语分析(DA)。西费尔曼回顾了这两种传统的历史,并举例说明。他将他的文章归结为四个观点:第一,定性研究不是以一套独立技术为基础的;第二,定性研究在揭示社会互动是如何按照惯例行事方面具有特殊优势;第三,定性研究提示了人们做事的方法;第四,定性研究的应用不仅仅局限于探索性目的。

总而言之,经验的文本形式是复杂的。但是如果谈话构成了大量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那么,西费尔曼所简要介绍的几种分析形式代表了重要的途径,可以使世界和世界的话语更加形象具体。

## 女性研究中的焦点小组访谈

第 24 章中,方塔纳和弗里特别提到,小组或者焦点小组访谈依赖在正式或者非正式场景下同时对几个个体进行系统性提问。在第 32 章中,麻德里兹(Esther Madriz)探讨了焦点小组访谈是如何运用于有色妇女的女性主义研究中的,从而有效推进了这一方法的研究[①]。她借助女性主义或者后现代方法,建立了一个焦点小组访谈的模型。这个模型强调了一种授权、道德共同体、感情投入和发展一种长期的信任关系的女性主义伦理。这种方法使那些长期保持沉默的有色妇女有了发言机会。焦点小组使妇女在一起进行写作训练变得更容易。作为一个拉丁美洲的女性主义者,麻德里兹把焦点小组访谈置于集体证言和小组反抗叙事的背景之中(参见第 21 章、第 20 章)。焦点小组缩短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但是参与者众说纷纭,限制了研究者对研究进程的控制。焦点小组谈话的非结构性特点也降低了研究者对访谈进程的控制。麻德里兹用他对下层有色妇女研究的例子阐明了这些观点。

借鉴种族批判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近期的发展成果(分别参见第 9 章、第 8 章),麻德里兹使我们意识到有色妇女经历着阶层、种族和性别三重压迫。焦点小组创造了种族批判意识和关注社会变迁意识产生的条件。通过焦点小组访谈,种族批判理论似乎发现了自己的方法论。

## 应用民族志

第Ⅳ部分应用的行动主题在第 33 章中延续,钱伯斯(Erve Chambers)在此章中广泛地分析了应用民族志的历史、形态和用途。应用研究是一种以制订决策为目的的调查,直接服务于一个或多个委托人的利益。也就是说,应用或行动民族志是一项主张社会变迁和促进不同社会群体间文化理解的研究。

钱伯斯讨论了应用民族志里三种截然不同的传统:认知、符号学、语义学的方法传统,微观和宏观分析传统以及行动和临床模式传统。认知方法尝试呈现特定情境中的原生观点,对特定地方使用的语言、分类和术语进行分解。微观和宏观分析通过洞察局部背景进而归纳出更大、更宏观的结构。例如,从一个社区的经历转移到国家经济。行动和临床模式提出一个支持模式。研究者在社区各种不同类型人群中建立合作关系,包括本土的专家、知情的局内人、教堂、学校、地方政府的领袖和国家、联邦机构的代表。

钱伯斯指出从事应用研究的研究者担负着重大的伦理道德责任(Trotter & Schensul,1998,p.692)。它会带来人文、社会和生态的后果,这些后果有时对一个社区的命运起着很关键的作用。这些后果是变化的,可能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

① 同样参考第 4 章对焦点小组法的讨论。

钱伯斯同时也提出了职业道德问题。他指出,业已获得公认的准则已经证明对应用民族志不大合适。坚守研究计划的秘密可能也是有问题的。同时,应用民族志研究者也面临道德问题,比如研究者应该支持谁的问题,或者他们是否能毫无偏见地为他人提供帮助的问题。

## 结　语

"作为方法论摆弄者"的研究人员应足够通晓本书中各章所介绍的关于收集和分析经验资料的各种方法。这种通晓指既要理解每种方法的历史,又要掌握每门方法的实施操作技巧。只有这样,一个研究者才能全面了解各种不同方法的局限和解释力。同时还可以清楚看到,每种方法作为一系列实践,如何生成自己的研究主旨。

此外,研究者必须明白每种范式和视角,正如第Ⅱ部分讲到的那样,都有独特的关于不同研究方法的传统。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作为工具的方法在应用时是通用的,但不是持所有范式的研究者都同样使用这些方法。当它们被使用时,往往切合或者与研究问题的范式的特性一致。

在第Ⅳ部分讲述的六种方法和技术(访谈法、观察法、文化产品研究、视觉方法、自我民族志和焦点小组访谈)中,实证和后实证主义者更倾向于使用结构性访谈和可以进行规范分析的文化产品研究。建构主义者和批判理论家各种方法都有所运用,女性主义者、酷儿理论家、民族学家和文化研究调查者等都使用以上的方法。同样地,持各种范式和视角的研究者会有选择地使用数据整理分析方法和讨论过的计算机辅助模型。

## 参考文献

Agar, M. (1991). The right brain strikes back. In N. G. Fielding & R. M. Lee (Eds.), *Using computer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81-194). London: Sage.

Akeroyd, A. V. (1991).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data: Some practical and ethical problems arising from data protection legislation. In N. G. Fielding & R. M. Lee (Eds.), *Using computer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89-106). London: Sage.

Atkinson, P, & Coffey, A. (1997). Analysing documentary realities. In D. Silverman (Ed.),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pp. 45-62). London: Sage.

Coffey, A., & Atkinson, P. (1996). *Making sense of qualitative data: Complementary research strategi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Fielding, N. G., & Lee, R. M. (1998). *Computer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Hayano, D. M. (1979). Auto-ethnography: Paradigm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Human Organization*, 38, 113-120.

Lee, R. M., & Fielding, N. G. (1991). Computing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Options, problems and potential. In N. G. Fielding & R. M. Lee (Eds.), *Using computer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13). London: Sage.

Lieblich, A., Tuval-Mashiach, R., & Zilber, T. (1998). *Narr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Oakley, A. (1981). Interviewing women: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In H. Roberts (Ed.), *Doing feminist research* (pp. 30-61).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Schwandt, T. A. (1997). *Qualitative inquiry: A dictionary of terms*. Thousand Oaks, CA: Sage.

Seidel, J. (1991). Method and madness in 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technology to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In N. G. Fielding & R. M. Lee (Eds.), *Using computer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07-116). London: Sage.

Silverman, D. (1998). *Harvey Sacks: Social science and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mbridge: Polity.

Trotter, R. T., & Schensul, J. J. (1998). Methods in applied anthropology. In H. R. Bernard (Ed.), *Handbook of cultural method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pp. 691-736).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 访谈：从结构式问题到引导式话题 24

THE INTERVIEW: FROM STRUCTURED QUESTIONS TO NEGOTIATED TEXT

⊙安德里亚·方塔纳　詹姆斯·H·弗里

哈姆雷特：你有没有看到天边那片云？它看起来像只骆驼。

（手指天上的一朵云）

波隆尼尔：老天，它的确像只骆驼。

哈姆雷特：我觉得它倒颇像只黄鼠狼。

波隆尼尔：它弓着背像只黄鼠狼。

哈姆雷特：或像条鲸鱼。

波隆尼尔：也像条鲸鱼。

《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二场

哈姆雷特式的询问……大约有三重意思：解释、证实和交流……

这种访谈似乎是宫廷权力关系的显现……

哈姆雷特式的访谈也许……可以被看做是对现实社会普遍性疑问的一个解释（或者，进一步说，这种访谈是引导式话题的一个例证）。

《访谈》（*Interviews*, Kvale, 1996）

提问、回答，看起来容易，实际上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无论我们提问的措辞多么谨慎、对答案的记录多么仔细，总还是会有一些含糊不清的地方。然而，访谈毕竟是我们理解他人最普遍、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访谈有多种类型和用途，最常见的访谈形式有个别的、面对面的言语交流，访谈还包括面对面的群体交流、邮寄或自填问卷以及电话调查。它可以是结构性的、半结构性的或非结构性的。访谈可以用来进行市场调查、民意测验、临床推理和学术研究；它还可以用于测量，或者是从个人的、群体的多重视角来理解研究的现象。访谈可以是一次性的、简要的事实陈述，5 分钟的电话交谈，也可以是多次性的、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如生活史访谈。

在今天，运用访谈获取信息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以至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被称为“访谈社会（interview society）”（Atkinson & Silverman, 1997; Silverman, 1993）。定性研究者越来越认识到，访谈并不是中立的资料收集工具，而是两个

人或多个人根据具体情境商谈的结果。因此,访谈不仅包括传统的"是什么"(日常生活活动)的问题,也包括人们的生活"怎么样"的问题(涉及日常生活秩序的建构)(Cicourel,1964; Dingwall,1997;Gubrium & Holstein,1997,1998; Holstein & Gubrium, 1995; Kvale, 1996; Sarup, 1996; Seidman, 1991; Silverman, 1993, 1997a)。

这一章首先讨论访谈社会,然后从结构式方法开始探讨访谈,逐渐转向访谈的定性类型,最后讨论引导式话题的访谈。开始我们将简要介绍访谈的历史,然后讨论访谈的理论价值。尽管这本书的重点是定性研究,但为了说明访谈的全部含义,我们不仅要介绍访谈的其他方法,也要讨论访谈的主要类型(结构式访谈、小组访谈和非结构式访谈)。需要说明的是,在对各种访谈方法的介绍中,我们采用了研究者在实际使用这些方法时所用的语言和解释,在这一章的后半部分讨论性别化访谈以及其他新的定性访谈类型时,我们指出了自己与这些研究者的不同,并提出了我们的批评。分析了结构式访谈以后,我们详细论述了定性访谈的各种要素,然后讨论了与性别化访谈相关的问题以及解释和报告的难题,并就伦理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最后我们特别提到了定性访谈的新趋势。

## 访谈社会

在开始讨论访谈之前,我们想简要介绍一下当今的美国社会对访谈的巨大依赖,这种依赖程度已让很多学者都把美国称为"访谈社会"(Atkinson & Silverman,1997; Silverman,1993)。无论是定性研究者还是定量研究者都倾向于把访谈作为资料收集的基本方法,不管其目的是为了获得被访者生活中某一事件丰富的、深入的经验资料,还是只为了得到一些简单的信息。人们相信访谈结果是可靠的、精确的,并且在访谈过程中,访谈者与被访者的关系也不会过分影响访谈结果(Atkinson & Silverman,1997; Silverman,1993)。对访谈的信奉和依赖反映并强化了将美国视为访谈社会的观点。

不仅是社会研究者,而且似乎每个人都将访谈作为信息的来源,都认定访谈的结果是被访者自身和其生活的真实写照。一个人不可能不接受访谈,访谈无处不在:如政治中的民意测验、医生家访时的调查表、住房申请、关于社会工作资格的表格、大学申请、脱口秀、新闻节目,等等。作为一种资料收集方法,访谈不只是被社会科学研究者或警局的侦探所使用,它已经成为一种"系统调查的普遍方式"(Holstein & Gubrium,1995,p. 1)。似乎所有类型的问题——私人的、敏感的、探索性的、苦恼的、责难的——都是访谈的目标,在访谈的情境中都是许可的。几乎所有的访谈,不管其目的如何(都可以形式多样—描述、询问、帮助、检验、评估),都在寻求传记体描述的各种形式。正如古布里厄姆和霍尔斯泰因(Gubrium & Holstein,1998)所指出的,访谈已变成了当代叙事的一种方式,在访谈中,人们向调查者诉说生活史。媒体也能很娴熟地运用这种技术。

作为一个社会,我们依赖访谈并且视之为理所当然。访谈以及围绕被访者和访谈者角色制定的标准已经制度化,不再需要广泛的培训。人们都熟悉并遵从这些规则和规范。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对访谈的传统假定表示怀疑——我们将在后面性别化访谈以及访谈的新趋势中回应他们的顾虑。许多研究者仍然在继续使用传统的访谈技术,访谈似乎是目前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在一个个性化、多样化以及角色关系特殊化的社会,访谈实际上已成为获得个人、群体和组织信息最可行的方法。因此,许多人觉得没有必要对每一种访谈情形都去重新制定规则,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访谈已变成一种日常的技术性实践和普遍的想当然的活动"(Mishler,1986,p. 23)。

但是访谈的专业化以及程序的标准化还远没有达到研究者可以忽略情境、社会及人际因素的程度。每一次访谈都是一种互动和关系,访谈的结果不仅仅是明确的叙述和回答,它也是社会互动的结果。访谈变成了一种普通的、不引人注意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回答率的持续下降,显示很少有人愿意敞开他们的"自我",或者他们认为在访谈时被要求太多,因此在访谈准许的范围内,他们变得更有选择性。但是社会科学家更倾向认为,访谈是相互影响的、随机访谈的社会动态性质决定了所获取的模塑知识的性质。访谈者一般没有受过社会科学家那么多的训练,也没有那么多经验,可能不会意识到访谈的参与者在围绕问题和回答积极地建构知识(Holstein & Gubrium,1995)。

下面我们将简要回顾访谈的历史:它的起源和发展。

## 访谈的历史

很久以前就有各种各样的访谈形式,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的人口普查(Babbie,1992)。在近代,访谈的传统主要由两种趋势演化而来:第一种,在临床诊断和咨询中,访谈被应用得相当普及和广泛,其所关注的是回答的质量;第二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访谈被大量地运用于心理测验之中,在这里关注的重点是测量技术(Maccoby & Maccoby,1954)。

人们一般认为,运用访谈进行社会调查的第一人是布思(Charles Booth)(Converse,1987)。1886 年,布思从事了一项关于伦敦居民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全面调查,其成果以《伦敦居民的生活和劳动》(*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 1902—1903)为题出版。布思的早期研究中就包含了个别访谈的方法,因为他不仅实施了他的调查研究,而且通过非结构式的访谈和民族志的观察来检验他的结论:

> 通过对大量邻居、街坊和家庭的访问以及与各种各样福利机构和社区领导人的讨论,资料不断得到检查和补充。在一些地方,布思常常作为一个普通的房客生活在那里,以便能够更密切地了解贫困阶层的生活和习惯(Parten,1950,pp. 6-7)。

伦敦许多其他的调查以及随后的英国其他城市的调查,都参照了布思的研究。在美国类似的情形也相继发生,其中,1895 年在芝加哥的一项研究试图完全按照布思在伦敦所做的那样来进行(Converse,1987),1896 年,美国社会学家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自己承认,按照布思的方法对费城的黑人进行了研究(Du Bois,1899)。接下来是城市和小城镇调查,其中最著名的是林德夫妇(R. S. Lynd & H. M. Lynd)的《中镇》(*Middletown*, 1929)以及《变迁中的中镇》(*Middletown in Transition*, 1937)。

民意测验是访谈的另一种早期形式。一些民意测验早在 20 世纪之前就已开始实施了,但是直到 1935 年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成立美国民意测验研究所,它才真正获得应有的地位。在盖洛普之前,20 世纪 20 年代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中,有一个对态度研究的趋向(通常是测量)。托马斯(W. I. Thomas)和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在社会心理学中运用文献法来推行态度研究。托马斯和帕克(早期曾做过记者,他坚信社会学应该进行实地研究)对芝加哥大学所做的社区研究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些研究最终被认为是芝加哥学派的成就。还有一些研究者也非常有影响,比如斯默尔(Albion Small)、米德(George H. Mead)、伯吉斯(E. W. Burgess)、休斯(Everett C. Hughes)、沃思(Louis Wirth)、沃纳(W. Lloyd Warner)和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最近一项有关芝加哥人的关系与影响的讨论,参见 Becker, 1999)

尽管芝加哥学派的成员被认为在调查中运用了民族志的方法,但是另一些人则不这么认为,他们注意到多数芝加哥学派的研究都缺乏现代民族志的分析成分,因此充其量不过是"第一手描述性研究"(Harvey, 1987, p. 50)。不管如何描述芝加哥人的实地工作,在研究中他们已经明确地将观察、个人文献和非正式访谈几种方法综合起来了。访谈在思拉舍(Thrasher, 1927/1963)的研究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他对帮派成员的研究主要依赖的就是对最初大约 130 个人的定性访谈。在安德森(Anderson, 1923)对流浪汉的经典研究中,也是依靠非正式的深度交谈。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和推动社会学民族志方法的工作主要由布卢默和他早期的学生贝克完成。访谈开始失去布思所赋予的折衷味道以及芝加哥学派所强调的定性的特征。通过访谈理解帮派成员或流浪汉已失去意义,与此相关的是在调查研究中访谈开始成为资料量化的工具,就像多年来在民意测验和市场研究中所做的那样。但是在二战期间,美国军方聘请了大量的社会学家,调查研究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发展。50 多万美国士兵以各种方式接受了访谈(Young, 1966),对他们的心理和情绪活动的研究报告后来出版了,这就是四卷本的《二战中的社会心理学研究》(*Studies in Social Psychology in World War* Ⅱ),前两卷《美国士兵》(*The American Soldier*)由斯托夫(Samuel Stouffer)直接指导,这部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为系统调查研究的广泛使用开辟了道路。

但是在接下来的三十年中,出现的新动向是定量调查研究进入学术界,并且作为一种优先选择的方法逐渐垄断社会学研究。一个奥地利移民,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是这种变动的先驱。他极其欣赏《美国士兵》,实际上,默顿

和拉扎斯菲尔德(Merton & Lazarsfeld,1950)还合编了一本书来分析《美国士兵》。拉扎斯菲尔德1940年调入哥伦比亚大学,同时也带来了他的市场研究和一些资金,这一切对于应用社会研究所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另外还有两个"调查机构":一个是1941年由菲尔德(Harry Field)成立的全国民意研究中心(the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开始在丹佛,后来迁到芝加哥;另一个是1946年由李克尔特(Likert)和他的研究小组成立的密西根调查研究中心。

那时,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是理论研究,反对这类应用性的、以数据为基础的社会学。一些社会学家和人文主义者,其中包括布卢默、米尔斯(C. Wright Mills)、小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和索罗金(Pitirin Sorokin)都对拉扎斯菲尔德以及其他调查研究者提出了批评,按照康弗斯(Converse,1987)的说法,索罗金觉得"他们对定量研究的强调有些过分,因此他把这些研究者叫做'定量研究迷'——特别是斯托夫和拉扎斯菲尔德"(p. 253)。康弗斯还引用了米尔斯的话"那些死守着方法论框框的人,如果不在数据统计的小作坊里进行操作的话,是不会对现代社会做任何评价的"(p. 252)。康弗斯指出,小施莱辛格将这样的调查研究者称为"社会关系贩子"(social relations hucksters, p. 253)。

但是调查研究者也有强大的联盟,比如默顿在1943年加入哥伦比亚大学调查中心,并且政府对调查研究的资助也越来越多。20世纪50年代,各大学的调查研究都有了明显的增长,调查研究逐渐扩大了它在社会学的影响,这种状况在1960年拉扎斯菲尔德当选美国社会学学会会长达到高潮。尽管其他方法开始削弱调查方法的重要性,但是调查研究的方法论优势从20世纪70年代一直延续到90年代。

定性访谈继续与参与观察一起使用,但是它太多地采用了调查研究的定量技术。这种情况在扎根理论中尤其明显(Glaser & Strauss,1967),因为它特别强调编码资料,并在民族方法学中追求社会行动的不变性质(Cicourel,1970)。其他的定性研究者则强调变动。洛夫兰德(Lofland,1971)批评扎根理论不太注重资料收集技术,道格拉斯(Douglas,1985)建议,应进行持续一天或更长时间的一对一的访谈,斯普拉德利(Spradley,1980)则试图阐明民族志观察和民族志访谈的差别。

近来,后现代主义民族志学者开始关注在访谈中出现的一些假设,并且注意控制访谈者的作用。这些关注导致了定性访谈的新趋势,即越来越重视被访者的意见(Marcus & Fischer,1986),访谈者与被访者的关系(Crapanzano,1980),访谈中研究者性别的重要性(Gluck & Patai,1991),以及其他因素的作用,如种族、社会地位和年龄(Seidman,1991)。

## 结构式访谈

在结构式访谈中,访谈者对所有被访者都询问同样的、事先设计好的问题,除了开放式问题(很少)以外,答案的类别十分有限,在回答时一般没有什么变动

的余地。访谈者根据事先设计好的编码方案记录答案,根据问卷控制访谈的节奏,将问卷当做剧本,以标准化、直线性的方式一步步加以处理。访谈者必须对所有的访谈情境一视同仁,以同样的顺序、同样的问题询问所有的被访者。在结构式访谈中,问题和回答都没有什么灵活性。访问员指南通常包括以下原则:

- 不要对研究进行过多的解释,只用设计者提供的标准解释。
- 不要偏离研究指南、打乱问题的顺序或者改变问题的措辞。
- 不要让别人打断访谈;不要让别人替被访者回答或者在被访者回答时发表他(或她)对问题的看法。
- 不要暗示同意或反对某个答案,不要给被访者任何关于调查问题的个人意见。
- 不要解释问题的含义,可以重复问题,并且给出在培训中统一规定的或是由设计者提供的说明和解释。
- 不要临场发挥,比如增加答案类别或者改变问题的措辞。

电话访问、在被访者家里面对面的访谈、在马路上或公园里中途拦截的访谈,以及与调查研究相关的访谈,都很有可能属于结构式访谈。

这种访谈情境要求访谈者扮演中立的角色,不要在被访者的回答中插入他或她的意见。访谈者必须建立"和谐的关系",一方面他或她一定是随意的、友好的,另一方面又必须是指导性的、客观的。访谈者必须做一个"感兴趣的听众"以回报被访者的参与,但对回答不做评价(Converse & Schuman,1974)。

乐观地说,在结构式访谈中,出错的可能性很小。在问卷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回答效应或非抽样误差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是被访者的行为。被访者可能故意取悦访谈者,或是阻挠访谈者获取自己的信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被访者会在答案中添油加醋,给出一个"社会期望"的答案,或者省略某些相关信息(Bradburn,1983,p. 291)。被访者还可能因为记忆错误而犯错。第二是方法本身的特性。问卷实施的方法(面对面或者通过电话)、问题的顺序或措辞。第三是访谈者。他的个性特征和提问技巧都可能妨碍问题的正常交流(Bradburn,1983)。访谈者本身犯错误的严重程度是至关重要的。

大多数结构式访谈几乎都没有给访谈者留下即兴发挥或独立判断的余地,但即使在最严格的结构式访谈中,也会有一些情况出乎预料,并不是每一个访谈者的行为都符合规定(Bradburn,1983; Frey,1989)。实际上,一项对访谈者影响的研究发现,访谈者会改变问卷中多达三分之一的问题措辞(Bradburn, Sudman, & Associate,1979)

一般来说,对访谈者影响的研究显示,访谈者特征如年龄、性别和访谈经历对回答只有很小的影响(Singer & Presser,1989)。但是有证据表明,学生访问员对回答的影响比非学生访问员更大,地位高的访问员比地位低的访问员影响更大,访问员的种族只在涉及种族方面的问题时产生不同的效果(Bradburn,1983; Hyman,1954; Singer, Frankel, & Glassman,1983)。

在结构式访谈情境中,访谈者对回答的质量影响很小,这主要是因为这类访

谈本身是无弹性的、标准化的、预先设计好了的,几乎没有犯错误的机会。但是那些提倡结构式访谈的人并非没有意识到,访谈发生在社会互动的情境之中,并受这种情境的影响。一个优秀的访问员不但能够认识到这个事实,而且能够敏锐地感觉到这种影响是如何发生的。康弗斯和舒曼(Converse & Schuman,1974)指出,"没有一种访问类型适合所有的场合和所有的被访者"(p.53)。这意味着访谈者必须意识到被访者的不同并根据需要做出适当调整。正如戈登(Gorden,1992)所说"访谈技巧不是像骑自行车一样的简单运动技能,确切地说,它们是观察、移情敏感度和理智判断的高度结合"(p.7)。

只理解访谈技巧是不够的,理解被访者的世界与可能刺激或阻碍回答的力量也相当重要(Kahn & Cannel,1957)。但是若假定只要问题问得合适,被访者就会真实地回答,那么结构式访谈就是按一种刺激—反应模式进行的。这种类型的访谈经常会得到一些理性的答案,但它忽略或错误估计了情感方面的作用。

## 小组访谈

小组访谈本质上是一种定性资料收集技术(Madriz,本书第32章),依赖于在一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情境中,对几个人同时有系统的提问。因此这种技术介于正式和非正式访谈之间。

在焦点小组(focus group)的名称下,小组访谈的使用常令人联想到市场研究。这种研究的目的是收集顾客对产品特征、广告主题、送货服务等方面的意见。这种方式也被一些政党和候选人大量使用,用来了解投票人对一些问题和政策的反应。小组访谈还被运用于社会学的研究中:鲍格达(Bogardus,1926)用小组访谈检验了他的社会距离量表,朱克曼(Zuckerman,1972)访问了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汤普森和德梅拉斯(Thompson & Demerath,1952)研究了军队中的管理问题,摩根和斯帕尼什(Morgan & Spanish,1984)研究了健康问题,我们调查了年长工人劳动力的再就业问题(Fontana & Frey,1990),默顿与他的合作者运用小组访谈研究了宣传效应(Frey & Fontana,1991)。实际上,默顿、弗斯克和肯达尔(Merton, Fiske, & Kendall,1956)杜撰了"焦点小组"的术语来说明这样一种情况,即研究者或访谈者在做了大量的研究之后再就相关议题询问一些特殊的问题。也有证据显示,公认的人类学家如马林诺夫斯基曾使用过这种技术,尽管他们没有报道(Frey & Fontana,1991)。今天,即使小组访谈的特征和类型千变万化,但所有的小组访谈仍普遍被认为是焦点小组访谈。

在小组访谈中,根据访谈的目的,访谈者或主持人可以选择结构式的方式或非结构式的方式来指导调查和控制被访者之间的互动。访谈的目的可能是探索性的,比如研究者召集几个人在一起,或者检验一种方法论的技术、界定研究的问题,或者确认关键的信息提供者。这种探索性意义的一个延伸,就是小组访谈可以用来预先检验问卷的措辞、测量量表或调查设计的其他要素,这在目前的调

查研究中十分普遍(Desvousges & Frey,1989)。小组访谈也能成功地用来帮助被访者唤起对一些特殊事件的记忆,激发出对事件的细节描述(比如一场灾难或一次庆典)或由一个小组成员共同分享的经验。小组访谈还能够用于三角测量,或与其他资料收集技术同时使用。比如,通过将个人回答放入一个具体的情境中,小组访谈有助于理解"模糊的三角测量"过程(Cicourel,1974)。最后,小组访谈无论是作为资料收集的唯一方法,还是与其他技术一起使用,现象学目的都是可以达到的。

小组访谈依据其目的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它们可能是非结构的或没有访谈者指导的头脑风暴会议,也可能是典型的结构式,像名义小组(nominal)和市场焦点小组。在后一种类型中,访谈者的作用是非常明显和富于指导性的。实地工作的情境为小组访谈既提供了正式的机会,也提供了非正式的机会。实地研究者可以将被访者带入一个正式的场景中并询问非常直接的问题,也可以将他们带进一个自然的场景,像街角、邻近的小酒馆,这些地方对于那些非正式而目的明确的调查来说,是非常有利的环境。

小组访谈可以在几个维度上进行比较。首先,访谈者可以是非常正式的,采取指导性和控制性立场,严格地引导讨论,不允许偏题和离题,这是焦点小组和名义小组/德尔菲小组的模式。在后一种情况下,参与者完全是分开的,但通过一个协调人或访谈者分享和交流意见。不直接提问的方法更可能运用在自然的实地情境中,如街角或一个控制的环境(比如研究实验室),在那里,研究的目的是现象学的,只就某一主题确立一个大致范围。也可以根据问题形式和目的来区分小组访谈,在这种情况下,小组访谈可以是探索性的、试调查或现象学的。探索性访谈的设计是为了增加对一个主题或环境的熟悉和了解,访谈者可能是非常富于指导性的(或者相反),但问题通常是非结构式的或开放式的。现象学目的的访谈中也采取同样的形式,目的是为了在深度和多样性上发掘主体间的意义。在试调查的访谈中,问题形式一般是结构式的,访谈者是指导性的。表24.1从不同的维度比较了几种小组访谈。

表 24.1 小组访谈的类型和维度

| 类 型 | 场 景 | 访谈者角色 | 问题形式 | 目的 |
|---|---|---|---|---|
| 焦点小组 | 正式—预设 | 指导性 | 结构式 | 探索性<br>试调查 |
| 头脑风暴法 | 正式或<br>非正式 | 非指导性 | 高度结构式 | 探索性 |
| 名义小组/德尔菲 | 正式 | 指导性 | 结构式 | 试调查<br>探索性 |
| 实地,自然的 | 非正式<br>无约束 | 适度的<br>非指导性 | 高度结构式 | 探索性<br>现象学 |
| 实地,正式的 | 预设的,<br>但在实地 | 有些指导性 | 半结构式 | 现象学 |

资料来源:Frey & Fontana(1991,p.184)

实施小组访谈的技巧与个别访谈没有明显的差别。访谈者必须灵活、客观、移情、有说服力、做一个好听众,等等。但是在小组访谈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在个别访谈中没有发现的问题。默顿等人(Merton et al., 1956)指出有三个特殊的问题:第一,访谈者必须防止一个人或小团体控制小组;第二,访谈者必须鼓励那些不顺从的被访者参与;第三,访谈者必须从全部被访者那里得到回答以保证收集到有关议题的最全面信息。此外,访谈者必须在指导性的访谈者角色与协调人角色之间取得平衡,这要求对被访谈的群体进行动态管理;小组访谈者必须既考虑到预先准备的问题,又随时关注小组成员之间互动状况的变化。

小组访谈具有一些个别访谈所没有的优点:实施起来相对经济,能获得丰富、详尽的资料;能刺激被访者的回忆;形式灵活。但小组访谈也存在一些问题:结果不能推论;新出现的群体文化可能干扰个体的表达;小组可能被某个人控制;结果可能是"小团体思想"。小组访谈对访谈者的技巧要求也比个别访谈更高一些。因为小组的状况是不断变化的。此外,这种方法不太适合研究敏感性话题。然而,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小组访谈都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 非结构式访谈

非结构式访谈比其他定性方法能收集到更广泛的资料。在这部分我们将讨论非结构式访谈的传统类型:开放式的、民族志的(深入的)访谈。很多定性研究者都对深度(或民族志)访谈和参与观察做了区分。然而,正如洛夫兰德指出,这两种方法是密不可分的,参与观察中收集的很多资料都来自于非正式的访谈。分析一下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1967/1989)的日记:

> 星期六8点(1917年12月)。起来晚了,感觉很不好,用了点灌肠剂。大约1点钟我出了门。听到叫喊声,从 Kapwapu(来的人)正带着 uri 给 Teyava。我和土著人坐在一起,与他们聊天、照相,然后回来。Billy 修正并补充了我关于 wasi 的笔记。在 Teyava,一个老人谈了很多捕鱼的故事,但我听得不太懂。然后我们转到他的 bwayama,谈起 lili'u。晚上,我跟一个警察谈起 bwaga'u, lili'u 和 yoyova 时,他们不停地问我关于战争的事。因为他们笑,我生气了。Billy 又跟我讲了很多有趣的事。服了一点奎宁和泻药。

马林诺夫斯基的"实地日记"显示了在实地工作中非结构式访谈的重要性,并清楚地阐明了结构式访谈和非结构式访谈的差别。马林诺夫斯基想了解一些普遍性的问题,但他没有采用封闭式问题和正式访谈的方式。而且他违反了(像大多数实地工作者那样)结构式访谈者的两个"基本禁忌":①他回答了被访者的提问,②他受自己个人情感的影响(像所有的实地工作者那样),因此他违背了"理想"中的冷静、保持距离的理性访谈者的原则。

马林诺夫斯基的例子反映了结构式访谈与非结构式访谈的差别:前者的目的是获得精确的定量资料以便在预设的范畴中解释行为,而后者的目的是理解

社会成员复杂的行为,并不强行地将这些行为纳入有限的预先分类之中。

马林诺夫斯基的访谈在某种程度上说仍然是结构式的——有场景、有明确的信息提供者,能清楚地看到被访者。在另一种类型的访谈中,可能没有场景。比如赫茨(Hertz,1995,1997b,1997c)对历史上某一时刻而不是某一个地方妇女的调查。另外在他们对单身母亲的研究中,赫茨和弗格森(Hertz & Ferguson,1997)访问了一些难以确定身份的女人,她们不属于任何一个群体和社区。有时这些被访者很难找到,但是研究者碰到的其中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极有价值的信息提供者。赫茨和弗格森依靠商人和朋友为他们的研究寻找单身母亲。方塔纳和史密斯(Fontana & Smith,1989)发现被访者有时很难确定身份,在 Alzheimer 的病人研究中,他们经常将护理者与早期病人相混淆。同样地,在方塔纳(Fontana,1977)对贫困老人的研究中,根本没有固定的场景,他只是在公园里散步,那里有很多老人,然后他去找那些衣冠不整的老人交谈。

斯普拉德里(Spradley,1979)恰当地区分了访谈的不同类型,对访谈者与被访者之间的互动做了下面的描述,这在传统的社会学界无法想象,然而却又是非结构式访谈最根本的东西——与被访者建立人与人的关系,渴望理解而不是解释:

> 不久她笑了,把手放在她的胸脯上说"Tsetchwe",这是她的名字,"Elizabeth"我指着自己说。她回答"Nisabe"……然后她肯定怀疑我是一个女人,就勇敢地把手放在我的胸脯上,证明我是女人,她又摸摸她自己的胸脯,很多澳洲丛林的居民都这样做;在他们看来,所有的欧洲人都是一样的。她说"Tasu si"(女人),停了一下,她开始教我(pp. 3-4)。

斯普拉德里继续讨论访谈者从土著人那里学到的东西,他们的文化、语言,他们的生活方式,尽管每一种研究会有所不同,但这些都是非结构式访谈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已经被详细地讨论过,我们不必再阐述(关于非结构式的详细描述,可参见 Adams & Preiss, 1960; Denzin, 1989b; Lofland, 1971; Spradley, 1979)。这里我们提供一个简明的大纲,请记住这里所描述的仅仅是一些探索性的方法,每一种研究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基本的要素都有细微差别,在组合上也会有所不同。

在本章的后半部分讨论新趋势的时候,我们将访谈定格为一种积极的、自主发生过程,并对这些思想进行分析。我们认为我们的访谈社会将会指导人们如何从事这些探索性研究(Silverman,1993,1997a,1997b),同样地舒瑞(Scheurich,1997)公开批评了实证的和阐释的这两种访谈,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现代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对于舒瑞来说,访谈(和它的语言)不是固定不变的过程,它会随对象、环境、时间的不同而不断发生变化。

**进入现场**。我们应该怎样"进入"?当然要视我们准备研究的小组的情况而定。一个人为了研究"裸体海滩",他可能会脱去衣服,裸体散步(Douglas & Rasmussen,1997),一个人为了研究和尝试像朋友一样对待地狱天使(the Hell's Angels),他可能会去买一辆大摩托车经常到某个地方的破旧酒吧(Thompson,

1985)。"进入"的方法和尝试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获得进入现场的机会,有时也许本身就没有现场。当方塔纳(Fontana,1977)试图研究无家可归的贫困老年人时,每调查一个被访者都要重新进入。

**理解被访者的语言和文化**。韦(Wax,1960)在一项对1943—1945年美国集中营里"不忠诚"的日本人的研究中,对于了解被访者的语言和文化的重要性给予了深刻的描述。在研究中,韦克服了大量的语言和文化障碍,尽管被访者能够流利地使用访问者的语言,但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表达方式,而有的东西也许根本就无法言说,语言和文化是紧密相关的。韦写道:

> 我提出想看那封信时,刚才还在闲聊的一帮人马上沉默了。主人的窘态很明显,faux pas(失礼)不是看一封信,因为信的内容已相当清楚明白,它实际上表达的是日本人不会给白种人看一封含有朋友"不忠诚"言论的信(p. 172)。

一些研究者,特别是在人类学的访谈中倾向于依赖翻译,这容易使原有的意思、偏见、解释受到影响,导致糟糕的误解(Freeman,1983)。一些特殊的专业术语,比如医生的医学术语,对于不是医生的人来说常常是很难理解的。

**决定如何出场**。作为医学院的学生代表应该如何出场(Becker,1956)?我们应该将访谈当做拉家常吗(Spradley,1979)?我们的穿着是否应该与被访者相像(Fontana,1977;Thompson,1985)?我们代表殖民文化吗?或者我们应该以谦虚的"学习者"的身份出场吗(Wax,1960)?这个决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访谈者呈现的自我形象一旦"定型",它将给被访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对研究的成功与否产生巨大的影响。有时,研究者不小心将自我印象歪曲了,像约翰逊(Johnson,1976)在研究一个福利事务所时发现,尽管他努力避免被工人认为是资方的"间谍",但结果却适得其反。

**寻找知情人**。研究者一定要找到一个知情人,一个被研究群体中的成员,他愿意提供信息,愿意充当向导和翻译,解释当地的习俗、术语和语言。尽管没有这样一个信息提供者,研究者也能做访谈,但是如果能找到一个这样的人,他将节省大量的时间和避免错误。典型的"社会学的信息提供者是怀特(William Foote Whyte)的《街角社会》(*Street Corner Society*)里的多克(1943)。没有多克的帮助和引导,怀特的研究是否能达到现有的水平是值得怀疑的。非常富有指导意义的是拉宾诺(Paul Rabinow)对他与其主要信息提供者(Abdal-malik ben Lahcen)之间关系的论述。马利克(Malik)不仅是一个翻译,而且为拉宾诺提供了接近当地人的方法,通过他的帮助,拉宾诺看到了自己和一个土著的摩洛哥人之间的巨大差别。

**获得信任**。如果研究者只是询问被访者是否赞成在他们国家建立核垃圾堆(Frey,1993)之类的问题,那么研究者不需要在获得信任方面做太多的工作,因为被访者如果在核垃圾堆方面有想法的话会很愿意表达,有时甚至有强烈的表达愿望。但如果是想问一个人性交的频率和节育方法的选择,那情况就不同了。访谈者必须得到被访者的信任(Cicourel,1974),拉斯穆森(Rasmussen,1987)不

得不在按摩院的等候室旁观了几个月之后,女按摩师才开始相信他并告诉他一些内部的秘密,与顾客"按摩"关系的类型。获得信任是访谈成功的基本要素。而且已经得到的信任也是很脆弱的,研究者的任何失礼都有可能会彻底破坏他经过长时间努力获得的信任。

**建立关系**。因为无结构访谈的目标是"理解",所以研究者与被访者建立友好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换句话说,研究者要能扮演被访者的角色,试图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看问题,而不是将自己的学术观点和先入之见强加给他们。尽管与被访者建立亲密关系能够使研究获得更多的信息,但也可能因此而产生一些问题,比如研究者可能变成了被研究群体的代言人,而失去了自己的立场和客观性,或者就"成了当地人",成了被研究群体中的一员而放弃了自己的学术角色。有时,研究者可能感觉与被访者关系不错,但结果却不是,比如汤普森(Thompson,1985)就提到了一件相当可怕的事情,当他的研究接近尾声时,他遭到了地狱天使的野蛮鞭打。在另外的研究中,即使到结束的时候,一些研究者也觉得他们从来没有与调查对象建立过友好关系。像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1967/1989)总是怀疑土著人的动机,有时因他们野蛮的纵欲而苦恼或者因为他们公然的撒谎和行骗而生气:"午饭后我(拿着)一块黄色印花布,谈起 baloma,我做了一个小的 sagali, Navavile。我受够了那些黑鬼。"(p.154)

**收集经验资料**。因为实地研究在野外,不可能给研究者提供摄像机、隔音室和高级的录音设备。洛夫兰德(Lofland,1971)曾就如何做访谈,如何记录访谈内容,如何做实地笔记,如何组织笔记内容做了详细的介绍。然而,实地工作者经常需要创造性地运用这些方法,尽可能不引人注目地使用微型录音机,或者用大脑记着,然后冲进浴室找一个隐蔽的角落迅速记下刚才的内容,有时甚至就记在卫生纸上。我们同意洛夫兰德的观点,不管情况如何,研究者都应该做到:①定期和及时地做笔记;②记录所有的事情,不管在当时它多么不重要;③记笔记的时候尽量不惹人注意;④经常思考、分析笔记的内容。

## 其他类型的非结构访谈

在本章的后面,我们将讨论经验资料的解释和报告问题。在这一节里,我们简要概述几种不同类型的非结构式访谈。

### 口述史

口述史与其他非结构式访谈的区别不在方法论上,而在它的目的。口头收集历史资料的方法可以追溯到古代,而它在现代的正式组织可以回溯到 1948 年,内文斯(Allan Nevins)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的口述史计划(Starr,1984,p.4)。口述史记录了种种生活的形式,从普通人谈论他们的职业[Studs Terkelis,《工作》(*Working*),1975]到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回忆过去的往事[Merle

Miller,《平易的演讲》(*Plain Speaking*)1974,参见 Starr,1984)。口述史的文字记录常常是不公开出版的,但是大多都能在图书馆里查到,那些沉默的、值得纪念的东西期待有人找到它们、利用它们。最近,口述史在女性主义者中间变得相当流行(Gluck & Patai,1991),她们将它看做是在一种文化中理解和生产妇女历史的方法,而妇女历史在传统上是依靠男性来解释的。"拒绝继续在历史中被当做沉默的人群,妇女正在创造一个新的历史——用我们自己的声音和经验。"(Gluck,1984 p.222)

与口述史研究(实际上是所有的访谈)相关的,是记忆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回忆的研究。比如施瓦茨(Schwartz,1999)分析了我们生命中会回忆重大事件的某些时期。他总结道:"传记性的记忆……最好作为一个社会过程来理解","当我们回首往事时,我们发现关于自己生活的记忆一直和别人的经验联系在一起(p.15;也参见 Schwartz,1996)。艾利丝(Ellis,1991)依靠"社会学的反思"重构了一些她过去生活的事件。在艾利丝的作品中最突出的是她重新塑造了自己与她配偶韦恩斯坦(Gene Weinstein)9 年的关系。在文章中,她描写了当他们面对他每况愈下的身体健康状况,一直到最后与死神较量时,两人所进行的一些富有感情的谈话(Eills,1995)。

### 创造性访谈

与口述史相近,但作为一种更传统的社会学工具使用的是道格拉斯(Douglas,1985)的"创造性访谈",道格拉斯反对对访谈进行入门指导,因为非结构式访谈主要发生在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世界。因此访谈和访谈者必须具有创造性,放弃那些固定的规则,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与口述史学家相类似,道格拉斯也将访谈作为从社会成员中收集口头传说的工具。在创造性访谈中,这些报告常常会超过传统的非结构式访谈的长度,变成"生活史",因为这种访谈一般会跨越被访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 后现代访谈

道格拉斯对访谈者本身所起的重要作用的关注,被女性主义口述史工作者所认可,并且成为 1980 年代中期后现代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访谈方法中最重要的元素。马库斯和费舍尔(Marcus & Fischer,1986)一般称为民族志,但他们对非结构式访谈的讨论是恰当而贴切的,正如我们所见,非结构式访谈已成为实地工作中收集资料的重要方法。马库斯和费舍尔对研究者在资料收集和报告结果时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反思,这种关注引出了一些指导访谈的新方法,即如果不能消除也要尽量减少访谈者的影响。这类访谈中有一种叫"多音(polyphonic)"访谈,被访者的声音几乎没有受到研究者的影响而被记录下来,并且作为一个整体通过研究者的解释而报告出来。不同被访者的各种观点都得到报道,有冲突的问题被讨论,而不是被掩盖(Krieger,1983)。"阐释性的"互动主义追随创造性访谈和多音访谈的脚步,但又从乔伊斯(James Joyce)那里借用了一个概念,增加了一

个新的要素“顿悟”,邓津(Denzin,1989a)将之描述为“那些在人们生活中留下印记的互动时刻,有可能让一个人从别人的经验中获得体验”(p.15)。因此调查的主题可能会因为关注人们生活中特定的时刻而被戏剧化,并有可能产生更丰富和更有意义的资料。最后,因为后现代主义者正在寻求理解和报告资料的新方法,我们希望能注意这样一个概念“oralysis”,它指的是“来源于日常生活的口述形式,以录像的方式,与文字形式一起应用于分析的目标”(Ulmer,1989,p. xi)。在 oralysis 中,传统的访谈产物——谈话,与可见的图像形式相连,根据厄尔默(Ulmer,1989)的说法,是提供了一个由电视媒介控制的与社会相符合的产物。

## 性别化访谈

> 一个主妇走进一家货物齐全的商店去买一口煎锅。她的想法不会是完全按照一个方向依次去找,很有可能是在多种两维取向间做出选择:是铁的还是铝的?厚的还是薄的?金属柄还是木头柄?有盖还是无盖?深的还是浅的?大的还是小的?这个品牌还是那个品牌?价钱中等的还是较高的?买还是不买?现金还是支票付账?托运还是自己带回?这种两维取向的问题本身在记录答案或者用表格形式表示的时候是简单的(Payne,1951,pp. 55-56)。

以上引文描述了在访谈中对待妇女流行的家长式态度(Oakley,1981,p.39)以及对编码答案的青睐,因此就只提供了有限的二项选择。传统访谈范式除了对妇女具有优越感的倾向外,并不能提供性别差异的其他解释。实际上,巴比的经典著作《社会研究实践》(*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1992)只有三次简要提及性别,并且没有谈到访谈中性别的影响,正如奥克利(Oakley,1981)中肯地指出:无论是访谈者还是被访者都是没有特征的,如果要收集支持假设的客观资料,他们必须是无特征的。然而,正如邓津(Denzin,1989a,p.116)告诉我们的“性别过滤器知识”,当访谈是在一个家长制社会进行时,由于男性身份与女性身份的不同,访谈者和被访者的性别确实有影响。

在典型的访谈中存在着等级关系,被访者处于从属地位。要求访谈者要有礼貌、友好、讨人喜欢:

> 访谈者的言谈举止应该友好、礼貌、健谈、公正,既不太严历也不太感情奔放,既不要说话太多也不要太胆怯。应该让被访者感到舒适、不拘束,**这样访谈者便可以自如、充分地交谈了**(selltiz, Jahoda, Dentsch, & Cook, 1965,p.576。黑体部分是增加的)。

然而,正如上面引文黑体部分所显示的,这种努力是获得被访者信任和信息又不需要其他感情回报的一种策略。访谈者不要说出他们自己的观点,也不要直接提问。谈话似乎成了一个单向的“伪”谈话,这引起了对人们进行机会主义原因研究中固有的道德困境(Fine,1983—1984)。当被访者是女性时,访谈会提

出一些额外的问题,因为直接与研究相关的预设格式,倾向于忽略对被访者个人的关注,省略任何离开主题的尝试和过于详尽的叙述。这种形式也妨碍了任何个人情感和情绪的流露。

沃伦(Warren,1988)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实地工作中讨论了性别问题,其中的许多问题也反映在民族志访谈中。有些涉及入场和信任等惯例性问题。因为访谈者的性别被强化了。特别是在高度性别隔离的社会:"我从来没有碰见任何禁止妇女的情况。无论什么时候我到一个居民区访问,我都会和妇女们坐在一起,男人们就聚在客厅或房子前面……但我从来没有到过这样的地方:男人们坐在一起喝酒或拿着酒聊天。"(Sudarkara,1986,节录自:Warrer,1988,p. 16)

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将女性人类学家看做一个雌雄同体的个体或者在她研究期间给她一个名誉男性的身份。沃伦(Warren,1988)也提出了女性研究者的一些优势,因此也不一定全是坏处。另外一些问题与访谈者的地位、种族以及访谈情境有关。而且在一个家长式社会,这些问题会因为研究者的性别是女性而被扩大。女性研究者有时要承受一些额外的负担:模糊自己的性别,或掩饰性骚扰(Warrer,1988,p. 33)。

女性主义研究者要求避开传统访谈范式。奥克利(Oakley,1981)认为,访谈是一种男性的范式,嵌入在男性文化之中,强调男性特征同时排除像敏感、多情和其他在文化上被认为是女性特征的东西。然而,人们对于继续将访谈的妇女视为"客体"、很少或根本就不将她们看做独立个体的状况,越来越不满意了,特别是女性研究者(Oakley,1981;Reiharz,1992;Smith,1987)。尽管这种不满来源于道德和伦理的原因,但它也是与方法论相关的。正如奥克利(Oakley,1981)指出,在访谈中,"没有互惠就没有亲密"(p. 49),因此,应该特别强调转换,允许访问者和被访者建立亲密关系;在访谈中,访谈者应尽量缩小双方身份的差异,抛弃传统的等级观念。访谈者要显示他们人性的方面,解答疑问,表达感情。从方法论上看,这种新方法能获得更丰富的资料,能对被访者的生活有更深入的了解或"参与",避免等级的陷阱(Reinharz,1992,p. 22)——因为这种方法既鼓励访谈者控制访谈的顺序和语言,也给予他们开放式回答的自由(Oakley,1981;Reinharz,1992;Smith,1987)。即"女性总是……受到鼓励,要'离开主题'进入她们个人经历中的一些细节,详细叙述她们工作中的一些轶闻趣事。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获得大量重要的信息"(Yeandle,1984;引自:Reinharz 1992,p. 25)。

赫茨(Hertz,1997a)塑造了一个可见的研究者自我,并且认为这仅仅是研究者开始从事实地工作时众多自我中之一种。她认为访谈者必须是自省的,必须做到"在对过去经历进行访谈的同时自己的意识还停留于现在"(p. viii)。通过这样的行动,他们将会增加对访谈者与被访者之间意识形态、文化和政治差异的理解。

赫茨还强调了"声音"的重要性——作为作者,我们将如何表达和书写我们的故事;我们将引用哪些材料,又舍弃哪些材料;我们将选择和不选择谁的声音来表达。在《对黑人妇女的口述研究》(*Narrative Research With Black Women*,

1997)一书中,我们发现了对声音的特别关注。撰稿人之一,奥博(Obbo,1997)写道:

> 这一章做了一个谨慎的尝试:给予妇女的声音以表达的机会,充分展示她们的感觉和经验,使她们不再仅仅只发出微弱的声音,也不仅仅被置于政治、社会和文化事件的陪衬地位。在男性文化史的叙述中,妇女的声音被贬值。即使他们知道女性也是信息的重要提供者,因为在社会中男性声音的权威和优势,女性的声音便变得无关紧要了(pp. 42-43)。

这种维持现象的完整性,保留被访者观点的承诺,就像用他们的日常语言表达一样,与现象学社会学和经验主义社会学采取的立场是近似的(Douglas & Johnson, 1977; Kotarba & Fontana, 1984),同时也反映了后现代民族志学者的关怀(Marcus & Fischer, 1986)。不同在于:①增强了对被访者/参与者的道德关怀。②试图修正男性/女性的等级差别和现存的家长式统治结构。③最重要的是提出了成员资格的问题,因为男性研究者对女性被访者进行访问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怀疑了。

贝哈(Behar,1996)质疑了访谈中存在的一些不确定性问题:在实地工作中研究者的定位在哪里?我们应该把自己暴露到何种程度?怎样使我们的角色和位置保持一致?贝哈使我们看到:访谈者、作者、被访者,以及访谈都不是清楚明确的存在,相反,他们含含糊糊地紧紧缠绕在一起。

一些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已经不再关注访谈或实地工作本身,里查德森(Richardson,1992a)正在寻求用一种新的表述方式来报告她的结果,她用诗歌的形式描述了她的实地工作。克拉夫(Clough,1998)分析了目前范式下实地工作的状况,提出要重新评估整个社会学研究工作,不带家长式偏见地重读现在的社会学文本。她们的声音恰好回应了史密斯(Smith,1987)关注的问题,史密斯形象地写道:

> (一项研究设计的)问题和它独特的解决方式类似于壁画专家们的技巧,通过这些技巧,画家们可以在一面墙上表现出故事的不同瞬间。问题是画家如何在二维的墙壁上表现出一个时段中的情节和动作世界(p. 281)。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觉得我们不能从其他重要"过滤性知识"的要素中将性别因素单独提出来。其中科林斯通过成员资格——美国文化中的黑人和妇女,令人信服地记录了有关过滤的知识。韦斯顿(Weston,1998)得到了一个对于性别特别具有说服力的个案,她声称不应该分专业区别对待,因为对于整个社会科学来论,它是一个整体,很明显,社会性别、生理性别、种族不能分离,种族、阶级、等级、身份和年龄(Seidman,1991)都是这个复合体的一部分,然而,在访谈的影响要素中经常被忽略。

## 访谈的表达和阐释

除了在二维空间表达真实的事件以外,我们还需要处理如何表达以及谁来表达的问题,用社会学的话来说,这意味着要选择访谈类型,运用访谈技巧,并且记录资料的方式都要在研究的结果中进行叙述。另外,这些资料必须解释,而且研究者对报告什么资料,以及如何报告有很大的影响力。

### 访谈的表达

大量关于结构式访谈技巧的书籍已经出版了(Babbie, 1992; Bradbum et al.,1979;Gorden, 1980; Kahn & Cannel,1957),也有大量的文献是关于小组访谈的,特别是在市场调查中(有关这一领域的文献综述,见 Stewart & Shamdasai, 1990)。小组访谈的使用已经和定性社会学联系在一起了(Morgan, 1988),非结构访谈的技术也被详细讨论过(Denzin 1989b; Lofland, 1971; Lafland & Lofland, 1984; Spradley, 1979)。

正如我们提到的,如果考虑非正式特点,依赖场景的特性,避开预设的一套技术等方面,那么非结构式访谈形式千变万化(Douglas, 1985)。然而不管访谈者是一个厉害人物,还是照本宣科,访谈都涉及一些技巧。碰到不同的情况,技巧应该随之改变。改变技巧被称为使用策略。传统上,研究者和被访者会进行一场非正式的谈话,因此他或她在牢记调查主题的同时必须保持一种"友好"的声调与被访者交谈。研究者开始必须用一些一般性问题来"打破坚冰",然后逐渐转到更具体的问题,同时,还要尽量不露痕迹地问一些问题以检验被访者所谈内容的真实性,研究者应该避免陷入一场"真的"谈话,避免在谈话中回答被访者的提问或者就讨论的问题发表个人意见,研究者可以不加入自己的意见,避免"掉进陷阱"("我怎么认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观点")或者假装无知("对这个问题我真的不懂,不知道说什么,你是专家")。当然,正如我们在性别化访谈中所看到的案例一样,研究者可能会拒绝使用这些技巧,而与被访者开始一场"真的"交谈,互相迁就,分享移情式的理解。

语言的作用,特别是专业术语的作用在"意义分享"的创作中是很重要的,在这种创作中,访谈者和被访谈者通过上下文来理解某一特殊说法所要代表的东西,比如,在研究裸体海滩的时候,道格拉斯和拉斯穆森(Douglas & Rasmussen, 1977)发现"裸体海滩少女"这一术语与贞洁无关,其准确的意思指的是一个人的臀部是白色的,说明那些人是刚到裸体海滩来的。语言在描述问题类型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宽阔、狭窄、主要的、引导的等)。

访谈中的非语言技巧也很重要,有四种基本的非语言交流形式:

> "人际距离(proximic)"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来反映人们对交流的态度,"时位(chronemics)"是在谈话中对讲话节奏及沉默时间长短的控制,

“身势(kinesic)”交流包括任何身体动作或姿势,“附属语言(paralinguistic)”交流包括音量、音调和音色的所有变化(Gorden, 1980, p. 355)。

这四种形式为访谈者描述了一些重要的技巧。另外,访谈也应该仔细观察和记录被访者对这些方式的运用,访谈资料不仅仅应该包括语言记录,还应该尽可能包括互动中的非语言特征。最后,在小组访谈中,技巧会有所改变,比如,在对一群孩子进行访谈时所用的方法肯定和访谈一群年老的寡妇所用的方法不一样。

## 访谈的阐释

许多用非结构式访谈所做的研究,对于解释的过程没有进行足够的反省,一些老生常谈的话表明资料本身是独自起作用的,研究者是中立的、无偏见的、“无形的”。资料表达得有条有理,自然流畅,没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也没有提到哪些资料被排除在外,为什么被排除。如果对事件不需要考虑,仅仅只是将资料归档、分析、报告,那么就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了。但是任何从事过实地工作的人都知道,不管研究者如何组织,他或她都会慢慢埋没于不断增加的像小山一样的实地笔记、手稿、剪报和录音磁带之中。传统上,研究者为读者提供对资料的解释,清楚、简单、合乎理性、自圆其说。最近,社会学家开始抓住资料的反思性、不确定性甚至是矛盾性,以及研究者作为作者的大量不可言说的影响。范曼尼恩(Van Maanen,1988)称为“忏悔的风格(confessional style)”在 1970 年代兴起(Johnson,1976),并一直持续到今天,让研究者以心灵净化心灵的形式消除困难和不愉快的情况。也许从某种程度上说有些过分,但这些“忏悔”是很有价值的,它们能使读者意识到在自然场景中访谈对象的复杂性,并且赋予研究现实主义和真实性的风格。比如,“昨天我起得很晚,大约 10 点钟才起床,前天我约了 Omaga、Koupa 和其他几个人,他们都没有来,我又一次生气了(Malinowski,1967/1989, p. 67)。

对研究者人性一面的展示及对非结构式访谈困难的陈述都采用了一种解构主义的新形式(Derrida,1976)。这里作者的影响被控制,因此,经过研究者艺术处理过的文本被“解构”了。作者的偏见和“想当然”的思想被暴露,选择的方法常常是看看这些资料能否使用(Clough, 1998)。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后现代的社会研究者试图将研究者作为实地工作者和作者的影响力减到最小,比如,克拉潘扎诺(Crapanzano,1980)引用了图哈密(Tuhami)的描述,不管它们是社会历史的艺术处理、梦想,还是公开的谎言,它们都构成了被访者的自我意识和个人历史的一部分,在访问图哈密时,克拉潘扎诺不仅了解他的被访者而且了解他自己:

> 作为图哈密的对话者,我已经变成了他生活史的主动参与者,即使我很少直接出现在他的讲述之中。不仅仅是我的在场,我的提问构成了他叙述的材料,而且它们也给他的意识带来了变化,同时,这一切也改变了我的观点。我们在对自己和生活世界的态度上存在着分歧,也在相互影响的过程

中寻找共同点(p.11)。

图哈密和克拉潘扎诺不再声称是没有个性的被访者和看不见的研究者,他们被描述为具有个人历史和个性特征的个体,作为读者我们可以了解两种人和两种文化。

## 伦理关怀

因为访谈中的调查对象是人,研究者应特别注意,避免伤害他们。传统上,伦理关怀主要涉及知情同意(小心谨慎地告诉他或她有关研究的事以后得到被访者的同意)、隐私权(保护被访者的身份)、避免伤害(身体的、情感的或任何其他方面)。

社会学家或其他社会科学家都一致赞同考虑以上三种伦理关怀,对其他方面则存在异议。关于公开还是隐蔽的实地工作的争论与参与观察尤为关系密切,争论还包括录音技术的秘密使用,沃里克(Warwick,1973)和道格拉斯(Douglas,1985)为隐蔽的方法做了辩护,因为它们反映了日常生活现实中的欺骗。至于其他人,包括埃利克森(Erikson,1967)都激烈反对被访者在不了解情况的情况下参与研究。

另外一些疑问来源于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参与群体活动的程度。在同一次地方选举期间,怀特(Whyte,1943)不止一次地被群体成员邀请去投票(也就是说,非法投票)。群体成员都对他很友好,信任他。他运用"情境伦理(situational ethics)"断定,违法的损失与他如果拒绝投票所带来的实地工作的损失相比要小得多。汤普森曾面临一次更为严重的违法。他特别害怕必须亲眼目睹一次所谓的强奸,因为那些"地狱天使"们已经变得声名狼藉了。但是,正如他在报告中所写的,这样的情况在他研究期间一次也没有发生。在定性社会学中最著名同时也是被广泛讨论的伦理问题发生在汉弗莱斯(Laud Humphreys)对"茶室交易(tearoom trade)"的研究期间(1970),汉弗莱斯在公园的公共厕所里通过扮演"望风人(watch queen)"来研究同性恋聚会,尽管事实本身可能被看做是伦理上的错误,但是他又不得不如此做,否则便会招来学术界的反对。汉弗莱斯不能在"茶室"访问他们,便记下他们的汽车牌照号码,在警察的帮助下找到他们的住处,然后在他们的家里进行访问,并且没被认出曾做过他们的"哨兵"。

另一个伦理问题是由研究者撰写报告的真实性引起的。比如,怀特(Whyte,1943)著名的波士顿街角意大利人的研究,由于一直在众目睽睽之下(Boelen,1992),正如一些人声称的,怀特是以一种谦逊的方式在描述他们,而这种描述并不能反映他们的真实情况。怀特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但它的确说明在实地工作和研究报告中伦理决定的脆弱性,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五十多年(Richardson,1992b)。

正如我们所见,越来越多的学者(Oakley,1981)觉得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大多数传统的深度访谈都是缺乏职业道德的,他们认为,当把被访者作为物体或数字而不是单独的个人时,访谈的技巧和策略是巧妙地操纵被访者的真正方法。对客观性的追求应该取代我们研究中人性的一面吗?注意看下面:

> 一天我正在康复中心做研究,一个护理一边跟我谈话,一边更换被病人尿湿的卧具,这个病人又老又瞎,以前是个摔跤手,被关在急诊室。突然,这个摔跤手不跟护理合作了,开始粗暴地乱打,幸亏没打着护理。因为周围没有别人,我别无选择只好抓住病人,将他按在床上让护理继续更换卧具。这是让人不愉快的:病人一直在扭动并用他最大的声音叫喊,发出可怕的威胁;令人反胃的尿骚味;病人的力气越来越大,我不得不松开他,当时我一直觉得可怕,感觉像 ken kesey 小说中的 Bromden 首领按住已经施行脑白质切断术的 Mac Murphy。**但是别无选择,当病人厮打护理的时候,一个人不能仍然只坐在原地记笔记**(Foutana,1977,p.187;黑体部分是增加的)。

很显然,当我们往前追溯社会学的时候,我们不能正确表述布卢默(Herbert Blumer)在很多年以前所说的,让方法控制人类的想象。正如庞奇(Punch,1986)提出,作为实地工作者我们需要运用常识和责任,如果我们想更进一步的话,首先必须关注我们的被访者,其次是我们的研究,最后是我们自己。

## 访谈的新趋势

访谈的最新趋势是越来越远离结构式访谈,我们已经达到了将访谈视为商谈式话题的程度,很长时间以来,民族志学者已认识到研究者不是无形的、中立的存在;相反,他们应该是研究中互动的一部分并且影响互动。访谈最终开始与民族志相吻合。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访谈者不是被调查研究虚构出来的中立工具,访谈者与被访者一起被看做是互动中主动的参与者,访谈被看成是访谈者与被访者在具体情境中的协商完成。正如施瓦特(Schwandt,1997)曾指出的,"在定性研究中,将访谈视做两个人或更多人之间对话的一种形式,或者作为一个语言事件已越来越普遍。其中,问题和答案的意义是根据情景决定和由访谈者与被访者共同建构起来的。"(p.79)我们渐渐认识到,不能将访谈结果与其背景割裂开来,因为这些访谈结果与背景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且它们应当被视为无任何附带条件的客观资料。

### 作为协商完成的访谈

让我们简要概述一下在霍尔斯泰因和古布里厄姆之后两种传统的访谈方法(Holstein & Gubrium,1995,1997)。这些作者将康弗斯和舒曼的"随意谈话"作为访谈的范本运用在调查研究中,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访谈者要尽可能顺从,以便减少他或她的影响——访谈者的作用就是得到被访者的回答。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技巧,他就能够得到它,就像一个技术熟练的外科医生从一个捐赠者身上取下

一个肾,然后将它放在另一个人身上(比如说一个等待移植的病人)。

霍尔斯泰因和古布里厄姆(Holstein & Gubrium,1995,1997)将道格拉斯(Douglas,1985)创造性访谈看做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访谈类型。创造性访谈建立在"感觉"的基础上,它认为作为访谈者,研究者必须了解隐藏在被访者理性外表下的一面,通过吸引他们,研究者就能够达到被访者的情感深处,与他们一起分享感情和思想。毫无疑问,道格拉斯的访谈者更主动,比康弗斯和舒曼的更少中立,但是假设仍然是相同的:访谈的"技巧"将提供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存在一个研究者可以获取的"核心知识"。

最后,霍尔斯泰因和古布里厄姆提出了一种新的访谈类型——"新"并不是特别准确,因为他们对比概念的引用来自于珀尔(Ithiel deSola Pool)1957年出版的作品。也就是说"每次访谈……都是一出随着情节发展的人际交往戏剧(Pool, 1957,p. 193;引自:Holstein & Gubrium,1995,p. 14)。霍尔斯泰因和古布里厄姆一直关注着那些我们所关注的东西:访谈"内容",主要的发现,现在我们应该将注意力放在访谈的"方式"上——事情的来龙去脉,特殊的情景,微妙之处,人们参与的程度等访谈互动时所发生的一切。这个想法又回到了民族志方法论的问题上。霍尔斯泰因和古布里厄姆(Holstein & Gubrium,1995)指出,"说访谈是一出随情节延伸的人际交往戏剧,这反映了一种更广阔的意义——现实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相互理解的过程"(p. 16)。加芬克尔(Garfinkel)、萨克(Sack)和其他人在1960年代后期曾明确指出,现实是建立在社会成员实际推理基础上的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访谈是现实的产物,访谈的意义是在访谈者与被访者的互动过程中实现的。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霍尔斯泰因和古尔里厄姆(Gubrium & Holstein,1998)继续发展了他们的论点,他们将访谈看做讲故事,看做是实践的产物,社会成员通过讲故事来完成他们叙述的连续性。他们一再强调应该去分析"如何"讲故事以及故事讲了"什么"。同样地,萨拉普(Sarup,1996)也写道:

> 每一种叙述都包括两个部分:故事(叙事)和话语(论述)。故事是内容,或者一系列事件。在叙述中,故事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话语则告诉我们是如何发生的。话语更像是一个情节,使读者意识到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以及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p. 17)。

霍尔斯泰因和古布里厄姆并不是唯一提倡对访谈进行反思的学者。西尔弗曼(Silverman,1993)和丁沃尔(Dingwall,1993)也赞同塞科莱尔(Cicourel)的经典著作《社会学的方法和测量》(*Method and Measurement of Sociology*,1964)里所说的访谈是一种社会交往的观点。丁沃尔(Dingwall,1997)指出:

> 如果访谈是一种社会交往,那么从逻辑上说,它一定与其他的社会交往一样使用同样的分析方法。访谈的产物是社会情景活动的结果,在访谈者与被访者的角色扮演和印象整饰过程里,反馈一直贯穿其中。

塞德曼(Seidman,1991)认为访谈是建立在民族方法论学者舒茨(Schutz,

1967)的理性前提基础上的关系。塞德曼用舒茨的"我—你"关系分析了访谈者—被访者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彼此互享视角,双方通过"你们"取向,创造了一个"我们"关系。因此被访者不再是一个客体或一种类型(Seidman,1991, p.73),而是互动中的一个平等参与者。

### 新方法的问题

一些民族方法学式的访谈提倡者不仅批评了实证主义访谈的方法,而且也批评了互动论者的方法。与其他学者一样,丁沃尔(Dingwall,1997)论及了民族志(和访谈)中的浪漫主义运动,这一运动的观点是,我们越贴近被访者,就越能了解其真实的"自我"。这个观点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自我是一个在互动中协商和实现的过程。丁沃尔也指出了"后现代"转向的缺点,即如果没有真正的自我,也就没有真正的世界,而且一个人可以随意制造出自我。最后他自己也被浪漫主义者和那些质疑的"讨伐"所困扰,"如果学术研究更注重获取正确结果的方法而非结果本身,那么其价值何在"(p.64)。

同样,阿特金森和西尔弗曼(Atkinson & Silverman,1997)也驳斥了后现代"多声部(polyphonics voices)"的观点并指出,访谈者与被访者共同合作形成了一个基本一致的现实观。同样的反驳也针对舒茨(Schutz,1967)的观点——"我"和"你"创造了一个统一的"我们",而非两个独立的部分。

然而,民族方法学式的访谈本身也难逃批评,舒茨假想了一个可能不存在的互享视角,在我们这样一个访谈社会中,即使我们都知道访谈的常识性惯例和基本准则,但在别的社会,情况可能会完全不同。鲍勒(Bowler,1997)曾尝试访问巴基斯坦妇女在妇产科的经历,结果发现她们对于社会研究和访谈的价值一点也不了解,"我告诉她们我正在根据调查的结果写一本书,一个英语说得较好的人雅姆斯(Yams)用怀疑的语气翻译了这句话,然后她们开始大笑,说医院很好,没有什么问题,一切都好。"(p.72)鲍勒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不能"分享对研究过程的看法,那么访谈就无法进行"(p.66)。

西尔弗曼(Silverman,1993)还预见了另外一个问题。他觉得一些民族方法论学者放弃了对日常生活大量关注的兴趣,并且宣称不掌握更多研究方法就不会去研究它们,他说:"根据塞科莱尔的看法,简单地讲,我们将更关注参与者的谈话技巧,而不是他们的交谈内容以及访谈与外部世界的关系。"(p.98)

塞科莱尔(Cicourel,1970)指出,社会学家在从事自我和社会研究之前需要拟定一个合适的模型,加芬克尔也持相同的观点。比如在他著名的变性研究中,加芬克尔通过男性或女性的社会成员资格来考察惯例,几乎没有关注变性本身的问题。因此,它遵循西尔弗曼的民族方法学观点:如果要了解访谈更多的东西,必须先掌握谈话的方法。

### 未来的趋势

借用古布里厄姆和霍尔斯泰因(Gubrium & Holstein,1997)的一句话:"我们

将往何处去?"(p.97)我们和两位作者分享了后现代主义新视角的同时又适当保留了对日常生活经验主义描述的限制。古布里厄姆和霍尔斯泰因(Gubrium & Holstein,1998)引入了一种他们称之为"分析框架"的技巧用来处理访谈(和民族志)不同层次的问题:

> 比如,我们可能更强调故事是"怎样"讲的,而暂时不会去关注与故事"内容"相关的方面——故事的主旨、结构、情节,讲述的背景,对听众的解释。随后我们再回到这些问题(p.165)。

这个分析框架的运用,允许作者将访谈看成是一个合作完成的事件来分析其内在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在访谈中,结果和过程是相互建构的。

访谈中一个迫切的问题是我们使用这些新的不同类型的访谈时所用的标准。采取完全的相对主义不是解决办法,用西尔弗曼的话来说,它将导致"目光狭隘的社会学"(p.240)。西尔弗曼主张用美学的方式来进行研究,反对在社会学中运用文学的形式:"如果我想读一首好诗,难道要去找一本社会科学杂志?"(Silverman,p.240)。西尔弗曼对互动主义社会学的批评和对美学价值的看重似乎集中在下面三点:①他批评英国社会学家宏大的政治理论并赞同回到更普通、更微小的目标上;②他反对将真实性等同于体验的(从成员资格的观点来看)浪漫主义想法;③他认为在社会学中,我们一味地模仿访谈社会的大众媒体,结果只关注到一些微不足道的浅薄鄙俗、闲言碎语和不实之辞,而忘记了简单和深刻。

西尔弗曼认为,在社会学研究中,我们应该关注那些具体的事情而不是宏大的、抽象的东西。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与洛夫兰德回到局部要素,远离超理论的强调没有什么差别。对西尔弗曼来说,细节就是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面对的琐事——非常类似于加芬克尔的日常事务,它构成了世界的基础,并让我们彼此产生互动。

我们同意西尔弗曼的观点,不再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拥有了解自我的钥匙,我们也同意当我们远离主题而滑入(没有文学意味的)新的荒诞剧中时寻找一种新的标准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只有行动,才能在访谈或日常生活中通过参与者找出方法模型。塞科莱尔(Cicourel,1970)互动的固定特征太笼统,对社会学调查没有什么作用。

我们必须对社会成员以及日常生活中结构性活动进行大量观察,并且自始至终保留对访谈过程的反思(Gubrium & Holstein, 1997,1998)。正如贝克(Baker,1991)指出,一个研究者告诉被访者"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与告诉她"我是一个大学教授"会造成不同的情景并带来不同的话题。我们必须继续进行社会学的调查,即使情况并不十分完美。正如格尔茨引述的:仅仅因为不能实行彻底的无菌处理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很好地实施外科缝合手术吗(Geertz,1973)?

访谈的另一种走向——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新的女性主义访谈实践。传统访谈煞费苦心地保持中立、客观,尽量消除访谈者的影响。但是女性主义者反对利用被访者,希望运用访谈达到善意的目的。也就是说,"致力于改变社会的研

究者应该远离‘象牙塔’,建构更加共享、更加民主的实践。**我们应该将人和政治置于研究的中心**”(Benmayor, 1991, pp. 172-173;黑体部分是附加的)。邓津(Denzin,1989a)称这种方法为“女性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伦理模式”(Lincoln, 1995),他写道:

> 女性主义和共产主义研究者不会侵犯他人的隐私,而会运用知情同意的形式,随机选取被访者,根据效度来考虑研究设计。这个框架假定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建立了合作的、互惠的、真诚的、友好的关系……那些在研究过程中形成的所有资料,包括实地笔记被研究者声称拥有所有权,也是可以理解的。

将学者的角色与女性主义放在一起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尤其是当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有不同的政治倾向时,可能还会导致冲突(Wasserfall,1993),但是这种方法让研究者看到了来自研究的积极效果,从这一点来说,它还是有价值的(Gluck,1991)。

## 电子访谈

目前,访谈的另一种走向与技术的变化有关。访谈作为一种资料收集方法,最近已经扩展到电子市场。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网址来实施问卷调查。近期的预测显示 50% 的家庭拥有电脑,其中近一半上了网,研究者很容易获得相关的软件用来编辑和保存聊天室访谈收集的资料。能够使用电脑的潜在被访者是有限的,这样通过网络来对普通人进行调查便行不通,但是电子访谈对某些专门的人可以达到 100%(Schaefer & Dillman,1998)。

现在可以进行“虚拟访谈”,在这种访谈中,可以同时或不同时运用网络联系来获取资料,这种方法的好处是费用低廉,没有电话费或访谈者费用,并且反馈迅速。当然,面对面的互动就没有了,无论是访谈者还是被访者,对非语言行为的解读或者想从性别、种族、年龄、阶级以及其他个人特征方面获得暗示都是不可能的。通过这种方式收集资料虽然可能,但还是比较困难,因此必须在访谈者与被访者之间建立“关系”并使“气氛活跃”。网络调查使得被访者很容易编造虚假的社会事实而没有人发现(Markhan,1998)。当然,为了与被访者建立更好的关系,访谈者也会欺骗被访者,声称他们具备某些子虚乌有的经验及个性。出于同样的目的,访谈者也有一些“虚假的非语言行为”,比如,他们会告诉被访者某些话把他们“逗笑”了,某些话使他们“感到难过”。

马卡姆(Markham,1998)在她的网络访谈的自我民族志中写道:电子访谈比传统的访谈要花更长的时间,也更隐密,深度也不够,但是访谈者有更多的时间去完整地表达连续的问题或进行探索性调查。

在 E-mail 调查中保持匿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聊天室和类似的地方可以使用假名。虽然电子访谈目前主要用在定量研究中并且通常使用结构式问卷,但就像研究者学会使用电子技术分析数据一样,他们迟早也会运用这些技术来做定性研究。比如,马卡姆一直致力于研究与各种电子或网络形式(如聊天

室、管理讨论邮件的程序)打交道的过程。她去访问其他参与者,证明她在虚拟社会的经历,了解参与者在线生活方式的体验和意义。她提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在我身体不在的地方能有一个自我吗?”(p.8)。

将来可以看到大量的以电脑为中介进行交流的民族志,在那里访谈的场景是虚拟空间而不是一个现实的房间或工作场所。电子访谈是让研究者获得“深描”还是主观经验的叙述,还要看情况的发展,并且这种访谈是否提供“过程背景”,对于定性访谈也特别重要。另外,进行这种访谈的研究者从来也不会相信,他们所得到的答案就来自于那些他们期望的或者符合要求的被访者。目前网络访谈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已有人开始研究它对回答质量的影响。比如,谢弗和迪尔曼(Schaefer & Dillman,1998)发现,E-mail 调查能达到和邮寄调查相似的回答率,但是在填空及对开放式问题的回答方面,资料的质量不如邮寄调查。

有许多无回答的问题明显与运用电子访谈有关,正像人们越来越多地依靠电子技术进行交流一样,电子访谈在即将到来的新千年也会显著增加。但是网络交流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取代面对面的访谈,只有让时间来回答。

## 结　论

在这一章我们主要分析了访谈:从结构式类型到引导式话题。从定性和定量的起源,简要叙述了访谈的历史,考察了结构式访谈、小组访谈和各种形式的非结构式访谈。我们分析了性别在访谈中的重要性以及表达和阐释是如何影响访谈的。我们还探讨了访谈中伦理的重要性,最后,讨论了访谈最新的发展趋势。

尽管这本书主要关注定性研究,但我们的讨论包括了访谈的全部领域,因为我们相信,如果研究者想准确理解访谈,他们就必须知道访谈的各种类型。显然,某种访谈类型只适合某种特殊的情形,因此研究者“必须清楚他们所选择的访谈类型的含意、缺陷和问题”。如果我们希望知道有多少人反对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建立核仓库,那么结构式访谈是最好的方法,就像在调查研究中一样,我们可以将答案量化和编码,运用数学模型来解释我们的结果。如果我们想知道人们对一种特定产品的看法,那么焦点小组访谈可以给我们提供满意的答案。如果我们想了解在抵抗运动中巴勒斯坦妇女的生活(Gluck,1991),那么我们需要利用非结构式访谈,详细深入地访问她们。在上面提到的第一和第二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用一种正式语言来论及科学的严密和实证的结果。在第三个例子中,我们特别强调通过交流来理解一种生活方式。

更多的学者意识到,用一种访谈去反对另一种访谈是徒劳无益的,这是过去一代人遗留下来的定量和定性对立的产物。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运用多元方法来获得更广泛的结果,这种多元方法被称为“三角测量(triangulation)”(Dentin 1989b;Flick,1998),它允许研究者用不同的组合方式来使用不同的方法。比如很

久以来,小组访谈一直被用做调查研究的补充,而现在则被用做参与观察的补充(Morgan,1988)。人类是复杂的,他们的生活在不断变化,我们研究他们的方法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理解他们建构生活的方式以及他们所叙述的故事。

对访谈世界的一次简短旅行,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到寻求社会学原因时存在的症结,并对之更加敏感。我们必须记住每个人都有他/她的社会历史以及对世界的看法,因此我们不能以自己的目标想当然,正如奥克利(Oakley,1981)指出"访谈非常像结婚,每个人都知道它是什么,许多人也都这样做,然而在每一扇关着的门后面都有着大量的秘密"(p.41)。她说得非常正确——从普通人到合格的数量分析专家都认为,我们知道如何问问题,如何与人交谈,然而,要真正理解人,我们必须将他们作为人来对待,他们将和我们一起建构他们的生活史。只要研究者继续将被访者看做平凡的、普通的个人,认为其唯一的作用就是填写一份有较多限制的答卷,那么作为研究者,我们所得到的就是与我们所问的问题以及提问的方式相称的答案。这和斯坦(Gertrude Stein)没有什么区别,她在临终之际,问她毕生的好友艾利斯(Alice B. Toklas),"答案是什么?"当艾利斯不能肯定地说出来时,斯坦又问道,"如果是那样的话,问题又是什么呢?"


Adams, R. N., & Preiss, J. J. (Eds.). (1960). *Huma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Field relations and techniques.* Homewood, IL: Dorsey.

Anderson, N. (1923). *The hobo: The sociology of the homeless 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tkinson, P., & Silverman, D. (1997). Kundera's *Immortality*: The interview society and the invention of self. *Qualitative Inquiry*, 3, 304-325.

Babble, E. (1992).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6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Baker, C. (1997). 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and interview accounts. In D. Silverman (Ed.),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pp. 130-143). London: Sage.

Becker, H. S. (1956). Interviewing medical stud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2, 199-201.

Becker, H. S. (1999). The Chicago school, so-called. *Qualitative Sociology*, 22, 3-12.

Behar, R. (1996). *The vulnerable observer: Anthropology that breaks your heart.* Boston: Beacon.

Benmayor, R. (1991). Testimony, action research, and empowerment: Puerto Rican women and popular education. In S. B. Gluck & D. Patai (Eds.), *Women's words: The feminist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 (pp. 159-174). New York: Routledge.

Boelen, W. A. M. (1992). *Street corner society*: Cornerville revisite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1, 11-51.

Bogardus, E. S. (1926). The group interview. *Journal of Applied Sociology*, 10, 372-382.

Booth, C. (1902-1903). *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 London: Macmillan.

Bowler, I. (1997). Problems with interviewing: Experiences with service providers and clients. In G. Miller & R. Dingwatl (Eds.), *Context and method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66-76). Thousand Oaks, CA: Sage.

Bradburn, N. M. (1983). Response effects. In P. H. Rossi, J. D. Wright, & A. B. Anderson (Eds.), *Handbook of survey research* (pp. 289-328).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Bradburn, N. M., Sudman, S., & Associates. (1979). *Improving interview method and questionnaire desig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Cicourel, A. (1964). *Method and measurement in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Cicourel, A. (1970). The acquisi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Toward a developmental sociology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In J. D. Douglas (Ed.), *Understanding everyday life: Toward a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knowledge* (pp. 136-168). Chicago: Aldine.

Cicourel, A. (1974). *Theory and method in a study of Argentine fertility.* New York: John Wiley.

Clough, P. T. (1998). *The end(s) of ethnography: From realism to social criticism* (2nd ed.). New York: Peter Lang.

Collins, P. H. (1990).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 Hall.

Converse, J. M. (1987). *Surve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Roots and emergence* 1890-196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onverse, J. M., & Schuman, H. (1974). *Conversations at random: Survey research as interviewers see it.* New York: John Wiley.

Crapanzano, V. (1980). *Tuhami: Portrait of a Morocc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enzin, N. K. (1989a). *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 Newbury Park, CA: Sage.

Denzin, N. K. (1989b). *The research act: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methods* (3r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Derrida, J. (1976). *Of grammatology* (G. C. Spivak, Tran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Desvousges, W. H., & Frey, J. H. (1989). Integrating focus groups and surveys: Examples from environmental risk surveys. *Journal of Official Statistics*, 5, 349-363.

Dingwall, R. (1997). Accounts,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s. In G. Miller & R. Dingwall (Eds.), *Context and method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51-65). Thousand Oaks, CA: Sage.

Douglas, J. D. (1985). *Creative interviewing.* Beverly Hills, CA: Sage.

Douglas, J. D., & Johnson, J. M. (1977). *Existential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uglas, J. D., & Rasmussen, P. (with Flanagan, C. A.). (1977). *The nude bea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Du Bois, W. E. B. (1899). *The Philadelphia Negro: A social study.* Philadelphia: Ginn.

Ellis, C. (1991). Sociological introspection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Symbolic Interaction*, 14, 23-50.

Ellis, C. (1995). *Final negotiations: A story of love, loss, and chronic illnes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Erikson, K. T. (1967). A comment on disguised observation in sociology. *Social Problems*, 14, 366-373.

Fine, M. (1983-1984). Coping with rape: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consciousness. *Imagination, Cognition and Personality*, 3, 249-267.

Flick, U. (1998).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Sage.

Fontana, A. (1977). *The last frontier: The social meaning of growing old.* Beverly Hills, CA: Sage.

Fontana, A., & Frey, J. H. (1990). Postretirement workers in the labor force. *Work and Occupations*, 17, 355-361.

Fontana, A., & Smith, R. (1989). Alzheimer's disease victims: The "unbecoming" of self and the normalization of competenc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2, 35-46.

Freeman, D. (1983). *Margaret Mead and Samoa: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an anthropological my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rey, J. H. (1989). *Survey research by telephone* (2nd ed.). Newbury Park, CA: Sage.

Frey, J. H. (1993). Risk perception associated

with a high-level nuclear waste repository. *Sociological Spectrum*, 13, 139-151.

Frey, J. H., & Fontana, A. (1991). The group interview in social research.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8, 175-187.

Garfinkel, H.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Geertz, C. (1973). 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 In C.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pp. 3-30). New York: Basic Books.

Glaser, B. G., & Strauss, A. L.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Chicago: Aldine.

Gluck, S. B. (1984). What's so special about women: Women's oral history. In D. Dunaway & W. K. Baum (Eds.),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pp. 221-237). Nashville, TN: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

Gluck, S. B. (1991). Advocacy oral history: Palestinian women in resistance. In S. B. Gluck & D. Patai (Eds.), *Women's words: The feminist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 (pp. 205-220). New York: Routledge.

Gluck, S. B., & Patai, D. (Eds.). (1991). *Women's words: The feminist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Gorden, R. L. (1980). *Interviewing: Strategy, techniques, and tactics.* Homewood, IL: Dorsey.

Gorden, R. L. (1992). *Basic interviewing skills.* Itasca, IL: F. E. Peacock.

Gubrium, J. F., & Holstein, J. A. (1997). *The new language of qualitative metho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ubrium, J. F., & Holstein, J. A. (1998). Narrative practice and the coherence of personal storie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9, 163-187.

Harvey, L. (1987). *Myths of the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Aldershot, England: Avebury.

Hertz, R. (1995). Separate but simultaneous interviewing of husbands and wives: Making sense of their stories. *Qualitative Inquiry*, 1, 429-451.

Hertz, R. (1997a). Introduction: Reflexivity and voice. In R. Hertz (Ed.), *Reflexivity and voice.* Thousand Oaks, CA: Sage.

Hertz, R. (Ed.). (1997b). *Reflexivity and voice.* Thousand Oaks, CA: Sage.

Hertz, R. (1997c). A typology of approaches to child care: The centerpiece of organizing family life for dual-earner couple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8, 355-385.

Hertz, R., & Ferguson, F. (1997). Kinship strategies and self-sufficiency among single mothers by choice: Postmodern family ties. *Qualitative Sociology*, 20(2), 13-37.

Holstein, J. A., & Gubrium, J. F. (1995). *The active interview.* Thousand Oaks, CA: Sage.

Holstein, J. A., & Gubrium, J. F. (1997). Active interviewing. In D. Silverman (Ed.),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pp. 113-129). London: Sage.

Humphreys, L. (1970). *Tearoom trade: Impersonal sex in public places.* Chicago: Aldine.

Hyman, H. H. (1954). *Interviewing in social resear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ohnson, J. (1976). *Doing field research.* New York: Free Press.

Kahn, R., & Cannell, C. F. (1957). *The dynamics of interviewing.* New York: John Wiley.

Kotarba, J. A., & Fontana, A. (Eds.). (1984). *The existential self in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rieger, S. (1983). *The mirror dance: Identity in a women's communi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Kvale, S. (1996). *InterViews: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viewing.* Thousand Oaks, CA: Sage.

Lincoln, Y. S. (1995). The sixth moment: Emerging problem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Ed.),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A research annual* (Vol. 19, pp. 37-55). Greenwich, CT: JAI.

Lofland, J. (1971). *Analyzing social settings.* Belmont, CA: Wadsworth.

Lofland, J., & Lofland, L. H. (1984).

*Analyzing social settings: A guide to qualitativ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2nd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Lopata, H. Z. (1980). Interviewing American widows. In W. Shaffir, R. Stebbins, & A. Turowetz (Eds.), *Fieldwork experience: Qualitative approaches to social research* (pp. 68-81). New York: St. Martin's.

Lynd, R. S., & Lynd, H. M. (1929). *Middletown: A study in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Lynd, R. S., & Lynd, H. M. (1937). *Middletown in transition: A study in cultural conflict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Maccoby, E. E., & Maccoby, N. (1954). The interview: A tool of social science. In G. Lindzey (Ed.),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1. Theory and method* (pp. 449-487).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Malinowski, B. (1922).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New York: E. P. Dutton.

Malinowski, B. (1989).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7)

Marcus, G. E., & Fischer, M. M. J. (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arkham, A. N. (1998). *Life online: Researching real experience in virtual space.*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Merton, R. K., Fiske, M., & Kendall, P. L. (1956). *The focused interview.* Glencoe, IL: Free Press.

Merton, R. K., & Lazarsfeld, P. F. (Eds.). (1950). *Continuities in social research: Studies in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The American soldier."* Glencoe, IL: Free Press.

Miller, M. (1974). *Plain speaking: An oral biography of Harry S Truman.* New York: Putnam.

Mishler, E. G. (1986). *Research interviewing: Context and narra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organ, D. (1988). *Focus groups as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Morgan, D., & Spanish, M. T. (1984). Focus groups: A new tool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Qualitative Sociology*, 7, 253-270.

Oakley, A. (1981). Interviewing women: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In H. Roberts (Ed.), *Doing feminist research* (pp. 30-61).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Obbo, C. (1997). What do women know? ... As I was saying! In K. M. Vaz (Ed.), *Oral narrative research with black women* (pp. 41-63). Thousand Oaks, CA: Sage.

Patten, M. (1950). *Surveys, polls, and samples.* New York: Harper.

Payne, S. L. (1951). *The art of asking ques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ool, I. de S. (1957). A critique of the twentieth anniversary issu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1, 190-198.

Punch, M. (1986). *The politics and ethics of fieidwork.* Newbury Park, CA: Sage.

Rabinow, P. (1977). *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in Morocc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asmussen, P. (1989). *Massage parlor prostitution.* New York: Irvington.

Reinharz, S. (1992).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ichardson, L. (1992a). The poetic representation of lives: Writing a postmodern sociology. In N. K. Denzin (Ed.),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A research annual* (Vol. 13, pp. 19-28). Greenwich, CT: JAI.

Richardson, L. (1992b). Trash on the corner: Ethics and technograph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1, 103-119.

Sarup, M. (1996). *Identity, culture and the postmodern world.*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Schaefer, D. R., & Dillman, D. A. (1998). Development of a standard e-mail methodolog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2, 378-397.

Scheurich, J. J. (1997). *Research method in the postmodern.* London: Falmer.

Schutz, A. (1967). *The phenomenology o/the social world.*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Schwandt, T. A. (1997) *Qualitative inquiry: A dictionary of terms.* Thousand Oaks, CA: Sage.

Schwartz, B. (Ed.). (1996). Collective memory [Special issue]. *Qualitative Sociology*, 19(3).

Schwartz, B. (1999). Memory and the practice of commitment. In B. Glassner & R. Hertz (Eds.), *Qualitative sociology as everyday life.* Thousand Oaks, CA: Sage.

Seidman, I. E. (1991). *Interviewing as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Selltiz, C., Jahoda, M., Deutsch, M., & Cook, S. W. (1965).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relations.* London: Methuen.

Silverman, D. (1993).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data: Strategies for analysing talk, text and interaction.* London: Sage.

Silverman, D. (Ed.). (1997a).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London: Sage.

Silverman, D. (1997b). Towards an aesthetics of research. In D. Silverman (Ed.),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pp. 239-253). London: Sage.

Singer, E., Frankel, M., & Glassman, M. B. (1983). The effect of interviewer characteristics and expectations on respons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7, 68-83.

Singer, E., & Presser, S. (1989). *Survey research metho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mith, D. E. (1987).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A feminist sociology.*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Spradley, J. P. (1979). *The ethnographic interview.*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Spradley, J. P. (1980).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Starr, L. (1984). Oral history. In D. Dunaway & W. K. Baum (Eds.),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pp. 3-26). Nashville, TN: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

Stewart, D., & Shamdasani, P. (1990). *Focus groups: Theory and practice.* Newbury Park, CA: Sage.

Sudarkasa, N. (1986). In a world of women: Field work in a Yoruba community. In P. Golde (Ed.), *Women in the field: Anthropological experiences* (pp. 167-19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erkel, S. (1975). *Working.* New York: Avon.

Thompson, H. (1985). *Hell's Angels.* New York: Ballantine.

Thompson, J., & Demerath, M. J. (1952). Some experiences with the group interview. *Social Forces*, 31, 148-154.

Thrasher, F. M. (1963). *The gang: A study of 1,313 gangs i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7)

Ulmer, G. (1989). *Teletheory: Grammatology in an age of video.* New York: Routledge.

Van Maanen, J. (1988). *Tales of the field: On writing ethnogra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az, K. M. (Ed.). (1997). *Oral narrative research with black women.* Thousand Oaks, CA: Sage.

Warren, C. A. B. (1988). *Gender issues in field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Warwick, D. P. (1973). Tearoom trade: Means and ends in social research. *Hastings Center Studies*, 1, 27-38.

Wasserfall, R. (1993). Reflexivity, feminism and difference. *Qualitative Sociology*, 16, 23-41.

Wax, R. (1960). Twelve years later: An analysis of field experiences. In R. N. Adams & J. J. Preiss (Eds.), *Huma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Field relations and techniques* (pp. 166-178). Homewood, IL: Dorsey.

Weston, K. (1998). *Long slow burn: Sexuality and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Routledge.

Whyte, W. F. (1943). *Street corner societ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Yeandle, S. (1984). *Women's working lives: Patterns and strategies.* New York: Tavistock.

Young, P. (1966). *Scientific social surveys and research* (4th ed.). Englewood Cliffs, . NJ: Prentice Hall.

Zuckerman, H. (1972). Interviewing an ultra-elite. *Public Opinion*, 36, 159-175.

# 反思观察：从程序到文本



RETHINKING OBSERVATION: FROM METHOD TO CONTEXT

⊙ 迈克尔·V·安格罗西诺　基姆伯利·A·梅斯·德培雷

## 观察的基本假设

观察被看作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中所有方法的基石以及民族志研究的主要方法。即便在以当面访谈为基础的研究中，(研究者)也通过观察身体语言或手势来了解访谈对象的弦外之音。社会科学家观察的对象包括人类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所发生的地点、情境等。有的观察所针对的活动或许发生在实验室或者临床研讨中，此类活动是控制实验的结果。另一方面，有的观察所针对的活动发生在自然情境中。有的学者不赞同"自然情境(natural setting)"这一概念，他们认为这些所谓的自然情境，尤其是在第三世界的实地研究中，实际上是内化的、非自然的殖民化的产物(Gupta & Ferguson,1996c,p.6)。但是在大多数的文献中自然情境这一约定俗成的用法仍然被多数人所接受。因此，在本章中我们采用自然观察(naturalistic observation)或实地(fieldwork)研究的说法。

自然情境中的观察可以被表述成一种通过开放性叙事或者印制好的访谈提纲或实地研究指南的描述(Rossman & Rallis, 1998, p. 137; 参见 Stocking, 1983a)。无论哪种描述都假定自然观察不会干扰所观察的人及其行为。尽管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早已普遍接受观察者对其所观察的对象产生影响的可能，但是严谨的研究者仍然应该坚持观察报告的严格标准以尽可能克服潜在的偏见。即使是把自己看作参与式观察者以及有意编排资料以便获得对所研究文化的主观上的浸入式(理解)的文化人类学家，也宣称他们能够保持研究的科学与客观(Cole, 1983, p. 50; Wolcott, 1995, p. 66)。做不到这一点便意味着他们被当地居民同化，他们的研究成果也会被不断地质疑。尽管人类学家不再迷恋在参与和观察间取得微妙的平衡(Gupta & Ferguson, 1996c, p. 37)，但仍然将其看作一种理想追求(Stocking, 1983b, p. 8)。对于大多数社会科学家而言，研究的客观性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严格意义上的客观研究常常和量化研究方法相联系，而

在情感和态度上的超然也是十分重要的,即便是定性研究亦致力于将观察到的资料组织到非常客观的、看上去量化过的表格中以便加以研究(参见:Altheide & Johnson, 1994; Bernard, 1988; Miles & Huberman, 1994; Silverman, 1993)。

阿德勒双氏(Adler & Adler,1994)指出观察法不仅将被证实是方法谱系的一部分,而且还是资料采证的最有力的来源。他们宣称观察法有赖于研究者如何凭借自身的直觉和自己的判断去发现常量(p.389)。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如同法律案件中一样,来自值得信赖的观察者的目证是特别有说服力的(Pelto & Pelto, 1978, p.69)。实际上,一份可信的研究描述报告常常可用事实检验,即使这种检验是民族志学者的写作技巧而不是他们的观察能力所致(Kuklick, 1996, p.60)。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社会文化研究中的后现代转向所引发的批评科学的客观性假设,以及预设的权威话语使得定性研究者不得不去应付由此引发的问题①。原先的批评主要指向特定的研究者,质疑他们是否遵循应有的治学态度的客观标准。与之相反,在后现代的背景下,批评指向标准本身。实际上,如今我们可以质疑作为目标的观察的客观性是否是必要的和可行的。作为一名在社会文化研究中曾有过广泛和批判性论述的学者,克里夫德(Clifford,1983a)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根据斯托金(Stocking,1983a)的说法,即使是作为科学的参与观察的典范并受人尊敬的学者,马林诺夫斯基也是应该对有关民族志学者的角色转换直接负责的学者,这一转换指的是从调查员的角色向以某种方式参与村庄生活的参与观察者的角色转换(p.93)。更令人吃惊的是,克里夫德对有着广泛影响的现代解释学派的格尔茨的研究提出疑问,他指责格尔茨应该对提倡民族志学者通过同理心(empathy)来描述一种文化对其成员的特定意义承担责任。换言之,一个作为独立个体的民族志学者——就像她或他所被建议的那样——以马林诺夫斯基的方式在一个更为开放的实证主义的世界中消失了。克里夫德的评论得到了希韦尔(Sewell,1977)的回应,后者指出格尔茨并没有指望实地工作者透过他们与之短暂且不完全分享的居民的同理心来获得某些奇迹(式的观察),他们并没有诉诸超自然的能力来像当地人那样去思考、感受和认知(p.40)。可是问题不在于格尔茨有没有达到某种理想的同理心状态,而是在于这种理想状态是否与民族志研究有关,是否对于描述或理解一种文化而言是必要的;如果在没有民族志学者自身作用的情况下,这种对文化的描述或解释仍然可以存在,那么格尔茨所言的同理心是否有必要呢?

后现代的批评强调作为理解民族志作品的一部分的民族志学者自身位置(例如他或她的性别、阶级、族群)的重要性,这是因为遥远的、传统的、作为人类学家的传统研究对象的民俗社会已经消失;如今大多数人类学家已经是在已开

---

① 对客观性的批评并非后现代主义者的发明。实际上,有一个很好的例证是作为一名跨学科的学者贝特森(Bateson,1972)的预见提出来的,他对实地研究中观察者的位置加以严格系统的分析,然后对力图消除"观察者偏见"的基本原理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他的"控制论"表明观察者不可避免地与其所观察的事物相联系。不管怎样,这一争论使得民族志研究者的注意力从对文化研究的说服力的批评出发,其所争论的内容既可从他们所运用的语汇中得知,也可从他们对认识论的特殊兴趣中得知。

化的、作为全球传播和运输网络的一部分的社会里开展工作。像社会学家一样,人类学家研究上层社会几乎和研究贫困或边缘社会一样频繁。虽然这样做可以克服那些与传统的民族志研究相联系的、逡巡不去的殖民主义偏见所带来的麻烦(D. L. Wolf, 1996, p. 37),但是也导致了由做观察研究的研究者的立场和地位所引起的新麻烦。不过有一件事可以肯定,民族志学者不能继续宣称自身是所研究的社会及其文化知识的唯一仲裁者,因为他们的地位与其先辈不同,他们自己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不得不同那些他们为之代言的已开化的当地人的分析相竞争(Bell & Jankowiak, 1992; Larcom, 1983, p. 191)。实际上,之所以无法建立关于一个社会的客观真理,是因为关于同一件事的论述必然会有互相冲突的版本。过往的人类学家由于宣称拥有关于所研究社会的客观的、权威的知识的特权,并宣称已有众多当地人已做好准备接受人类学家的改造,而如今这样做却会引起麻烦。在人类学家学会面对这种情况,并做好准备警惕这种麻烦之前,社会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早已在这种情境下开展工作。正如沃尔夫(Margery Wolf)所间接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再能假设会有一个孤零零的、无法在短期内跨入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之列的村庄。一个常常跟在你后面的男孩会有一天获得牛津大学的文凭,手里拿着你写的书出现在你家的台阶上"(wolf, p. 137)。传统假设的有效性,即真理可以通过小心地、反复检查的民族志研究和内部人报告获得的想法已不再被想当然的接受。作为当代研究社会和行为的社会科学家日益倾向于接受建立在不同性别、阶级、族群和其他不易形成共识的因素基础上的证据的差异。民族志研究的真相只是许多研究方法中的一种而已,民族志学者不能再指望自己可以宣称在众多研究方法中具有排他的特权。确实,民族志研究的结论不再能蜕变为那种由单一民族志研究唱主角的原有格局(Marcus, 1997)。

某些来自不同学科的民族志学者通过修正基于观察的研究方式并提供其分析,以对新局面做出回应。他们不再想当然地认为民族志学者能与其研究对象保持距离。确实,研究对象一词由于暗含了殖民主义者的意涵,不再适用。这些学者更进一步提出在研究者和所描述的社会文化间进行对话。当民族志研究者从其原先所熟悉的研究领域(孤立的村庄)抽身而出或者转向研究他们自己(处于文化中心)的社会时,讨论民族志学者在工作场所中的自身的互动、人际关系和情感状态便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尽管这种研究取向在民族志研究中初露曙光,但这种取向本身也引起了新的问题。例如:持该取向的民族志研究者写下(或至少是合写、编撰)他的实地研究结果。难道他们不是在暗示其社会/文化知识的仲裁者/协调者的地位吗(Wolf, 1992, p. 120)? 该类民族志学者或许会强调他们只是再现与研究有关的各种声音,但是我们仍然质疑是否只有该类民族志学者的论述才符合实情。

不管怎样,我们现今是在协同研究的脉络里运作。协同研究不仅是指不同学科专业人员间的合作,它还常常指专业研究人员和其往日的研究对象间的假定的平等参与(Kuhlmann, 1992; D. L. Wolf, 1996, p. 26)。例如,松本(Matsumoto, 1996)为了一项口述史研究计划向她打算访谈的研究人群派发预先准备好的问

卷。她向所有被访人群保证划掉他们不愿应答的问题。潜在的被访者对于友好地邀请他们参加研究的框架设计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当这种情况逐渐普遍,对观察的反思是十分重要的,即到底什么是观察?观察法是如何进行的?在产生民族志知识的过程中,观察法扮演了什么角色?小结如下,完成观察法的转变是有益的,即从观察本身作为一种程序向文本视角的转变,即在协同研究中强调观察作为与之有关的人群的互动文本视角的转变。

## 观察法:古典传统

在探讨作为一种文本的观察之前,我们将简单回顾一下作为一种程序的观察,因为后者是我们反思的基础。实际上,尽责的民族志学者早已警觉到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与否将影响所观察的行为。不过他们相信发展一套标准化程序来提高观察的效力并减少调查者的偏见是有可能的。当研究者在其研究报告中使用观察所得的资料时,这些被检查过的资料的效度和信度将被同行与研究对象认可,而保证这些资料质量的标准化程序应该是可重复的和可验证的(Gold,1997,p. 397)。真正的客观性被认为是在参与者与观察者就给定条件下所发生的事情达成一致的结果。而这种一致性被认为是通过排除研究对象的反馈来获得的。民族志学者的自我纠错的调查程序通常包括充分的、合适的抽样过程、收集和分析资料所需的系统技术、数据的核查、避免观察者的偏见和对观察的记录(Clifford,1983b,p. 129; Gold,1997,p. 399)。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于民族志研究中参与者的看法的主要分歧在于,前者常常认为有必要通过其他形式记录的资料来确认参与者的观察的可信度,而后者则趋向于采纳参与者的观察并作为最终的检验其他更精致的研究技术的手段,尽管这种观察看上去缺乏系统(Pelto & Pelto,1978, p. 69)。

在民族志研究的传统中无论从社会学还是从人类学的取向出发发生观察者偏见的可能性都被夸大了(Werner & Schoepfle,1987,p. 259)。即使抛开可预料到的族群中心主义的扭曲不谈(只要民族志研究者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族群中心主义的偏见便可被预先控制),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每个人的观察都必然带有自身才艺的助益和其经历的局限。因此,记录的内容而非记录活动本身的品质,成为可用的观察资料的衡量标准;因为前者可以被监控和复制,而后者受个人行事风格的局限难以被复制。尽管分析的理论和概念框架不可避免地指导着观察者的观察,长久以来的做法却是研究者在使用基本的观察资料时可以把理论摆在一边。出于这个原因,在实地研究的章程中常常将对观察方法的强调作为其基本主题,“主要报告具体的事实以及在实地研究中尽可能地避免抽象思考”(Pelto & Pelto, 1978, p. 70),因此,理论分析成为观察的附带产品。

依戈尔德(Gold,1958)所言,20 世纪前半期的社会学取向的民族志学者经常暗示不同类型的(研究者)角色会对实地研究的风格产生影响:完全参与(其主观

立场会使得科学效度受到质疑),部分参与(也会有点这些方面的疑问),部分观察以及完全观察。完全观察者是指将其全部的个人意图排除在研究环境之外,研究者不以任何方式对被观察的对象产生影响。由于完全观察过于理想化(Werner & Schoepfle, 1987, p. 259),也由于该种研究方式会导致缺乏被观察对象的非正式同意(这种缺乏作为一种伦理缺失是有责任心的研究者所无法容忍),因此部分观察的角色被认为是一种可接受的妥协,它使得研究者在得以即兴的、间接的和研究对象打交道的同时仍然保留研究者的角色,而且不必越位到与研究对象交朋友的阶段(Adler & Adler,1994,p. 380)。这种研究方法在现今最重要的使用或许是教育研究者在教室里所进行的对学习的观察(Rossman & Rallis, 1998, p. 137)。

如今受过社会学训练的民族志学者比起他们的前辈更倾向于将参与视为实施观察的合法性基础。阿德勒双氏(Adler & Adler,1987)因而对戈尔德那耳熟能详的分类模式提出修正:即在反对完全观察的研究者角色的同时,认识到现代民族志研究对成员角色的日益增长的强调。换言之,原有的有关参与的假设,致使研究者对观察资料的效度做出重大让步,通常代之以现代研究中常常使用的对文化的浸入式研究。而这样做或者有意或者无意,比起原先所容忍的可取的标准更加严重,由此给社会学家带来了远多于给人类学家所带来的困扰。阿德勒双氏举例说,作为外围成员的研究者认为,他们可以发展出一套可取的内部人视角,从而用不着参与核心成员的那些活动。与之相对照,作为积极分子的研究者卷入研究对象的重大活动,有时甚至对领导角色负责,然而他们不一定完全赞成研究对象的价值理念。第三类方式,作为完全成员的研究者,自身成为研究对象的一部分,此类研究者推崇主观体验,不过他们仍然致力于使其成员身份不应对日常互动产生不必要的干扰(Adler & Adler,1994,p. 380)。

传统的人类学取向的民族志学者并不质疑参与的效用和作为观察基础的成员身份等问题,他们担心的是其观察方法的非体系化的特征。沃纳和谢弗(Werner & Schoepfle,1987,pp. 262-264)在以过程而非身份为标准来提出自然情境下观察的类型时强调了这个问题。在他二人的分类体系中,观察的过程有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反映了对所研究的社会群体日益深入的理解。首先是"描述性观察(discriptive observation)",其目的是观察所见到的一切事物。此时的民族志学者表现出孩童般的态度,假定自己对所观察的事物一无所知,不去做想当然的判断。尽管这种取向有助于让民族志学者理解所研究的文化中何事重要何事不重要,但是它容易使人陷入由无关的细节所构成的泥沼中。正因为如此,民族志学者改用"焦点观察(focused observation)",即忽略那些不重要的事物。焦点观察认为有必要限制访谈法的使用,因为当地人的言谈举止间流露出的信息会引导民族志学者去决定该文化中何事重要何事不重要。焦点观察大多用于有着明确边界的集体活动中(例如,宗教仪式、课堂教学、政治选举)。最后,也是最体系化的方法是:"选择性观察(selective observation)",民族志学者关注不同类型行为的某一方面,例如撇开教学内容的明显差异不谈,在不同的社会学习情境下

教学的语言艺术有何不同。

## 反思观察:作为互动的文本

当代社会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①民族志学者越来越愿意承认并发展其在所研究的区域社会的身份角色,②调和观察者与局内人的视角以便达成某种"民族志的真相"被认为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可能的,③从往日的个人主观研究向民族志学者的协作模式的转型。以往对研究过程和研究路径的关注被新的研究兴趣所补充(并非代替),这种新的研究兴趣强调的是民族志观察者与其研究对象的互动和对话关系。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讨论几个当代民族志学者的作品以便阐明这种补充因素——观察研究的当代互动情境取向。我们将用五个非常一般的社会互动的原则来组织下面的评论,这些评论在理论和方法上迥异,并由大量文献所组成。

### 情境认同的有意采用

第一个原则如下:(自发的或者带一点计划性质的)参与某一社会设置的决定,而非对他人行为的被动反应,是社会互动的基础。在某些早期的社会学文献中,这一过程被称为"角色扮演(role making)",与"角色适应(role taking)"相对应。在这一原则的鼓舞下,民族志学者主动寻求以成员身份为基础的情境认同,而非传统理解中的观察。

例如,安格罗西诺曾在美国开展过一项长期研究,该研究关注的是由社区服务机构提供服务的那些患有精神痴呆或周期性精神病的成年人。该项研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这些年轻时在这些大机构中完成社会化的成年人,在他们之中除了极少数病情严重的病人外,大多数人已经适应了(精神病院)这一特定社区的生活方式,以至于难以摆脱此类生活方式对他们的影响。为解答这个疑问需要深入了解这些成年人的生活,因为他们难以对问卷或其他调查工具做出充分的反应。安格罗西诺还想了解在一个高度强调技能的社会里精神障碍患者的自我感受。为了调查这个问题,仅仅从原有的客观中立的角度出发去那些被抽中的机构对精神病人进行观察是不明智的,因为民族志学者难以假定自己能理解这些精神病人不同于常人的言谈举止中透露出的信息。另一方面换用密集访谈的方式也是不合适的,因为精神病人难以信任那些生活在外面社会中的人,他们觉得与之没有共同语言。

因此安格罗西诺积极地在精神病人的生活世界中寻求一种成员身份。他不打算采用已经被病人所熟知的那些专业角色(例如,治疗师、社工、老师、假释官等),因为这些病人已熟知的角色会导致刻板反应。另外,他也不能仅仅到此一游。与其他的人群不同,没有人能够在此类闭合的群体中走过场。于是,安格罗西诺选择了志愿者的角色,有时以助理的身份在教室里协助老师工作,常常是安

排病人来往上课的地点;有时在一家二手商店当店员,这个二手商店是用来筹措捐款,而且由病人自己来充任职员,安格罗西诺在这家商店里做一些特定的工作(例如,安排一场用作慈善募捐的垒球比赛)。通过承担这些工作,安格罗西诺修正了他原先所提出的团体中每个人的角色的模型,如今他真正能够阐明每件事情的意义,而不是像一名单纯的研究者那样,难以理解病人所关注的事情。因此,安格罗西诺能够花大量时间来观察病人的饮食起居,而他的出现也不再使得病人觉得新鲜以至于干扰病人原来的生活,他已经获得病人的信任,从而能够自如地与病人访谈(有关该研究的进一步细节,参见:Angrosino,1992,1994,1995a,1997b,1998; Angrosino & Zagnoli,1992)。

贝哈(Behar,1993)的有关 Esperanza(一名墨西哥裔印第安妇女)的研究表明了一名民族志学者由于其合作者人格因素的影响,被迫采取与原先设想不同的成员角色之后所做出的一流成果。实际上,该项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一位女性民族志学者——她认识到自己在写作期间是一名女性主义者——的成功典范。通过对那位贫苦的墨西哥裔印第安妇女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来养家糊口的故事的叙述,贝哈更深刻地理解到她自己的人生境遇,即作为来到美国的古巴移民在社会上或学术圈内寻求身份认同过程中的一种圈外人的处境。贝哈第一次遇到 Esperanza 的时候,后者正在街头的一个角落里卖花。贝哈提出要给 Esperanza 拍照,原以为后者会顺从的应允。不曾想 Esperanza 以一种傲慢的态度反问她为何要拍照。贝哈在其 1993 年的著作中写道,自己当时是以 Esperanza 具有墨西哥裔女性的气质,可以用来作为自己采风的代表之类的言语来回应 Esperanza 的话,可是 Esperanza 拒绝合作并且敢于质疑她的研究计划。作为对此事的反应,贝哈反思自己在民族志研究中的权力关系假设的正确性(参见 D. L. Wolf,1996,p. 2; M. A. Wolf,1992,p. 5)。在这个案例中,贝哈觉得自己被误导,错误地认为研究对象愿意被研究,Esperanza 不会对自己被描绘成研究对象表露出不满。贝哈认识到如果她想理解 Esperanza 的生活,她必须成为 Esperanza 生活脉络的一部分。贝哈后来以成为 Esperanza 的女儿的朋友的身份步入她们的生活进程。

研究者将自己投入其所研究的社会情境中会导致情感上的后果,贝哈(Behar,1996)曾对此有过讨论。她将人类学原来的问题——与研究对象建立友好关系时避免"土著化"(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强调的是研究的伦理)——转变成另外一个问题,即允许研究者处于一种容易受到被研究者的影响,但并非过于受影响的境地(这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强调的是研究的道德立场)。贝哈机警地选用理论的表达方式和谨慎地加以分析,她说这是她自己获得有意义的新的经验的一种工具,但是这一方式也易使研究者陷入某种情感纠葛,有时还是一种痛苦的体验。

莫雷诺(Eva Moreno,笔名)报告了这方面的例证,她在书中讲述了她自己在埃塞俄比亚开展田野调查时被强奸的事件。莫雷诺(Moreno,1995,p. 246)表明在田野调查中假装一种中性的性别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行的,问题在于研究者

如何呈现自己的性别,她必须警惕不要因此使得自己成为他人性侵犯的对象。莫雷诺猜想她所遇到的性侵犯更多的是针对她的专业认同而并非因为她是女性。在莫雷诺开展研究期间,当地人针对外国人表现出普遍的敌意,尤其是对那些像是专家的外国人更是如此,当地人认为正是这些所谓的专家破坏了他们的生活。莫雷诺举例说,她曾听说一名外国妇女在打算向当局报告一起当地人的罪行时被真正的警察强奸。莫雷诺(Moreno,1995)提出女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提防性侵犯的幽灵(p. 248)。实际上男性研究者也会遇到类似的性侵犯,不过男人从不公开讨论此事。有一点莫雷诺无疑是正确的,性侵犯在大多数情境下是针对女性。对那些涉世不深的女性民族志研究者而言,她们大多尚未在自己的研究计划中对自己容易受到性侵犯一事想好应对之策,而做足防范又必然会对研究计划的进行产生影响。

简言之,角色扮演以一种准专业的姿态成为被研究对象家庭生活的一部分,有时研究者会对其性角色过于敏感,有时是两者兼而有之。不管怎样,角色扮演比原先那种被动的面对其所研究的地域社会的假设要好得多。

### 对权力的理解

第二个原则是在大多数社会互动中,人们对行为的评价不是根据其在抽象意义上的与社会或文化规范的符合程度,而是根据其连贯性,也就是说这种认知模式关注的是某人在给定的社会情境下影响他人的能力。该原则与传统人类学中对文化中的应然与实然的区分有关。采用参与观察的民族志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文化中的应然部分,严格遵循研究规范,不越雷池一步。采用成员身份的民族志研究者更熟悉实然部分的生活,社会群体的成员在其给定的情境下的生活方式不需要同传统人类学奉为神圣的应然部分相一致。

我们常常依照某种意识形态来行事,这种意识形态使我们期待并由此看到权力发自白人,即西方体制及其代言人——民族志学者,并指向各类“劣等的”或边缘化的人群。然而日益增多的文献指出那些被看作“劣等的”人群致力于反对白人的掠夺(Maddox,1996,p. 277)。我们也有长期的偏见认为文化或社会应该是凝聚成一体的。然而越来越多的民族志学者发现其所研究的地域社会充斥着冲突、分裂,并以其内部的小群体为界(Hubbard,1997;McCall, Ngeva, & Mbebe, 1997)。

例如,安格罗西诺(Angrosino,1991)于佛罗里达本笃会百年庆祝时编撰了修士们的口述史。他花了一个月时间住在修道院以便进行访谈,在此期间他遵循由圣·本笃订立的有关每日祷告、工作、冥想的规范。修道院的院长也允许研究的进行,并要求所有管辖下的僧侣予以合作。同样的,尽管安格罗西诺并非一名修士,该院长也要求安格罗西诺尊重其权威。这名院长还常常对安格罗西诺的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并以各种方式明白无误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有时是以一种微妙的方式,例如当安格罗西诺对他进行访谈时,他端坐在自己的办公桌背后;有时则是以一种明目张胆的方式,由他自己决定安格罗西诺的访谈对象。尽

管其他的修士常常宣称支持该项研究计划,可是安格罗西诺发现他们中为数不少的人言辞闪烁。他对此的解释是修士们不想对自己的经历谈论太多,以免对上帝不恭。在进行该项研究期间,安格罗西诺意识到尽管这种韬晦式的沉默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但是这种沉默的底下掩盖着其他的动机,例如它表达了对那位操纵他们的合作的修道院院长权威的反叛。在其日常生活中,他们不敢流露出违背院长意愿的意向,然而安格罗西诺是局外人,他只是暂时生活在修道院中,即便对他有什么不敬,他也不能像院长般把他们怎么样。更进一步,这种策略使得某些修士对那些完全与安格罗西诺合作的修士加以冷嘲热讽。这些说风凉话的修士的韬晦是对其同伴的象征性暗示,让后者不要以与安格罗西诺完全合作来拍院长的马屁。至此,修士们的那种理想化的生活方式——正式的、符号化的上下尊卑关系——并不是其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即使在这样一个高度受限制的文化里,人们也能透过其互动仪式以一种微妙方式向研究者呈现其阋墙之举,这种权力游戏塑造了民族志学者所能观察到的事物以及对其观察的阐释。

贝哈(Behar,1993)探讨了她自己试图将 Esperanza 的故事塞进主流的有关拉美裔美国妇女的女性主义模型中。然而她认识到 Esperanza 与那些模式化的女主人公没有什么相似之处,Esperanza 的真实的一面在于她并不值得钦佩,也不是那种献身女性解放事业、背离其父权制文化的英雄,但是她是一名会犯错误的有血有肉的妇女,而非那种刻板化了的第三世界女模范。贝哈认为民族志学者在创作并赋予其研究对象以形象的故事时,她必须将这个故事植根于允许其研究对象表现出其文化的不同行为的基础之上,必须尊重她们做事情的不同方式,即便这些方式不符合欧美女性主义者的理想化了的期望(p. 270)。以同样的风格,赫什和奥尔森(Hirsh & Olson,1995,p. 23)引证了哈丁(Sandra Harding)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女性主义者学识的功效问题,这些学识常发自男性视点,甚至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女性学者所采用,却被用于克服既定的社会知识分类体系。于是沃尔夫(Wolf,1992)追问道:"是否我们在进行研究时也利用了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否我们在提高妇女地位时也将另一种强势的社会价值观念强加给她们。"更进一步,这样做会对研究者及其研究对象间的权力关系的概念化产生误导。熊(Hsiung,1996)宣称这一立场忽视了女性研究者与其女性被访者双方各自所处的父权制脉络。因而我们有必要考虑"多元权力关系"的概念,这一多元关系将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制度、女性被访者、女权主义的女性研究者均视为多元权力关系的关键组成部分。

现今的民族志研究者常常会发现自己已无法再遇到早期人类学家所面对的单一族群(Gupta & Ferguson, 1996b, p. 2),因此在给定的情境中关注何事产生出意义尤其显得必要。换言之,已经没有民族志研究者能够在与其先辈的概念框架所描绘的那般高度限定的、同质的文化或社会里工作。我们已经不再能假设研究的文化对象只是一个能完全进入的特定场所(Marcus, 1997, p. 96)。如今的多数民族志工作场所是由以下有关文化交汇的特定人群的三方面的研究组

成:其一是用来呈现行为或态度模式多样性的某个局部地区;其二是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混合体;其三是在相互联系的区域里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Gupta & Ferguson, 1996a, p. 35)。毕竟,人们是生活在不同的、多重层叠的,但并非总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时空中。这些不同的时空包括本土时空、民族时空、广播或窄播意义上的时空、生物意义上的时空、日常时空、计划的或是自发的但也是社会地理意义上的时空中(Abu-Lughod, 1997, p. 112)。例如,马尔基(Malkki, 1996b)对偶发群体的记忆运作的描绘。此类研究对象包括共同经历过战争的人,比如那些广岛和长崎轰炸的幸存者;在某一革命中的逃亡者;被某种疾病困扰的人们;或者那些在某一慈善或发展计划中共同工作的人(p. 92)。所有这些案例都是偶发群体而非事先计划好的团体(p. 92)。民族志学者已难以坐享原先的便宜,即其所观察的区域社会是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代表。现今所研究的社会受多种间质性、杂合性因素的影响(Gupta & Ferguson, 1996a, p. 48),例如全球化话语和大众传媒的想象(Peters, 1996, p. 81),而古典民族志研究的那种中性人无助于当今研究。有时,民族志学者甚至会为了研究某特定人群或者表达出研究者所感受到的特定人群之间的联系而创造一个区域社会。例如怀特(White,1955)、利博(Liebow,1967)、汉纳兹(Hannerz,1969)等人所研究的街角社会之所以成其为"社会",只是因为研究者将此互动汇聚之所当作一个实体。口述史学者常常围绕某一特定主题将若干人的人生体验联系起来从而创造出一个虚拟的共同体。

当性别取向——如利奥塔(Lyotard)所言的宏大叙事(引自 Olson, 1995a, p. 186)——与性取向的问题被考虑时,权力原则常易引起困惑,因为不同的性观念影响了民族志研究者与其研究对象的关系,并反过来又影响了研究者对此的解释(Willson, 1995, p. 253)。性别取向与性取向在界定民族志学者的个人认同时是非常有意义的成分;它们还是某种滤镜,研究者透过其观察到的区域社会已经被滤镜所中和。问题在于其所产生的意义在不同社会里是不一样的。观察者无法想象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理想化的性别取向或性取向符号。个人认同的蛛丝马迹必须在给定的社会情境的生活脉络中加以阐明。

例如杜比什(Dubisch,1995,p. 34)指出,女性民族志学者仅仅因为她们是女性,无论其性事是发生在家中或是在田野研究中,此类艳遇都不被接受。相反,男性民族志学者长期被默许在其田野研究中有风流韵事(Newton, 1993, p. 5)。此类默识认为男性民族志学者做这些事情是没关系的,所有人都会预期并接受男人的作为,而女性民族志学者则不能这样做,因为这不会被人们所接受。这种假定应该被质疑,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志学者将其性态度卷入其工作场所中都会影响自身的观察。比起这种行为所引起的研究对象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其所能观察到的类型和品质的影响来说,这种行为是否得到赞成是不重要的。由于意识到这一点,基利克(Killick,1995)提出应该节欲,他指出:"在田野研究中,为避免干扰与被访谈者的关系的微妙平衡,对利比多加以约束是必要的"(p. 81)。另一方面,基利克提倡那些管不住自己的利比多,难以遵守这一方法论

的微妙之处的人应该闭起嘴巴,他们的行为或是令人厌烦的(我们对这种可能不能忽略不计)或是应该受到谴责的(p. 81)。然而,阿尔托克(Altork,1995)反对这种存天理灭人欲的做法。她认为与其钳制人欲或是将其归入私人领域,不如在工作中为我们的感官反应留有余地(p. 116)。以她的观点视之,谁是否做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研究者能否敢于承认有什么事情发生或者没有发生,以及为何会这样。因为这种坦诚有利于民族志学者展开可能的对话,从而探讨由于我们的感受、见证和对工作场所的演绎使得哪些事情发生了改变、增强或转移(p. 121)。作为对这一古老(却仅在最近为公众瞩目)的困境的反讽,阿尔托克提出:"也许在承认了我们的情感和欲望之后,我们才能找出自己的偏见和我们工作中的曲解,从而真正客观的了解异文化"(p. 132)。

然而这一开诚布公的进程却由于那些身为同性恋者的人类学家所迟滞,这些男女同性恋者惯于对其个人或者职业生涯加以某种程度的隐瞒。古德曼(Goodman,1996, p. 50)指出身为同性恋的民族志学者打算在田野调查中隐瞒其性取向,可是伯克哈特(Burkhart,1996)相信其最初的隐瞒,被合理化为一位致力于成为客观中立的观察者的做法,实际上是出于习惯和压抑的世俗观念的束缚所致(p. 34)。威廉姆斯(Williams,1996, p. 74)则提议一种妥协方案:对其研究的区域社会坦白自己的性取向,而在申请研究计划时加以隐瞒。他宣称在他的实地研究中,将自己的性取向透露给当地社会获得了正面评价。然而他发现在申请课题时必须慎重考虑是否有必要透露自己的性取向,即使是申请那些对同性恋进行研究的课题也是如此。甚至对于艾滋病研究,这个可以获得大批赞助经费的领域,最初也没有多少机构愿意听说研究者是个同性恋之类的消息,因为这将意味着艾滋病是只有同性恋才关注的事情(Bolton, 1996, p. 157)。

男女同性恋习惯于长期小心翼翼地对认同加以管理,并将他们生活中的这种典型的思考定势带入研究领域(Lewin & Leap, 1996, p. 13)。相当多的同性恋民族志学者选择同性恋行为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显然他们假设将自己作为预置好的参照群体。因为若有人假定自己对同性恋有切身感受,或者认为所有区域社会的同性恋都是一码事,这就好比假定作为女性的民族志研究者更有利于理解不同文化中的女性一样(Lewin & Leap, 1996, p. 17),这类假定都容易让人失望。关键在于在进行民族志的观察研究中,一个人的性别以及性取向都是必须加以考虑的,此二者都不能被当作私人的事情并加以排除。正如兰(Lang, 1996)所指出的:"很明显,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同性恋模式。"(p. 103)最起码,同性恋并不能"超越现代社会中的等级制度"(Kennedy & Davis, 1996, p. 193);在一个同性恋团体中,仍然有必要调查作为等级制度的阶级和种族的影响。

不管怎样,这清楚地表明民族志研究者不再接受以往的做法,即不再试图隐藏或否认研究者的性别认同、年龄、阶级与种族(就此而言,性认同是最后的前线)。相反,当代民族志写作倾向于承认这些属性,并把它们看作塑造民族志研究者如何演绎其在田野研究中所看到的事情的重要因素(Weston, 1996,

p. 276)。例如,埃德尔曼(Edelman,1996)讨论了其犹太人身份在三个不同的田野研究地点所产生的不同影响。至于其他因素,即便不如那些人口统计因素重要,也会对民族志学者的研究产生影响。例如:罹患各类病症,比如贪吃症(Tillman-Healy, 1996)、乳腺癌(Kolker, 1996)、另类童年经历(Fox, 1996; Ronai, 1996)或者化疗(Mienczakowski,1996)等都会对民族志学者的研究产生影响。在所有引用的案例中,民族志研究者的个人经历是对其观察和阐释产生影响的重要原因。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这些民族志研究者打算研究其他有着同样症状的人,他们(指研究者)必须把自己的视角转换成普通人的视角以便观察研究对象在正常情境中的运作。

## 调和情境认同

第三个原则:互动是包含所有参与者并对其角色框架加以不断检测的一种张力过程。换言之,民族志学者与其合作对象并未步入一个固定的、被完全限定的空间中,而是贯穿在一个研究计划中或者由一个计划到另一个计划的过程中,由其行为和对彼此的期望组成并不断发展的一个动态过程,尽管有时是一种事与愿违的过程(Wolcott, 1995, p. 77)。吉罗克斯(Giroux,1995)指出需要一种"在不同研究地点重新来过"的智能(p. 197),对民族志学者来说尤其如此。邓津(Denzin,1997a)则探讨了民族志学者的"动态关注"能力,即对"其与不断变化的外部世界的关系"的觉知(p. 46)。

例如,安格罗西诺(Angrosino,1997a)在美国人类学协会南方分会成立 30 年之际对其开展了一项口述史研究。从该分会成立之初至 1997 年,安格罗西诺已是其资深会员。作为美国南方某高校人类学系的人类学专家,又是长期从事当代美国南方研究的学者,他是其所研究的组织文化的局内人。而且他和其所要访谈的对象有着长期的个人和专业上的联系。在年会的 30 周年庆典之际,安格罗西诺带领三名研究生充当他的研究助手以便与到会的诸多被访谈的人类学家晤谈,更重要的是这三名研究生可用来进行"真实性核查",以免安格罗西诺由于过于熟悉情况而像局内人那样行事反而忽略了被局外人看来需要加以澄清的重要线索。然而,晤谈仍然在开始时显得有点尴尬,不少被访谈者对于安格罗西诺提出明知故问的问题有点恼火。他们会说:"你不是记得 1970 年代在新奥尔良发生的事情么?",安格罗西诺反问道,"呃,不妨谈谈你自己的看法。"而被访谈者常对此类建议感到沮丧,他们感到作为一名人类学专家要转换成被访谈对象已属不易,更何况在访谈者已经知道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的情况下,这些被访谈者觉得这种转换相当艰难。有的被访谈者决定缩短这段不愉快时间,一个有效的做法是让这种访谈改头换面,用自问自答的方式而避免理会访谈者的问题。还有的被访谈者则要求由那些研究助手进行访谈,他们中有人说到:"安格罗西诺,我无法接受你的面对面访谈。"

过了一阵子,这种尴尬的感觉逐渐消退,大概被访谈者互相交流了自己对访谈的反应,更主要是因为他们确信这项口述史研究对于后来人是很有价值的。

后面的访谈进行得非常顺利,被访谈者心照不宣地将安格罗西诺看作一名凡事必问的局外人。这些民族志学者将安格罗西诺想象成自己的一名学生,从而能够耐心地回答后者的所有问题。虽然大多数被访谈对象设法将局外人角色转化为访谈参与者的角色,但是安格罗西诺在此研究中则是努力将自己的圈内人角色转化成旁观者角色,对于这种做法,安格罗西诺的一名合作者打赌他做不到这一点。在观察研究的互动脉络中,角色的变换是为了对应变化的环境而且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贝哈将这一过程描述成从"女性主义取向的人类学家"向"女性主义取向的民族志学者"的进化,她的意思是说要成为一名"专注于对女性主义策略加以反思的研究者,这种策略可能是工作中的女性主义或是实验文化写作的女性主义"。对这种反思的关注必然是一种"女人对女人的关系"(Behar,1993,p.301),而不是一种科学的观察者与其研究对象的关系。对贝哈而言,参与式观察这一术语是一种"矛盾式修辞法"。贝哈认为民族志学者必然被其成员身份与观察者角色之间的创造性张力所限定,而并非那种仅仅收集到数量有限的信息的资料员。根据弗格森(Ferguson,1996,p.153)的说法,探究如何在部分或暂时脱节的各个地点、社区、社会的经验框架中进行转换的能力可能代表着未来民族志研究最有潜力的领域。

布莱克伍德(Blackwood,1995,p.53)因而指出民族志学者在其研究领域所假定的认同是由他或她被"他人"感知的不同方式所决定的。作为一名妇女,"她常常陷身于一系列被指派或被建构的认同之中:研究者、朋友、女儿、专家、美国人等"(p.58),她得出结论说"研究领域的认同是不确定的,无法加以简单限定"(p.70)。在这一点上,西方文化的心理社会史清楚地表明我们的"认同"在存在意义上总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并且从不会有一个固定的、最后的终点。那种认为民族志研究者的认同可以被明确限定的幼稚想法只不过是一种古老信仰的遗迹罢了,这种古老信仰便是对"整体性"的强调,认为个人可以自发的修正以便符合对整体的认同。不管怎样,自从弗洛伊德的观点在社会分析中得到运用以来,民族志研究者一直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认为田野研究是一种可以让他们更好地面对自己的一种方式。依照巴内特(Barnett,1983)所言:"分享不同的生活方式可产生一种镜像效应,便于观察者正衣冠知得失"(p.169)。

沃尔特斯(Walters,1996)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为建立起个人的认同感,则必须"不断地围绕轴心转动"(p.63)。她是在必须处理如何带女朋友去也门进行田野调查的难题时得出这一结论。她原以为保守的伊斯兰社会不会对两个公开的女同性恋表示欢迎,于是她用各种办法来加以隐瞒(例如宣称她俩是由于收养关系而成的亲戚);最后她决定将其女朋友指认为女伴,这种半真半假的说法足以避免也门当局的盘查(维多利亚时期有一种风俗,年轻女子在出游时会有一名年长女子陪伴,世界上许多地方也有类似的做法)。

尽管这是一种侥幸成功的做法,但是大多数女研究人员常常感到外在压力迫使其性取向和其所研究的社会一致,哪怕那种社会习俗非其所愿,以至于她们

不得不诉诸某种欺骗手法来表现出遵从所研究社会的习俗。依沃尔夫(Wolf, 1996)所言“女性田野调查者曾隐瞒其婚姻状况、民族认同、伦理或宗教背景,以及有关离婚或前一次婚姻的情况,乃至其阶级背景。”(p.11)虽然在这些案例中,这类欺骗手法不曾伤害被观察对象,然而民族志研究者仍深感内疚,这部分是因为每一次欺骗“都违背了女性主义的田野工作的方向,即不利于和被观察者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以及创造一种朋友气氛”(Berik, 1996, p.56;参见 D. L, Wolf, 1996, p.12)。在另一方面,拒绝欺骗,会违背所研究社区一直尊奉的习俗,有时会引起难以预料的不良后果。譬如,贝里克(Berik,1996,p.65)承认她在土耳其的一个村庄开展研究时公开其同性恋取向,结果导致她的一名受访女性被其盛怒之下的丈夫暴打,那男人认为自己的妻子被不规矩的民族志研究者引入歧途。

兰(Lang,1996)开展了一项对本土美国人中的女同性恋的研究。尽管她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取向,但是仍然发现自己不被酒吧里或其他明显的聚会场所里的潜在访谈对象所接受。由于她常在此类酒吧逗留,她被其他女人认为是来找性伙伴的而不是做研究的。她认为扮作一名潜在的性伙伴来引诱访谈对象是不道德的(Lang, 1996, p.94),因此在那些不是那么显眼的场所寻觅其访谈对象。在这个案例中,兰认为自己以民族志研究者的身份出现要优于以女同性恋者的身份出现,尽管女同性恋是她研究的主题。她的抉择是在了解了所研究的区域社会的实际运作后做出的。

许多晚近的文献关注的是观察者认同感的产生、维持、创造性演变以及在欺骗和公开其自身认同之间的摇摆不定,如上所述的那样,这一点对于男女同性恋的研究尤为突出。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其他有关认同的问题也应引起注意,譬如政治上动荡的局面,谁如何被确认为政治上的被排斥群体(Hammond, 1996; Mahmood, 1996; Sluka, 1990),必须靠隐瞒真相度日的群体(非法移民)(Chavez, Flores, & Lopez-Garza, 1990; Stepick & Stepick, 1990),那些卷入犯罪活动的人(Agar & Feldman, 1980; Brewer, 1992; Dembo, Hughes, Jackson, & Mieczkowski, 1993; Koester, 1994; van Gelder & Kaplan, 1992)。

### 效度的标准

第四个原则:使参与有效的信息是由他人透过内在或外在标准产生的。内在标准指的是区域社会的成员检查自己的行为与其所在区域社会的主流文化的符合程度。外在标准指的是区域社会的成员依照可能的一般标准检查其行为。换言之,互动的参与者会问:“这管用吗?”,或者用一种不是非常客气的说法,“这样做可以说得过去吗?”(即,我的阐释可以帮助我和我的潜在合作者弄清有关的联系吗?)。更不客气的说法是,“这样做对吗?”(即,这是该文化以某种方式要求人们如此行事的吗?)

例如,安格罗西诺(Angrosino,1995b)率领一个研究生小组开展一项关于某地居民对艾滋病反应的研究。该研究是以某个机构为中心,该机构提供为数不多且多为实验性的直接服务,但是该机构拥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通报和转介的网

络。这个机构是由一对感染了艾滋病的伙伴创建的;当地人相信这对伙伴的个人经历尤其是其情感投入是该机构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他俩将一个临时性的机构发展成一个拥有专业设施的机构。人力资源管理和发展专家日已掌握了该机构的实权,并将该机构发展成不仅仅关注艾滋病问题而且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来看待的机构。这些专业管理人员对于研究者是有帮助的,但是这种帮助是以一种公事公办的方式进行。与之不同的是,老一辈的创业者则愿意将研究者纳入其社会网络中,这有利于研究者了解"机构的真正成长经历"。

这便是内在标准和外在标准以不同方式运作的情况。一方面,该机构的两伙人以非常不同的标准对什么办法有效做出各自的反应,老一辈的创业者认为其活动和其使命感来自人际互动的成效(内在标准)和普遍的人文关怀(外在标准)。他们认为该机构与其所服务的社区欠缺一种应该具备的合作文化。问题是"怎样做有效",回答应该是"这取决于你想达到的目标"。创始人孜孜以求的试图说服民族志学者,他俩认为克服艾滋病危机的关键在于"行动应该发自内心,而非仅取决于头脑"。患有艾滋病的人和他们的照料者更需要情感支持,而不是仅仅拥有像他们这样的机构所提供的可靠的经济资助。他俩不否认病人赞成良好的管理,但是他俩坚信一个良好运转的管理并不能提供病人在寻求帮助时所需要的一切。他俩诉诸同理心,对缺乏人情味的机构感到厌倦。对此,民族志学者倾向于赞同他俩的观点,尽管他们也欣赏管理人员在他们的研究中对他们的帮助。

在调和社会情境内在标准和外在标准的过程中,以个人体验作为组织材料的标准对于将互动的情境类别化是有意义的。如邓津(Denzen,1997a)所言,"观点是一种个人经验"(p.55),因为观点导致了民族志学者和区域社会的其他成员间的对话,这种对话常常以学者自身痛苦的自传式经验开始(p.57)。实际上,人们也越来越容忍以这种个人经验作为研究的结尾(Quinney, 1996)。欣斯利(Hinsley,1983)指出:"田野调查是一种个人经验。民族志研究,尽管其本意指的是对人群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一种自传,即个体人类学。"(p.55)昆尼(Quinney, 1996)、奥尔森(Olson,1995b)引证哈拉维(Donna Haraway)来说明民族志观察必须转译成一种写作的再现来"体现作者在时空中的位置"(p.46)。邓津(Denzin,1997a)与奥尔森在各自的著作中分别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针对观点文本的出炉加以评论,这些观点文本"大多源自人文学科的非主流观点"(p.55)。斯托金(Stocking,1983b)以一种更不青睐的口吻来表述这种相同的现象,他说这是"修辞性人类学"的分蘖。

虽然任何人都可以用同样的视点从事人类学研究,然而那些来自传统的、主流社会团体的人类学家必须更加慎思自己的活动对他人的意义及影响。对于他们而言,正如对那些原来处于边缘位置的人类学家一样,观察研究的视角取决于个人的经验,因为民族志研究者将自身的存在投注于所研究对象的文化转换中,这些研究对象包括人、事,以及由当今国家来定性的文化产品(Malkki, 1996a, p.53)。依贝伦基(Mary Belenky)所言,"我们必须学会如何针对不同的听众来改

编同一个材料"(引自 Ashton-Jones & Thomas, 1995, p.86)。另一方面,如胡克斯(bell hooks)所说,研究者不能只针对某一类听众,因为这样做会导致研究者画地为牢(引自 Olson & Hirsh 1995, p.110)。实际上,民族志研究者的参与观察在其所欲研究的文化转换的每一个情境中都留下了人为斧凿痕迹。这种观察法不能解决民族志研究的必然和实然之间的张力。与其为了这种张力而去杞人忧天,倒不如适时地为这种观察法在我们的分析中找出其实际用途(M. A. Wolf, 1996, p.217)。

博尔顿(Bolton,1995)指出当民族志学者以性为研究的主题时,根据传统的做法,他们便受限于无法直接观察这种行为。大多数社会科学在讨论性行为时所采证的都是二手资料而非亲眼目睹,而这些他人的实验资料本身亦缺乏严格的观察设计的指导。博尔顿提出如果民族志研究者本身不介意的话可以通过参与观察来了解这一问题。他坦承:"我通过参与观察学到了比仅仅通过简单观察或直接访谈要多得多的东西。"(p.148)这一解决方式引起了有关该互动方式内涵的争论:是否以该种方式参与其中的民族志研究者真的了解到其所研究文化的性习俗?更刺激的说法:是否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别出心裁而不是为了其所研究的社会与其所属的社会?如果是后者,那么他还是在做社会研究吗?抑或引入了一种新的观察方法,而对这种新方法最起码要讨论其是否归属不明,还是仅仅为了获得一个新的论题而有意模糊原有的学科边界?默里(Murray,1996)指出:"和当地人发生性关系并不是了解异文化性习俗的第一选择……在依照研究者的要求解答他所提出的问题并记录当地人的生活史的同时还得和他发生关系,那么研究对象会猜想这个研究者与其说是想了解异文化不如说是想宣泄自己的原始欲望或寻找自己的性认同。"(p.250)

吉林(Gearing,1995)提供了博尔顿观点的女性版本,她在做田野研究时爱上并嫁给了她的最佳访问对象。吉林提出田野研究便是要努力将想当然的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结合起来,而这依赖于"我们的个人关系的质量"(p.207)。她还倡导应该放弃那种无动于衷的参与观察角色,改而采取一种满怀激情的全身心投入的角色。

民族志学者个人体验的效度在传统上是与民族志研究相联系,而这种传统民族志研究是来自于观察研究的结果。虽然近来有人试图在部分程度上将被观察对象也纳入听众的范围,但是其主要的听众仍然是学者。如今根据民族志学者所针对的支持者的不同,研究报告有了各式各样的编写方式(Polkinghorne, 1997)。传统的民族志研究报告得益于被假定为客观的第三人称叙述,正如蒂尔尼(Tiereny,1997, p.27)所指出的,这种叙述来自"全能的观察者"。而当今的民族志研究者则必须根据其所表现的材料的不同而表达出不同的声音。这种向更多参与的转变使得民族志研究者坦承自身的出现对研究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常常以学者自我指称的迂回方式表达出来,比如说"访问员"(Tiereny,1997, p.26)。一度被禁用的第一人称如今被用来作为对主观体验的表现而崭露头角(Tiereny,1997, p.25;亦见 Ellis, 1997; Lather, 1997; Tanaka, 1997)。沃尔克特

(Wolcott,1995)宣称他偏爱“一种可保持人类可视存在的取向,即对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一视同仁”(p.15)。沃尔夫(Wolf,1992, p.52)提出原来由女性学者或其他被学术界边缘化的学者所首创的以敢于挑战正统为特征的第一人称写作方式已经有进入学术主流的趋势,如今男性学者也采用同样的写作手法。这种转换与写作风格无关,它反映了民族志研究者的自我想象的进化,观察者和被观察者彼此间关系的改变,现今的民族志研究者必须重视听众的差异(甚至是彼此矛盾)。一个民族志文本的听众可能有专家、参与者、门外汉或侧重审美的听众(Denzin, 1997b, p.188)。显然与访问员叙述方式的效度相比,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的效度,无论从哲理上还是从学理上,都是完全不同的。

或许被最广泛引用的关于内在标准和外在标准之间的微妙互动的个案研究要数沃尔夫(Wolf,1992)的“讲过三遍的故事”。在她的书中,沃尔夫以重访一个虚构的短篇故事的方式进行个人的反思之旅,这部虚构的短篇故事是她在三十多年前写成的,当时她是其前夫在台湾开展首次田野研究的助手。后来,她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她以当年的田野调查笔记和日志重新回顾了原来的故事(建立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该书的第三部分是一篇正式的民族志研究论文,曾发表在一份主流学术刊物——《美国民族志学家》(*American Ethno logist*)上。该书的每一个部分都伴以评论,在这些评论中,沃尔夫解释了在三篇文章中所呈现的她当年的回忆,以及她现在对这三十年中同样事件的一些思考。在这一过程中,她看到了自己向女性主义人类学家的转变。例如,她提及“她曾有一次感到很满意的精确描绘了她的所见所闻,解决了其被访对象的不同观点所带来的混淆。突然,她认识到最重要的应该是保留这些‘彼此竞争的看法’”(p.4)。

沃尔夫的观点是没有一个民族志研究,包括那些被假定为客观中立的观察,能够被认为是完整的和有效的,除非该研究完成了波尔金霍恩(Polkinghorne,1997)所描绘的“从一系列罗列的、缺乏联系的研究材料向一个统一的、主题突出的文本的转变”(p.14)。一个好的观察者不仅能发展一套捕捉被当地社会成员自身所理解的文化内涵的技巧,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拥有撰写报告的技巧,以便能让“其他文化中对此感兴趣的读者了解这一文化内涵”(Wolf,1992,p.5)。

## 文本脉络的意义

第五条原则:人们是通过假定情景认同来彼此互动的,这一认同增强了他们的自我观念或者服务于他们自身的需求,这种认同更多地是依靠上下文来确定而不是依靠社会或文化规范来确定。区域社会的成员对某一民族志研究者做出反应,他或她发出的暗示并非“外在”于其行为的意义。民族志学者可以练习并控制其中的某些暗示,如果该学者对此保持敏感的话(例如:提高语言能力、穿着得体)。然而有不少暗示是某种混合体(例如:性别、种族/族群、相关的年龄)。在后一种情况,民族志研究者需要认识到其所观察到的事物是由他或她是什么样的人所决定的,对于不同的民族志学者——哪怕受过同样良好的学术训练、同

样对理论和方法娴熟,但是性别、种族或年龄不同——可能引发不同的互动,由此产生不同的观察,得出的结论也不同。

例如,安格罗西诺曾在荷属安的列斯群岛开展过一项长期的研究计划——记录岛内劳工移民的模式和影响。他的一个线人是一名住在一个名叫 Saba 的小岛上的老妇人,安格罗西诺将这位老妇人的生活史以人类学作品的方式编录进该计划的 Saba 岛部分。此后不久,同一名老妇人被 Saba 岛出生的民俗学者(也是当地的政治领导人)所拜访,该民俗学者后来出版了一部题为献给"岛的珍宝(例如其年长居民所传承的智慧)"的文集。这名老妇人的生活史主要框架在两篇文献中基本相同,但是其他部分也有明显的不同。正如可以预期的那样,老妇人告诉安格罗西诺的故事里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进行解释,而老妇人在向本岛的民俗学者讲述时则很少这方面的内容。安格罗西诺显然问了老妇人许多问题,以便澄清那些非当地人所不能了解的容易引起混淆的微妙之处。老妇人曾有过无比艰辛的生活,她(被虚构化为只靠自己一个人)辛辛苦苦地把一大家子拉扯大,所有的孩子都已经成为当地社会的栋梁之材,她自己也被认为是当地最受人尊敬的人。当她向安格罗西诺讲述这些事的时候,有点夸耀自己如何玉汝于成。她在这个故事是一个虽然带点谦逊的老妇人,但绝对是一个英雄形象。在她向本岛的民俗学者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由于岛上的文化是枪打出头鸟,因而相当自我克制。另一方面,她在故事里加上了自己反抗白人殖民者的趣闻轶事,附带还说了自己和白人民族志学者交谈时感到压抑。安格罗西诺的问题在于他是一名白人,来自另一个国度,与老妇人的孙子同辈,这些导致了他所听到的故事与民俗学者所听到的不同,那位民俗学者是当地的黑人而且与老妇人同辈。没有证据表明老妇人有意造成这种不同,她仅仅是对她的两名听众做出自己的反应,正如众多优秀演员一样,她十分明确的根据其听众个人背景的不同做出不同的回应(这两份生活史比较的详细材料参见 Angrosino,1989)。正如贝哈(Behar,1996)所指出的引自德弗罗(George Devereux)的观点:观察者"无法观察在他缺席情况下发生的行为,也不可能听到同一个被访者向他人转述同样的故事"(p.6)。

邓津(Denzen,1997a)指出现在有必要重视性别、种族、族群、阶级的影响,这些因素"塑造了访谈过程,因此使做研究成为一个多文化进程"(p.19)。这一观点并不新鲜,对于这次讨论来说重要的是民族志研究者必须重视这些因素,而不是像传统的观察者所被教导的那样——忽视这些因素或是将它们看作一成不变的,而且还要创造性地将它们整合到观察和写作的过程中。沃尔夫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做出回应说,民族志研究者在分析他们的田野研究时应该运用他们的"直觉、感情和见解",而非否认这些感性因素。

例如,莫顿(Morton,1995)在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汤加——开展研究。在首次访问时,她简直无法摆脱异国情调的诱惑;十年后,当她挺着大肚子开展研究时,孕妇身份成为她避免异性追求的安全带(p.168)。读者或许假定莫顿的怀孕有其他动机,但是怀孕有助于她避免一些尴尬处境(与他人的性关系),也使得她得以聆听汤加文化中不同的部分,而这是她当初作为一个单身、没有怀

孩子的女人所无法了解的。

## 观察研究的伦理维度

观察一向被认为是一项收集资料的技术,民族志学者认为他们自己作为观察者是超脱于其所研究的社会情境的。当研究者投身所研究的社会中并成为其成员时,他与其他成员的对话互动使得观察演变为文本脉络。这种转换也影响了我们对社会研究伦理的反映标尺的转变。

### 制度性机构的建立

无论出于好心还是恶意,事实上全美所有的社会研究都受制于制度性审查委员会(IRBs)的建立,制度性审查委员会是美国联邦政府在1960年代设立的一个机构,该机构负责监管所有接受联邦资助的研究计划的内容。一个显而易见的威胁便是伤害性研究(通常是生物医学的研究),凡从事这类研究项目都必须在政府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下进行。后来制度性审查委员会将这种监管权扩张到所有接受联邦资助的研究项目上,从而颠覆了研究者与研究项目的关系,民主、共和两党也都可以对研究项目插上一脚(关于这段历史的更详细资料参见Fluehr-Lobban, 1994; Wax & Cassell, 1979)。

然而,民族志研究者一直对这种情况感到不舒服。当然,这不是因为他们想从事偷偷摸摸的、有害的研究,而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研究会具有什么“伤害性”。这种宣称本来就是“参与式观察”的典型假定的一部分,尽管这种说法带有传统研究者对其研究对象采取“家长式作风”的遗迹(Fluehr-Lobban, 1994, p.8)。民族志研究者也担心他们呈交给制度性审查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能受到通盘考虑,倒是那些从事“伤害性研究”的报告倒可能被全面的评估。民族志学者争辩道,他们的研究常常伴随研究的进行而变更,不可能按照专家权威所预先设想的计划去开展。他们进一步指出相关学科委员会所公布的专业伦理守则已经能保证研究内容的适当性,制度性审查委员会的作用不过是叠床架屋。

在1980年代,社会科学家从美国联邦健康及人力资源署获得一项赦免,该赦免提出在评估社科研究时可将有关儿童、残疾人或其他被界定为易受伤害群体的研究排除在制度性审查委员会的权限之外。不管怎样,多所大学的法律顾问(包括南弗罗里达大学,那里有人类学和民族志研究的基地)采取谨慎且又非常勉强的做法使得这一几乎是空白支票般的赦令得以采用。实际上,在南弗罗里达大学可以将研究计划提交快速审查通过,如果该计划看上去符合联邦赦令的标准的话,即使那些被认为需要全面审查的计划也只是走走形式而已。南弗罗里达大学现有两个制度性审查委员会,一个是主管生物医学研究的,另一个是主管“行为科学”研究的。由于后者被心理学家(文理学院社会科学部的最大的系)所把持,民族志研究者对此亦表示不满。心理学家惯于处理假设检验、实验、

临床或以实验为基础的研究,他们难以弄清观察法研究设计的细致划分。由此,行为科学制度性审查委员会常要求研究申请书里以个人而非群体或社区为研究对象,还要求假设应该是可检验的而且有实验数据作支撑。南弗罗里达大学的有关民族志学者发现其他研究机构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提交报告,但是如果民族志学者也以同样的写法向南弗罗里达大学行为科学制度性审查委员会提交报告的话,制度性审查委员会在评估时不会认可民族志学者的报告,评委们不把民族志学者的研究方法看作行为研究的一个变通模式。

有趣的是只有观察研究在南弗罗里达大学行为科学制度性审查委员会被明确的提及并被置于例外的类别里,还被界定为"公众研究",一种残留的民族志研究的古典"纯观察"类型,例如观察人们在候机大厅里的行为模式。然而,如果研究者打算出版照片或确认构成公众的人的时候,观察研究的这一例外也被取消了。

**当代观察研究者的问题**

采用成员身份认同导向——正如本评论所阐述的,一种非常强烈的趋势——的民族志学者会发现自己夹在两大模式中左右为难。一种是官方的制度性审查委员会模式,它与经验研究、假设检验、临床模型相联系;另一种是那些力图从不相关的、耗时的限制中脱离出来的民族志学者,并申明他们的研究不是,也不会是"伤害性"的。然而这种互动,并非是就"伤害性"这一字面的负面意义而言,成员身份导向的研究者仍然深深卷入了其所研究社会的生活与活动中,一种充满各种"伤害"可能性的状态。持"应用"取向的民族志学者(例如,那些谋求利用他们的研究来影响社会或制度变迁的研究者),还有那些提倡"普世"价值(例如,女权、生态审查)的学者,特别是当其所研究的当地社会的行为损害了这些价值的时候,这些学者的兴趣在于将自己的研究作为社会批评计划的一部分。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学者都从事了"伤害"性研究,然而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标准来决定哪些伤害是必要的,哪些是研究者可以避免的。当研究者无法预计个人互动可能产生的后果时,我们很难准备一套有关研究内容的规定。至少,在原则上我们可以说由于研究者在制定日程安排时充分考虑了研究对象的权利,因此研究的合作对象不再是被动的研究目标,也没必要得到警告或保护。但是事实上,就其所从事的研究和向那些关注者散发其研究成果而言,研究者仍然处于一个有特权的位置。现今的研究者可能不愿意回到古典观察者的角色中,不愿意回到那种冷冰冰的客观研究中。然而这些研究者会不会为其可能伤害研究对象或者令那些在研究中相信过他们的研究伙伴们感到尴尬的行为做点什么,以便回避责任呢?正如弗路尔—劳班(Fluehr-Lobban,1994)所说:

> 开放式研究或/和封闭式研究,在社会研究中用参与者代替访问对象的说法,合作研究模式与非合作的询问模式,这些都是民族志研究的组成部分,无论是纯学术的还是应用的研究,联邦资助或是个人赞助的研究,我们要研究的是一个我们身处其中的完全展开的世界,并通过专家来研究它。

内容清晰的研究只有在生物医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才得以行其方便,但是这种研究的灵魂是不完整的,它促使我们寻求更好的研究和更好的研究者(p.8)。

## 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案

这种伦理上的两难看来成为观察研究发展将要面对的中心任务,然而只有临时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其中一个例子便是安格罗西诺(Angrosino,1998)的"机会屋(opportanity house)"研究,他在研究中累积的报告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讨论。在长达近二十年的研究中,他对一家以社会为基础的针对有精神障碍的成年人的社会服务机构进行了研究。研究对象都是由拥有完全能力的案主或是获得其合法监护人同意的案主组成,由此内容的合法性得到了保证。可是安格罗西诺对于研究对象是否完全了解了其内容的不同之处没有把握,尤其有许多做长期的生活史访谈的民族志研究后来都迷失了原来的研究方向,而这种失控在原来的研究设计和审批时是无法预计的。各种中期报告都充满了客观的科学家的标准、权威的声音,所累积的观察资料只是有限的摘录了一点访谈资料(归因于匿名访谈对象)来举例说明。当要写一份有关整个计划的全面分析的时候,安格罗西诺发现原来的写作策略看上去不够充分。他认为有必要让读者感受到两方面的体验,一方面是有精神障碍的人们的体验,他们在许多方面和我们相似,只是其在某一个关键的方面——想象能力——和我们相异;另一方面是研究者试图勾画出社区中人们的互动方式,以便让读者了解这种体验。但是这样做若是以暗示的、冷漠的科学协作方式和无视个人差异的写法便难以引人入胜。

安格罗西诺因而决定试图用一种"另类的民族志写作方式"来将他的材料组织到一篇虚构故事中,以便无需对特殊环境下的特定人群加以直接判断从而保留个人体验的真实性。有多种原因支持对民族志材料采取非说明性表达方式的尝试,不过可以将这种另类的写法看作对过渡阶段的观察研究伦理窘境的一种反应。

## 观察研究伦理:迈向相称理性(proportionate reason)

正如其近年来演化的那样,因为观察研究基本上是一套人际互动的方式而不是一套客观假设检定的方式,那么对"人类行动的道德"(Gula, 1989, p.272)加以合适分析是确定伦理判断标准的正确做法。人类的行为必须由其情景来定义,而非依据客观的"符号"。如古拉(Gula,1989)所指出:"没有人愿意在道德问题上有一套史无前例的优先项来给出绝对正确的做法。"(p.275)相称理性的概念便是这种说法的关键之处(Cahill, 1981; Curran, 1979; Hoose, 1987; Walter, 1984)。相称主义有时是指一种严格的功利主义的成本利益分析,但是在此文本中的更合适的看法是赋予人的行为以道德意涵。在这个意义上,"'相称'指的是在得失攸关时的特定价值和在实现价值时不可避免的产生的局限、伤害或者不便之间的联系。"(Gula, 1989,p.273)换言之,衡量行动的后果虽然重要,但是后

果仅仅是行动的全部意义的一部分。由此观之,相称理性指的是个人在行动中的做法(当一位民族志学者投身于一个观察的脉络中时)而并非在已界定的行动中的无关事务(例如,民族志观察的旧观念将民族志学者看作外在于其所记录行动的事物)。

有三个标准帮助我们决定在特定的价值和行动的其他成分之间是否存在着正确的关系(McCormick, 1973; McCormick & Ramsey, 1978)。首先,使用的手段所带来的伤害不能超过为实现价值所必需的手段所可能造成的伤害。说的更具体点,目的不能比人更重要。如果我们认为这一价值是某种民族志研究的结果,那么我们必须小心地认为所使用的手段(例如,投身于一个社会网络中,采用拍照或其他个人记录方式)不会引起不必要的伤害。我们也可以辩驳成为被访者的情人(特别是那种性关系的目的不是超脱研究之外的)所带给被访者的伤害可能会超过一本民族志著作、论文或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所可能造成的伤害。在一个针对有精神疾病的成年人的辅导项目中,为了观察和访谈而以志愿者身份出现的做法可能是合适的;相反,为诱使研究对象合作而付给报酬的做法在道德上是值得怀疑的。

第二条标准是对当前价值的保护是伤害最小的方式。有人会争辩说观察研究会不可避免地侵犯个人隐私,没有一种研究可以保护那些被珍视的价值。但是大多数研究者将会拒绝这种极端的观点,并会认为那种为了增进我们的知识、理解文化的差异、合作策略的本质或者为了那些突出的社会公正问题的受害者谋福利而拓展民族志研究是有价值的。当然任何方法都有潜在伤害的可能,我们必须确定选择那些造成伤害最小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依然可以使我们能获得传播有价值信息的高效率的结果。例如,创作民族志故事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虽然每一个人都拥有民族志学者用来辨别其人物的知识,但是一个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很少有机会能够公开发表一份以客观材料为基础的报告。

第三条标准是为实现价值而采用的方法不能有损于该价值。例如,如果有人为了提高那些有精神障碍的人的尊严而开展研究,他必须确信其研究方法不会使其研究对象受嘲弄。当一群精神病人打垒球时给他们摄影可能会给观众造成这样的印象:这些精神病人倒还努力,不过他们是笨拙的和无能的。从好的一面来说是值得怜悯的,从不好的一面来说是会受到嘲笑而非受人尊敬的病人,这种印象强化了被普遍接受的思维定势。摄影在民族志研究中是一种中性的方法,它是否得到合适的运用必须根据相应的情景来评判。

麦考米克(McCormick,1973)提出在采取拟议中的行动时分辨相称理性的三个模型。首先,我们知道在特定价值和透过经验的行动的其他成分之间存在一种正确的关系,这种关系有时以一种通俗易懂的形式出现。例如,尽管我们会想到鼓励个人表达的重要性,然而我们从经验得知在一个区域社会(例如,修道院)的情景中,这样做可能会引起与群体规则的冲突。传统上,个人在此类情景中屈从于群体,他们已经长期融合在此群体中。经验会提醒我们反思在收集此类群体中个人的生活史的决定之时,应该注重收集那些为共同活动或事件而重建的

集体记忆。

第二,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直觉来把握合适的关系,即使我们对某些事情缺乏经验,我们也可透过直觉断定哪些行为是天生便不合适的。詹森斯(Janssens,1979, p.63)声称我们能够通过自己对"不统一"的感知来发现不适当的行为。例如,直觉告诉我们公开出版那些生活在压制性的、集权社会中的人们的资料会对他们造成伤害,即便这类威胁不是直接的或是暗示性的。我们揭露集权体制的良好目标会给那些我们试图帮助的人们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直觉提醒我们其他有价值的研究计划(例如,收集生活史、家谱,或观察当地市场的日常活动)若是落到不合适的人的手中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当然,对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直觉的后果)的感知与将会发生的事情(经验的后果)的了解是不同的,我们也不必老是去幻想每一个可能的灾难,也没必要为此因噎废食。但是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便是某些后果总是更有可能发生。

第三,我们可以通过试错法来提高我们的认识能力。这种认知的模式在目前制度性审查委员会的伦理规范下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去了解每一个特定的社会互动中的各种可能的后果,那种认为我们可以预知——因而可以先发制人——所有不良后果的想法是极端幼稚的。一项符合伦理要求的研究设计将忽略(或加以修正)那些直觉和经验告诉我们可能产生不良后果的事情;不过,当在真实生活情景中已经清楚的明了哪些是可行的且是必要的事情,并据此认识到要修改行动中的计划之后,我们会继续进行研究计划。对于试错法这一称谓的不确定性引起的不舒服,沃尔特(Walter,1984)提议用"理性分析与争论"来代替(p.38)。我们力图通过收集资料并以逻辑为引导的争论来对所选择的行动给出支持原因。但显而易见的是,这是一个认识的过程,确实,考虑到犯错的可能性,可能还会有未预料到的伤害性后果。虽然如此,那种坚持认为可以预见所有可能的伤害并认为人的行为(包括建立在人际互动基础上的研究计划)不会有任何风险的想法是没有诚意的。相称理性策略的道德优势在于它鼓励研究者有过则改;相反,研究伦理的客观模式相信他们可以消弭所有的问题,因此拒绝对问题负责,且对那些不可避免的突然出现的问题则束手无策。那些同有发育障碍的人一起工作的学者熟悉这样一个表达"风险的尊严(the dignity of risk)",该词常用来描述病人在完全参与社区生活中的"功能适应"。为否认病人犯错的可能性(以假定所有风险都被预先消除和难以做到提供增进解决问题技巧的培训的方式)而否认病人应对其生活负责的能力。是应该躲进庇护所,受到客观法则的庇护,避开风险,还是应该生活在真实世界中面对风险?伦理范式表明没有什么比让观察研究者面对有尊严的风险一事更有利于研究的进行。

乍看上去,以相称理性作为社会研究伦理实践的基础倾向于主观相对主义。实际上,在一个互动中得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由研究者的良心所决定。然而一种合适的相称主义不能被缩减成这样一种立场,即认为研究者可以随心所欲,或者伦理仅仅是研究者个人心灵的诉求。相称主义的策略更多的是建立在共同

体的认知上,个人所做出的伦理抉择必须最终由某种"共同的洞察力"所指导。例如,当我们谈到"经验"时,我们不是仅仅指个人经验,而是指嵌入到共同体传统中的"传统智慧"。同样的,"为防止来自偏见或误识的个人好恶的影响,我们需要广泛征求他人的经验和看法。运用相称主义要求我们比以往更多在共同体中征求道德意见,以免行动只考虑了一个方面的道德问题而忽视了与其他方面的联系。"(Gula, 1989, p. 278)就此而论,理想的制度性审查委员会不应满足于对可能的问题做功利性的核查,它应该由一个智囊团组成,研究者可同其一起讨论并厘清那些有时是互相冲突的需求,例如有关经验、直觉、理性分析和争论的潜在可能等。当前道德守则的基本问题,从定性的观察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在于它们在研究者和其他学者的共同体之间建立了一套武断的——且相当没有必要的——对抗性关系。相称理性的框架意味着研究的伦理是彼此分享的论述的成果,而不是某种检举式的质询。

## 对观察法的展望

如在本书的第 1 版阿德勒双氏(Adler & Adler,1994)在其撰写的章节中所指出的,尽管他们不能从当时的趋势加以推断,但是"预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盛衰总是难有定论的"(p. 389)。以此推论,我们提出观察研究的未来可能更像拜里特(Barrett,1996)所指出的"千差万别的定性调查方法"(p. 237)。拜里特指的是方法论的去魅化。尽管民族志学者曾经用含混的方式谈论"亲善"和"同理心",由于前文所提到的文献,他们现在以坦然的态度公开广泛地讨论这一问题。这种去魅化的一个重要后果便是观察不再被看作是研究那些宏大的,但又是晦暗不明的诸如"文化"、"社会"一类分析单位的关键因素。确实,阿卜—卢格霍德(Abu-Lughod,1991)力劝定性研究者运用他们的技巧来消解那些她觉得已经成为"种族"(有差别的人群的分类)一词的现代等价物的概念,把此类概念打入冷宫。相应的,为表述此类有具体区隔和天然层级的概念,观察研究具有一种潜力,即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阿卜—卢格霍德(Abu-Lughod,1991)所说的"具体的民族志"(p. 154)上。这并非是试图描述某群体的文化组成或者分析那些假定的组成社会体制的全部范围,采用观察法的民族志研究者将能够提供特定人群生活的一整套记录,其关注点是放在个人及他们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上,而不是放在那种假定的团体没有时间性的所谓同质性、凝聚力、伙伴关系等概念上(这些概念为传统的人类学者所钟爱)。

远在二十多年前,格尔茨(Geertz,1973)便预见到了阿卜—卢格霍德的观点(这表明预见是如何缓慢地被人们所接受)。格尔茨倡导抛弃那些传统的社会科学所关注的"实际行为模式的复杂性",而代之以建立在对"意义符号(significant symbol)"(p. 44)解释基础上的对"具体行为的关注"。前面的文献回顾清晰地表明这种转变已经发生,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关于生活史和意义研究的兴趣都

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前,以对具体行为的观察为代表的研究取向和定量研究以及社会学、人类学与社会心理学诸派别的实证主义等研究取向共同存在。来自曾经统一的社会科学认识论的不同分支的不同研究取向能够维持多久的联系值得怀疑,因为它们的目标迥异。看来观察法不太可能在一个被重新界定的文化研究(由旧有学科的定性部分组成)的范畴里找到一席之地,而将其实证主义同僚留在被重新界定的社会科学学科里。

人文主义者认为观察研究者和他们的定量研究的同事一样依靠技术的演进。曾经用笔和本子来记录,也许还有素描本,又有拍照和电影先后加入民族志研究者的工具囊中。渐渐地磁带录音机被摄像机所补充(甚至取代)。笔记本电脑的出现增进了做笔记的能力,对定性资料的分析程序也日益得到广泛运用。因此,以观察为基础的研究者被推到一个岔路口:一面是满口的理论术语"情境化"、不确定性和相对主义;另一面是这些研究者越来越依赖于技术,而技术捕捉"真实性"的能力超过了他们相对有限的阐释能力。技术使研究者能够记录和分析人物和事件,而这在十年前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记录的便利性容易导致民族志学者丧失所熟知的生活体验能力。以观察为基础的民族志学者也可能愚蠢地追求现代技术记录的连贯性,从而使自己陷身于日益复杂的记录和分析技术之中。但是因此而因噎废食也同样是愚不可及的。也许我们有必要在观察的每一进程中运用我们的观察力,认识到我们不仅是心理社会生物(这是当前的趋势)也是技术的使用者。正如波斯特曼(Postman,1993)所指出的,技术变迁从来不仅仅是带来增减效应的,也从来不仅仅是带来一种简单的用来做事的工具,而是通过改变行为的某个方面的生态,从而根本的改变了行为所属的系统的生态。"围绕每一项技术都有一套组织起来的机制,从而反映技术所带来的世界观。"(p.18)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最有效的做法是在最不远的将来对技术运用的同时也注意反思技术本身的影响,不再把技术仅仅看作研究计划的中性附属品。技术有能力影响我们的工作。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所观察到的事物并不仅仅是"我们"和"它们"发生遭遇时的样子,而且也是"我们"通过特定的技术手段所塑造出来的样子。

不管怎样,这清楚的表明实证主义认识论及其外围的作为最基本的人文主义研究技巧的观察法的根基已经动摇,尽管这种认识论曾经拥有不可辩驳的霸权地位。作为一位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和历史学家,戈尔德(Gould,1998)的悲叹反映了这一变革以及即将到来的挑战的力量:

> 没有一种信仰会比下面的观念更具有误导性,即不加考虑地认为人们可以"眼见为实",我们很少去置疑这种观念的有效性。完全没有偏见的观察只能侧身于原始神话和科学的陈词滥调之间,因为我们只能见到与我们的精神世界相符的事物,包括解释在内的所有描述和感官报告一样值得质疑(p.72)。



Abu-Lughod, L. (1991). Writing against culture. In R. G. Fox (Ed.), *Recapturing anthropology: Working in the present* (pp. 137-162). Santa Fe, N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Abu-Lughod, L. (1997).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after television. *Reflections*, 59, 109-134.

Adler, P. A., & Adler, P. (1987). *Membership roles in field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Adler, P. A., & Adler, P. (1994). Observational techniques.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377-392). Thousand Oaks, CA: Sage.

Agar, M., & Feldman, H. (1980). A four-city study of PCP users: Methodology and findings. In C. Akins & G. Beschner (Eds.), *Ethnography. A research tool for policymakers in the drug and alcohol fields* (pp. 80-146). Rockville, MD: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Altheide, D. L., & Johnson, J. M. (1994). Criteria for assessing interpretive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485-499). Thousand Oaks, CA: Sage.

Altork, K. (1995). Walking the fire line: The erotic dimension of the fieldwork experience. In D. Kulick & M. Willson (Eds.), *Taboo: Sex, identity and erotic subjectivity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pp. 107-139). London: Routledge.

Angrosino, M. V. (1989). The two lives of Rebecca Levenstone: Symbolic interaction in the generation of the life history.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45, 315-326.

Angrosino, M. V. (1991). Conversations in a monastery. *Oral History Review*, 19, 55-73.

Angrosino, M. V. (1992). Metaphors of stigma: How deinstitutionalized mentally retarded adults see themselv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1, 171-199.

Angrosino, M. V. (1994). On the bus with Vonnie Lee: Explorations in life history and metapho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3, 14-28.

Angrosino, M. V. (1995a). Eutaw Jack: The man born blind. In B. Grindal & F. Salamone (Eds.), *Bridges to humanity: Narratives on anthropology and friendship* (pp. 7-22).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Angrosino, M. V. (1995b). *The Tampa AIDS Network: An oral history.* Tampa: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Center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

Angrosino, M. V. (1997a). Among the savage Anthros: Reflections on the SAS oral history project. *Southern Anthropologist*, 24, 25-32.

Angrosino, M. V. (1997b). The ethnography of mental retardation: An applied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6, 98-109.

Angrosino, M. V. (1998). *Opportunity House: Ethnographic stories of mental retardation.*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Angrosino, M. V., & Zagnoli, L. J. (1992). Gender constructs and social identity: Implications for community-based care of retarded adults. In T. Whitehead & B. Reid (Eds.), *Gender constructs and social issues* (pp. 40-69).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Ashton-Jones, E., & Thomas, D. K. (1995). Composition, collaboration, and women's ways of knowing: A conversation with Mary Belenky. In G. A. Olson & E. Hirsh (Eds.), *Women writing culture* (pp. 81-104).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Barnett, H. G. (1983). Learning about culture: Reconstruction, participation, administration, 1934-1954. In G. W. Stocking, Jr. (Ed.), *Observers observed: Essays on ethnographic fieldwork* (pp. 157-174).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Barrett, S. R. (1996). *Anthropology: A student's*

*guide to theory and metho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Bateson, G. (1972).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Collected essays in anthropology, psychiatry, evolution, and epistemology.* San Francisco: Chandler.

Behar, R. (1993). *Translated woman: Crossing the border with Esperanza's story.* Boston: Beacon.

Behar, R. (1996). *The vulnerable observer: Anthropology that breaks your heart.* Boston: Beacon.

Bell, J., & Jankowiak, W. R. (1992). The ethnographer vs. the folk expert: Pitfalls of contract ethnography. *Human Organization*, 51, 412-417.

Berik, G. (1996).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system in rural Turkey: Fieldwork dilemmas of conformity and intervention. In D. L. Wolf (Ed.), *Feminist dilemmas in fieldwork* (pp. 56-71). Boulder, CO: Westview.

Bernard, H. R. (1988). *Research method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Newbury Park, CA: Sage.

Blackwood, E. (1995). Falling in love with another lesbian: Reflections on identity in fieldwork. In D. Kulick & M. Willson (Eds.), *Taboo: Sex, identity and erotic subjectivity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pp. 51-75). London: Routledge.

Bolton, R. (1995). Tricks, friends, and lovers: Erotic encounters in the field. In D. Kulick & M. Willson (Eds.), *Taboo: Sex, identity and erotic subjectivity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pp. 140-167). London: Routledge.

Bolton, R. (1996). Coming home: The journey of a gay ethnographer in the years of the plague. In E. Lewin & W. L. Leap (Eds.), *Out in the field: Reflections of lesbian and gay anthropologists* (pp. 147-170).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Brewer, D. D. (1992). Hip hop graffiti writers' evaluations of strategies to control illegal graffiti. *Human Organization*, 51, 188-196.

Burkhart, G. (1996). Not given to personal disclosure. In E. Lewin & W. L. Leap (Eds.), *Out in the field: Reflections of lesbian and gay anthropologists* (pp. 31-48).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Cahill, L. S. (1981). Teleology, utilitarianism, and Christian ethics. *Theological Studies*, 42, 601-629.

Chavez, L. R., Flores, E. T., & Lopez-Garza, M. (1990). Here today, gone tomorrow? Undocumented settlers and immigration reform. *Human Organization*, 49, 193-205.

Clifford, J. (1983a). On ethnographic authority. *Representations*, 1, 118-146.

Clifford, J. (1983b). Power and dialogue in ethnography: Marcel Griaule's initiation. In G. W. Stocking, Jr. (Ed.), *Observers observed: Essays on ethnographic fieldwork* (pp. 121-156).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Cole, D. (1983). "The value of a person lies in his *Herzenbildung*": Franz Boas' Baffin Island letter-diary, 1883-1884. In G. W. Stocking, Jr. (Ed.), *Observers observed: Essays on ethnographic fieldwork* (pp. 13-52).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Curran, C. E. (1979). Utilitarianism and contemporary moral theology: Situating the debates. In C. E. Curran & R. A. McCormick (Eds.), *Readings in moral theology* (pp. 341-362). Ramsey, NJ: Paulist Press.

Dembo, R., Hughes, P., Jackson, L., & Mieczkowski, T. (1993). Crack cocaine dealing by adolescents in two public housing projects: A pilot study. *Human Organization*, 52, 89-96.

Denzin, N. K. (1997a). *Interpretive ethnography: Ethnographic practices for the 21st century.*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nzin, N. K. (1997b). Performance texts. In W. G. Tierney & Y. S. Lincoln (Eds.), *Representation and the text: Re-framing the narrative voice* (pp. 179-218).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Dubisch, J. (1995). Lovers in the field: Sex, dominance, and the female anthropologist. In D. Kulick & M. Willson (Eds.), *Taboo: Sex, identity and erotic subjectivity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pp. 29-50). London: Routledge.

Edelman, M. (1996). Devil, not-quite-white, rootless cosmopolitan: *Tsuris* in Latin America, the Bronx, and the USSR. In C. Ellis & A. P. Bochner (Eds.),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pp. 267-300).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Ellis, C. (1997). Evocative autoethnography: Writing emotionally about our lives. In W. G. Tierney & Y. S. Lincoln (Eds.), *Representation and the text: Re-framing the narrative voice* (pp. 115-142).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Ferguson, J. (1996).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on the copperbelt. In A. Gupta & J. Ferguson (Eds.), *Culture, power, place: Explorations in critical anthropology* (pp. 137-154).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Fluehr-Lobban, C. (1994). Informed consent in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We are not exempt. *Human Organization*, 53, 1-10.

Fox, K. V. (1996). Silent voices: A subversive reading of child sexual abuse. In C. Ellis & A. P. Bochner (Eds.),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pp. 330-356).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Gearing, J. (1995). Fear and loving in the West Indies: Research from the heart (as well as the head). In D. Kulick & M. Willson (Eds.), *Taboo: Sex, identity and erotic subjectivity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pp. 186-218). London: Routledge.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Giroux, H. A. (1995). Writing the space of the public intellectual. In G. A. Olson & E. Hirsh (Eds.), *Women writing culture* (pp. 195-198).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Gold, R. L. (1958). Roles in sociological field observation. *Social Forces*, 36, 217-223.

Gold, R. L. (1997). The ethnographic method in sociology. *Qualitative Inquiry*, 3, 388-402.

Goodman, L. (1996). Rites of passing. In E. Lewin & W. L. Leap (Eds.), *Out in the field: Reflections of lesbian and gay anthropologists* (pp. 49-57).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Gould, S. J. (1998). The sharp-eyed lynx, outfoxed by nature (part two). *Natural History*, 107, 23-27, 69-73.

Gula, R. M. (1989). *Reason informed by faith.* New York: Paulist Press.

Gupta, A., & Ferguson, J. (1996a). Beyond "culture": Space,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A. Gupta & J. Ferguson (Eds.), *Culture, power, place: Explorations in critical anthropology* (pp. 33-52).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Gupta, A., & Ferguson, J. (1996b). Culture, power, place: Ethnography at the end of an era. In A. Gupta & J. Ferguson (Eds.), *Culture, power, place: Explorations in critical anthropology* (pp. 1-32).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Gupta, A., & Ferguson, J. (1996c). Discipline and practice: "The field" as site, method, and location in anthropology. In A. Gupta & J. Ferguson (Eds.), *Anthropological locations: Boundaries and grounds of a field science* (pp. 1- 4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ammond, J. L. (1996). Popular education in the Salvadoran guerrilla army. *Human Organization*, 55, 436-445.

Hannerz, U. (1969). *Soulside.* 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areven, T. (1996). The search for generational memory. In D. K. Dunaway & W. K. Baum (Eds.),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2nd ed., pp. 241-256).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Hinsley, C. (1983). Ethnographic charisma and scientific routine: Cushing and Fewkes in the American Southwest, 1879-1893. In G. W. Stocking, Jr. (Ed.), *Observers observed: Essays on ethnographic fieldwork* (pp. 53-69).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Hirsh, E., & Olson, G. A. (1995). Starting from marginalized lives: A conversation with Sandra Harding. In G. A. Olson & E. Hirsh (Eds.), *Women writing culture* (pp. 3-44).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Hoose, B. (1987). *Proportionalism*.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Hsiung, P.-C. (1996). Between bosses and workers: The dilemma of a keen observer and a vocal feminist. In D. L. Wolf (Ed.), *Feminist dilemmas in fieldwork* (pp. 122-137). Boulder, CO: Westview.

Hubbard, A. S. (1997). Face-to-face at arm's length: Conflict norms and extra-group relations in grassroots dialogue groups. *Human Organization*, 56, 265-274.

Janssens, L. (1979). Ontic evil and moral evil. In C. E. Curran & R. A. McCormick (Eds.), *Readings in moral theology* (pp. 49-72). Ramsey, NJ: Paulist Press.

Kennedy, E. L., & Davis, M. (1996). Constructing an ethnohistory of the Buffalo lesbian community: Reflexivity, dialogue, and politics. In E. Lewin & W. L. Leap (Eds.), *Out in the field: Reflections of gay and lesbian anthropologists* (pp. 171-199).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Killick, A. P. (1995). The penetrating intellect: On being white, straight, and male in Korea. In D. Kulick & M. Willson (Eds.), *Taboo: Sex, identity and erotic subjectivity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pp. 76-106). London: Routledge.

Koester, S. K. (1994). Copping, running, and paraphernalia laws: Contextual variables and needle risk behavior among injection drug users in Denver. *Human Organization*, 53, 287-295.

Kolker, A. (1996). Thrown overboard: The human costs of health care rationing. In C. Ellis & A. P. Bochner (Eds.),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pp. 132-159).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Kuhlmann, A. (1992). Collaborative research among the Kickapoo tribe of Oklahoma. *Human Organization*, 51, 274-283.

Kuklick, H. (1996). After Ishmael: The fieldwork tradition and its future. In A. Gupta & J. Ferguson (Eds.), *Anthropological locations: Boundaries and grounds of a field science* (pp. 47-6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ang, S. (1996). Traveling woman: Conducting a fieldwork project on gender variance and homosexuality among North American Indians. In E. Lewin & W. L. Leap (Eds.), *Out in the field: Reflections of lesbian and gay anthropologists* (pp. 86-110).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Larcom, J. (1983). Following Deacon: The problem of ethnographic reanalysis, 1926-1981. In G. W. Stocking, Jr. (Ed.), *Observers observed: Essays on ethnographic fieldwork* (pp. 175-195).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Lather, P. (1997). Creating a multilayered text: Women, AIDS, and angels. In W. G. Tierney & Y. S. Lincoln (Eds.), *Representation and the text: Re-framing the narrative voice* (pp. 233-258).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Lewin, E., & Leap, W. L. (1996). Introduction. In E. Lewin & W. L. Leap (Eds.), *Out in the field: Reflections of lesbian and gay anthropologists* (pp. 1-30).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Liebow, E. (1967). *Tally's corner: A study of Negro street corner men*. Boston: Little, Brown.

Maddox, R. (1996). Bombs, bikinis, and the popes of rock 'n' roll: Reflections on resistance, the play of subordinations, and liberalism in Andalusia and academia, 1983-1995. In A. Gupta & J. Ferguson (Eds.), *Culture, power, place: Explorations in critical anthropology* (pp. 277-290).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Mahmood, C. K. (1996). Why Sikhs fight. In A. Wolfe & H. Yang (Eds.), *Anthrop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conflict resolution* (pp. 7-30).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Malkki, L. H. (1996a). National geographic: The rooting of peoples and the territorializ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mong scholars and refugees. In A. Gupta & J. Ferguson (Eds.), *Culture, power, place: Explorations in critical anthropology* (pp. 53-74).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Malkki, L. H. (1996b). News and culture: Transitory phenomena and the fieldwork tradition. In A. Gupta & J. Ferguson (Eds.), *Anthropological locations: Boundaries and grounds of a field science* (pp. 86-10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arcus, G. E. (1997). The uses of complicity in the changing mise-en-scène of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Reflections*, 59, 85-108.

Matsumoto, V. (1996). Reflections on oral history: Research in a Jap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In D. L. Wolf (Ed.), *Feminist dilemmas in fieldwork* (pp. 160-169). Boulder, CO: Westview.

McCall, G. J., Ngeva, J., & Mbebe, M. (1997). Mapping conflict cultures: Interpersonal disputing in a South African black township. *Human Organization*, 56, 71-78.

McCormick, R. A. (1973). *Ambiguity and moral choice*. Milwaukee, WI: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McCormick, R. A., & Ramsey, P. (1978). *Doing evil to achieve good.*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Mienczakowski, J. (1996). An ethnographic act: The construction of consensual theater. In C. Ellis & A. P. Bochner (Eds.),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pp. 244-266).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Miles, M. B., & Huberman, A. M. (1994).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n expanded sourcebook*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Moreno, E. (1995). Rape in the field: Reflections from a survivor. In D. Kulick & M. Willson (Eds.), *Taboo: Sex, identity and erotic subjectivity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pp. 219-250). London: Routledge.

Morton, H. (1995). My "chastity belt": Avoiding seduction in Tonga. In D. Kulick & M. Willson (Eds.), *Taboo: Sex, identity and erotic subjectivity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pp. 168-185). London: Routledge.

Murray, S. P. (1996). Male homosexuality in Guatemala: Possible insights and certain confusions from sleeping with the natives. In E. Lewin & W. L. Leap (Eds.), *Out in the field: Reflections of lesbian and gay anthropologists* (pp. 236-260).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Newton, E. (1993). My best informant's dress: The erotic equation in fieldwork. *Cultural Anthropology*, 8, 3-23.

Olson, G. A. (1995a). Resisting a discourse of mastery: A conversation with Jean-Francois Lyotard. In G. A. Olson & E. Hirsh (Eds.), *Women writing culture* (pp. 169-194).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Olson, G. A. (1995b). Writing, literacy and technology: Toward a cyborg writing. In G. A. Olson & E. Hirsh (Eds.), *Women writing culture* (pp. 45-80).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Olson, G. A., & Hirsh, E. (1995). Feminist praxis and the politics of literacy: A conversation with bell hooks. In G. A. Olson & E. Hirsh (Eds.), *Women writing culture* (pp. 105-140).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elto, P. J., & Pelto, G. H. (1978).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The structure of inquiry*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eters, J. D. (1996). Seeing bifocally: Media, place, culture. In A. Gupta & J. Ferguson (Eds.), *Culture, power, place: Explorations in critical anthropology* (pp. 75-92).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Polkinghorne, D. E. (1997). Report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as practice. In W. G. Tierney & Y. S. Lincoln (Eds.), *Representation and the text: Re-framing the narrative voice* (pp. 3-22).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ostman, N. (1993).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New York: Vintage.

Quinney, R. (1996). Once my father traveled west to California. In C. Ellis & A. P. Bochner (Eds.),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pp. 357-382).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Ronai, C. R. (1996). My mother is mentally retarded. In C. Ellis & A. P. Bochner (Eds.),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pp. 109-131).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Rossman, G. B., & Rallis, S. F. (1998). *Learning in the field: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Sewell, W. H. (1997). Geertz and history: From synchrony to transformation. *Reflections*, 59, 35-55.

Silverman, D. (1993).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data: Strategies for analysing talk, text and interaction*. London: Sage.

Sluka, J. A. (1990).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violent social contexts. *Human Organization*, 49, 114-126.

Stepick, A., & Stepick, C. D. (1990). People in the shadows: Survey research among Haitians in Miami. *Human Organization*, 49, 64-77.

Stocking, G. W., Jr. (1983a). The ethnographer's magic: Fieldwork in British anthropology from Tylor to Malinowski. In G. W. Stocking, Jr. (Ed.), *Observers observed: Essays on ethnographic fieldwork* (pp. 70-12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Stocking, G. W., Jr. (1983b).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Whence/whither. In G. W. Stocking, Jr. (Ed.), *Observers observed: Essays on ethnographic fieldwork* (pp. 3-12).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Tanaka, G. (1997). Pico College. In W. G. Tierney & Y. S. Lincoln (Eds.), *Representation and the text: Re-framing the narrative voice* (pp. 259-304).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Tierney, W. G. (1997). Lost in translation: Time and voi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W. G. Tierney & Y. S. Lincoln (Eds.), *Representation and the text: Re-framing the narrative voice* (pp. 23-36).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Tillman-Healy, L. M. (1996). A secret life in a culture of thinness: Reflections on body, food, and bulimia. In C. Ellis & A. P. Bochner (Eds.),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pp. 76-108).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van Gelder, P. J., & Kaplan, C. D. (1992). The finishing moment: Temporal and spatial features of sexual interactions between streetwalkers and car cients. *Human Organization*, 51, 253-263.

Walter, J. (1984). Proportionate reason and its three levels of inquiry: Structuring the ongoing debate. *Louvain Studies*, 10, 30-40.

Walters, D. M. (1996). Cast among outcastes: Interpreting sexual orientation, racial, and gender identity in the Yemen Arab Republic. In E. Lewin & W. L. Leap (Eds.), *Out in the field: Reflections of lesbian and gay anthropologists* (pp. 58-69).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Wax, M. L., & Cassell, J. (1979). *Federal regulations: Ethical issues and social research*. Boulder, CO: Westview.

Werner, O., & Schoepfle, G. M. (1987). *Systematic fieldwork: Vol. 1. Foundations of ethnography and interviewing*. Newbury Park, CA: Sage.

Weston, K. (1996). Requiem for a street fighter. In E. Lewin & W. L. Leap (Eds.), *Out in the field: Reflections of lesbian and gay anthropologists* (pp. 274-286).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Whyte, W. F. (1955). *Street corner societ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illiams, W. L. (1996). Being gay and doing fieldwork. In E. Lewin & W. L. Leap (Eds.), *Out in the field: Reflections of lesbian and gay anthropologists* (pp. 70-85).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Willson, M. (1995). Perspective and difference: Sexualization, the field, and the ethnographer. In D. Kulick & M. Willson (Eds.), *Taboo: Sex, identity and erotic subjectivity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pp. 251-275). London: Routledge.

Wolcott, H. F. (1995). *The art of fieldwork*.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Wolf, D. L. (1996). Situating feminist dilemmas in fieldwork. In D. L. Wolf (Ed.), *Feminist dilemmas in fieldwork* (pp. 1-55). Boulder, CO: Westview.

Wolf, M. A. (1992). *A thrice-told tale: Feminism, postmodernism, and ethnographic responsibil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olf, M. A. (1996). Afterword: Musings from an old gray wolf. In D. L. Wolf (Ed.), *Feminist dilemmas in fieldwork* (pp. 215-222). Boulder, CO: Westview.



# 文献和物质文化的诠释 26

THE INTERPRETATION OF DOCUMENTS AND MATERIAL CULTURE

⊙ 伊恩·霍德

本章阐释的是无声证据的诠释——简而言之，是对书写文本和史前古器物的诠释。这些证据不像口语，它们在物质上存在，并因此而能够在空间和时间上与其作者、生产者、使用者分离。因此，物质的痕迹经常不得不在没有本土注释的情况下被解释。相对于客位的"他人"观点，通常不存在与说话的主位的"内部人员"互动的可能性。即使有可能存在这样的互动，行动者们似乎常常无法清楚地说出他们以特定方式穿着、选择特定的陶器图案，或在特定场所丢弃粪便的原因。因此，物质的痕迹和残余就给定性研究提出了特殊的问题。已经试图发展合适的理论和方法的主要学科有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认知心理学、科技和现代物质文化研究，我的说明就是在这些学科的范围内提出的。

## 书面的文献和档案

林肯和古巴（Lincoln & Guba，1985，p. 277）以文本是否为证明一些正式事务而准备为根据来区分文献（documents）和档案（records）。这样，档案包括结婚证书、驾驶执照、房屋契约和银行申明，而文献是为个人而非官方原因准备的，它们包括日记、备忘录、信件、田野工作笔记等。事实上，这两个术语经常可以互换使用，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别，这种差别类似于下面将要讨论的书写（writing）和讲话（speech）的差别。文献更接近于讲话，它要求有更多的置于上下文中的解释，而档案则可能具有了和其官方办理的意义相去甚远的地方用途。文献涉及一种个人技术，而档案则完全是一种权力的国家技术。这种差别还和定性研究有关，因为研究者通常能接触文献，而使用档案的权力则可能受相关法律限制，如关于隐私、机密性和匿名性的法律。

尽管文献和档案之间存在差别，我这里更多地关注所有类型的书面文本的解释问题。这些文本对定性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通常条件下，这些文本是易得而低成本的，这些文本提供的信息可能不同于口语形式中的信息，或者不能

从口语形式中获得这些信息,而且这些文本经历了很长时间,从而(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历史洞察力。

例如,在有关历史时期的考古学中,通常假定书面文本提供了一种比其他类型的证据(下面将要考虑的)"更真实的"关于原始意义的暗示。当然,西方的社会科学长期以来一向是重视口语胜于文字,重视文字胜于无文字(Derrida,1978)。反正,人们假定文字能让我们更接近精神。但正如德里达表明的,意义并不存在于文本中,而存在于文本的书写和解读中。当文本被放在不同的语境中重读的时候,它就被赋予了不同的涵义,这些涵义经常是矛盾的并且植根于社会之中。因此,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外,文本并没有"原始的"或"真正的"的涵义。历史考古学家已经接受这样的看法,即历史文献和档案提供了不是更好的,而仅仅是不同于古器物和建筑的图景。文本可以和其他形式的证据一起使用,这样就可以理解和比较各自的偏差。

同样的,不同类型的文本必须被置于其产生和阅读环境的背景中去理解。例如,分析人员会关心一个文本是第一手经验的结果还是来自于二手资源,它是否是被主动提供的、是否经过编辑,以及匿名的还是有签名的等(Webb, Campbell, Schwartz, & Sechrest, 1966)。就如利科(Ricoeur,1971)所论证的那样,具体的文本不同于语言的抽象结构,因为它们是为做某些事情而写的。它们只能被理解为"它们自身"——在特定的物质环境下产生(并非每个人都能写,或能以某种方式写,或能够获得相关的复制技术),并体现在社会和意识形态系统中的一种人造物品。

当然,语言是为了做某事和说某事而说的——它们既具有实际影响和社会影响,又具有沟通功能。一旦语言被转换为书面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鸿沟就变大了,各种各样的重新诠释的可能性也增大了。一个文本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下"说"许多不同的事情。书面文本也是一种人造物品,可以被传播、操作、改变,被使用和抛弃,被重新使用和反复利用——随着时间、根据背景"做"不同的事情。将话写下来常常可以更有效地控制语言及其意义,使语言及其意义和"集中化"与"规范化"的策略联系起来。在人造物品中具体化或"有血有肉"的词语能超越背景、随着时间聚集在一起,从而扩充其符号内涵。在人造物品中长久存在的词语在权力合法化的世俗进程和宗教进程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在书面文本的具体本质(即持久的状态)和其在新的上下文语境下重新解读意义的持续潜力(即对话语权威性的破坏)之间经常存在着张力。文本和上下文处于一种持续的张力状态中,彼此定义和再定义着对方,随着时间"说"和"做"不同的事情。

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书面文本正越来越多地被用一种修辞策略加以仔细阅读,以便确立权威的位置(例如,Tilley, 1989)。考古学家已经习惯于这样的观点:他们的科学活动留下了踪迹并改变了他们所研究的世界。出土文物不能被复制,堑壕的遗迹、劫掠的场所和旧的啤酒罐头是以特定方式看待世界的特殊表达。过去已经被转换进现在的产品中,包括田野笔记和现场报告。民族志学的

田野笔记(Sanjek, 1990)也将研究的对象转换进了立足于历史的产品,在熟悉的程序中“获取”“另一个”。田野文本不得不被置于特定的历史时刻中加以研究。

本章我将书面文本作为人造物品的一种特殊案例来对待,它们都具有相似的解释程序。文本和人造物品中都存在的问题是,将物质文化置于变动的背景中,并讨论那些背景与解释者的背景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解释学训练——在其中,围绕着物质文化的鲜活的经验被转化成一个不同的解释背景——对于文本和其他形式的物质文化而言都是普遍的。我将解释语言和物质文化之间的各种差异,但将物质文化作为文本考虑时,类似的解释已经被广泛地讨论过了(Hodder, 1991; Moore, 1986; Tilley, 1990)。

## 人造物品分析及其对于社会经验解释的重要性

远古和现代的建筑物和人造物品——人类活动有意或无意的残留物——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洞察力,用以透视人们感知和适应其生活的方法。穿过草地的捷径暗示了首选的通行模式,外语标记表明了和四邻的融合程度,烟灰缸中烟蒂的数目折射出了精神不安的状况,日常文书工作的工作量可以用来衡量工作负担或工作效率及优先考虑的事项(Lincoln & Guba, 1985, p. 280)。尽管围绕这些证据存在一些推论方面的问题,我希望在开始就确定这样的观点:行为的物质痕迹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洞察力,并且它不同于任何数量的调查问卷的洞察力。

“人们说什么”通常和“人们做什么”非常不同。这一点可能被近些年源于拉思杰(Bill Rathje)的研究最为成功地证实了。在对图森、亚利桑那州和其他地方的研究中,拉思杰和他的同事们收集了家庭用的垃圾袋,并逐条记录其内容。例如,很明显,人们所估计的他们所制造的垃圾的数量是非常不准确的,丢弃的啤酒罐头表明实际的酒精消耗量高于所承认的量;在肉类短缺时期,人们因过度储藏而扔掉了比往常还多的肉类。因而,一个完整的社会学分析不能仅限于访谈数据,还必须考虑物质痕迹。

在另外一系列的研究中,房间中的装饰品、罐子和其他容器已经被解释为由妇女引导的一种无声的谈话,她们的声音被处于支配地位的男性的利益所压制了。装饰品可能被用来无声地标示,并巧妙地将注意力引向女性控制的领域,如房间的女性区域、容器中食品的准备和供应。装饰品在一个层面上可以用于掩盖女性秽物,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则表达了妇女的力量(Braithwaite, 1982; Donley, 1982; Hodder, 1991)。

因此,研究物质文化对于那些定性研究者是重要的,这些定性研究者希望探究多样而相互冲突的声音、不同而相互影响的解释。经验的许多领域是语言所无法触及的,特别是那些从属经验。弗格森(Ferguson,1991)已经表明,对食物和罐子的物质痕迹的研究以怎样的洞察力揭示了美国南部种植园中的奴隶是如何理解并反抗针对他们的统治的。惯常沉默的群体成员在他们日常生活的世俗活

动中表达了他们自己的观点。

对这些痕迹的研究并非如世俗和日常生活那样是微不足道的工作,因为对处于支配地位的利益不重要的东西,对于另外一些观点的表达来说也许是至关重要的。权力的物质表达(游行、等级标记、坟墓和艺术)可作为抵抗的表达形式。这些研究的重要性因为有这样的认识而增加了,即文化不仅仅是被动的其他生活领域的副产品,相反,物质文化是积极的(Hodder, 1982)。在此,我的意思是,人造物品被制造出来以进行物质的、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改造,是人造物品本身的互换构建了社会联系,比如古代使用相同风格的矛的人会产生认同感,而这种权威的标志本月又再生产着权威。这样,物质文化对于多数社会建构而言就是必要的。因此,一个适当的社会互动研究取决于和无声的物质证据结合的程度。

## 关于物质文化的一种理论

我们已经证明物质文化的研究能成为社会学和人类学分析的一种重要工具,我们必须努力建立一种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解读物质文化。这里的难点在于"物质文化"的多样性,从书面文字、围绕着死亡的物质符号、戏剧、消费行为的仪式到公路和飞机的建造。结果,理论指导经常采取相当不同的路径,人们可以通过比较下面的两种方法看到这一点,一种方法是试图建构一个关于技术行为的综合理论(Lemonnier,1986),另一种方法是试图将物质文化视为文本(Tilley,1990)。

最终,物质文化始终要在其产生、使用、丢弃、重新使用的特定情境关系中被解释。在做情境性解释时,区别一些普遍特征和不同类型的物质文化的类比物可能很有帮助。在试图建立一般理论的过程中,一系列学科最近的研究已经开始区分物质意义的两个领域。

有些物质文化被特别设计得富有沟通性和表现性,最清楚的例子就是书面文本,但现在已经延伸到了某些职业的标志和制服、红色和绿色的交通指示灯、禁止吸烟的警告、十字架上基督的形象等领域。因为这个范畴包括书面文本,因此可以认为该范畴的意义的组织方式可能和语言类似。因此,就像语言中的话语一样,外在于历史背景的物质符号常常是随意的。例如,一个旗帜上可以用任何设计,只要它能区别于其他旗帜上的设计,并能够用于辨认其自己的身份。因而,在旗帜的例子中,意义系统是通过符号代码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而建构的。米勒(Miller,1982)已经表明,服装是怎样被结构性、范例性地组织起来的。用于特定场合的帽子、鞋带、衬衣、裤子、鞋子等的选择是由一个语法规则指导的,它让特定系列的服装搭配在一起。另一方面,不同种类的帽子(圆顶硬沿帽、草帽、布帽、棒球帽)或夹克之间的差别构成了范例性选择。

已经被应用到第一种物质意义中的三个主要理论领域源于信息技术、马克

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第一，目标一直是为了说明物质符号能给社会群体提供适应有利条件的方式。这样，复杂符号系统的发展就有助于更有效率地处理更多的信息（例如，Wobst, 1977）。这种方法对定性研究的价值是有限的，因为它并不涉及有意义的符号解释和体验。第二，符号的意识形态成分是在权力和统治的关系中加以识别的（Leone, 1984; Miller & Tilley, 1984），权力、价值系统与权威日益被认为具有多重的和辩证的关系（Miller, Rowlands, & Tilley, 1989; Shanks & Tilley, 1987）。结构主义分析的目标一直是根据潜在编码来考察设计（例如：Washburn, 1983）或者空间关系（例如：McGhee, 1977），尽管后结构主义者思想的各种方向已经受到争论（Tilley, 1990），这里的倾向也一直是强调多重意义在活动的社会背景中的角逐。

在大部分这项工作中，语言的隐喻已经被相对毫无问题地应用到物质文化中。罐子似乎"表示"和词语"罐子"同样的意思。最近的工作已经开始将注意力转向物质文化和语言之间类比的局限性，这将在我对第二种类型的物质文化意义的思考中得以澄清。人们可以认为物质文化的许多事例根本不是为了"表示什么意思"而生产的，从而探究类比的局限性。换言之，最初它们被生产出来时并没有符号功能。因而，在普劳斯特（Proust）的《寻找丢失的味道》（*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Swann 式）中被讨论的马德琳糕点就是作为一种诱人的食品被生产出来的，其形状象征着有凹槽的扇贝。但是普劳斯特所描述的意义和它的符号表征相当不同。倒不如说，它的意义是普劳斯特和其母亲在冬日喝茶时所环绕着的整个童年记忆、声音、味觉、嗅觉的唤起。

即便不是全部，也有相当一部分物质符号并非通过表征的规则而运作的，如运用一个类似于语言的句法。相反，它们通过存在于个体经验中的系列实践的唤起而运作。构造物质符号的语法或字典可能是相对困难的，除非是那些具有特别代表性或象征性的项目，如旗帜和交通标志。这是因为大多数物质符号的表达方式和语言并不相同。相反，它们通过联想和实践而渐渐获得抽象的意义。在体验了共同实践的社会成员中物质符号能获得共同唤起和共同意义。因此，特定种类的食品、饮料、音乐和体育运动被经验的方式是植根于社会习俗之中，并因而获得共同意义的。在英国，压蒜机可能不会被公开用来代表或象征阶级，但是通过一系列围绕着食物及其准备活动的复杂实践，压蒜机已经通过唤起而表达阶级的含义。

因为物体延续有其自己的轨迹、自己的本质特征，因此具有独特唤起功能的单个物体就能被识别出来。和任何特定物体（一个特定的压蒜机）相联系的特殊记忆轨迹将因个体的不同而不同。物质经验和意义的特殊性不仅源于人类生活的多样性，而且源于物质对象的可识别性。这种物质的可识别性总是有潜力通过实践而反对和改变整个社会习俗。因为结构和实践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也因为能够赋予事物以多样性的局部意义，所以，为大部分物质文化意义建构词典和语法可能是困难的。

不能建立物质文化词典的另一个原因来自于这样一种麻烦，即人们对物质

象征体系的随意性解释。意义经常是心照不宣和含蓄的。马德琳蛋糕的香味和滋味可能会唤醒强烈的感情,但众所周知,困难就在于描述一种味道或感觉,或压制被唤起的情感。在实践中,我们可能知道这款或那款衣服"好看"、"做工很好"、"时髦",但我们可能不知道怎么表达这"意味着"什么,因为这个类没有意义——更准确地说,它是嵌入在包括阶级、地位、人生目标、审美等一系列实践当中的。我们可能对艺术知之甚少,但知道我们自己喜欢什么。以一系列实践的联系为基础,我们建立了一种关于特定人造物品或风格的联系与唤起的隐含知识。这种嵌入的、实践的经验似乎有别于表达规则的操纵,有别于有意识的分析性思想。物质符号的意义可以让我们接近鲜活的实践,但它们不易被清楚地表达。

实践对于人造物品的社会意义和象征意义的重要性已经在近期关于技术的研究中被加以强调(Schlanger, 1990)。每项技术操作都和操作链条中的其他操作相联系(Leroi-Gourhan, 1964),包括物质、能量和姿势。例如,有些粘土比其他粘土更适合在陶轮上制作,因此,粘土的类型让制造者决定是在陶轮上做罐子还是做手工的小雕像。粘土的质量和其应该使用的揉制类型相联系。所有这些操作链条都是非确定性的,它包括了一定程度的社会选择(Lemonnier, 1986; Miller, 1985)。所有操作链条都包括生产、交换和消费等方面,因此,它是综合了物质、经济、社会和概念的关系网络的一部分。

实践的操作链条经常带有延伸到社会和道德领域的隐含意义。例如,拉图尔(Latour,1988)讨论了水压的关门系统,这是一种在人打开后能自动关门的装置。因而,物质的关门系统取代或代表了看门人的角色,看门人就是站在那里,确保在人们通过之后门能够保持关闭的状态。但是使用这种特殊的代表具有多方面的隐含意义,其一就是特别小的人或柔弱的人通过那扇门有困难。这项技术在无意中就暗示了社会差别。在另一个例子中,拉图尔讨论了柏林的一些居民使用的钥匙。这种双头钥匙能强迫使用者锁门,以便拔出钥匙。钥匙代表了标志或象征,它可能命令一个人"重新锁上身后的门"。标志或象征可能是不可靠的——它们可能被瞒骗或忽略。钥匙强制了一种道德。同样,"电子警察"、"坏路限速"强迫汽车司机有道德,并在学校前面慢下来,但这个道德不是社会赋予的,可能也是不可靠的。这个道德嵌入在这样的实践结果中:驾驶速度大大超过速度限制将损坏车子。关门系统、柏林的钥匙或者速度限制的社会和道德意义是完全嵌入于物质实践的隐含意义之中的。

我已经建议,在发展一种关于物质文化的理论时,首要任务是区别至少两种不同的物质文化超越其最初的实用考虑而获得抽象意义的方法。第一种是通过表达的规则,第二种是通过实践和唤起——通过网络、相互联系,以及物质与非物质的相互隐含意义。尽管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即书写的语言是第一个种类的主要范例,而工具是第二个种类的主要范例,但语言也必须在实践中完成,并从中衍生出它的大量意义。同样的,我们已经看到物质元素能被置于类似语言的代码中。但也有一些来自认知心理学的支持,认为在两种类型的知识之间

存在一种一般差异。例如,贝克特尔(Bechtel,1990,p.264)辩称,基于规则的认知模型天然地优于相当不同的、来自于联系主义模型的活动。第一种适合于解决问题,而第二种在模式识别、自动控制等任务方面则是最好的。那么似乎很有可能是这样,物质实践中的技巧以及蕴涵在这些实践中的社会、符号、道德意义所包含的认知系统可能不同于在规则和表达方法中包含的认知系统。

布洛克(Bloch,1991)争辩道,实践知识从根本上不同于在头脑中被组织的语言知识。实践知识形成整体性的、高度溶入背景的关于如何在特定活动领域中"生活"的信息。大量文化知识是非线性的和目的导向的,它们通过紧密相关的活动而形成。我在这里已经说过,甚至实践世界也包含一些社会意义和符号意义,它们没有被表达性代码所组织,但它们是整体性的或溶入背景的活动领域,在隐含的不言自明的技巧或诀窍的层面上,情感、欲望、道德和社会关系被包含在这些活动领域。

或许应该强调,两种物质象征体系——表达的和唤起的或暗示的——在运作中通常关系很近。因而,一系列实践可能用房间的不同部分、一天中的不同时间将男人和女人联结起来,但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中,这些联系可能被用于建构关于隔离和排外的符号规则,构建一个抽象的表达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神话和宇宙哲学扮演了一个角色(例如:Yates, 1989)。这样的系统也有意识形态成分,它们反过来限制实践。因此,实践、唤起和表达方法在许多(如果不是所有)生活领域内相互渗透、彼此滋养。结构和实践在物质生活的"结构"中循环联系着(Giddens, 1979;也可参见:Bourdieu, 1977)。

## 时间中的物质意义

看来人们不仅经历而且"阅读"物质文化的意义。关于物质文化如何在社会背景中运作有许多可说的。例如,通过直接而明显的隐喻而起作用的一些例子,在这里,形态的相似性遵循的是历史先例,而另一些例子则由于其含糊和抽象,通过采用壮观的或戏剧性的效果、通过控制旁观者的接近、通过控制视点而起作用。尽管这里不存在探究整个的物质策略的余地,但建立起暂时的活生生的经验维度仍然是重要的。

就如已经解释的,物质文化是持久的,当它和其最初的生产者分离之后,它能够被赋予新的意义。这种意义上的暂时变更常常和意义在(不同)空间和文化中的变化有关。考古学或者人种学的人造物品被不断地从其背景中拿出来,并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博物馆中被重新解释。收藏在不列颠博物馆中的埃尔金大理石雕呈现出新的意义,这些意义在古希腊的一些学术圈子中被依次以相反的方式重新解释。美国印第安人和人造物品的遗迹对于考古学者和生物人类学者而言可能具有科学意义,但它们对于土著居民而言则具有重要的情感和身份意义。

物质元素被不断地置于新的背景中加以重新解释。物质文化也能被加上或去掉,留下重新使用和重新解释的痕迹。在一些例子中,使用的顺序能揭示一个个体的思想过程,就如早期的史前社会中那些从核心中剥落下来的燧石薄片被今天的考古学家们进行重新整修,以便复原燧石的核心并理解最初敲击燧石的人在制造薄片和工具的过程中所做的决定一样(例如:Pelegrin, 1990)。在另外的一些例子中,更长的时间框架被包含了进来,就如一个纪念碑,如,Stonehenge(英国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史前环状巨石阵(柱)可上溯到公元前 2900—公元前 1600 年,当时是宗教中心,也被用作星象观测台——译者注)历尽千年直到今天,因不同目的而被改编、重建和重新使用一样(Chippindale, 1983)。在这样的例子中,保留在人造物品痕迹中的叙述具有一种由很多人或群体创造的总体形态,并且常常没有意识到初期的意图和意义。今天,尽管大家都很熟悉各种圣诞的实践,但很少有人能注意到隐含在圣诞树的选择、圣诞老人、红色外套、飞驰的驯鹿后面的历史原因。

物质元素能通过不断转换的意义而获得许多轨迹。例如,许多物质元素最初是为了遵循或唤起隐喻性的意义,然而随着岁月流逝,最初的意义消失了或变成了陈词滥调,失去了它的新颖性。一个人造物品开始时可能是一个中心,而后仅仅变成一个结构,成为适当的背景的一部分。在形态偏移的过程中,一个功能性的成分变成了装饰性的,就如用一个煤气取暖器描述燃烧的木头或煤块。在另一些例子中,一个人造物品中的附加意义随着时间而增加,就如护身符和古迹一样。在对传统的回顾性虚构中,物质元素常常是重要的,就如意大利的法西斯运动提升了罗马的权威象征———捆权杖——从而为一种新的集权形式提供权威性。

时间纬度的简短讨论强调了物质文化意义的情境性。上面的一些例子很清楚,随着时间而变化的意义常常涉及群体之间的敌对关系。过去和现在的意义作为社会和政治策略的一部分而被不断地争论和重新解释。这种关于物质意义的冲突对定性研究而言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它表达和集中了各种备选的观点和利益。美国印第安人的改葬墓和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遗迹表达了对北美和澳大利亚的本土权利的一种新观点,但可能也有助于构造这种观点。就如重新出现在欧洲的"种族清洗运动",也是试图重新解释有关种族的文献、纪念碑和人造物品。但过去的人造物品也能以生产性和实践性的方式被用来帮助当地社区。可以在埃利克松(Erickson,1988)于秘鲁喀喀湖附近所做的研究中得到这样的例子:过去的东西现在正被积极地加以利用,在当地农民的参与和帮助下,运用对凸起的田野进行考古学研究所得到的信息,来重建基于远古模型的农业系统。

## 方　法

对无声的物质证据的解释将互动主义者的观点置于压力之下。当被调查者

或者是死了很久,或者是没能清楚表达的时候,给说话的主体之间的互动赋予相当重要的方法(例如:Denzin, 1989)该如何处理物质的遗迹呢?

我已经解释了物质证据在洞察鲜活经验的其他成分中的重要性。可是,提出的方法论问题不是唯一的。在所有类型的互动研究中,分析人员不得不决定是否从表面价值上获取解释,并决定如何评价说出口的或未说出口的回答。所说出的话如何适应更加一般性的理解?物质文化的分析人员可能没有很多的口头说明,但他们肯定有模式化的证据,而他们必须根据能得到的所有信息来对这些证据进行评价。他们也必须将证据的不同层面协调进一个解释学的整体中(Hodder, 1992; Shanks & Tilley, 1987)。他们问,所做的成果如何才能符合更加一般性的理解?

在一般条件下,物质文化的解释者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或在物质文化的不同例证之间展开工作,在它们之间进行类推。物质证据总是有潜力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被仿造。这样它就提供了"另一种"方式,据此,分析人员对这个世界的自我经验得以被评价和扩大。尽管证据不能"说明过去",但它能以加强重新自我评估的方式去面对解释者。至少,当一个研究者在研究史前遗迹时,没有"成员检查",因为人造物品本身是静默的。另一方面,物质文化是"内在"经验的产物并体现在"内在"经验之中。甚至可以辩称,正因为有些物质文化不是公开说出的有自我意识的语言,它才可以更深地洞察内在意义,而人们正是依照内在意义而生活的。我上面提到有几个物质文化的例子就被用于表达隐秘的意义。因此,能说话的成员检查的缺乏被另一种检查弥补了,这种检查是由无言的物质模式所提供的,而这种无言的物质模式仍然能反抗和破坏解释。

物质文化的那些解释所做的一个重要的初始假设是:信仰、思想和意图对于行动和实践而言是重要的(见上面)。它认为,概念对物质遗迹的模式有一定的影响。物质模式的概念成分不是对立于其物质机能,而是和其物质机能结合在一起。因此,可从物质证据的模式中同时推断出功用的和概念的意义。

解释者所面对的物质数据是沿许多不同的维度被同时模式化的。考古学家抽象地辨别了技术、功能和类型,他们用这些属性来形成类型学,并寻求空间和时间的模式。然而,在实践中,就如上面的讨论所显示的,要将技术和类型分离,或者将类型和其空间、时间背景分离正变得日益困难。换言之,分析阶段或模式识别阶段本身已经被看成是解释性的了。

因此,在所有阶段中,从阶级和属性的识别到对高级社会过程的理解,解释者必须同时处理三个评价领域:第一,解释者必须识别情境,在这个情境中,事物具有相似的意义。情境的分界线从来都不是"给定的",必须对他们进行解释。当然,物质的痕迹和间隔可能有助于界定情境的边界线,如围绕着一个村庄的界线或一系列事件之间在时间上的间隔。宗教仪式的情境可能比世俗的情境更正式,也可能转化为世俗的情境。但尽管有这些线索,已经由本土行动者构建的可能情境仍然存在着无限可能性。在对不同系列的数据进行比较时,情境的概念始终是相关的,在这里,一个主要问题是:不同的例子是否具有可比性,明显的相

似之处是否是真实的?

第二,和情境的识别相关并且不可分割的是对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承认。解释者通过说明在一定界线之内,人们以相似的方式做事、人们对相似的境遇会有相似的反应来界定一个情境。所做的假设是:在一个情境中,相似的事件或事物具有相似的意义。但只有当正确界定情境的界线时,这个假定才是正确的。原先被认为是用于宗教仪式或崇拜的许多人造物品后来被证明完全来自于实用的情境。同样地,声称具有跨文化相似性的事物总是必须被评估,以判断它们的情境是否具有可比性,因而,对情境和意义相似性及差异性的解释完全是相互依存的。

在模式化的物质中,对情境、相似性和差异性的识别取决于运用适当的社会理论和物质文化理论。解释者必须做的第三个评估是评估一般或特殊的历史理论与手头数据的相关性。观察和解释是有理论支撑的,尽管面对物质证据时,理论可能会以辩证的方式改变。关于物质文化的几种适当类型的一般理论已经在上面被讨论了。比较特殊的理论包括参与者的意图和社会目标,或对立于世俗或功利行为的宗教仪式或崇拜的性质。

根据前面所识别的两种类型的物质意义,表达的规则是从联合与排斥的模式中建构出来的。例如,在各种背景中,如果一个别针是唯一与妇女联系的物品,则它可能在所有场合都被解释为代表妇女。和别针相联系所呈现的女人的一面源自于别针的其他联系——可能和外来的、非本土的人造物品相联系(Sorensen, 1987)。解释者所理解的网络联系越丰富,越能产生更厚重的描述、更敏锐的解释。

对于另一种类型的立足于实践的物质意义,解释者的首要任务就是理解特定实践活动的所有社会和物质含意。对现代物质文化的研究极大地提高了这一点,包括文化聚落考古学(Orme, 1981)。实验考古学家(Coles, 1979)现在对重构过去的实践非常有经验,从在深坑中储藏谷类到打磨燧石工具。这样的重构,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始终无可避免是肤浅的,但提供了直接透视另一种鲜活经验的洞察力。以这些知识为基础,延伸到社会和道德领域的物质实践的含意就能够被理论化。但又一次,正是对联合与背景的详细而厚重的描述使物质实践置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并使独特的唤起能够被理解。

运用这些方法的一个例子来自于麦里曼(Merriman,1987)对隐藏于公元前6世纪的德国霍伊纳贝格的精英社区围墙背后的意图的解释[这类似于柯林伍德提供的例子(Collingwood,1956)]。就文化而言,中欧,包括德国的初期铁器时代的背景能和同时期的其他文化区域,如爱琴海,区隔开来。尽管墙是由泥砖做的,并带有堡垒,但只有在爱琴海才有类似的这两样东西。在实践中,在德国的气候条件下,泥砖可能从来都不是有效的长期形态的防卫物。因此,我们猜想它有并非防卫的一些目的。这些墙不同于德国其他同时代的墙,但它们和在爱琴海背景中发现的墙相似。似乎相关的其他相似性和差异性是声望互换的例子——有价值的物品,如酒壶,从爱琴海通过交易传到德国。根据一个理论,这

个交易似乎是相关的，该理论认为，中欧的精英将他们的权力建立在对与地中海的声望互换的控制的基础上。在这种声望互换的背景中，看起来似乎是爱琴海形态建筑的墙也被设计用以将声望授予组织这些建筑物的精英。在这个例子中，建筑物墙的意图被解释成是为了声望而不是防卫。这个解释是建立在对相似性、差异性、背景和理论同时评估的基础上的。表现的象征意义（赋予声望）和实践意义（在一个非地中海气候中由精英建造的墙）都被考虑了（关于将这种方法运用到现代物质文化（研究）中的其他例子，参见：Hodder，1991；Moore，1986）。

## 证 实

如何才能证实这些关于静默的物质文化和书面文化的意义的假设呢？为什么有些解释比其他解释更合理？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太可能从根本上区别于其他解释领域的程序，因此，我在这里将相对简短地讨论这些问题（Denzin，1989；Lincoln & Guba，1985）。然而，在证实关于物质对象的假设中存在着一些差异，最大的困难可能在于，根据其本质，物质文化横跨了关于物质的普遍性的自然科学方法以及关于文化的历史的、解释性的方法之间的分水岭。因此，在科学共同体关于证实程序的合适基础问题上，特别明显地缺乏一致性。我的观点是，一个解释性的立场能够而且应该与关于人造物品的转化与衰退的自然过程的科学信息相适应。因此，我这里描述的是解释性的立场。

一致性和相对应是证实的一对支柱。如果论证的各个部分相互并不矛盾，并且结论是从前提而来的，就产生了一致性。不同类型的理论之间存在着一种局部的自主性，从个别观察的到普遍性的，一致的解释意味着这些不同的层面不会产生矛盾的结果。不同类型理论的局部自主性在和物质文化的关系上尤为明显。因为物质证据能够持久，它能被连续地重新观察、重新分析和重新解释。在早期挖掘中所做的观察正被置于新的解释框架中加以重新审视。从对早期工作的重新审视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早期的观察可被用于不同的解释——理论的不同层面是局部自主的。理论的不同层面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正在被不断地重新协商。

除了内在一致性外，也存在着外在一致性——解释和理论相适合的程度，而这些理论是被学科内外所接受的。当然，对一致性论点的评价本身就取决于理论标准的应用，而我已经解释了在关于物质文化基本问题——如自然科学或人文方法的重要性——的研究上缺乏一致性。但不管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如何，大部分从事物质文化研究的人似乎含蓄地接受了简单和精致的重要性。一个需要很多的特别申明以便主张一致性的论点不如一个简单或精致的理论能让人接受。一致性的观念也可以延伸到学科内外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但我在这里将分别讨论这些问题。

理论和数据相对应的观念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客观性和自主性，而是在一致

性里面嵌入了数据和理论的合适性。数据得以一致是通过在理论观点中将数据连接起来而实现的。同样的,论点的一致性由数据的适合性支撑。另一方面,就像已经解释过的,数据可能和理论相对立。因此,和数据相对应成为一致性论点必不可少的部分。可能应用的一致性论点有许多个方面。其一是理论预期和数据适合的精确性,可以用统计术语测量,在探索物质文化静默的一面的论点中,这是特别重要的方面。关于相对应的其他观点包括所说明的个案的数量、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范围、被解释的数据的多种不同类型。然而,这些相对应的数字指征通常必须对照背景相关性和厚重的描述加以评估,以决定关于适合性的不同例子是否彼此相关。在人种学和历史学的框架中,和本土记述的适合性可能成为支持背景相关性的论点的一部分。

影响关于物质文化意义的理论成功的其他标准包括多个——开发了多少新方向、调查的新线路和新观点。再现性涉及其他人用其他方法是否能得到相似的结果。基于不同起点的不同论点可能会产生相似的结果。我已经解释了,物质证据的优势之一是,能将它持续地还原成为被挖掘的遗址的部分加以挖掘、返回到旧战壕中加以重新发现和重新检查。主体间的一致性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尽管在一个领域也具有特别的困难,那就是彻底跨过自然一人文之间的分水岭。解释的成功取决于同行评议(在杂志上,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以及相信、引用和以之为基础的人们的数量。

但是,很多情况也取决于作者的可靠性、职业资格和社会地位,以及支持这种解释的人。这里的问题包括:解释者在实地花了多长时间,以及他/她了解数据的程度,他们的倾向性问题和特例。作者是否获得了适当的学位并已经被学术圈所接受?这个个体是不是一个确定而一致的作者,或者他或她是否证明了他/她自身?这个作者是否一直在改变主意?

实际上,听众不会直接对一个解释做出反应,而会对一篇文章或文章所写出的、表演出的解释做出反应。因此,听众对一个物质的人造物品或事件做出反应并重新解释。论点的说服力和它的表达所使用的修辞紧密相连(Gero, 1991; Hodder, 1989; Spector, 1991; Tilly, 1989)。修辞决定了学科的不同成分是如何讨论并界定问题和其解决方法的。

## 结 论

物质文化,包括书面文本,对解释性方法提出了挑战,这种方法经常强调和参与者对话、从参与者那儿得到口头批评性评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物质文化证据可能没有活的、能对解释做出反应的参与者。即使这些参与者确实存在,他们通常也不能清楚地说明物质文化的意义。无论如何,物质文化能够持久,因此,当一个物体随着时间流逝而被使用并被重新解释时,最初的制造者和使用者可能只能给出该物体意义的整个历史的局部画卷。

由物质文化提出的挑战对人类学和社会学分析是重要的，因为物质文化常常是一种媒介，通过这种媒介，能表达各种备选的并常常是静默的声音。但是，物质文化的"读者"必须认识到，在物质文化的意义中，只有某些方面才是像语言的。大多数物质文化的意义通过使用而产生，并且物质文化的知识常常是高度整体性的和溶入背景的。技术方面的操作牵涉了包括物质的、社会的、符号的资源在内的广阔网络，它所引出的抽象意义和物质紧密结合。

物质文化的解释方法以界定背景的同步解释学程序、模式化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构建、相关社会理论和物质文化理论的运用为中心。物质文化可能不能直接"说明过去"，但如果遵循合适的程序，则存在着让数据、不同层次的理论去面对解释的空间。解释者从物质遗迹的经验——数据中进行学习，并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将彼此引入存在。相对于其他运用明确标准的一定范围的内在和外在（社会）标准的方法，解释能够被证实得或做得多少合理一些。


Bechtel, W. (1990). Connection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An overview. In W. G. Lycan (Ed.), *Mind and cognition: A read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Bloch, M. (1991). Language, anthrop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Man*, 26, 183-198.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aithwaite, M. (1982). Decoration as ritual symbol. In I. Hodder (Ed.), *Symbolic and structural archaeology* (pp. 80-8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ippindale, C. (1983). *Stonehenge complete.* London: Thames & Hudson.

Coles, J. M. (1979). *Experimental archaeology.* London: Academic Press.

Collingwood, R. (1956).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nzin, N. K. (1989). *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 Newbury Park, CA: Sage.

Derrida, J. (1978). *Writing and differen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Donley, L. (1982). House power: Swahili space and symbolic markers. In I. Hodder (Ed.), *Symbolic and structural archaeology* (pp. 63-7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rickson, C. L. (1988). Raised field agriculture in the Lake Titicaca Basin: Putting ancient agriculture back to work. *Expedition*, 30(3), 8-16.

Ferguson, L. (1991). Struggling with pots in colonial South Carolina. In R. McGuire & R. Paynter (Eds.), *The archaeology of inequality* (pp. 28-39). Oxford: Basil Blackwell.

Gero, J. (1991). Who experienced what in prehistory? A narrative explanation from Queyash, Peru. In R. Preucel (Ed.), *Processual and postprocessual archaeologies* (pp. 126-189).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Giddens, A.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Glassie, H. (1975). *Folk housing in middle Virginia.*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Hodder, I. (1982). *Symbols in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dder, I. (1989). Writing archaeology: Site reports in context. *Antiquity*, 63, 268-274.

Hodder, I. (1991). *Reading the p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dder, I. (1992).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rchaeology.* London: Routledge.

Latour, B. (1988). Mixing humans and nonhumans together: The sociology of a door closer. *Social Problems*, 35, 298-310.

Lemonnier, P. (1986). The study of material culture today: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technical systems.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5, 147-186.

Leone, M. (1984). Interpreting ideology in historical archaeology. In D. Miller & C. Tilley (Eds.), *Ideology, power and prehistory* (pp. 25-3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roi-Gourhan, A. (1964). *Le geste et la parole*. Paris: Michel.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Beverly Hills, CA: Sage.

McGhee, R. (1977). Ivory for the sea woman. *Canadi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1, 141-159.

Merriman, N. (1987). Value and motivation in prehistory: The evidence for "Celtic spirit." In I. Hodder (Ed.), *The archaeology of con textual meanings* (pp. 111-116). London: Unwin Hyman.

Miller, D. (1982). Artifacts as products of human categorisation processes. In I. Hodder (Ed.), *Symbolic and structural archaeology* (pp. 89-9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iller, D. (1985). *Artifacts as catego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iller, D., Rowlands, M., & Tilley, C. (1989). *Domination and resistance*. London: Unwin Hyman.

Miller, D., & Tilley, C. (1984). *Ideology, power and pre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ore, H. (1986). *Space, text and gen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me, B. (1981). *Anthropology for archaeologists*. London: Duckworth.

Pelegrin, J. (1990). Prehistoric lithic technology. *Archaeological Review From Cambridge*, 9, 116-125.

Rathje, W., & Murphy, C. (1992). *Rubbish! The archaeology of garbag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Rathje, W., & Thompson, B. (1981). *The Milwaukee Garbage Project*.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aper Institute, Solid Waste Council of the Paper Industry.

Ricoeur, P. (1971). The model of the text: Meaningful action considered as text. *Social Research*, 38, 529-562.

Sanjek, R. (Ed.). (1990). *Fieldnotes: The makings of anthropolog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Schlanger, N. (1990). Techniques as human action: Two perspectives. *Archaeological Review From Cambridge*, 9, 18-26.

Shanks, M., & Tilley, C. (1987). *Reconstructing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orensen, M.-L. (1987). Material order and cultural classification. In I. Hodder (Ed.), *The archaeology of contextual meanings* (pp. 90-10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pector, J. (1991). What this awl means: Toward a feminist archaeology. In J. M. Gero & M. W. Conkey (Eds.), *Engendering archaeology* (pp. 388-406). Oxford: Basil Blackwell.

Tilley, C. (1989). Discourse and power: The genre of the Cambridge inaugural. In D. Miller, M. Rowlands, & C. Tilley (Eds.), *Domination and resistance* (pp. 41-62). London: Unwin Hyman.

Tilley, C. (Ed.). (1990). *Reading material cultur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Washburn, D. (1983). *Structure and cognition in a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bb, E. J., Campbell, D. T., Schwartz, R. C., & Sechrest, L. (1966). *Unobtrusive measures: Nonreactive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obst, M. (1977). Stylistic behavior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useum of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ical Paper*, 61, 317-342.

Yates, T. (1989). Habitus and social space. In I. Hodder (Ed.), *The meanings of things* (pp. 248-262). London: Unwin Hyman.

# 反思视觉方法：从伽利略到“神经浪游者”[①]



REIMAGINING VISUAL METHODS: GALILEO TO NEUROMANCER

⊙道哥拉斯·哈珀

在本书第1版中，已经介绍了关于“视觉方法（visual methods）”的相关内容，它可能对研究者理解视觉方法同其他方法的关系有所帮助，但是我感觉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楚、明晰的操作方案，所以对于那些希望学会具体如何使用该手段的学生或研究者来说并不那么实用，同时也不利于研究者深入理解其中蕴涵的分析框架。因此，这一版我做了较大的修改。首先，我提出在特定背景下如何看待摄影术与社会研究，这种背景构成了知觉的记录史。其次，我会介绍作为在几种不同研究传统指导下的有关实地摄影的视觉社会学。第三，我要描绘出“拍照”这一过程的社会影响，并指出与建构“图像”相关联的社会权力是如何重新定义制度、群体和个人的。最后，我指出视觉社会学首先是一个在理论指导下的“看见”的过程。总之，视觉社会学好像是由不同的研究路径与研究视角组成的大杂烩，但我力图减少它们之间的分歧并使之合为一体。

## 视觉方法和知觉的记录史

现代逻辑实证主义的形成可溯源到16世纪培根（Roger Bacon）提出的只有可观察到的事实才是知识的基础。培根还主张知识应该被用于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这预示着孔德在19世纪早期对社会学的统治地位。我要指出培根的这种见解来自于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这提醒我们这种观点其实和人类有记录的思想几乎一样久远。

培根及其同时代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发明了望远镜和显微镜，这些工具有助于人们认识到人眼所能观察的世界是不完全甚至完全不正确的。在16世纪这无疑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思想，实际上在伽利略执教的帕多瓦大学的哲学家们

① 加拿大籍美国作家威廉·吉布森著于1984年的一本具有后现代色彩的科幻小说，描述了电脑控制的跨国公司和高科技带给未来世界的可怕图景。本书简体中译本已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台湾的繁体中文本译作《神经异魔》。——译者注

就拒绝通过望远镜看一看能发现什么。由于遭到责难甚至死亡威胁,伽利略放弃了他通过望远镜已经揭示的新发现。当然,科学革命并没有因为受到教会的暴力干涉而停滞,伽利略和培根激起的革命在17世纪大放异彩,并最终成为现代科学的基础。

观念革命也是一种科学革命,到了19世纪,照相机成为这场革命的一部分。它和我接下来要谈的一些仪器和工具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关于所见与所知的关系的看法。

随着伽利略的望远镜而来的变革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这种新的、基于工具的知觉方式被认为比那种基于信仰、信念来认识世界要真实得多。它使我们相信,通过工具(比如望远镜、显微镜以及后来的照相机)比通过眼睛能够观察到一种更为深刻的现实;二是在很大程度上,科学的合法性依赖其宣称自己根据视觉术语来描述世界。这样,视觉就成为科学和现代主义的特权知觉。

科学和图像的霸权并不能持久,因为不断有新的工具和仪器被发明,这些工具和仪器对图像制作和图像的社会作用重新加以界定。最初的,也许是最重要的变革来自照相机本身。今天我们使用的照相机和150年前它们被发明出时极为相似,虽然它们可能"看"得更远、更近、更快,也能在更暗的光线下使用。然而,众所周知的照相机的用途并没有什么变化。今天的中产阶级同19世纪的中产阶级一样热衷于使用照相机。当然,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有不同的拍照特色(Bourdieu,1990),但19世纪家庭拍摄的照片与你在现代家庭影集内发现的照片没有什么两样。

与此同时,电影、录像、万维网和"虚拟现实",已经在人类存在与视觉知觉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这些新设备的出现,影响了图像的意义、图像与它们所指称的单词和发音(它们与口头言词和声音)之间的关系,以及视觉社会学的出现与发展。

到了19世纪末,技术已经发展到可以将一幅幅单独的画面连在一起快速放映,于是每幅都有少许不同的画面连续起来就形成了一幅很逼真的动态图像,这种效果是单独一张静态的画面所不能达到的。突然之间,生命本身的过程好像可以被记录下来了。当然,最初仅仅是单独将图像记录下来,还没有解决声音和画面同步的问题。早期的摄影机十分笨重,很难随心所欲地拍摄不断流动、变化的日常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最早的记录片——20世纪20年代拍摄的"*Nanook of the North*"是个了不起的技术成就。因为没有声道(除非是为一位现场的音乐家进行钢琴配乐),早期电影在一个情节段落之间会插入一个打着字的画面以做说明。这些插入的文字必须是简洁易懂的,要知道观众在看电影时可不希望经常被打断。这些就是我们今天称作"字幕"的东西,它们扮演相同的功能,即概括视觉文本的内容。

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电影中添加声音的难题已经解决了,但必须在录音棚里才能实现。例如洛伦茨的记录片《河流》(*The River*)和《垦荒之犁》(*The Plow That Broke the Plains*,Snyder,1968)使用了画外音解说情节的发展变化。这种解说所起的作用,与无声电影中的字幕一样,因为它们都力图明确图像的意义

并使之连贯完整。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可被视为现代科学的宣言。

随后到来的电视时代使有声图像(即"纪录片")进入普通美国家庭,这实际上始于20世纪50年代开播的每周一集的系列电视剧《公共汽车》(*Omnibus*)。又一次,画外音对图像情节进行了补充注释,使之更逻辑化。其结果是这些电影在组织上是直线性①和叙事的,在结构和信息上是清楚明晰的。

便携式摄影机能够同步记录画面与声音,它是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发展起来的。它的这些功能潜在地消解了图像和科学权威的话语霸权。电影现在终于能够解释自身了,它更加贴近现实,结果类似于杂乱无章的生活之流。十分有趣的是,这场运动被称为"真实电影运动"。简·罗赫(Jean Rouch)与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1960年拍摄的《夏日纪事》(*Chronicle of a Summer*)就是最早一批"真实电影"之一,该片在巴黎街头拍摄了公众对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及几个文化论题的看法。与先前电影的拍摄结构技巧不同,该片的主题是这样展现的:先播放早些时候拍摄下来的访谈,再对访谈对象模糊的表述辅之以深度分析。

在美国,早期的"真实电影运动"与实验民族志研究的兴起几乎同时发生(Mamber,1974),尽管只有为数甚少的受过社会学训练的电影制片人与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促成了两者之间的联系。这个时期的几部电影使民族志与实地电影拍摄几成一体,其中包括由梅斯勒斯(Mysles)兄弟拍摄的纪录片《推销员》(*The Salesman*,1969),它讲述了一个圣经推销员日复一日程式化的生活;罗伯特·朱(Robert Drew)的《初选》(*Primary*,1960),它讲述了一场平常的政治竞选;理查德·利考克(Richard Leacork)的《母亲节快乐》(*Happy Mother's Day*,1963),它讲述了一个小镇迎接一个五胞胎诞生的故事;弗雷德里克·韦斯曼(Frederick Wiseman)的《Titicut 讽刺剧》(*Titicut Follies*,1967),它描绘了一个拘留所对待嫌疑犯的刻板程序。这些早期的二十多部系列"真实电影"描绘了不同的美国风俗,它们为实证社会学和人类学提供了特别的资源。"真实电影运动"将社会学的视角用于日常生活,并且这场运动重新定义了"什么将被拍摄"。可悲的是这种拍摄技巧的潜力在社会科学领域没有得到承认,也很少被采用。

尽管"真实电影运动"重新定义了电影和现实的关系,但它的运用却受到费用的限制,因此这种研究技术一直没有被普遍采用。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部纪录片的典型预算就超过了每分钟1 000美元,还不包括人员工资。摄影机只能同步记录几分钟的声音和图像,通常需要一个录音师与摄影师同时工作,现场的录音师会对记录现实带来一定的干扰。

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更先进的录像技术出现了,它使得摄像者可以同步采集图像和声音信息达数小时之久,而且费用比起拍电影大为降低。随后,录

① linear 可理解为:某幅图景是由多个动作组成的,它们其实是同时发生的,但当用语言媒介描绘这一图景时,只能按一定顺序将它们排列在一起,这必然涉及对这一图景的重新组构,也不可避免地会对自己暗示的意象发生影响,这其实反映了理性思维的一种局限。可参见: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再版),第13章第8节"直线性呈现的作用";亦可参见: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章"时间意象"。——译者注

像机变得越来越小巧,功能却越来越强大,它可以提供高品质的画面和高保真的音响效果。并且录像机的操作越发简单,费用也降到了普通人家能够承受的地步。录像机打破了装备优良的专家对于图像制作的垄断。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变化使得这个世界的视觉表象失去了与科学权威的紧密联系。不过,这场变革的意义却并不明朗。在很大程度上,这场录像革命并未与实验民族志研究紧密配合来重新界定社会科学。实际上,其社会影响变得非常琐屑,仅在提供大量的"妙不可言的家庭录像"电视节目(现在是世界范围内的),由此,异乎寻常的摄像能力,只是用来呈现大众生活中的鸡毛蒜皮。

当代电子技术继续重新定义图像及其社会意义。目前,人们已经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创造"和/或"修改"图像,于是图像和"真实"之间的联系被永久打破了。以往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在一本全国性新闻杂志的封面上,萨达姆·侯赛因的肖像被加上一些希特勒式的视觉特征),现在已经司空见惯了。这种通过电子技术修改图像的做法,已经成为娱乐节目的一部分[在《泽利格》(Zelig)①中,伍迪·艾伦出现在列宁旁边;在《阿甘正传》中,汤姆·汉克斯与肯尼迪总统会谈]。在广告片中,那些相互之间毫无关系,甚至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热情洋溢地站在一起充当某种商品的代言人。

但是电子革命的作用,远大于能够修改摄影机或录像机拍摄的图像。由于现在所谓的"超级逻辑(hyperlogic)",我们已经在线性的或叙事的形式之外,可以采用另外的视觉呈现形式。超级逻辑是万维网的基础,它起始于"超级卡片"程序(hypercard program)。今天众所周知的是,万维网能使观众自由"创造"自己喜欢看的文本、图像,甚至自己剪辑加工电影和录像的片断。最近的一个绝佳的例子是彼得·贝拉(Peter Biella)、拿破仑·查根(Napoleon Chagnon)和盖瑞·希曼(Gary Seaman)于1997年制作的基于人类学家亚希(Timothy Asch)的电影《斧子的战争》(*the Ax Fight*)改编的互动式CD-ROM和相关的超级链接材料。这个互动式CD可以让观众以不同方式随意观看,比如正常放映、后退或前进、慢动作、画面定格,也可以选择经典片断赏析。观众还能够通过点击电影中一幕幕场景的相关链接以获取该场景的补充信息,或点击任何电影中出现的人物的链接以获取该人的资料,如该人的年龄、性别、配偶、孩子、出生地、门第家世、居住地、死亡年份、在亲属系统中的位置,以及其他一些人类学的细节资料。该CD还包括了全部未被剪辑过的原始镜头,数百张图片,还有几篇相关评论的原文。观众既可以随意进入影片的任一部分,也可以随时转向对影片进行不同的分析研究。

CD在我已经描述的"进化链"中处于一种奇特的地位。一方面,它通过丰富的视觉方法证明了专家的观点;另一方面,它又通过让普通观众自己动手成为所看与所知的"制作者"而解构了专家的权威。

始于伽利略望远镜视觉进化进程的最后一站是通过智能控制而使我们的知觉处于混乱状态,这被称之为"虚拟现实"。阿泰瑞(Artieri,1996)写道:"技术图

① 美国著名导演伍迪·艾伦1983年拍摄的一个纪录片形式的传纪片,讲述了大萧条时期一个著名的"变形人"的事故。

像是后现代的真正标志,它能够描绘出自我的经验在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界限。"(p.56)。人们可以通过穿上"仪器"来刺激视觉与触觉神经,原来界限分明的身体与社会的界限被打破了,于是经验丧失了确定性。上述"发明"使得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感不再是确定无疑的真实的了,于是科学曾经非常自豪地宣称自己代表真实世界的基础也随之被动摇了。相反,我们自己将会陷入一个虚拟的"知觉现实"之中,即作为一个由我们的"想像力"和"仪器"共同作用结果的"知觉的世界"。接下来的一步,仍然是虚拟的(这方面最好的作品是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写于1985年①的关于计算机朋客(cyberpunk)的小说《神经浪游者》),电脑芯片被植入大脑以使人直接与Web相联,从而使被植入者本能地感觉到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既然视觉社会学包含图像与科学,我们就应该研究组成它们的元素之间的关系的那些议题。那些由视觉社会学家们"制作"的图像也是这些议题的一部分;我们应该研究作为视觉社会研究一部分的我们的工作。因为新的技术手段改变了我们所能"看到的"和我们"看"的方式,甚至改变了看、真实和想像力的本质,这些议题将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与重要。

## 一种研究照片的视觉社会科学

以上评述提供了一个宽泛的视角。现在,我将转向视觉社会学的一般操作过程,通过一些在意大利拍摄的骑自行车的照片来说明视觉方法论中的几种不同范式②。

这些照片是我在意大利博罗尼亚大学讲授视觉社会学时拍摄的,当时我正在体验一种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文化。在那里,我和学生们一起探究那些可以"看见""拍摄"的形式和社会控制的水平。任何一种文化都存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控制,它们的关系是颇为复杂的,而意大利似乎尤为如此。对我而言,独自去探究这种社会控制的实质涵义仅仅是一种尝试而已,并不那么容易成功。城市交通系统的控制是非常复杂的,以骑自行车者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有其优势,并且看上去制定一个拍照计划来进行视觉社会学研究是可行的。于是,带上勇敢的雷卡牌照相机,我拍摄下了在同一道路上的几个不同场景,这是一条几乎把

---

① 应为1984年,原文如此。参见 http://www.williamgibsonbooks.com/books/neuromancer.asp——译者注

② 有关视觉社会学的"类型"最初发表于我的一篇文章中(Harper, 1988),该文是受到尼科尔斯(Nichols, 1981)的一篇讨论电影理论的文章的启发而写的。关于视觉社会学更宽泛的讨论,请见约翰·格莱迪(Grady, 1996)主张扩大视觉社会学的应用范围的文章和查尔斯·苏哈尔(Suchar, 1997)为视觉社会学所遭受的质疑辩护的文章。克里斯·金克斯(Jenks, 1995b)选编的文集则探讨了该主题下的关于视觉知觉社会学的几个维度的问题。金克斯(Jenks,1995a)指出"idea"一词起源于希腊语的动词,原意为"去看"。这个词源考古学提醒我们"我们西方文化思考问题的方式其实受一种视觉范式指导"(p.1)。金克斯在一些观点上和我是一致的:"现代世界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所见'的世界。社会学经常在现代性话语中浮现,但它却忽视了文化的视觉传统,并且必然导致对社会关系的视觉维度缺乏足够的敏感。"(p.2)

博罗尼亚内城一分为二的主干道。

从我个人观点来看,无论带不带照相机,骑着我那辆粉红色的自行车来体验意大利的交通实在是一件恐怖的事。我是应我的同事帕垂兹亚·法塞欧里(Patrizia Faccioli)的邀请来意大利执教的,她告诉我在穿行于由危险的汽车和疾行而又脆弱的行人构成的移动迷宫时,最好跟在她后面。当然这说明:本文化的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对异文化的人们来说却是令人震惊的。就穿行于街道之间而言,无知是危险的。

我先前曾经在另一个欧洲城市里骑自行车拍照过,可以说是精于此道。我的照相机不是全自动的,因此必须右手托住照相机,左手用来调节和操纵。我在拍照之前先调好光圈,设置好快门速度,然后一边骑车一边取景拍照,右手拇指不停地过卷。这些照片能够阐释那些互补性的视觉研究范式,更精确地说,这些照片的社会学意义至少可以以四种不同的研究策略来加以说明。

其中第一种策略可以谨慎地称之为"经验的(empirical)"模式。这种取向认为一幅照片只不过是被拍摄的对象反射的光线的记忆存储而已。对于任何存在的图像,都是光线照射到拍摄对象上再被反射而形成的。如此一来,照片只不过是拍摄对象在某个特殊时刻的记录罢了。

从这个视角出发,照片为不同层次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最好的注解。最简单的例子是一辆自行车的行驶历程,它可以反应意大利式的交通特色。每一天的每个时刻在意大利的大街上都有许多数量、种类都不同的交通工具。照片忠实地记录下了它们的众生相。这些照片揭示了看似很复杂的人类互动是如何被"机器"所"操纵"的。如果能够在该文化的内部人帮助下仔细研究这些照片,我们就可以找出那些在该文化中大家习以为常的行为举止来。这些信息看似很简单,但其实就是这些在生活中每天都会发生的"小事"成为我们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基础。总之,把生活分成不同种类的"片断"进行视觉研究是十分有效的,那些照片可以传递许多信息。

尽管这些(照片的)图像记录的是经验性的资料,但我并不认为它们就代表着客观真理。观察的具体过程其实就是一种"翻译",因为要观察就需要选择一个视角。具体来说,作为一个摄影者,我受到所使用的照相机档次的限制,它们的镜头调焦范围当然不同。照相机的镜头和人眼所能看见的范围和精确度也有所不同:有些照相机会放大一个较小的视域,就像望远镜那样;有些能扩展人们正常的视野所及之处,同时将较远处的物体置于最显著的位置定格;另一些就像一架显微镜一样。我选用35毫米焦距的镜头作为骑车拍照的工具,因为它与人眼视力所见的距离相似(但是受取景框限制,没有人眼所见的范围宽广)。这样,当我举着照相机拍照时就不需要检查取景器能否拍下我所要拍的图像了。看见这些照片的人会倍感亲切,正如他自己的眼睛看见的一样。总之,图像制作者的不同决定会带来不同图像,正是这些不同图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的社会

学解读①。

在这项研究计划中,我用的是型号为400的黑白胶卷,只需少许光线就能达到很好的曝光效果。这使我可以使用一个很快的快门速度来将取景器里的图像瞬间定格。并且我也能够采用较小的光圈,它能帮助我拍摄到较远距离的图像,于是在一张照片内既有近景,又有远景。上述这些就是我决定采用的拍照方法。不同的胶卷、快门速度、光圈以及镜头能够创造不同的视觉叙述。这些"叙述"不存在好坏之分,但无疑它们是不同的。例如,照片5表现了在一个特别危险的要道口的大约10名骑着不同种类的两轮交通工具的个人。这张图像清晰而又明确地反映了秩序。类似地,照片8中的老人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只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相反他是一个行人,正在衡量是否应该与我的自行车抢道横穿马路。如果我用不同的快门速度,甚至不同的取景角度来拍照(即视角),在公共场所所摄的照片将会传递出更多的混乱与不确定性信息。

很容易发现经验性的证据既是建构的,又是真实的。成为一名视觉民族志学者意味着要懂得照相机是如何"翻译"社会现实的,进而在潜意识里形成某种视觉陈述。也就是说,只有懂得照相机的工作方式才能运用技术手段自觉地"创造"照片,此时就可以将自动照相机扔进废纸篓了。

## 视觉叙事

单独一幅图像所包含的经验性资料并不能很好地揭示问题,必须将之与其他相关照片联系起来才能说明问题,这个技巧被称为"视觉叙事"。社会学家们使用书面语言来讲述社会学的故事,无论是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还是讲述一个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文化故事都是如此。从微观分析角度看,叙事和象征互动论相似,都力图使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人类互动过程是如何发生的"这一命题上来。从定义上看,互动本身就有叙事的意思在内,它包含了人生体验的改变。

视觉材料经常以叙事形式呈现。最常见的视觉叙事就是我们在上文谈到的电影或录像:许多单独的图像以很快的速度连续放映,其结果就像亲眼所见的运动被再现了一样。然而,照片也能够创造社会学的叙事(Harper,1982,1987)。例如,有这么一组照片:一个步履沉重的就像喝醉了酒一样的工人踏上一列货车到1 500英里以外的地方从事一个新的工作,在那里他重新找回了作为工人的身份认同。这些照片其实讲述的是一种文化的故事,但每个试图对其进行解读的人得到的结论却都有微妙的不同。那些最受尊敬的摄影记者们显然都是运用这种叙事形式的行家里手:尤金·史密斯和艾勒纳·史密斯(Smith & Smith,1975)的作品反映了由一个工厂对一个渔村的致命污染而引起的一场社会运动,他们的视觉叙事描绘了不同的社会集团对此事的不同态度。肯特·克里奇(Klich,

① 施坦格(Steiger, 1995)对于摄影者的选择同社会学的解读之间关系的分析是理解该主题的最佳导引。

1989)的视觉叙事作品《贝丝的书》(*The Book of Beth*)则讲述了一个瑞典海洛因吸食者同时又是一个娼妓的女孩生活中的故事。毫无疑问,这些略显悲情的叙事都力图将个体的命运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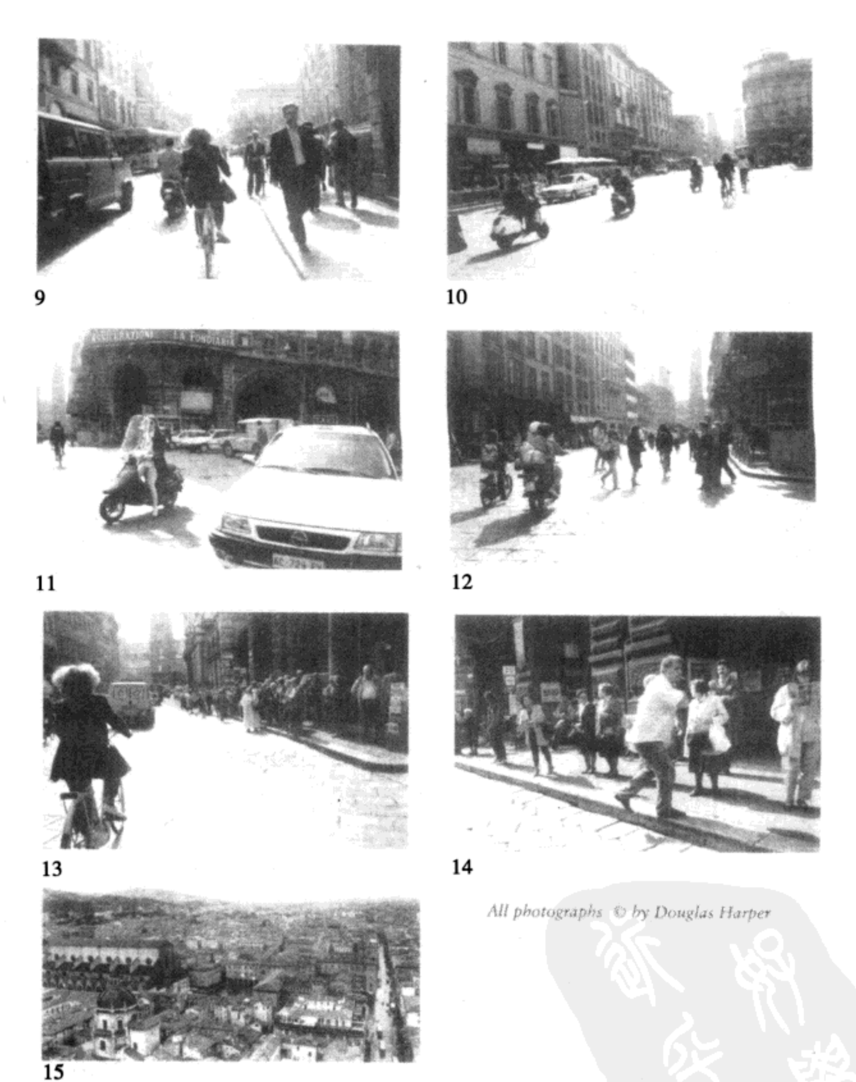
我的连续几天在同一时刻骑车经过同一条街道的关于文化现象的叙事研究,是由数种方法建构的。我把沿同一路线不同时间拍摄的照片混合在一起,你可以通过不同照片中光与影的变化来区别它们。以这种方式组合起来后,照片的排列顺序其实就是一个社会学的叙事,尽管这些图像之间的关系用来反映时间的叙事流略显武断。

我主要通过两种不同方式来"表达"关于自行车的叙事:一是有关自行车的文化定义方面的图像(照片 1),二是在一个较大的地理空间背景中的图像叙事(照片 2 ~ 14)。在按顺序排列的所有照片中,第一幅照片是一个广告宣传的图像,它显示自行车既具有实用性又代表一种时尚。最后一幅图像(照片 15)是从一座塔上向下俯拍的(同一座塔在照片 9 ~ 13 中出现过),照片显示了拍摄其他照片的那条街的全景。这些照片中持续变大的塔可以提示拍摄的顺序与进程。从高塔鸟瞰的视角人们可以从之前所摄照片之间的关系中,推断出自行车行驶的道路是博罗尼亚内城的主干道之一。这张全景照片就是之前所有照片的一个视觉总结。

在这一系列照片中,照片 2 更多的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视角而不是从一个参与者的视角拍摄的。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小汽车、轻型摩托车还有自行车正在等待过街信号。实际上,这个场景同照片 3 所表达的如出一辙。过了我们正在等待交通信号的十字路口,一条小马路瞬时变成一条宽阔的大街,蜂拥而来的交通工具立刻向右拐。照片 4 显示了通行信号来临的那一刻,数种不同种类的自行车和轻摩粗鲁地沿着划有白线的专供两轮交通工具行驶的道路骑行。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个骑一辆旅行自行车的看似"运动员"的人,他显然无视城市的交通管理规则。照片上还有两辆公共汽车正迎面驶来,一辆随后向右拐弯,另一辆则陷入混乱的交通秩序中。这些在不同日期拍摄下来的原始图像资料揭示了这条街道的众生相(注意这些照片中阴影的变化,以及消失的公共汽车和小汽车)。照片 5 显示了几辆离得很近的轻摩车手之间的算计(正准备抢道),他们都在等直行的轻摩通过后立即向左拐(看上去一场撞车即将发生,就像经常看见的那样)。照片 11 记录了类似"胆小鬼"游戏中的一刻:面对一辆疾驰的意欲和我抢道的出租汽车(还有一个骑轻摩的女人),我是不会显得软弱的,结果出租车不得不半途紧急刹车。有几幅图像显示了行人和机动车辆之间是如何互动的。照片 8 中的过街过了一半的老人显得很孤单。照片 12 中的几个小团体正在采用不同的策略穿过马路。最后,在照片 7 中,我沿街拍照的举止行为引起了旁观者的惊奇,他们都在观察我并显得有些不安。这种反应其实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我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对常规的侵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研究者的研究对现实所造成冲击的真实记录。从这几次沿着同一条街道骑行时拍摄的照片中,我就能够得到几件在不同时间发生的事件。



1 2 3 4 5 6 7 8






任何视觉叙事都必须决定在每个单位时间内包括多少信息。电影或录像包括了如此之多的信息,以至于它看起来是在复制现实。因此,电影和录像被广泛用于分析面对面的互动就毫不奇怪了。这里举的例子是通过少量的图像来涵盖几分钟内的社会生活。当然,人们有理由怀疑单凭简单的几幅照片能否探究到社会规范的真谛。毫无疑问,人们需要更多的视觉信息对该主题进行研究并获得一个较为满意的深度。也许录像以及随之带来的声音能够提供更多的有意义

的资料。

视觉叙事是个人选择和决定的结果。如果研究者能够谨慎地对待这些选择,视觉叙事就可以成为一种有益的研究社会模式的方法。当然,使用什么方法会影响如何提问。

## 诱导文化解释

尽管还较少被使用,"图片诱导(photo elicitation)"已经成为一个很熟悉的定性研究方法了①。在采用这项技术时,需要注意只要说明即可,不应对研究主题进行提问。例如,当某个研究者想了解"自行车在意大利文化中的作用"时,他可以展示一组相关图像(比如我拍摄的那些照片)给一个或一群意大利人看,借以诱导出他们的解释。当然,随着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一个骑自行车者、骑摩托车者、开小汽车者还是步行者的不同,他们对图像的反应可能会有很大不同。这样,这些图像就扮演了一种"文化的罗夏墨迹测验"的功能。

为了展示"图片诱导"是如何进行的,我将这些照片给我的意大利同事帕垂茨亚·法塞奥里(以下简称PF)看,当时她作为我的前导车在照片9和13中出现过。由于她是一个视觉社会学家,图片诱导对她来说并不陌生,我们可以以很自然的方式来分享她对照片的反应。事实上,她对这些并不算多的照片的反应写满了几张纸。以下就是被编辑过的她的反应的节选,虽然要点都被保留下来了,但并没有涵盖所有观点。作为一个示范,这不过是文化研究之冰山一角。

PF对这些照片的评论展现了自行车在意大利文化中的所有意义:

> 自行车意味着:快速、方便、锻炼身体、危险、风险、挑战、释放压力、增加紧张感、肺癌、冬天冷、夏天热、对(交通)规则的弹性、攻击性、专心、谈判、社会良心、无污染、自主性……
>
> 自行车增加你的紧张感:你必须浑身长满眼睛(前、后、左、右、上、下……),每10秒钟你会遭遇一次风险。街上没人在乎骑自行车者,就好像你不存在一样:行人忽然窜出,完全无视你正朝他骑过来;摩托车在你左右穿梭,不小心就碰你一下;甚至当你在正确的行车道上时,小汽车也不会给你让路;还有公共汽车……那些博罗尼亚的公共汽车司机们好像在比赛谁能开得离你最近而又不撞到你似的。
>
> 因此,骑自行车就意味着加倍小心,但也要有点儿攻击性和粗鲁。你必须学会瞪着小汽车或小型摩托车司机(公共汽车太高了,看不见),用眼睛警告他们:"我要先过去,我不会停车退缩!"

对于照片5和6,PF评论道:

① 科利尔(Collier)于1967年首次提出了"图片诱导"概念,这要归功于20世纪50年代他在康奈尔大学的一项关于加拿大城市化问题的研究。研究者们日益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没有照片来达致同感,他们的访谈不会取得很大进展。研究过程中拍摄的照片已经成为沟通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一座桥梁。

当信号灯一变绿,自行车和轻摩迅速抢在小汽车前面,因为绿灯同样允许对面驶来的车辆左拐。这里的挑战在于必须抢在对面左拐的车辆之前首先冲过去,照片 5 就是这样。那些朝着前面两座塔驶去的人们正在通过路口,但如果那些从那两座塔方向驶过来的车辆抢先左拐,他们就将过去而其他人必须停下来。如果你骑自行车,会对这个场景深有体会(回想一下,我先前说过的无论你往哪个方向,左顾右盼是少不了的)。这是我每天上下班途中最惊险的一幕之一。

理解了骑自行车者的经历后,PF 又引领我们去理解什么是意大利人称之为"轻微越轨"的东西:

骑自行车意味着不需要时时遵守规则。你其实是半个机器和半个行人的叠加,对其他人来说,自行车的危险不是很大,因为你能扫视前后左右,当然如果可能的话,你也会闯红灯。当遇到交通堵塞时,你能窜上人行道,在人群中穿梭。你也可以在单行道逆行,当然要注意迎面驶来的汽车。作为一个美国人,你可能会说:"规则就是规则,时时刻刻都是。"但你错了……某些规则必须被评估以决定是遵守还是拒绝。在意大利,这种想法是非常自然的,尤其是在对待交通规则方面更是如此。当然,对此没有统一的惩戒规则……但我们意大利人认为我们有权对某些规则做出判断并随之采取相应的行动。例如,意大利人认为(并确实这么做了)安全带在高速公路是重要的,也是有用的,但在城里却没用。警察也下了很大气力企图使人们遵守规则,但没用。所以现在他们已经容忍了这种行为,在城里开车不系安全带已经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了。意大利人不会承认谁制定的规则就一定正确,做决定的人也会犯错误。天天在路上跑的人会懂得什么是最恰当的行为。

照片 1 展示了橱窗里的一幅招贴画,画面上的女模特正推着一辆自行车,局外人很难理解其中的文化象征。PF 解释了几种不同交通运输方式的文化意义:

照片中的香水商店正在做广告宣传:如果你买了某品牌的香水,你就有机会像许多同样买了该香水的人一样得到一辆自行车作为奖品。这个图景翻译过来就是:"这款特别的自行车可能是你的。"这其实是自行车在意大利人的文化和日常生活中占多大位置的一个风向标。使用名牌香水的女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使用自行车:注意海报上的女人身穿高档服饰,而不是运动装。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骑自行车的大都是工人阶层,他们买不起,也用不起小汽车。那时许多人只是在星期天和家人郊游时才使用小汽车。今天的生活水准大大提高了:每个人都有一辆或更多的小汽车,城市里,尤其是老城区中心的交通拥挤不堪,因此,自行车又卷土重来了,但此时已经和社会地位或贫富无关了,它已经成为最快捷地穿过城区的手段之一。轻摩的情况和此类似:无论是学生、年轻人,还是雇员、律师、医生以及像我一样的教师等都纷纷骑它,这使得它越做越高档,当然也越来越贵,大约 3 000 美元一辆。因此,轻摩既意味着方便快捷,又是一种地位象征。摩托车不同于此:

它主要用于度假或在公路上飙车。在一个城镇里,你会看到富人骑小型摩托车,穷人骑助力车,特别穷的人和都市生态主义者骑自行车。当然,这些都是"理想类型",现实则复杂得多,往往呈现一种混合态势。

这些访谈摘录显示了如何通过图像诱导出文化信息,无论这些文化信息是关于微观社会行动的,还是文化定义方面的。图片诱导访谈的过程就是一部经验的和叙事的作品的完成过程,这里的关键是由一种文化的局内人士提供补充意义,从中我们认知到建构一个"事实"就是一种文化的解释。

## 经验和图像

接下来我要介绍第四种研究图像的方法,我称之为"现象学模式"。这种方法的关注点是"自我",在上例中是正在异文化的拥挤的街道上骑自行车穿行的"自我"。从现象学的视角看,照片表达了拍照者艺术的、情感的或经验的意图。在这里,社会学从艺术中获得了灵感:现象学模式脱胎于早期的摄影艺术运动,当时的摄影者比纯技术人员更愿意表现自己的风格特征,并断言摄影作为一种艺术表达形式与别的艺术表达形式具有同等效果①。

对照片进行现象学的分析并不是社会学的传统研究方法。或许这一领域最好的研究范例是昆尼(Quinney,1991,1995)的作品,他通过图像来表达和诠释自己的经历、反思和记忆。而我则试图通过这些意大利人骑车的照片来发掘出那些对本族人习以为常而对我们来说却是异常新鲜的东西。

在骑自行车工作的日子里,我常常处在一种既兴奋又恐惧的感觉之中。根据我的经验,摄影工作之艰难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如果带着这样的观念来看照片,你就会"看见"照片背后站着一个个各具情态的摄影者,他们通过照片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现实的不同理解。这种图像制作背后的情感必须通过另一种表达模式才能被理解:那是一种日记般的、诗性的或其他意味深长的表达形式。说来奇怪,照片本身看上去一副超然的样子,甚至显得十分安静、缄默,但它们蕴涵的意义却从你的经历体验中蓦然浮现。这里,我要提出一个疑问:同样的照片能否不偏不倚地既服务于经验性的模式又服务于现象学的模式。显然,它们之间尚有一段距离,那些采用经验性模式"翻译"过来的图像看似清晰,但却是不能表达拍摄时刻的体验的。

照片扩展了我们对于社会过程的理解,它使我们从已经形成的刻板印象中解脱出来,并学会理解异文化人士的观点。照片记录了丰富的细节资料,它能够鼓励观看者思考更大的文化事实。那些按顺序排列的照片则可以使我们"看见"社会行动是如何发生的。

骑自行车穿过一条城市中的街道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了,但这个例子提

① 这一观点的最佳入门读物是多尼·诺曼(Norman, 1960)的关于阿尔弗莱德·斯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的研究,对他来说,摄影术对于现代艺术的兴起是不可或缺的。

示我们连最平凡的事都可以用几种不同的社会学方式去思考。上面我已经介绍了在研究过程中使用照片的四种不同路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已经穷尽了所有可能的研究范式。

## 摄影的社会建构与视觉社会学

以上介绍的内容对于描绘视觉研究当然是不够的。就像所有的研究一样,视觉研究既受制于又能动于社会权力。当进行视觉研究时,这些困难同与摄影如影随行的权力紧紧粘合在一起。因此,我们所谓的"摄影的社会建构"只是有关视觉社会学本身的政治争论的一部分。

摄影的社会建构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摄影者的社会地位以及拍照时社会的主流思潮是什么。社会权力介入了摄影过程(Tagg, 1988),部分原因在于摄影可以用来区分个人特质(Spence, 1988)、制度关系(Jackson, 1977)和历史差异(Copeland, 1969; Rieger, 1996)。父亲可以对他的孩子滑稽可笑的举止拍照,但一般来说孩子没有权力拍摄父母吵架(或做爱),即使有,此类照片也不可能被纳入"官方"版的家庭故事的影集中(Chalfen, 1987)。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们都认为他们有权拍摄他们的研究对象,并将之视为学术研究对象(这种看法掩盖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意识形态基础)。爱德华兹(Edwards,1992)关于早期英国人类学摄影的论文集明确展现了这一点:那些 20 世纪早期人类学家的图像作品并不是对科学研究对象客观的"翻译";更有甚者,它们深深烙上了殖民主义关系的记号。人类学是一门起源于宗主国的学科,当时的人类学家认为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是低级与高级的关系,那些人类学家拍摄的关于当地土著人的照片只不过是将这种观念具体化罢了。当时根本就没有出自当地土著人之手的照片资料,但最近几十年里,一些"高等土著人"开始认为自己有权制作属于本民族的图像和讲述自己的视觉故事。这自然会使人们重新思考传统人类学关于二者关系的看法。

摄影的社会建构同时也是一个性别问题。例如,我现在正在从事的一项研究中使用了大约 110 幅二手文献照片,它们来源于一项关于二战后美国东北部地区奶牛牧场变迁的研究。这些照片是从大约 7 000 幅照片中选出的,它们是由罗依·斯特里克(Roy Stryker)组织拍摄的并得到了新泽西州的标准石油公司赞助。在 110 幅照片中,大约 40 幅照片是由一位女摄影师夏洛特·布鲁克斯(Charlotte Brooks)拍摄的,另外 70 幅照片则分别由几位男摄影师拍摄。当我以摄影者的性别作为自变量来比较这些照片时,我被自己的发现惊得目瞪口呆:在男摄影师的照相机下,牧场女性的工作被大量忽略了,在他们的照片中既看不见作为生产劳动力的妇女,也找不到有关操持家务、照料孩子的照片。然而,布鲁克斯的作品却包括了许多被男摄影师忽略的主题。这种差别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很明显,如果我们将这些照片视为二战以来的牧场生活的全部时,我们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实际上,这个例子中的照片只不过反映了 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

典型的"男性"和"女性"对牧场生活的社会建构。总之,性别角色在图像意义建构中的作用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未被发掘的领域①。

社会科学家们应该对图像的社会建构保持清醒的认识。我们必须承认绝大多数研究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不平等的,而摄影使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显性化。我能够进入那些在街上流浪的穷人的世界中去,也能拍摄那里的一切,但一个无家可归者是不可能潜入我所在的大学的,更不要说拍摄校长的生活。这个事实已经使许多社会科学家放弃使用照片。而对于那些坚持认为图像有用的人来说,这个事实则提醒我们必须克服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不可避免的权力差别。一些社会学家面对这个难题采取的对策是放弃自己摄影,转而教会那些被研究者去摄影,并让他们书写自己的文化,或许这体现了一种权力的转移。温迪·艾瓦尔德(Wendy Ewald)以她研究成人/孩子、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之间的权力不对称而成为此领域的领头人。她的第一部作品是关于阿帕拉契山脉的孩子的研究,该书成为采用上述研究方法的一个范例。她的学生们的照片和文章驳斥了长期以来关于阿帕拉契山脉原住民的陈词滥调(Ewald, 1985)。在该方法中,照片(它们经常在书中作为插图出现,而书则会详细讲述这些图像的故事)代表了一种强烈的反思:它们本身不是社会科学,也产生不了社会科学,它们只是社会学家和其他使用者可以利用的资料罢了。

## 视觉社会学的本质及其未来走向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研究方法问题(记住:这是一本定性研究方法的书),接下来还将讨论关于视觉运动的终结问题。进行视觉社会学研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带着社会学的意识去拍照,霍华德·贝克(Becker, 1974)是第一个持此观点的人,并且迄今为止仍没有人提出更好的观点。

贝克认为我们摄影时都会进行理论思考。更确切地说,贝克认为所有的摄影行为都是在某种理论视角指导下完成的,只不过不一定是社会学理论而已。一般说来,我们已经拥有的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贝克称之为"庸俗"理论)会决定我们应该在哪儿拍照以及如何使用照相机(从技术角度)来制作图像。这样一来,我们的拍照只不过是在"复印"那些其实未经检验的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知觉。我们就是用这些庸俗的空头理论来阐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照片就是我们的结论。例如,假如我们是摄影记者,我们必须学会附和报纸总编的眼光和近期摄影杂志的流行风格(Hagaman, 1996)。要做到这一点,仅仅按着某些所谓"主流"观点来选择文章主题和与该主题搭配的图像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使用特殊的镜头(取景框)、光圈和快门速度。如果我们是社会学家,我们或许拥有

① 经过一番彻底的查询后(包括网上咨询),我发现很难找到关于性别角色在纪实性摄影中影响的参考文献,倒是有许多研究是关于艺术摄影中的性别影响的。结果有趣的是,我倒成了第一个关注此问题的人,但将一个女性拍摄的照片和好几个男性拍摄的照片做对比研究并不十分妥当,因此该研究有一定局限性。

一些关于研究对象的理论知识,就像贝特森和米德(Bateson & Mead, 1942)一样,她们在开始对巴厘岛文化进行视觉研究前已经做了一些理论准备,但她们的研究对巴厘人来说仍然是不公平的。这些先验的知识将会提醒研究者:“我的研究对象有一套固定模式……它会持续20分钟,分4个阶段……拍摄重点是他们之间的交往与互动。”按着这种研究路径,视觉社会学的工作是直线向前的:“只要把它带进研究过程中去,我们就能扩展关于研究对象的知识。”

但并不是所有实地研究者都有贝特森和米德所拥有的先验知识。对视觉社会学家来说至少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把照相机视为一个信息采集器,通过它来实践由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ser & Strauss,1967)提出的“扎根理论”。研究过程中拍摄的照片使“观察”凝固,实地工作者利用它们不断地修订理论。通过这种方法,照片有助于建构理论。实际上,实地研究中的摄影工作往往要求实地研究者先看到一些东西,这些最初的观察就是建构理论的开端。

第二种办法是利用照片来验证和发展现存理论,其主要手段就是前文介绍过的“图片诱导”。研究者可以利用人们经历过的某些事件的照片来唤醒他们的历史记忆。玛格丽丝(Margolis, 1998)研究了煤矿工人的政治意识,她收集了几十年前有关煤矿工作的照片,然后借助这些照片来访谈老年矿工,探询他们对当年经历之事的反映。在这个例子中,拍照和“诱导”之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但这样反而能比常规的立即进行“诱导”来得更深入,挖掘出更多的东西。

也有的研究者既专注于拍摄研究对象,又重视“图片诱导”中的访谈。例如,范·德·道斯、库斯肯斯、莱弗廷、范·梅洛(Van der Dos, Gooskens, Liefting, Van Mierlo, 1992)拍摄过一个多种族聚居的荷兰社区。他们在该社区内分别找了5个不同的研究对象做“拍摄指导”(来拍照),这些人的年龄、性别、种族背景各不相同,然后分别同他们的“拍摄指导”就刚刚拍摄的照片展开访谈。最后交换各自的“拍摄指导”,访谈他们对于那些在原来的“拍摄指导”下拍摄的照片的意见。研究者们原先认为一个混合社区应该是由一些共享同一个物理空间但却意见分歧的人构成,但实际上,5个研究对象却能彼此互相欣赏对方的审美眼光。

在所有的图片诱导案例中,图像都失去了客观性。相反,图像的权力体现在它能够开启人们的主观性,使人们以不同于研究者的眼光看待图像的意义。

总之,人们可以认为视觉社会学家力图找到一条将“所见”整合到研究过程中去的路径。一个敏锐的实地研究者总是做好随时进行视觉社会学研究的准备。视觉社会学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照相机是如何记录信息的,以及图像在研究过程中的影响与冲击力。最后,它对于我们理解不同的建构方式(技术的和社会的)是如何影响图像的制作和诠释也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电子革命的时代,正如已指出的那样,它已经影响到了图像的制作、传递、体验和理解。这些变化当然会对视觉社会学带来冲击。然而,我们正处在一个尴尬地位。社会学骨子里依然对视觉文化(Denzin, 1995,他本人例外)或视觉方法不感兴趣。教科书则致力于揭示问题而不是去解决问题。绝大多数社会学家选用的社会学入门教材充斥了彩色的、简单的图像(那是一些被出版社的艺术编辑精心挑选出来的配合课文的插图)。这些图片重申了已经

算是比较简单的入门级教科书中的那些最显而易见的主题。如果认识到这些图像其实就是绝大多数社会学家们所能接触的全部"视觉社会学"的内容,或许就不必对此感到惊奇了,即:视觉社会学运动依然不是学科的主流,只是边缘而已。在人类学中,由于有长时间的拍摄人类学电影的传统,也有许多依然杰出的视觉民族志研究案例,就像贝特森和米德所做的那样,情况要好一些。然而即便这样,两本主要的视觉人类学杂志上发表的绝大多数文章依然只是"图像化的文字",而很少描述拍摄的经验过程,也不展现视觉思维历程。

未来何为? 一种可能是视觉敏锐感会带来一个融民族志学的方法和跨学科的理论为一体的充满活力的社会科学。层出不穷的新技术会提供多种手段将不断变化的视觉感受带进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并加深对社会视觉特质的理解。另一种可能是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和这个迅速变迁的技术世界联系起来,而仅仅将社会视为可观察到的现象按部就班地加以研究。在这个场景中,尽管一些令人敬佩的"思想者"发起了一场小规模的视觉运动,但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依然冷眼旁观。我认为未来将会是这两种图景的混合。

## 参考文献


Artieri, G. (1996). The virtual image: Technology, media,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visual reality. *Visual Sociology*, 11 (2), 56-61.

Bateson, G., & Mead, M. (1942). *Balinese character: A photographic analysis.* New York: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Becker, H. S. (1974). Photography and sociology. *Studies in the Anthropology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1(1), 1-19.

Biella, P., Chagnon, N., & Seaman, G. (1997). *Yanomamo interactive: The ax fight* [CD-ROM and tex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Bourdieu, P. (1990). *Photography: A middle-brow ar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lfen, R. (1987). Snapshot versions of life. Bowling Green, OH: Bowling Green Popular Press.

Collier, J., Jr. (1967). *Visual anthropology: Photography as a research metho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Collier, J., Jr., & Collier, M. (1986). *Visual anthropology: Photography as a research method* (Rev. ed.).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Copeland, A. (Ed.). (1969). *People's Park.* New York: Ballantine.

Denzin, N. K. (1995). *The cinematic society: The voyeur's gaze.* Thousand Oaks, CA: Sage.

Edwards, E. (Ed.). (1992). *Anthropology and photography* 1860-1920.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Ewald, W. (1985). *Portraits and dreams: Photographs and stories by children of the Appalachians.* New York: Writers & Readers.

Gibson, W. (1985). *Neuromancer.* New York: Ace.

Glaser, B. G., & Strauss, A. L.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Chicago: Aldine.

Grady, J. (1996). The scope of visual sociology. *Visual Sociology*, 11(2), 10-24.

Hagaman, D. (1996). *How I learned not to be a photojournalist.*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Harper, D. (1982). *Good compan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rper, D. (1987). The visual ethnographic

*narrative*. *Visual Anthropology*, 1(1), 1-19.

Harper, D. (1988). Visual sociology: Expanding sociological vision. *American Sociologist*, 19(1), 54-70.

Harper, D. (1994). On the authority of the image: Visual methods at the crossroads. In N. K. Denzin & Y. S. Yvonna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403-412). Thousand Oaks, CA: Sage.

Harper, D. (1998). An argument for visual sociology. In J. Prosser (Ed.), *Image-based research: A sourcebook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ers* (pp. 24-41). London: Falmer.

Jackson, B. (1977). *Killing tim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Jenks, C. (1995a). The centrality of the eye in Western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In C. Jenks (Ed.), *Visual culture* (pp. 1-25). London: Routledge.

Jenks, C. (Ed.). (1995b). *Visual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Klich, K. (1989). *The book of Beth*. Millertown, NY: Aperture.

Mamber, S. (1974). *Cinema vérité in America: Studies in uncontrolled documentary*. Cambridge: MIT Press.

Margolis, E. (1998). Picturing labor: A visual ethnography of the coal mine labor process. *Visual Sociology*, 13(2), 5-37.

Nichols, B. (1981). *Ideology and the ima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Norman, D. (1960). *Alfred Stieglitz: An American se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Quinney, R. (1991). *Journey to a far plac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Quinney, R. (1995). A sense sublime: Visual sociology as a fine art. *Visual Sociology*, 10(1-2), 61-84.

Rieger, J. (1996). Photographing social change. *Visual Sociology*, 11(1), 5-49.

Smith, W. E., & Smith, A. (1975). *Minamata*.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Snyder, R. L. (1968). *Pare Lorentz and the documentary film*. Norman: Oklahoma University Press.

Spence, J. (1988). *Putting myself in the picture: A political, personal and photographic autobiography*. Seattle: Real Comet.

Steiger, R. (1995). First children and family dynamics. *Visual Sociology*, 10(1-2), 28-49.

Suchar, C. (1997). Grounding visual sociology research in shooting scripts. *Qualitative Sociology*, 20, 33-55.

Tagg, J. (1988). *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 Essays on photographies and histories*. Basingstoke, Hampshire, England: Macmillan.

van der Dos, S. E., Gooskens, I., Liefting, M., & van Mierlo, M. (1992). Reading images: A study of a Dutch neighborhood. *Visual Sociology*, 7(1), 4-68.

# 作为主体的研究者：自我的民族志、个体叙事、自反性 28

AUTOETHNOGRAPHY, PERSONAL NARRATIVE, REFLEXIVITY: RESEARCHER AS SUBJECT

⊙卡洛琳·艾利丝　亚瑟·P·博克纳

## 楔子：丰富本书的体裁

“嗨！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亚瑟的声音从电话的另一端传来，给了我一点儿安慰）。

“你听上去有些情绪低落。出了什么事？”

“哦，今天办公室简直成了动物园——没完没了的长途电话、填不完的报表、回不完的电子邮件、一个接一个的学生……我已经陷入学期末的恐慌了。本来打算批改试卷并给出学期成绩，可一直没时间。家里情况怎么样？狗们都好吗？”

“它们都很好，但我不是很好。我正在写那本 *Handbook*（指本书，后同——译者注）中我们俩的那一章，但越想越写不下去。”

“我想你只是想写得更好一些吧。”

“嗯，这本书的第 1 版对于自我的民族志和个体叙事阐述得很不够，其实研究者的个人经历本身就足以成为研究课题了。因此我想借这次改写来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

“是的，是到了该这么做的时候了。当第 1 版出版时，很多学者都在致力于找到一条如何走出‘代言人’危机之路，但还没有多少学者将他们自身及其经历置于研究的中心。然而，在过去的 5 年间，情况大变，这起始于一系列的民族志研究，如邓津在《诠释民族志》（*Interpretive Ethnography*）里强调个体书写，贝哈（Behar）的《易受影响的观察者》（*The Vulnerable Observer*）……”

“对极了，的确已经掀起了一股更加重视个体的、私密的和体验式的写作潮流。”

“那还有什么问题呢？”

“通常，本书的体裁规范会限制写作的形式，我想我们低估了惯性的力量”，

亚瑟继续说道(明显地陷入思索之中)。

"但你以前已经为许多类似的《定性研究方法》写了相关章节,为什么这次不同呢?"

"因为那些章节符合《定性研究方法》的体裁规范。它们都是些论文,不是讲故事。但这次我们想'展示',并不仅仅是'讲述'自我的民族志。看一看你书橱中任何一本《定性研究方法》吧,你会发现绝大多数章节是用第三人称、被动语态写的。好像他们与书中所写的地点、人物毫无关系似的。那些规范惯例不欢迎个性化的、充满激情的写作风格。这些书籍充满了干瘪、空洞、抽象、言之无物的东西。"

"那才叫做'学术',亲爱的。"(笑声)当亚瑟停止发笑后,我不开玩笑了,接着说道:"但第 1 版 *Handbook* 中,也有一些作者是用第一人称来写的呀。"

"是的,但文章中的'我'经常在前面的介绍中出现后就找不到了,然后在结论那里又忽然杀了回来。"

"并且'我'通常被写做'我们',那些很含糊的'我们'有时是指文章的作者,有时又是包括我们所有的人。"

"还有作者通常不作为他们作品中的人物……"

"他们当然不能够这样",我插话道:"因为那些章节并不是真实的故事,它们几乎没有对话、引人入胜的场面或起伏跌宕的情节。"(唯恐亚瑟打退堂鼓不跟我合作写这一章),我继续说:"但要知道 *Handbook* 也是有用的,它们提供引文和进一步阅读文献,勾勒历史发展进程,也可以为其他人的文章论点提供合法性论据。"

"我并不怀疑它们的重要性。例如,成百上千的学生们在做定性研究时就受到了第 1 版 *Handbook* 的启发。"

"是啊,我们不能苛求 *Handbook* 的作者们做力不能及之事。"

"但我们应该提出质疑的是为什么作者们不被鼓励用第一人称来写学术文章。"亚瑟反驳道:"我们何以视作者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在其文章中被压制的现象为理所当然呢?别忘了,究竟是谁在收集证据?谁在具体论证?又是谁最后得出结论呢?随着放弃个人的能动性,第三人称、被动语态作为写作规范被我们的学术出版物强化了,这些著作更加看重的是抽象的和客观的知识,而不是个体叙事和第一人称中的直接证据。对绝大多数作者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用第一人称写作的念头。他们已经陷入自己构建的优势学术话语规范而不能自拔了。一旦去个性化成为论文的规范,那些个人的、自传性质的故事体也就成了表达的禁区。"

就在我开始怀疑我们是否还能继续完成写作计划时,亚瑟说道:"今天早晨我写了一些有关传统社会科学的短论。或许我们可以从这儿开始。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可以读给你听。"

我松了一口气,瞥了一眼那堆学期试卷,它们只好等等再说了。"当然有时间,快念吧。"

亚瑟开始读道："就像绝大多数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受教育的社会科学家一样，我是在经验主义的遗产中完成社会化的。我发展出一种对简化过的抽象概念和统一的知识体系的嗜好。最早的一批介绍社会科学的小册子是我上研究生时出版的，它们满足了一个渴求知识的饥饿的人的需要。我的教授们坚持认为科学知识是积累的和线性发展的，因此学者们必须不时地回过头去评估本学科的状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评估有时竟然成了'艺术式'的随笔（一种被假定为科学的艺术）。这就像 *Handbook* 那样——它不过只是一本充斥着所谓客观、中立的证据的读物而已。著者显然是专家，但他们却像陌生人那样写作。因为究竟是谁收集的证据或谁来权衡判断这些证据并不重要，*Handbook* 的著者们遵循传统惯例用那种去主观性和去个人能动性的被动语态写作。

当我拿到博士学位后，我变得对科学的局限性和可行性持高度谨慎态度。在1970年代中期，我的一个同事，他正在研究生的讨论课上讲授'科学的修辞'，建议我关注社会科学中飞速增长的关于'信任危机'的文献。我从阅读库恩（Kuhn，1962）开始，他认为已有的科学的模式缺乏根基；然后是罗蒂（Rorty，1982），图尔敏（Toulmin，1969），以及其他一些语言哲学家；利奥塔（Lyotard，1984）揭示了一种关于统一的、总体性的知识的信念，质疑了那种认为专家叙事是可能的或正当的观念；后结构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例如巴特（Barthes，1977）、德里达（Derrida，1978/1981）、福柯（Foucault，1970），成功地消解了现代主义关于作者的概念，改变了我们理解作者、作品与读者之间联系的方式；在巴赫金（Bakhtin，1981）的影响下——留给读者的理解空间变大了、鼓励多元视角、意义的解放、多重的声音、地方性和非正规知识，这一切极大地超越了一种统一的整体性理论的界域；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家，如克劳芙（Clough，1994）、哈丁（Harding，1991）、哈特索克（Hartsock，1983）、史密斯（Smith，1990/1992）提升了一种独特的却被忽视的观点——女性主义视角；还有一些跨学科的学者，如崔恩（Trinh，1989，1992）、安扎尔多（Anzaldua，1987）、贝哈（Behar，1993，1996）则极力捍卫那些具有反思的、经验的、自传体色彩的易受（传统观念）责难的文本，他们提请我们注意那些涉及民族、阶级、性、残疾和种族方面的比较复杂的偶发事件是如何被糅杂在个体身上而形成活生生的个人经历的。

这些事件发展的结果是我开始质疑如果 *Handbook* 还坚持传统写作规范的话，那么它能否有助于那些已经转向从事自我的民族志和个体叙事的学者阐释他们的观点就成了一个问题，因为这些学者的工作本身就是试图打破旧有的范式与规范。那些老一套的做法，如列出参考文献、定义概念、文献回顾与评论、明确提出评判标准以及理论化自己的视角，究竟有多大帮助呢？读者们能把我们的知识变为他们自己的吗？不，我们需要的是让读者感受到道德窘境，思考我们的故事而不是关注故事本身，积极主动地去寻找解读一项自我民族志计划的关键点，以及考虑如何将他们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个值得讲述的故事。"

当亚瑟读完了，我说："嗯，很聪明的看法。尽管你从'我'开始，但还是很快陷入了使用《定性研究方法》体来论证反对按《定性研究方法》体写作的观点。"

我禁不住笑道:"提醒我注意到那么多后现代的深奥术语其实与经验性形式十分亲近。"

"看见传统的力量了吧。"(亚瑟同意我的看法,也笑了起来)随后严肃地说:"我们就写信给邓津和伊冯娜说我们退出。想想我们可以把写作的时间花在海滩度假上,那是多么令人神往啊。"

"很有诱惑力啊,特别是最近在我们已经感受到生活被工作过度统治时,但不是现在。撰写 *Handbook* 中'什么是自我的民族志?'这节内容已经折磨我很久了,你知道我是如何在坚持的。同时,我知道它的重要性。"我回答道,忽然听到有人在敲门。

"我不认为我很满意,你也一样,除非我们找到一条超越传统之路。如果我们能够创造一个故事既能符合 *Handbook* 体裁要求,又能超出体裁限制该有多好。就是一边讲故事,一边展示我们在做什么,那将会是很有趣的。"亚瑟开玩笑似的建议道。

"多么辉煌的矛盾啊",我用一种恶作剧似的语调说。"但我们必须谨慎些,不要给人留下反对现行写作规范,主张每个人应当按我们的写作方式去写作的印象",我警告说那是我经常听到并极力避免的东西。然后我又回到亚瑟有讽刺意味的想法,"我们的论文并不受欢迎——知道吗?有人已经指责我们傲慢、自大、情绪化和不切实际?"抢在亚瑟回答前,我告诉他我必须走了。"有人在门外,再见——进来",我一口气说完,门已经被敲了三下了。

## 自我的民族志简介

一名 45 岁左右的女士站在门外,正在犹豫该不该进来。一顶大沿的周边嵌着紫色环饰的草编帽子盖住她的脸,一条很相配的围巾松松地搭在脖子上垂下来。"艾利丝教授?"我点点头。"我叫塞尔维亚·史密斯(Sylvia Smith),是心理学系的博士研究生。我正计划做关于乳腺癌的毕业论文,有人介绍说您是专门研究疾病的社会科学家。我希望您能作为我的论文答辩委员。我的答辩委员会中有三人来自心理学系,第四位是一名肿瘤学家。"

"稍等",我说,伸出手打断了她的独白。"进来吧。请坐,我们来谈谈你的计划。"

她摘掉围巾和帽子,双手大幅度地不停摆动,继续飞快地说:"我想对乳腺癌患者访谈交流,以了解她们在得知自己患病后是如何调适的?我希望结合定性与定量两种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先进行问卷调查,再访谈大约 30 个女性样本,包括非洲裔美国人和女性同性恋者、年长的和年青的女性、白领女性和蓝领女性。这样,我就可以归纳出……"

"那你为何对这个课题产生兴趣呢?"我打断她。

"嗯,是这样的",她说(眼睛怪怪地看着我,动作也慢了许多):"我本人就是

一名乳腺癌患者。"然后继续恢复她那惯用的慷慨激昂的声调,"但我不会因之影响我的研究的,不信你走着瞧吧。"

"怎么会不受影响呢?"我说,她立刻变得垂头丧气,像是被打败了一样,我见状赶紧加了一句:"除非你……"

"您这是什么意思?"她问道(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我),"我认为我可以做到把我的个人经历和研究分开。假如我想得到有效力的研究结论,我就不能过多关注自己也是一名乳腺癌患者的事实,对吗?"

"姑且放一放这个问题",我接着说,同时把椅子移到离她更近一些的地方。"你愿意先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吗?它会使我更清楚你的学术兴趣是什么,你不介意讲讲你的经历吧?"

"当然不介意,但我想大学里不会有人对我的个人经历感兴趣。"她深呼吸了一下,开始慢慢讲述自己的故事——7年前发现肿块,然后切除乳房,再化疗。她说:"这对我的家庭来说是个巨大冲击,特别是影响了我和女儿的关系,嗯,怎么说呢……"她的声音越来越沉重。

"那就谈谈它是如何影响你和女儿的关系的?"我平静地问到。

"自那以后,我女儿开始担忧自己也得癌症。你知道,我们有血缘关系,并且我们很难开诚布公地谈论该病的危险性,也不能交流思想感情。"

她继续谈着她女儿。过了一会儿,我问道:"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我甚至可以写本书来谈这些",她朝我点点头,继续说:"你知道,我是一名心理治疗师,我能处理得很好。但毕竟感觉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我不是指我失去了一个乳房。对我来说,那是一件好事,它们一直太大了,当我重新整形时,我把另一个也做了缩乳手术。我的意思是说除了工作时间以外,我的生活改变得太大了……"

她以一种充满活力的姿态讲述自己的故事,给人一种很超脱坚强的感觉,我则继续问着问题。她的故事引起了我的遐思:如果我的乳房被切掉了,我的感觉会是什么呢?她一边说,我一边瞥了一眼她那扁平的胸部,下意识地摸了摸我的胸部。我不能想象乳房不在那里的感觉。我感觉到不完整吗?失去性感吗?她是真的认为这是件好事,还是自我解嘲呢?

"……我的头发",她的话把我从遐思中拉了回来。"看看我的头发,它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了,我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兴高采烈地去美容店做头发了。"她现在长着稀疏的、一英寸长的褐灰色短发,当她偶尔用手梳理头发时,头发却基本不随手指而动。我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摸着我那齐肩长的光滑如缎的褐色美发——没有它们我就好像没穿衣服一样。我甚至忍住痒而不把贴在脸边的头发拨到脑后去。我在寻思为什么她将头发剪得这么短,好像在提醒人们注意她得了癌症一样。但那帽子和围巾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她是想用它们来遮掩一下吗?我不停地在胡思乱想。

我和塞尔维亚年龄差不多。这一切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吗?不,不可能,我每年都拍乳腺X光照片。

"……我在发现肿块前几个月才拍过乳腺 X 光照片",她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但我每个月都做乳房自我检查,我在和脑子里的另一个想法抗争。

"我每个月都做乳房自我检查,但还是发生了",她继续说,动摇了我那自知虚假的自我安慰。我专心地听着,意识到塞尔维亚会让我懂得很多东西。

"还有,我很关注其他女性的经历",她迟疑了一下,补充道:"我想知道她们和我比怎么样。你明白我以前从不关心别人的个人隐私的。"

我点点头。现在我能做些什么呢?我并不试图让一个学生脱离所谓科学范式,也不愿意加入一个科学取向的委员会。并且我也毫无兴趣卷人那种按照所谓简洁、范畴化的准则而将研究过程切割成一个个小方块的病态做法。但塞尔维亚本人就是名心理治疗师,她对于自己遭遇的感觉是唾手可得的。也许她的研究会揭示出乳腺癌患者的感觉变化过程,这些对其他女性也是有益的。尽管塞尔维亚的话语显得很镇静,但她脸上的悲伤却使我认识到这是一个做研究的好机会。并且我也知道这种研究经历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我该如何介人呢?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我问道。

"我知道您研究疾病,定性研究。我们系没人搞定性研究。但我修读过定性研究方法课程,我认为我能让我的答辩委员会接受在我的论文中采用扎根理论来做研究。"

"我几乎不用扎根理论,我的绝大多数研究用的是自我的民族志方法。"我说。

"那是一种什么方法?"她问,一边看着我,一边在笔记本上记下该词。

"我从自己的个人生活开始,关注自己的情感、思绪和情绪。我采用那种我称之为'系统的社会学内省'和'情感召唤'的方法来试图理解自己的生命历程。然后,我把它写成一个故事。通过探究一种特别的生活,我希望理解一种生活方式,就像雷德·德纳海(Reed-Danahay)所说的那样。"

"谁?"她停下笔,问道。

"雷德·德纳海,一个人类学家,他写过一本关于自我的民族志的书。"

"我在哪儿能复印到那本书?"

"别为这事担心,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读些自我的民族志方面的书籍。我要你首先感受一下自我的民族志。"(不顾塞尔维亚疑惑的目光,我在文件柜中翻弄起来)。

"如果我没领会错的话,就是通过自己的生命历程来概括归纳一个较大群体或文化的特征",塞尔维亚在我背后说道。

"对,但还不全面。还有一个目的是进人并记录下那种情境,那种生命历程中真实的细节。这也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方式。"

"嗯,只是记下你的生活经历就可以了?听起来很容易做到",塞尔维亚说道。

我转过身来,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好像想从中发现什么信号似的——那种使我决定是否将塞尔维亚纳入我的自我的民族志研究的信号。当确信没有信号发出后,我说:"哦,其实并不那么容易。绝大部分人可能都做不好,甚至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达不到要求。或者说,他们对自己的情感、动机或生活中的矛盾性缺乏足够的内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人对其周围的世界缺乏足够的观察敏锐。而强调自问、内省的自我的民族志的要求则高得多,就像你自己所面对的事情并不都是讨人喜欢的那样。相信我,真实的自我的民族志研究会引起许多恐惧、疑惑和情感上的悲伤。就在你认为不能再忍受这些痛楚与悲伤时,真正的研究才刚刚开始。然后,它会显示出你自己的某些脆弱之处,你没有权力故意删去这些内容,也不可能左右读者的理解。你会很容易感觉到你的生活与工作正在被批判,它使你的自尊心受到打击。还有伦理困境。"我提醒道,"当你写的故事涉及你的家人与所爱之人时,你就会感受到这一点。"

塞尔维亚坐在椅子里,眼睛瞪得大大的。我笑了笑,缓和了一下语气。"很抱歉,但我真是对这种研究方法情有独钟",我把语气更加放缓,"当然,也有回报,例如,你开始对你自己理解得更加深刻了,推己及人,你对别人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了。自我的民族志提供了一种途径,它可以使你为自己及这个世界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啊哈,找到了",我打断了自己的谈话,从文件夹中抽出两本订好的论文。"上面这本是《幸存者》(*Survivors*),一篇我写的关于我兄弟之死的文章。另一篇是巴特勒和罗森布卢姆(Butler & Rosenblum)合写的《关于癌症的两种声音》(*Cancer in Two Voices*)中的一章,这是一篇合作的个体叙事,关于一个患乳腺癌的妇女和照顾她的同性恋伙伴的叙事。"

"合作?"

"让我们谈谈后一篇文章吧。现在就来看看你对这些故事的反应吧。我想你读完文章后,就会理解我所讲的话的含义了。如果届时你还有兴趣的话,告诉我一声,我会寄给你更多的资料。"

"还有个事儿",我指着桌子上的材料说:"我经常外出开会,你必须阅读我的课堂阅读材料:'病患的叙事'和'沟通情感'。还有,我想你去见见亚瑟·博克纳,我的合作伙伴,他讲授关于叙事的课程,顺便说一句,也是我丈夫。"塞尔维亚张开一直紧闭的嘴唇,笑了起来,当她听到我最后说:"如果我加入你的答辩委员会,这些是最基本的要求。"

"哦,我……,我不知是否有时间",塞尔维亚说道:"我还有两门课'实验与测量'和'高级实验研究设计'。我希望在今年秋季学期完成学位课程,然后在接下来的春季学期早一点通过学位考试,明年九月份完成论文开题报告。"

我边耸耸肩,边站起来开门。我的详细描绘、那些警告,还有如此多的要求,任何一项都足以使她望而却步。当然,现在知难而退总比以后发生要好。我猜测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我很高兴很轻松地把她打发走了。塞尔维亚围好围巾,戴上帽子,把我给她的文章装进她的大包里,她对我说'再见',然后很快消

失在我的视野之中。

两天后,我到学校,发现了塞尔维亚给我的传真。上面写到——

亲爱的艾利丝教授:

这些是我曾经读到的最令人激动的文章之一。对于你忽然间失去了兄弟的悲痛,我有同感。你使我回忆起当自己发现得了癌症时的感觉。巴特勒和罗森布卢姆的也一样。我被唤起了那种骚乱、困惑和无意义的经历。这些作品彻底颠覆了我所学到的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切,但我非常喜欢并想了解得更多些。您能寄给我些材料以帮助我理清关于自我的民族志的起源与实践吗?或许一些文献综述就足够了。如果方便的话,能否再给我一些专著呢?

我笑了,随手抽出一些关于自我的民族志的文章来。Jago, Kiesinger, kolker, Ronai, Tillmann-Healy,这些人应该够了。当然还应包括我为邓津和林肯编的第2版 *Handbook* 所撰写的那一章。我开始读那一章的草稿,题目叫做"什么是自我的民族志"。

## 什么是自我的民族志

自我的民族志是一种自传体裁的写作和研究方法,它显示了意识的多层次性,把个体意识与文化意识联结起来。在自我的民族志学者眼中,他们首先要透过一个安装了民族志视角的广角镜,并把焦点落在外在于他们个体经历的那些社会与文化方面;然后,他们由外向内看,揭示出一个已经并将继续通过社会与文化折射出的脆弱的自我,与此同时又拒绝一种文化的解释(Deck, 1990; Neumann, 1996; Reed-Danahay, 1997)。随着镜头的调整——向前看和向后看,由内向外看和由外向内看,个体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变得模糊起来,有时超出了直觉的认知能力。自我的民族志通常用第一人称写法,其文本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如小故事、诗歌、小说、回忆录、随笔、日记、各种小品文、社会科学散文等。在这些文本中,真实的行动、对话、情感、细微之处、灵性和自我意识被仔细描绘。于是,这些文本就成了一个个被历史、社会结构和文化所影响的作为关系和制度的故事。当然,辩证地看,这些故事本身也是通过行动、感觉、思维和语言所展现的。

自我的民族志这个术语已经出现了最少有20年。尽管人类学家卡尔·海德(Karl Heider)在1975年已经指出"在 Dani 的作品中,他亲自记录下来人们的所作所为,这种体裁可以视为一种自我的民族志",但大卫·哈亚诺(Hayano,1979)通常被认为是该术语的发明者。那些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们通常认为人类学家是他们"自己人"。的确,人类学家将自己完全融入被研究者群体,他们与被研究者异常熟悉,简直就是"一家人",哈亚诺(Hayano)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该术语限制在文化研究层面上使用(p. 100)。

就像社会科学家所使用的许多术语一样,自我的民族志这个术语的涵义和具体应用也很难讲得清楚,你很难精确定义和明确它的操作步骤。或许较好的方式是在一个较宽泛的范围内指出与自我的民族志类似的一系列术语,比如:个体叙事(Pesonal Narratives Groups,1989)、自我的叙事(Richardson,1994b)、个体经历叙事(Denzin,1989)、自我的故事(Denzin,1989)、第一人称记录(Ellis,1998a)、个人随笔(Krieger,1991)、民族志的小故事(Ellis,1995d)、书面故事(Richardson,1997);还有比如:全成员研究(Adler & Adler,1987)、自动观察(Adler & Adler,1994)、机会主义的研究(Riemer,1977)、个体民族志(Crawford,1996)、文学启示(Van Maanen,1988)、生活经历(Van Maanen,1990)、批评性自传(Church,1995)、自身的民族志(Van Maanen,1995)、极端经验主义(Jackson,1989)、社会性自传(Zola,1982)、自我的病历(Hawkins,1993)、激发回忆的叙事(Bochner, Ellis & Tillmann-Healy,1997)、个体书写(DeVault,1997)、自反性民族志(Ellis & Bochner,1996a)、忏悔式叙事(Van Maanen,1988)、民族志式回忆录(Tedlock,1991)、民族志式传记(Lejeune,1989)、自我的生活史(Payne,1996)、合著式自传(Goldman,1993)、民族志式自传(Brandes,1982)、感情主义(Gubrium & Holstein,1997)、经验性文本(Denzin,1997)、叙事的民族志(Abulughod,1993)、自传体的民族志(Reed-Danahay,1997)、民族志诗学(Marcus & Fischer,1986)、原生的民族志(Ohnuki-Tierney,1984)、原发的民族志(Gonzalez & Krizek,1994)、民族风格的自传(Reed-Danahay,1997)。然而,社会科学家们经常把自我的民族志视为其他一些术语范畴的子类型,例如:印象主义记录(Van Maanen,1988)、叙事的民族志(Tedlock,1991)、阐释性传记(Denzin,1989)、新的或经验性民族志(Ellis & Bochner,1996b)、社会性诗学(Ellis & Bochner,1996a)、后现代民族志(Tyler,1986)。

上述这些自我的民族志作品采用了多种方法论策略,尽管这些方法论也被广泛应用于其他定性研究中。它们包括:系统的社会学内省(Ellis,1991b)、传记体方法(Denzin,1989)、个体经历方法(Clandinin & Connelly,1994)、女性主义方法(Reinharz,1992)、经验性分析(Reinharz,1979)、叙事探询法(Bochner,1994)、意识唤醒法(Hollway,1989)、联合叙事(Bochner & Ellis,1992)、互动式访谈(Ellis, Kiesinger & Tillmann-Healy,1997)。在一些学科内,自我的民族志已经发展出了一些地方性变体来。例如,在社会学中包括:个体的社会学(Higgins & Johnson,1988)、自传性的社会学(Friedman,1990)、社会学式的自传(Merton,1972/1988)、私人的社会学(Shostak,1996)、情感性社会学(Ellis,1991a);在人类学中,则包括:人类学的自传(Brandes,1982)、土生的人类学(Narayan,1993)、原发的人类学(Tedlock,1991)、自身的人类学(Strathern,1987)、自我意识的人类学(Cohen,1992)、自我的人类学(Kondo,1990)、家庭人类学(Jackson,1987)、人类学诗学(Brady,1991)、自我的人种学(Lejeune,1989);在传播学中包括:修辞的自我的民族

志(French,1998)、表演性自传(Miller & Taylor,1997)、自我的民族志式的表演(Park-Fuller,1998)。此外,大凡试图做有关个人与文化方面的研究,自我的民族志已经日益成为主要选择之一,这点很容易从有关书籍、论文、书内的某些章节、文章、学术期刊的选题以及某些系列图书的标题中看出来(参见:Clough,1997;Deck,1990;Ellis,1997/1998a;Ellis & Bochner,1996a;Gravel,1997;Herndon,1993;Lionner,1989;Pratt,1994;Reed-Danahay,1997;Trotter,1992)。

这些自我的民族志学者研究的重点并不一致,有的关注"过程"(graphy),有的侧重"文化(ethnos)",还有的专注于"自我(auto)"(Reed-Danahay,1997,p.2)。这些不同种类与范畴的自我的民族志落在一个三位一体的连续统的不同位置上。研究者们没有就每一范畴的边界达成一致意见,也不能为每种类型的自我的民族志精确地下定义。事实上,很多作者即使在同一篇文章中的关注点也在不断前后游移。认清这一点后,我认为本文作为探索性的介绍文献多涉及一些和自我的民族志类似的表达内容是非常有必要的。

自反性民族志主要聚焦于一种文化或亚文化模式,但作者们却根据在该文化中的个人经历与体验自反性地修正自我,并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中(对该文化本质)看得更加深入。在土生土长的原发民族志中,研究者们本身就是被研究文化中的内部人,这种文化却被他者所忽视或疑惑不解,于是他们亲自来书写并"翻译"自己的文化给他者看。在全成员研究者们的文本中,研究者们研究那些他们已经彻底成为其中一员的群体,或者研究那些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已经完全接受并认同其文化的群体。在个体叙事中,社会科学家们同时在学术的普遍性与个人的情感倾向性上两线作战,他们讲述的是一个饱含日常生活中的个人体验的自传体故事。在文学式自我的民族志中,一个著者首先是作为一个自传的作者而不是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而出场的,并且其文本关注于自传中的自我的程度并不亚于关注将该种文化翻译给异文化的阅听人(Deck,1990)。

在自反性民族志中,研究者们的个人经历的最重要之处在于它如何阐释被研究的文化。自反性民族志沿着一个连续统分布:从个人的经历开始研究进程,再把个人经历中涉及的其他当事人加进来,然后解剖该故事,在剖析过程中,研究者做研究的体验成为剖析的焦点。

在把自反性民族志同自传式写法结合起来的过程中,女性主义为这种做法的合法性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例如:Behar,1996;Behar & Gordon,1995;Krieger,1991/1996;Personal Narratives Group,1989;Richardson,1997)。许多女性主义学者已经提倡做研究应该从个人的经历开始(如 Smith,1979)。这就是说,研究者们或多或少都会将他们的个人经历和观点纳入其研究之中:先是讲述一个和他们自己相关的故事,再阐释个人经历与研究计划的关联性;或在研究过程中遇到困难时运用个人知识来克服这些困难

(Jones,1998;Linden,1992;另外,关于自反性研究的综述,可参见 Reinharz,1992,pp. 258-263)。

杰克逊(Jackson,1989)使用彻底的经验主义这个术语来指称如下过程:民族志学者的个人经历体验以及与其他当事人的互动成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从理论上说,自反性民族志学者有意使用他们所有的感觉、身体、行动与情感,也就是说,他们试图用全部"自我"去了解他者(Cohen,1992;Jackson,1989;Okely,1992;Turner & Bruner,1986)。这其中,特别容易引起争论的是有关性别角色观念的差异(Kulick & Willson,1995;Lewin & Leap,1996)。

在一篇总结自反性民族志及其发展历程的文章中,泰德洛克(Tedlock,1991)区分了民族志式回忆录(也就是范·曼尼恩所谓的"忏悔式叙事",1988)和叙事的民族志。在民族志式回忆录中,民族志的作者是整个故事的焦点,它讲述了作者在过去做研究的过程中发生的有关其本人的故事。而叙事的民族志则将该民族志作者的个人经历、体验注入到民族志的深描和有关他者的分析中去,其重点在于强调叙事者和被研究群体成员之间的"民族志的对话或冲突"(p. 78)。从历史角度看,民族志式回忆录始于马林诺夫斯基保存下来的个人日记(1967)。在这之后,许多民族志学者追随马林诺夫斯基根据他们当时的研究记录写了一些有关他们自己的研究的"忏悔式叙事"(如:Dumont,1976,1978;Rabinow,1975,1977)。这些著作中的一些是用笔名写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失去学术可信性(如,Bowen,1954)。泰德洛克(Tedlock,1991)指出,这类自反性著作发展到 1970 年代发生了侧重点上的转移:从"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到"参与的观察(observation of participation)",再到强调"书写过程"。这种转变是与伴随着代表性危机的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密切相关的,其结果是民族志作者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下层阶级民众、少数民族和种族团体以及第三和第四世界的学者(Bochner & Ellis,1999)。

这种成员构成变化的原因也和权力和实践的关系有关,你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非主流民族志作者开始以他们本民族为研究对象。例如,原生的民族志通常由来自第三和第四世界的研究者们来完成,他们曾经或正在体验着一段殖民地的或经济边陲的历史,这一切都成为他们著作关注的主题。作为跨文化的研究者,他们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现在他们已经建构起了自己的文化故事(同样聚焦于他们自己的自传体故事。参见:Kinkaid,1988;Rodriguez,1983),他们对先前那些对他们的误读提出强烈质疑,并且利用自己的双重身份地位对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差异重新进行了诠释(参见:Motzafi-Haller,1997;Trinh,1989;更详细的讨论参见:Neumann,1996;Reed-Danahay,1997;Tedlock,1991)。

全成员研究者作为一个概念术语是由阿德勒(Aldler)于 1987 年提出的,用来指称那些全身心地沉浸于他们所研究的群体的研究者们。在研究

过程中,虔诚的“皈依者”与其研究群体完全融为一体,甚至已经成为“被研究的现象”(Mehan & Wood,1975)。例如,朱丽丝—洛塞特(Jules-Rosette,1975)接受洗礼成为她所研究的非洲十二使徒教派的一名真诚的信徒。“机会主义”的研究者(Riemer,1977),有时被人类学称之为“原发的研究者”(indigenous researcher,参见Tedlock,1991)研究那些他或她已经成为其中一员的群体[例如哈亚诺(Hayano)1982年做的玩纸牌群体研究或克莱格(Krieger)1983年做的女同性恋群体研究]。

全成员研究强调研究过程和被研究群体。与此相反,社会科学家们最近开始将他们自己视为“现象”,并开始书写那些能够激发回忆的个体叙事,特别是那些学术和个人生活方面的叙事。他们的首要目的是理解自我或生活在一种文化语境中的生命的某个方面。在个体叙事文本中,作者变成“我”,读者变为“你”,主题变为“我们”。那些其余的参与者被鼓励加入到与著者/研究者的互动中去,他们被视为“共同的研究者”,与正式的研究者分享权威,并用自己的声音来书写自己的生活。而读者们也会被邀请在著者的世界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他们会被那些详细描绘的事件激发出某种感悟,这些感悟会刺激他们更好地思考、理解和应对自己的生活。总之,其目的有二:一是书写一些充满象征意义和令人回味无穷的话题,这些话题既包括感觉和情绪上的本质体验,但相互之间又有所差异(Shelton,1995);二是书写过程要坚持体现一种关心和照顾的伦理道德观(Denzin,1997;Noddings,1984;Richardson,1997)。

文学和文化批评领域通常是使用自我的民族志这个术语的社会科学家们的大本营,他们利用自传这种写作体裁来自觉的探求内省与身体力行地进行文化描绘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文化描绘是通过语言、历史和民族志式的阐释来达成的(Deck,1990;Lionnet,1989;Pratt,1994)。例如,莱恩耐特(Lionnet,1989)和戴克(Deck,1990)都曾经注意并探究过赫斯顿的作为自我的民族志的回忆录(Hurston,1942/1991)。在赫斯顿那里,传统的历史框架和回忆录中那些对著者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和事件都被最小化了,而那些鲜活的人生经历、著者的人性观以及那些力图展现给局外阅听人的民族文化则得到了最大化的处理。这就像赫斯顿(Hurston,1942/1991)在阐释那些她在自己的研究中收集到的民歌时指出的:“歌词并不重要,曲调却是独一无二的东西。”(p.144)戴克比较了文学意义上的自我的民族志和自反性的田野工作记录,例如肖斯塔克(Shostak,1981)的“一个Kung族妇女的生活和话语”和克拉潘泽诺(Crapazano,1980)的“一个摩洛哥人的肖像”,在这两篇作品里,著者都扎根于他们的田野经历,都力图向其他社会科学家们证明他们讲述的故事中的人物、事件的真实合法性,在开篇介绍和结语中都保持了自传的写作要素,都聚焦于个人在田野工作经历中得到的启示而不是他们的个人经历本身。

社会科学家们还写作文学的和诗学的民族志。例如,罗斯(Rose,1991)

区分了他自己的个体性诗学和其他人类学家,比如斯坦利·戴蒙德(Diamond,1982)的诗学,罗斯的诗学与其作为人类学没有什么联系,而后一种诗学则聚焦于作为观察者的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式体验。许多人类学家,比如像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和鲁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已经在主流人类学期刊上发表了很多写实性的民族志文章,并也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个体性诗学(Bruner,1993)。目前,《人类学与人文主义》(*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已经刊登人类学家写的小说和诗歌作品了。在社会学中,劳拉·理查德森(Laurel Richardson)则在文学(1995)和社会科学(1996)专业期刊上发表随笔和民族志色彩的诗歌(1994a)。

自我的民族志、原生的民族志、自身的民族志、回忆录、自传,甚至小说,这些体裁的边界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在许多案例中,一部社会科学作品被称为自我的民族志还是民族志取决于作者的声称。一部作品被认为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自我的民族志还是自传,这取决于:写作实践——社会科学意义上的自我的民族志通常包括一些学术化的"引文",并使用一种学术化的学科术语;出版实践——是谁出版该书、它是如何被推广的(比如封面上是否标明该书属于哪个学科)、它被归入哪一类(ISBN 书号)、目标阅听人又是谁;评论实践——谁写序和跋、谁在写书评、作者是何许人士。文学批评将一些自传当做是自我的民族志而不是其他什么别的东西;赫斯顿视她自己为一个小品文作家、一个人类学家、一个小说家(Lionnet,1989),她就是一个多重角色重叠的绝佳例子。主流社会科学倾向于把自我的民族志(例如,Ellis,1995b)和学术生涯中的生活史(例如,Berger,1990;Goetting & Fenstermaker,1995;Riley,1988)分别列入回忆录或自传体裁(Zussman,1996)。或许在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自我的民族志这个术语仅仅意味着一种较大的包容性:为了达到民族志的多重目标和更好地理解语言与概念的欺骗性和不确定性。

我冲着这篇文章的草稿笑了笑,然后复印了一份寄给塞尔维亚,并努力去想象她会做何反应。

一周后,塞尔维亚又一次出现在我的门口。"嗯,我已经读了所有你寄给我的材料。那些个人的叙事强烈感动了我。您的关于自我的民族志的内容是非常有趣的,但是难以掌握。我深信它在未来会对我有用的",她反复对我保证,接着继续飞快地说道,"但目前我很困惑"。

"对不起,我只有 5 分钟时间",我说,"我要去系里参加一个研讨会。"

"哦,很抱歉。那我换个时间再来吧。"塞尔维亚边说边向门外走。

"等一等,什么使你困惑呢?"我问道。

"嗯,我的方法课教我必须避免将个人偏见带到观察中去,研究的目的就是寻找普遍知识和理论。但您给我的文章却强调具体而真实的表达重于抽象提炼概念和理论。假如我做一项自我的民族志研究,那么客观性置于何处呢?我对此感到困惑不解。为什么还有人对此感兴趣呢?我该如何证明我所说的那些个

人经历是真实的呢？自我的民族志其实并非真正的社会科学，对吗？”

“你的运气真好，跟我来吧”，我说，摘下钥匙往楼下走，“我想你该去听一个人的讲座。”

我们走进一个拥挤的屋子，一场讨论会就要在此进行了。“那是亚瑟，我的学术合作者，就是那个很帅的坐在桌子旁的那个人”，我对塞尔维亚耳语，并找了椅子坐在后面。

“很高兴大家能来参加我们的跨学科系列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是关于社会科学中的阐释学研究的”，吉姆·斯皮罗(Jim Spiro)说道，他是我们系的同事，也是这次研讨会的主持者。“今天主讲人是亚瑟·博克纳，他为博士生开一门叫做‘叙事研究’的研讨课程。”

“我们每周都有这样的研讨会”，我对塞尔维亚耳语道，“都是非正式的活动。”

“亚瑟将讲 15 分钟，然后是听众提问”，吉姆宣布道。“今天亚瑟的内容是被一些学者称之为‘人文科学的叙事转向’的东西，特别是有关个体叙事方面。他的演讲题目是‘为什么个体叙事是重要的’。现在开始，有请亚瑟。”

亚瑟站起来，伸手挠了挠头发，然后开讲起来。

## 为什么个体叙事是重要的

很荣幸今天有机会在这里介绍我非常热衷的一个题目。在座诸位中有很多人知道我的教育背景使我成为一名传统的经验主义者，在我学术生涯的第一个十年中，绝大部分时间是继续从事我研究生时的专业领域。到了1970 年代后期，我开始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比如那些政治的、哲学的、伦理的和意识形态的等感到疑惑(Bochner,1981)。我供职于传播学系，专业领域是人际沟通研究，它的一个前提假设是认为沟通能够作为一个纯客观事物被经验性的加以研究。但实际上人际沟通本身并不是纯客观的，这门学科也不是一门只研究客观事物的学科。沟通是一个持续不断地互动过程，其研究也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且，作为研究人际沟通的“沟通人”，我们本身就是在“人际沟通中”来研究沟通。这种人际沟通所具有的自反性提示我们不应该将自己的研究动辄冠之以“科学的名义”。相反，我们应该在研究及研究结果中充分考虑到这种自反性。

就像其他许多同样严重关注这些问题的社会科学家们一样，那些后结构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们的批判动摇了我曾经深信不疑的关于社会研究方法的正统共识。这些批判认为社会科学文本需要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以及作者与读者之间建构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关系，因此我转向了一种作为探询模式的叙事。我想得到一种更加个性化的、合作的、互动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被视为一个关注个体经验如何被赋予意义的

人,一个生活在充满变动和不确定性的世界里面临着道德与伦理抉择的人。我也希望能够理解那些习俗、惯例,它们能够强制性地决定我们能够讲述哪些故事和如何讲述这些故事。我还希望揭示出人们究竟是如何反抗各种形式的社会控制的,这些社会控制排斥或压制那些看起来是离经叛道或超出允许范围的叙事和故事。这种通过我称之为叙事研究手段书写的文本将讲述故事——这些故事将要展现事实的真相,揭示复杂性的本质,屏蔽混乱、断裂、斑驳、省略、支离破碎的干扰,并力图保存生命和谐的统一与连续性过程,尽管有时有些不期而至的对于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质疑。

我将这些关于个人的故事称之为"激发回忆的叙事(evocative narrative)"(Bochner, Ellis, & Tillmann-Healy, 1997, 1998)。"激发回忆"这个词意指作品的目的是表达性的和讨论的,这和传统的社会科学主流思想强调代表性形成鲜明对比。一部"激发回忆的叙事"式作品的作者通常以第一人称写作,并将她自己作为研究对象,于是传统的研究者同研究对象之间的分离就被打破了(Jackson,1989);这些故事通常只写一个个案,这就改变了研究的传统路径,即从通过多个案例来归纳出普遍结论转变为在一个案例内得出普遍结论(Geertz,1973);讲故事的方式类似于小说或自传,于是原本界限分明的社会科学与文学变得日益模糊了;叙事文本的通俗性与可读性彻底转换了读者的角色,使他们从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变为共同参与者;在叙事文本中,私人生活中的那些被隐藏的细节得到了充分展现,焦点集中于情感历程,这挑战了那种认为社会表演中的角色都是理性的观念;叙事的文本拒绝那种试图进行摘要和解释的冲动,重视过程甚于得出结论,这使人们从认为科学的目的就是控制和驾驭的幻觉中清醒起来;另外,在这类文本中人际关系实际上是没有固定模式的,它们拒绝认为现实的社会生活和其中的人际关系就像快照拍下来的标准相那样呆板僵化。这些能够激发回忆的故事开启了主观性的理解,但却反对情绪化的回应。它们渴望原汁原味,而不是被解析;渴望被告诉和复述,而不是理论化和条理化;渴望为进一步讨论提供素材,而不是提出确定性的结论;渴望丰富多彩的细节性描绘,而不是对有关事实干巴巴的摘要性描写。

和这种"激发回忆的叙事"类似的是"个性化写作",它最近的出现频率呈激增态势,你可以轻易地在主流出版社、新锐派杂志、有创意的非小说类文学作品,以及各种体裁的文学回忆录、自传和带有自我的"病情记录"性质的作品中发现它们(Buford, 1996; Harrington, 1997; Hawkins, 1993; Parini, 1998;"True Confessions,"1996)。所有这些以生活为书写对象的写作体裁(Tierney,1998;亦可参见本书第20章)看上去似乎都朝着更加私密化、更加个性化和更加充满自我意识的方向转向。我认为在社会科学中出现的这种越来越多的个性化和去匿名化的书写趋势是和文学作品与报刊杂志中出现的相同倾向同步发生的(Denzin,1997; Neumann,1996)。无论原因是什么,有大量证据表明这种兴趣在急速增长,我就发现在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领

域内都可以轻松地找到各种体裁的个体叙事和自我的民族志作品。我记忆之中近年来的例子包括如下:《当代民族志杂志》(*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Ellis & Bochner, 1996b)和《定性社会学》(*Qualitative Sociology*, Glassner, 1997; Hertz, 1996);由 AltaMira 出版社出版的"民族志选读系列(*The book series ethnography alternatives*)";由人类学家(Benson, 1993; Brady, 1991; Okely & Callaway, 1992)、社会学家(Ellis & Flaherty, 1992; Hertz, 1997)和教育学家(Tierney & Lincoln, 1997)选编的一些读本;还有许多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文章和专题论文,这些期刊包括:《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人类学与人文主义季刊》(*Anthropology and Hamanism Quarterly*)、《女性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个人和人际缺失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Loss*)、《定性研究》(*Qualitative Inquiry*)、《社会学季刊》(*Sociological Quarterly*)、《象征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文本和表演季刊》(*Text and Performance Quarterly*)、《西部传播学杂志》(*Wester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和《妇女研究国际论坛》(*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为了更好地说明,请允许我简单地举三个已经发表的有关"激发回忆的叙事"的例子。每个例子都关注沟通实践,通过这种方式,作者的个性自然而然地得以展开、呈现与发挥作用(Bruner, 1990)。更重要的是,作者们显示了某些隐喻和意义是如何被"叙述"进他们的生活的。穆凯亚(Mukaia, 1989)描绘了自己的一段患厌食症的亲身经历,展现了食物和饥饿是如何深刻影响她的个性的;罗奈(Ronai, 1992)讲述了一个双面故事,表达了她痛苦的双重人格,因为她假扮一名艳舞表演者进行她的社会科学研究,她必须在双重自我中穿梭;艾利丝(Ellis, 1993)则展现了当她得知弟弟在一场意外的空难中丧生后,她作为学者和家庭成员的冲突的人格面貌,以及她是如何超越由于震惊和极度悲伤而导致的情感迷茫的。每个例子都是用第一人称叙述的,都被写成一个故事,都描绘了作者个人经历中的鲜活细节。"研究文本"是故事体,完全(但欢迎你加入)是自己的故事,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学术术语和深奥的理论。作者们将故事置于分析之上,允许并鼓励竞争性理解和多重解释。她们力图使读者感到故事的真实性,并成为共同参与者,从道德、情感、审美和理性等方面多维度地解读故事(Richardson, 1994b)。

我常常被问的一个问题是,"这些故事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的真实性?"通常这种提问的腔调表达的是一种怀疑、质疑,甚至是敌意。一些批评(如:Mink, 1969—1970; Shotter, 1987)认为这些故事赋予生活一种本不存在的结构,因此故事虚构了生活。既然作为叙事的基础的那些生活经历是模糊不清的和不确定的,那些故事就不可能是明确和完整的(如:Shotter, 1987)。通过记忆的失真和语言的中介,叙事所讲述的总是一个源自过去但又不完全是过去的故事。

第二种批评是认为个体叙事反映的或追求的是一个"自我的浪漫建构"

(Atkinson,1997),它不值得成为社会科学的一分子。假如你是"一个故事讲述者而不是一个故事分析者",阿特金森争辩道(Atkinson,1997,p. 335),结果是你的目标就变为诊疗而不是解析了。阿特金森相信所谓叙事文本只不过是自我发现或自我创造的代名词而已,更确切地说,当某个叙事者平静有序的生活忽然被疾病、暴力或意外事故打破时,他/她在书写自己的故事时难免不受影响,因此这种叙事文本不可能是一种学术化的文本。这里的潜台词是说,假如你不用社会学的、文化的或其他的分析框架来进行叙事,而只是将故事作为"社会事实"来看待的话,那你根本就不是在进行社会科学研究。阿特金森(Atkinson,1997)强烈反对一些学者认为"叙事表演享有某种意义上的特权"的看法,他欲图重返(并特权化)传统社会科学的主流标准版本,拒绝或边缘化任何不符合传统主流观点的作品,拿他的话说就是,"叙事必须用来进行严肃的社会分析"(pp. 338-339)。

让我简单评析一下上述批评性意见吧。首先,这里有一个叙事真实性的问题。一个以故事形式展现的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叙事的真实性追求过去的鲜活再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故事其实是不完整的、不明晰的和变形的,因为过去的意义和重要性是与我们目前的生活境遇息息相关的,我们是站在现在来书写过去的故事。这难道不意味着我们讲述的故事总是徘徊在曲解过去的边缘吗?是的,没错。毕竟故事经过了重新编排、复述、编造、省略和修订。它们在很多方面可能是错误的——语气、细节、内容等等。那么讲故事的这些特点会威胁到个体叙事的目标吗?这倒不一定,因为讲故事的目的并不在于真实"复制"个人生活,它并不试图再现已被建构起来的意义。仅仅在那些需要精确地复制记忆的政治性回忆录那里,这种批评才有用武之地(Hacking,1995)。

叙事的真实性并不能同前叙事经历的意义做简单类比。完全可能同时存在几个对过去的事件不同的叙事解释,但是不存在一个客观标准来衡量哪一个叙事不符合事件本身的意义,因为作者的前叙事经历的意义已经被揉进叙事表达中了。生活与叙事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生活既参与叙事,又从叙事中汲取存在的意义。叙事既是讲述生活的,又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将本次讲演命名为"为什么个体叙事是重要的"是为了强调我们生活在一种张力之中,一种过去的回忆和将来的期望之间的紧张。个体叙事是作者对人类困境的一种回应,希望挖掘和保存我们生命中一些永恒的东西。我们的个性似乎取决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沟通过去的记忆与未来的期待,以达到斯蒂芬·克莱特(Crites,1971)所说的"超越时间达到经历的连续统"。我们作为叙事者所面临的挑战在于能否在叙事中达到一种连续性,使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成一体。"过去的回忆和未来的期望都对现在产生影响",克莱特(Crites,1971)说,"它们在现在之处交汇,使现在无时无刻都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之中,并随时修改着现在的性质"(p. 302)。自我叙事

作品的目的就是“生产”出这种连续性的感觉:通过重新讲述个人生命历程中的某些事件,以便使有时显得陷入分崩离析状态的生活重新连成一体。因此叙事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大卫·卡尔(Carr,1986)指出的那样,“无论我们是否有意去追寻,一致性对我们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p.97)。我们试图通过叙事来达致关于自我的一致感,这种追求自我的完整性和可理解性其实是个冒险,但我们却不得不依赖这些故事将出生、成长和死亡联结起来,这种依赖看起来是那么的柔弱和难免犯错误(MacIntyre,1981)。最后要指出的是,自我与生活故事是无法分离的,生活故事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建构的,不能将其分为从过去继承了什么、正在实践着什么,以及未来期待着什么(Freeman,1993,1998;Kerby,1991)。

因此问题不应该是“我的故事能精确反映我的过去吗?”,就好像正拿着一面镜子来照自己的过去那样。相反,应该问的问题是:“我的故事会带来什么结果? 它会将我形塑成哪一种人? 它能给我的生活带来哪些新的可能性?”重要的问题是叙事做了些什么,它们的后果是什么,它们能被用于什么方面。这些都是应该在书写故事之前,而不是之后,才思考的问题,因为对它们的回答是受具体的书写行为影响的。“我们生活的故事成为我们生活本身”,阿德瑞纳·里奇(Rich,1978,p.34)写道。如此,个体叙事成了本人的一部分,既存的抗争与奋斗推动着生命前行。通过自我创造的叙事活动,我们试图将自身同所讲述的故事合二为一。阿奈斯·涅(Anais Nie)强调了自我创造的叙事的意图,她说,“我不能生活在任何一个被指定的世界里……我相信一个人书写自己的故事是因为他必须创造出一个他在其中生存的世界”(转引自:Oakley,1984)。

我无法容忍那些轻视或减损故事的诊疗作用的作者们。他们倾向于对诊疗和社会研究做出明确区分,并暗示叙事仅仅在发展社会学、人类学或心理学理论时才有一定作用。这些批评认为叙事威胁到了整个科学的合法性。他们愤怒的回应,竭力宣传传统观点,其经典说法是:“如果你坚持己见,你就将被抛弃出科学共同体。”最重要的事情是保持机敏、智慧和分析,这就是学术的全部涵义。他们反对平等对待诊疗的观念,认为诊疗显得模糊不清、情绪化以及太通俗化了。就这样,他们成了女性主义批评家简·汤普金斯(Tompkins,1989)所说的那种“情感的败类”,这些所谓的学术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一场“反对感情,反对女性,反对自我意识”的永不停息的战争(p.138)。

对于作者以及那些很投入地沉浸在文本中的读者而言,他们若想很好地理解一篇执行着自我发现或自我创造功能的文本,就应该力避对文本的社会探询功能做狭义的理解,他们必须带着道德感全身心地投入到文本中去。为什么对文本的同步耕犁与移情神会和对文本的控制与解析相比总是处于从属地位? 为什么只有当文本超越纯个人领域时才被承认是学术呢? 我们需要对一些传统的前提假设提出质疑,这些前提假设是统治着社会科

学研究的元规则,比如:论证而不是感情用事、理论而不是故事、抽象而不是具体描述事件、复杂的术语而不是通俗易懂的语言。为什么我们要为自己的作品是诊疗性的或充满个人的价值观而感到羞愧呢?还有,我们的个人故事难道不是一直被嵌入我们的研究论文中去吗?问题在于我们是愿意将我们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地方和主观性公开呈现在文本中呢?还是把它们隐藏在"社会分析"背后?

有时我自己在想:亚瑟,在填平社会科学究竟是强调有代表性还是强调要能激发回忆之间的鸿沟方面,是否只有你才能做得更好一些呢?为什么很少有人能领悟到个体叙事既是道德行动又是伦理实践呢?当叙事者是一个研究者时,她必须随时随地地问自己什么是对的?对在何处?在最极端的意义上,那些希望"在应该叙事的地方叙事"的人(Atkinson,1997,p.343)认为每个叙事存在并仅仅存在于一个最正确的地方。他们力图保存那些已经逝去的事物(Gergen,1994;Schwandt,1996)。他们认为假如这些个性化的声音被扼杀的话,人们也许就会重返到常规的社会科学中去,这就意味着拒绝生命经历中的那些偶发事件,回复到传统信念中权威的至上性,逃离道德选择和情感窘境,鼓励事在人为而不是各安天命,看重事实而不是意义,追求狂野而不是心灵的宁静。

"好了,就先讲到这儿吧。下面是交流提问时间",亚瑟说道。听众们坐在椅子上热切地交头接耳起来,然后几只手举了起来。"哦,比利,请!"亚瑟指着一位我认识的哲学教授说道。

"亚瑟,你提到你的叙事转向受后现代影响很大。可以讲得详细些吗?"

"我以前读过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他认为没有办法将头脑中所思和外部世界精确地区分开来。大约在同一时间,我被介绍读了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53)、海德格尔(Heidegger,1971)、伽达默尔(Gadamer,1989)和德里达(Derrida,1978)的作品,还有话语行动理论。所有这一切以十分不同,甚至是对立的方式论证了一个同样的观点——现在看起来是多么不可思议,即语言是一种中性、直白的沟通媒介。无论我们将语言用于自身还是世界,语言总是易变的、不确定的和非决定性的。然后我读了理查德·罗蒂的《哲学与自然之镜》(Rorty,1979),它对那些挑战我们关于真理与知识的那些最有价值的观念做了强有力的综合。阅读罗蒂的作品是令人激动的。我开始相信那些传统认识论的基础并非千真万确。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显示人们的知识与意识是无关的。所有的真相都是随着人类行为的具体描绘而变化。在事实与价值之间不存在一条鸿沟。如果你不能在观察中消除观察者的影响,那么就不存在任何所谓完全中立的理论或发现,它们其实都要受人们价值观的影响。研究者一直就是被卷入其研究产品中的。因此为何不观察观察者呢?应该将我们的观察焦点转到我们自身上来。为何写作不可以直接一些呢?应该从我们的亲身经历写起,采用叙事的、诗性的和激发回忆式的写作方法来写。是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不应该继续抱着社会科学应该朝着物理学靠拢而远离文学或诗歌的念头了。并且,我选择

社会科学是因为我相信社会科学能够找到一条使人们过着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和更加伦理的生活之路。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问题被笼罩在方法论的困难之下。现在,我又一次感到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那就是运用个体叙事,更多一些对话。"

一个我不认识的坐在后排的女人站了起来,大声说道,"我一直发现后现代主义者显得压抑和愤世嫉俗。他们似乎是在说你不可能弄懂任何事。所有的看起来都被解构了。"听众们一阵哄堂大笑,我注意到有很多人都在点头称是。

亚瑟回应道,"嗯,后现代主义不都是这样,也有一些有明确的观点。至少我是这样看的。在某些后现代主义者的作品中,特别是女性主义者和酷儿理论中,你可以发现一种对情感、直觉、个体经历、身体化以及灵性的重新解读。她们帮助我们超越艺术与科学的界限,使我们的关注点从统一与相似性转向多样化与差异性。我并不认为这些转向是不愉快或令人沮丧的。或许就像你一样,我承认这些变化有时有点令人不安,甚至使人痛苦,但奥妙就在这儿。我们失去了自己的纯真以及这些纯真所蕴涵的美好价值。我们应该变得更具包容性和更加谦和一些。有时我们已经为自己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个体经历,只知道躲藏在既存范式之中而懒于孜孜不倦地去发现而感到羞愧,而这些却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不需要逃离恐惧与焦虑,相反我们应该从中悟出些什么来。种族偏见,性别歧视,厌恶贫穷者、同性恋者和残疾人,这些念头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谁也绕不过去。我们或多或少都身陷其中,无一例外。因此重视地方性故事是非常重要的,它们会把我们带入我们所未知的经验性世界中去,会给我们展示人们真实的日常生活细节,这些人的生存状态已经被或根本就没有被想象过,会帮助我们减少对其的无知,会显示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是多么地不全面和情景化。或许你们中的一些人会对此感到沮丧,但我认为它具有启发意义,并且很可能是决定性的巨变。"

"我想你误解了她的意思",一个坐在前排的人忽然插话道。我知道他是我的一个专攻主流社会研究方法的同事。"阻力和政治性因素的考虑我们已经十分清楚了,但我们中的一些人还是不明白我们应该如何证明我们的精确性和代表性。"

亚瑟有些失望地叹了口气,继续说道,"我们可能必须接受相反的意见。我比你更关注代表性危机的问题。对我而言,需要对我们工作的目标做一番彻底变革——从记叙到沟通的变革。这就是叙事转向令人激动的地方。在我看来,人类的沟通实践——协商和通过行动来表达意义——应该成为我们如何讲述经验世界的楷模(Bochner & Waugh,1995)。然后,我们会感到必须'生产出'叙事的、激发回忆的、对话式的文本来展现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人类在一个充满困难、干扰、不确定性、歧路、顿悟与道德选择的世界里,是如何通过创造、协商和在他者的世界中表达意义来寻求出路的。"

"那么目的何在? 我还是不很清楚",该人继续问道。"你能说得详细些吗?"

"目的是鼓励同情,加强对话。更确切地说,如果我们理解了我们研究的全部目的是为了克服那些使交流变得困难的一切障碍,以达致更好的交流的话,那么我会感到很欣慰。我们书写的那些故事能够使我们与自己以及与读者进入同步对话状态。在与自己对话中,我们揭示着自己的脆弱、冲突、抉择与价值观,测量着自己的犹豫、情感的复杂和多重体验。我们的叙述竭力想表达应对上述局面的复杂性与困难之处,展现了我们通过理解自己的个体经历而带来的改变。我们对于自己的叙述通常是不讨喜欢的和不完美的,但却是人性化的和可信的。这样,文本就可以作为自我理解和伦理讨论的基础了。"

亚瑟继续说道:"在与读者的对话中,我们采用'讲故事'的手段来引导他们站在我们的角度换位思考。我们的对话集中在道德选择上,更多地关注应该如何生活而不是如何知道的问题,就像迈克尔·杰克逊观察到的那样(Jackson,1995)。这些故事的作用在于它们能够激发读者们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出发,带着问题来加入对话。叙事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读者:它能开阔读者们的视野,批判地反映他们自己的个体经历,使读者们移情般地进入自己没有体验过的别人的经验世界,并积极投身于不同的社会和道德的隐喻之间的对话中去。通过介入故事并内化,读者们成了共同演员,他们运用叙事文本所具有的激发回忆的力量来检视自身。"

亚瑟停了下来,喝了一口水。吉姆,会议组织者,转向亚瑟说道,"我本来希望你能和叙事研究的批评者展开对话讨论,但你却回避了我的这一主要目的。那么你将如何回应那些认为个体叙事只不过相当于纪实性电视节目而已的批评者呢?这些叙事难道不是一种信仰救赎和牺牲的文化精神之反映吗?它们难道不是一种旨在通过揭示精神与肉体上的双重痛苦来体验伤感、忏悔与享乐的作品吗?总之,个体叙事使我想起了'受难者的艺术',它们拍打着你的同情心,并操纵着你的情绪。"

"我以前就听说过这些诘难,吉姆。我的第一反应是思考它们的源头在哪里。在我看来,那都是些个人的看法罢了。因此,那只不过意味着批评者们同样也在讲述他们自己的生活而已。文本的意义从来就不是一目了然的。在读者的感觉与他们读的文本之间总是有联系的。因此我希望多了解读者一些,包括他的兴趣、愿望、价值观、前提预设,以及他拒绝什么,为什么要拒绝。"亚瑟说道。

"那么,吉姆,你在这幅图景中的哪个位置呢?"亚瑟故意逗着说,然后停下来,一边绅士般地笑着,一边听着听众们一阵哄堂大笑。吉姆疑惑不解地四处打量着,耸了耸肩。

"开个玩笑,吉姆",亚瑟继续说道。"我不是说你处在困境中,或许反而是我正处在困境中。但是,我认为一个批评者不应该绝对化地谴责某事,你必须看到每种观点的长处。我很难依靠某个普遍规则来回应。假如你采用一种被称为'疾病叙事(illness narratives)'的故事体裁,就像亚瑟·弗兰克(Frank,1995)曾经分析过的那样,我认为目标就应该是力求减少对疾病和残障的污名化与排斥。这类叙事的作者绝大部分本身就是病人和残疾人,他们拒绝按着传统的医学叙

事所认定的那样给疾病和残障套上牺牲品和边缘化的标签。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力图把自己描绘成生存者,并视自己为知识的源泉之一。很难想象会有人将布罗亚德(Broyard,1992)、麦尔丝(Mairs,1986,1990,1998)、洛德(Lorde,1980)的作品——类似的我还能举出一打名字来——作为受难者的自白书来阅读。他们不祈求怜悯,也不把自己描绘成一幅可怜的、无助的、被践踏的形象。相反,他们将叙事看做一种重获权力的源泉,一种反抗权威话语体系的形式。我认为考泽尔(Couser,1997)彻底撼动了既存的'受难者的艺术'的观点,她指出绝大多数叙事关注的是'复苏身体'和'去受难化'(p. 291)。这些叙事的作者以见证者的身份讲述身体机能失调者的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并通过这些证据强化、人性化了患病的体验与经历。噢,吉姆,你会选择什么?抹掉记忆?沉默?屈服?我想你会理解这里已经有一些政治色彩了。谁的故事被讲述?谁来讲述?为什么讲述?我知道你对叙事中暗含的文化和政治倾向感兴趣。难道你不认为这些叙事会帮助我们理解文化和政治究竟是如何来书写身体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吉姆说道,"但我依然担心窥视狂主义(voyeurism),这些关于个人的故事会过分纵容我们文化中的那些喜好隐私、偷窥的堕落的好奇心。我们如何才能评判这些故事的优点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知道它们是可信的和真实的?"

"我认为我们对任何作者或任何角色的评判标准是统一的。比如,作品是诚实的,还是不诚实的?作者评估了她本身、她的局限性、她的疑惑、她的矛盾情绪以及复合的情感吗?你是否感受到了一种情感上的可靠性呢?你是否察觉到了一种由情感顿悟向沟通理性的转变呢?——当然,不是本质上的转变,只是某种程度上从一个旧我转向一个新我(Rhett,1997)。故事能让你理解并意识到它试图表达的经历体会吗?要知道,文本中充满了复杂性、多样化、不确定性与期待。而有学者则将个人随笔类比为对自我做简单基本的研究,它旨在提炼出一个关于'人的模型'(Lopate, p. xliv),它不是科学,也不是哲学。而我所说的那些激发回忆的、个人的故事也正是这样的。这里存在着一场对不确定的世界进行诚实还是夸张描绘的拉锯战。"

我拍了塞尔维亚肩膀一下,附耳对她说道,"注意亚瑟是如何搪塞那些要求他明确进行概念界定的问题。他总是试图在严密精确与想象力之间搞平衡。他认为如果你太拘泥于规则,那你很可能就玩不出任何有趣的东西了。哦,对了,我还要回办公室见另一个学生,关于他补考的事,完了后我再来这儿找你。"

当我回来时,塞尔维亚正一个人站着看一群学生围在亚瑟周围热烈地谈论他们的写作计划。"面对我们的女人是莉萨·蒂尔曼·海丽",我告诉塞尔维亚。"她已经出了一本书,是关于她自己的饮食失调的。最近,她完成了自己的关于'异性恋情侣与同性恋者之关系'的博士论文,讲述了一个她本人的友谊的故事。海丽左边的女人叫德鲍亚·奥斯汀,她会写抒情诗,她的毕业论文是关于'百万

人大游行'①余波后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婚姻,这是她一直关注的领域。那个正在与亚瑟交谈的女人是克里斯蒂娜·基辛格,她已经根据她的博士论文发表了好几篇叙事文章,她的论文是关于女性饮食失调的。你或许会对她的论文感兴趣,你可以看看她是如何将那么多人的故事组织起来的。那边是劳拉·伊林逊",我一边说,一边朝着左边的一个人努努嘴。"她最近在《定性研究》上发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她自己的疾病是如何影响她理解其他癌症患者和她正在研究的肿瘤医院的组织环境的,还有这种体验又是如何帮助她再诠释自己的疾病的。我会给你一个副本的。劳拉正在和莱赫·伯格谈话,伯格写过一个故事是关于她自己与她的有听力障碍的姐姐,以及她那因精神病而被强制收容的父亲之间的关系。她现在正在研究'拯救犹太人'运动,她观察'作为一个宗教团体成员的她'本身所起的变化。来吧,我把你介绍给她们。"

"我读过莉萨和克里斯蒂娜的文章",塞尔维亚提醒我。"有趣的是她们全是女性",她若有所思地说,然后忽然大声惊呼道,"喔,真是太棒了!"我笑了,还没等我开口,塞尔维亚脱口而出,"我要写我自己的故事。但是我没保留下任何记录什么的。我将如何是好?我又该从何开始呢?"

## 实践自我的民族志:思考

"解答你这些问题需要花些时间。一块儿去喝杯咖啡吧。你以后会有机会同其他同学交流的",我冲着大家挥挥手,告辞出来。"有许多方法来写作自我的民族志",我和塞尔维亚边走边谈。"它取决于你愿意把自己置于艺术和科学的连续统的哪一点上。你想说明什么?假如你追随传统的民族志方法来写作,那么如果你保存了当个体经历发生时的记录就最好不过了。这些记录是当时的原始田野记录,你就根据它来写。"

塞尔维亚问道:"假如没有记录,那又怎样才能记住曾经发生过什么呢?"

"你认为这些记录将告诉你什么确实曾经发生过吗?它们难道不也是有偏的记录吗?"

"嗯,是的,但是……那么我该如何确定我所讲述的是真实可信的呢?"

"能确定的只有一样,那就是我们永远不能捕获当时的经历体验。就像亚瑟说得那样,'叙事总是关于过去的故事',因此所有的田野记录都是经过挑选的故事——都是为了一个特定目的以特定的观点来进行剪裁。但如果代表性是你的目标,那你最好尽可能地收集在不同时间里被记录下来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即使是这样,你必须意识到每个故事其实都是不全面的和情景化的。"

我从口袋里掏出四个二角五分的硬币,把它们投进自动售咖啡机中。"我请客,咖啡伴侣还是糖?"我问道。

① 指1995年10月13日约100万美国黑人在华盛顿游行以争取自己的权利。——译者注

“哦,不,我来吧”,塞尔维亚坚持着,打开钱夹。

“下次你来,好吧?”

“好吧,我要苦咖啡就行了。”我们坐在外面一棵树下,边喝咖啡边享受着弗罗里达明媚的春天。“有没有一个办法超越代表性来思考个体叙事呢?”塞尔维亚问道。

“嗯,如果你的写作计划更靠近艺术而不是科学一端,那么你就不必以精确地描绘出过去所发生的事实为目标了,取而代之的是表达出那些你过去的经历体验的意义。你应该试图讲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能让读者身临其境并感到他自己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你应以某种方式来写作,该方式既能激发读者来体会和思考你的生活,又能让他们思考自己的生活与你的生活之关联。你应该让他们感受到你的体验和感受——我指的是你的乳腺癌。”

“如果这些成为你的目标”,我继续说,“及时记录下你过去的经历体验是有益的,但并不绝对必需。假如你的研究旨在揭示一种‘顿悟’的话,你可能会因过分沉溺于过去所熟悉的细节记录而不能写清楚。”

“但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又怎么记住当时的对话和细节呢?”

“当我写《最后的谈判》(*Final Negotiations*)时,那是一部关于我的患慢性疾病而去世的前夫的书,我也记不清过去所有的事,更不用说每句话了。我确实保存了一些当时的记录,但还是必须依靠这些有偏的记录来建构一些当时的场景与对话。更有甚者,我还建构了一些当时根本就没有被记录下来的东西。但如果整个事件是用真情实感来书写的,它就会激发读者的想象力,你能从中感受到的是一种持久的震撼。我还写过一个关于一个小城镇的种族关系的故事,它是根据事件发生 25 年后的回忆来写成的。”

“但是,那么它的效度体现在哪里呢?”

“这取决于你对有效性的定义。我认为语言具有欺骗性,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绝对的关于真实性的标准。对我而言,有效性意味着我们的作品不断逼近真实;它会唤起读者的一种感觉,使读者认为那些被描绘的经历体验是栩栩如生的、可信的和可能的。你也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来评判有效性,即你的作品是否有助于读者与那些不同于他们的其他人沟通,或者作品是否提供了一种手段来改善参与者与读者,甚至你自己的生活。可以去查一下 1993 年的《社会学季刊》,那里有一场关于有效性和权威的大讨论,我相信我是对的。”

塞尔维亚停止记笔记,抬起头来做了个鬼脸,“那什么是信度呢?”

“既然我们总是从一个情景化了的位置出发来进行我们的个体叙事,我们又力图在该文本中同时反映现在、展望未来和回忆过去,那么在自我的民族志研究中就不可能有传统意义上的信度可言。然而,我们却可以做信度检验。当有读者阅读你的故事时,他们就有机会对其进行评判,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增加一些材料进去,并提供他们的诠释。同时,你的故事也会改变他们的想法。”

“这就涉及‘概括力’的问题了吧?”

“当然涉及了,但依然不是从通常意义上来说的。我们的生活是特殊的,但

同时也是类型化和概括性的,因为我们都生活在有限的几种文化和制度中。我们总是试图通过各自的故事进行沟通。一个故事是否有概括力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被读者检验:故事的内容读者是有过切身体会呢,还是那些虽然他们没有亲身体验过,但已经通过其他方式了解了的别的生活经历?类似地,故事给读者讲述了他们所不熟悉的人或生活吗?作品能否体现斯泰克谓之的那种'自然主义的概括'?这种自然主义的概括意指把'可被感觉到的'新奇的感觉从一个世界带到另一个世界,并为读者提供一些身临其境地感受故事中的经历体验的机会。"

"这和我学过的东西太不一样了,但我想我能明白。可是我还是不明白该从哪里开始我的计划。"

"为什么不先写一个关于你的故事的草稿呢?把它当做写回忆录好了,包括所有你能想起来的细节。我发现先按时间顺序用主要事件把故事的架子搭起来,再来进行写作是有益的。我力图每天都写一点儿,把前一天写的再重读一遍,然后再添上一些新的回忆。记住,你是在创造故事,而不是在找回故事。你最后的成品故事就是从这些草稿中精心加工而来的。"

"但是我又怎么才能知道文本中的哪些部分保持了当时的原汁原味?哪些部分却掺进了现在的视角的影响呢?"

"嗯,你的理解不对。记忆并不总是以线性方式呈现,生活同样如此。就像邓津和罗耐在《探求主观性》(*Investigating Subjectivity*)一书中——这本书是我和迈克尔·弗拉尔蒂(Michael Flaherty)共同主编的,所说的那样,(阅读文本时)思考和感觉总是环绕着我们,它们时而闪回,然后再前进,在时间流中不断地循环往复,通过我们的理解而融为一体,然后在另一个情境中再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并不总是能精确地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知道。记住亚瑟的话——我们总是依照当前的情形来理解过去发生的事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从过去到现在进行一番清理是毫无价值的,只是你要认识到并不存在一个什么完美的、应当被完成的计划;相反,就像里查德森在本书的一章中所说的那样:你应该努力以一种意味深长的方式来得到它的'不同的轮廓和微妙之处'。"

"您指什么?您究竟打算怎样做呢?"

"我采用一个叫做'情感召回(emotional recall)'的书写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全身心地沉浸在过去我所处的情境中去。假如你能对这种情境产生一种身临其境之感,那你就会体会出那些未被写进故事的其他细节。这种贴近事件发生的时间的书写方式的优点在于它很容易进入当时的情感体验之中。不利之处在于过分沉浸在过去的情感体验之中会使你很难跳出来以一种文化的视角进行分析。然而这两个过程,进入和出来,都是完成一个好的自我的民族志所不可或缺的。这就是为什么你最好趁你的感情很强烈时赶紧写,然后在你的情绪冷静下来后再接着写。我曾经有几个学生,他们'进入'的能力极强,但他们的视域太狭窄。他们不能在体验中移动自如,不能以'他者'的眼光看问题,他们在分析作为社会建构过程的思考和感觉时遇到了麻烦。我会给你一篇我的关于系统化的社会学内省的文章,里面详细地探讨了作为一个社会过程的内省。"

"我喜欢这种体裁,但不能决定是否一定要把过去所有的情感隐私都翻出来。我不愿意把我的关于癌症的情感体验,无论是过去的和现在的,全部拿出来与人分享。我感到那样的话,自己是多么脆弱和易受伤害。"

"嗯,可以理解。但如果你不愿意成为一名'脆弱的'观察者,那你应该重新考虑是否要做自我的民族志。如果你展现出自己的脆弱和易受伤害的一面,那你的读者就更容易被打动了,这正是你所期望的——易受影响的读者。我同意露丝·贝哈(Ruth Behar)在《易受影响的观察者》(*The Vulnerable Observer*)中提出的观点:不打动读者心灵的社会科学等于不存在。我的目的与多罗茜·阿里逊(Dorothy Allison)的相同,那就是'对读者进行强行灌输,使她心碎,再治好她'。易受伤害是令人害怕的,但它也是成长和理解之源。"

"我一直认为一个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就是不带感情色彩地传递知识",塞尔维亚回应道。"我不知道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因此,假设我愿意展现出自己的脆弱和易受伤害的一面,我又该如何做才能彻底呈现自我,并打动读者呢?"

"你以前读过小说吗?",塞尔维亚点点头,我接着说,"想想一本精彩的小说带给你的感受吧。它会引起你的共鸣,对吗?"塞尔维亚又点点头,"那是什么激起你的这些感觉呢?"

"有时我与书中的角色融为一体,我用心体会他们。我想象我就是书中的人物,处在他的情境中,做他正在做的事,还想象如果换了我会怎样做。有时我会停下来思考我的生活与之差别与相似之处。"

"的确如此。好的小说家能让你好像身临其境地置身其中。他们能做到这样是有一些写作技巧的,例如内心独白、角色间的对话、引人入胜的回忆、强烈的隐喻、情境设计、角色发展、蒙太奇、悬念以及行为举止。你能沿着小说的情节线索进入其间,这条线索是通过特定角色的特定行动来发展的。"

"那我们要做的跟小说家又有何不同呢?"

"许多社会科学家都问过你的问题。看一看邓津的《诠释民族志》吧,他讨论了社会科学家和新型记者的关系问题。另外,苏珊·克莱格(Susan krieger)对小说和社会科学的较早期的研究和里查德森与洛克里奇关于小说和民族志的新著都是有帮助的。"

"这两种体裁的相似性大于差异",我继续说道。"就像沃尔特·哈林顿(Walt Harrington)所说的私密性新闻报导一样,在自我的民族志中,你也不过是试图从参与者内部写作,并唤起他们的共鸣而已。"

"当然,作家和社会科学家毕竟是不同的",我补充道。"你是一名社会科学家,因此很可能会影响你的关注点和看问题的方式。并且,在社会科学家中,自我的民族志通常没有一个明显的分析目的和分析框架。还记得我先前给你举过的卡洛尔·罗耐(Carol Ronai)是如何通过她的个体叙事来进行分层分析的例子吗?但是在《最后的谈判》中,我强调了分析也可以来自故事和对话。亚瑟·弗兰克(Arthur Frank)在《受伤的故事讲述者》(*The Wounded Storyteller*)中说:重要的是要思考故事,而不仅仅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故事来看待。思考故事意味着要

让你自己和故事产生共鸣,对其做出反映,并成为它的一部分。

"我建议你去读一些这类作品中的经典之作,注意一下作者是如何以不同方式融故事与分析框架为一体的。你可以看一看我和亚瑟主编的'阿塔米诺民族志著作选读(*AltaMira Ethnographic Alternatives Series*)系列'中的几本书。例如,琼在《万花筒般的记录》(*Kaleidoscope Notes*)一书中,运用了对话、歌曲、诗歌、故事、表演和自我的民族志等手段,对女性音乐、一个民间的音乐俱乐部和人种志做了综合研究;安格罗西诺的《机会之屋》(*Opportunity House*)讲述了成年弱智者的故事,作者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一直坚持在成年弱智者社区照顾中心参加社区服务并进行参与观察,这本书就是在此基础上写成的;还有马卡姆(Markham)的《在线生活》(*Life Online*)运用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研究因特网生活。在我们《组合而成的民族志》(*Composing Ethnography*),以及班克斯(Banks)主编的《小说与社会研究》(*Fiction and Social Research*)中,都展示了多种多样的、极具创造性的关于叙事写作的可能形式。"

"但关于社会科学家与小说家的区别问题,还是没有结论呀?"

"嗯,一般来说,不像小说家那样,自我的民族志学者对自己做了一个限定,他们只讲述他们能记起来的曾经发生过的事件。或者说,至少他们不讲述那些他们认为是虚假的东西。当然,这种区别并非那么泾渭分明,它取决于……"

"取决于什么?"

"噢,设想一下你想在你的故事中保护某个角色的隐私权,你可以掩盖或改变一些会使他人对号入座的信息。或者你可以拆散原来的事件,再重新组合成一个更加引人入胜的故事,尽管它已经不是历史中原来的那个故事了,但从叙事的角度看却可能更加真实。"

看见塞尔维亚满脸疑惑地望着我,我继续说:"你知道——故事唤起读者的共鸣,使他们认为叙事是真实的。故事是粘合剂,它联结读者与作者,沟通他们的生活,发掘出各自生活的连续性与相似性。"塞尔维亚看上去有点儿懂了,我继续解释道,"那些坚持写实主义的民族志学者声言自己追随科学的法则,但即使是他们也在使用各种技巧,比如拆分重组什么的,来使故事增色,同时保护故事中当事人的隐私。然而,他们崇尚叙述中的'精确性'。我的一个朋友,谢里·克莱曼(Sherry Kleinman)就说过:如果事情没有发生过,那么就不要讲述它。这其实是'不要借当事人的口来乱说,假如当事人没有说过的话'的另一种表达版本。当然,与此同时,民族志学者又总是通过当事人之口来表辞达意的。"

"真的?他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在记忆的基础上进行编辑加工,谨慎地剔除那些不符合情境需要的内容,然后再按自己建构的分析情境来重组话语内容。这样,当文本最终完成可供分析时,绝大多数传统的民族志学者很容易超越单纯的叙述层面,他们的文本中还包括了丰富的解释。"

"举个例子呢?"

"噢,叙事总是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但民族志学者们可以从中创造

出‘典型’人物或时期,以及‘一般化’的事件。他们使用模糊的、修饰性的限定词,像绝大多数、一些、频繁的、很少等。并且,他们当然使一些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了,比如社会结构、组织环境之类的。我在我最早的关于两个渔村社区的研究中也是这样做的。我要告诉你的是,当社区成员阅读我的作品时,我认为是典型的他们并不一定就认为是典型的。我的作品给你讲述的更多的是我眼中的世界,而不是他们眼中的世界。”

“别信宣传”,亚瑟夹着一摞书忽然朝我们走来,边走边说道。

我笑了,问道,“嗨,你去哪里了?”

“图书馆,为我们书的写作查些资料。”

“它们对我来说太沉重了”,我撇了一眼书的名字,笑着说:“亚瑟,这是我的学生,她正在研究乳腺癌。”

“哦,你好!我注意到你来参加我今天的讲座了,坐在艾利丝旁边。”

“是的,我对你的讲座很感兴趣”,塞尔维亚回答道。

“我们正在谈论自我的民族志与小说的区别”,我解释道。

“哦,卡罗琳正在给你讲她认为你必须有体系,又要坚持事实吗?”亚瑟转向塞尔维亚,问道:“这个事实嘛,嗯”,他开始模仿我的口吻调侃。

“您说什么……”塞尔维亚愣住了。

“好了,亚瑟,别闹了”,我会意地笑着说,然后向塞尔维亚解释道:“我和亚瑟对于如何写作自我的民族志有分歧。我主张你应当尽可能地按着你能记住的个体经历来建构故事,特别是按第一印象。这么做会有助于你找出故事的意义与目的。而亚瑟则认为重要的是故事的有用性。当然,我同意我们的故事应当具有诊疗价值……”

“诊疗价值?”塞尔维亚结结巴巴地问道。

“对,我在某种意义上将它视为对个体的能动进行研究。尽管诊疗可能不是我们的主要研究目的,但在优秀作品中却经常可以发现它”,我回答道。

“这倒提醒了我,嗯,我可以称呼您为亚瑟吗?”得到肯定回答后,塞尔维亚问亚瑟,“在您的讲座中谈到过故事的焦点问题,我认为诊疗与研究是性质不同的两个东西。我的意思是说,假如我是一名诊疗师,但我必须在进行访谈时隐瞒身份,因为不这样的话会得到有偏的资料。但这是否会陷入伦理困境呢?”

我和亚瑟对视了一眼,竭力控制住想笑的念头。塞尔维亚的问题和关注点帮助我们认清了我们的立场其实是多么接近啊。我飞快地插话道,“但你告诉过我你希望你的研究能有助于别人理解你的处境,也希望帮助那些和你有着同样困境的人。那么假如一名被访者不配合,或者假如你发现有一个地方对你特别有帮助,那你会怎么做呢?

她望着我,期待着答案,然后小声嘟囔道,“我不清楚。”

“假如换个角色,你是被访者,同样情况下你希望研究者如何对待你呢?”

“嗯,我希望他们善待我,他们应该理解我的处境。否则,我就不会与他们分享我的生活故事。”塞尔维亚轻轻地答道。

"如果一名研究者对你的需要无动于衷,这是不是不道德呢?"

"我以前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我希望我的研究对象能感觉到我是理解他们的。假如我的研究不能帮助那些有同样困境的人,尤其是我的研究对象,那研究还有什么必要呢?"

"所以应该参与进去",我平静地说。

"参与",她重复道,脸变得红起来。"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进行诊疗啊,难道不是吗?我是说绝大多数学者并不是训练有素的诊疗师。"

"有能力做诊疗并不等于一定要成为一名受过训练的诊疗师嘛",我回应道,塞尔维亚点头表示同意。"实际上,民族志的训练和诊疗训练对一名诊疗师来说同样重要。"

"而且诊疗训练却可能是成为一名民族志学者的先决条件",亚瑟笑着补充道。

我笑了,继续说道,"但你也没错,并非所有的人都能轻松面对情感挫折,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处理情感上的事。那些做不到的人可能就不应该把从事此类研究作为第一选择,也不应该指导愿意从事此类研究的学生。"

"或许你应该给她提供一些关于此类问题的参考文献,比如关于开小汽车与个人义务的道德困境,或许科林斯的书就不错",亚瑟建议道,这时他夹着的几本书掉到了地上。

"我会的",我边说边帮着从地上拾书。"其他一些女性主义学者也是有帮助的。让我们来过一过吧,Lieblich, Miller, Cook 和 Fonow, Oakley。她们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拾起书还给亚瑟。

"还有雷恩哈兹(Reinharz)的著作做了很好的总结,邓津的《诠释民族志》也很不错",亚瑟补充道,然后对着塞尔维亚说,"文献足够你看的,我倒是想更多地了解一下假如你作为一名研究对象,你会做何反应?什么能使你足够宽慰地讲出你的故事?"

"理解他人的关键在于倾听,投入地倾听。我希望能有个我能在他面前哭出来的人,最好她能陪着我一块儿哭。如果她有过和我类似的经历,她最好能跟我讲讲她的故事。"

"那么你愿意与你的参与者分享你的故事吗?"我问道。

"嗯,……让我想想……"

"大胆些。"

"哦,我以前认为我的故事只会带给其他人不好的感觉,但现在我已经不那么肯定了。"

我和亚瑟笑了。"你目前能认识到这一点就足够了",我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这次谈话会对你的研究有一定启示作用,下次见面时我们再继续讨论这个话题吧。"

我们互相道别后,亚瑟和我向汽车走去。"你能肯定这是好的开端吗?她准备书写她自己的故事吗?"亚瑟问道。

"哦,我想她会的。我感觉她会讲述她自己的故事的。"

"如果她真的完全敞开心扉,那会勾起她很多痛苦的回忆的。"

"我会和她保持密切联络,以防万一。但根据我拥有的关于个体叙事的经验来看,人们会很快渡过这个难关的,他们会知道该怎么做的。当然,如果她需要的话,我肯定会同意她改变研究计划,甚至完全倒退回传统的调查研究。她完全可以一直做那种调查研究",我补充道。

"我真的很钦佩你能愿意和学生们一起去冒险",亚瑟动情地说,他夹着的书又一次掉到地上了,我赶紧再次帮他捡起来。"你是多么关心你的学生啊!"

"和你一样",我说。

"展现出脆弱的一面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在学术场域,那里的规则是你应该控制并最好把你的私人生活驱除出你的职业生活中去。这就是我在'关于时间'这篇文章中试图表达的内容。"

"还有比这更糟糕的,每每想到科比大学的一名教授曾经让学生们写出自己的个体叙事,末了却被指控进行性骚扰的事件,你就会感到不寒而栗。当然,我们不知道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只是看到了鲁斯 · 沙利特(Ruth Shalit)的报导",我补充道,"或许他的私人生活与职业生活的确过于勾连缠绕了。"

"确有这种可能性。但《高等教育报导》(*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中的那篇文章又是怎么回事呢? 文章报导了简 · 汤普金斯(Jane Tompkins)认为大学过分关注于学生的智力,而忽视大学生的情感生活和精神生活,这二者至少同等重要,但她的一些同事却因此而攻击她。"

"或许我们应该只写小说了",我提议道。

"再等等看吧",亚瑟忿忿地说,"你知道我写的一切都是小说……"

## 实践自我的民族志:方法与形式

两周后,塞尔维亚又到办公室来找我。"嗨,我现在已经写完了绝大部分我过去的故事,而且是直到我几乎写完了之后,我才开始读其他关于乳腺癌的个体叙事。写作和阅读真是太有诊疗作用了。"她说,"但是我不能确定这能算是我的毕业论文吗? 我有很多疑问。"

"比如?"我问道。

"人们为什么要读我的故事呢? 我的故事与那些已经发表的有何不同呢? 还有我的故事怎么才能适合那些我想访谈的别的女性的口味呢?"

"慢点,别急。你学到什么了吗?"

"哦,当然,每时每刻都有。"

"给我讲讲你的收获。"

"好吧,我在其他女性乳腺癌患者的故事中发现了许多共同之处。比如,绝大多数女性都是从发现肿块讲起的——那总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然后是

确诊和评估治疗方案，然后她们描述了外科手术后的苏醒，再继续下一步的治疗，最后是恢复期以及某种意义上的康复。”

“很有趣，简直与考泽尔(Couser)在他那本关于疾病叙事的书中对乳腺癌叙事的概括一模一样”，我回应道，很高兴塞尔维亚读了那么多的相关书籍。

“绝大多数幸存者描述了决定去做整形手术，还有买假发——如果她们决定戴的话——她们的头发都掉光了，以及其他的治疗方法”，塞尔维亚飞快地说。“我也写了这些内容，另外还有……”

“那你从写自己的故事的过程中还学到了什么新的东西吗？对不起，我不是打断你，我只是好奇而已。”

“有啊，癌症不仅仅是一个医疗故事，它还是一个情感故事。我体会到我是多么的惊慌不安，尽管我已经是一个术后存活了7年的幸存者。有个有趣儿的现象——无论是在故事中，还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很少有长期存活的患者。绝大多数幸存者都是在她们术后康复不久就写她们的故事了，她们通常对于康复持相当乐观的观点，并且经常声称手术后比手术前感觉要好一些。我也有这种感觉，我是指乐观主义，当治疗终于结束后，你立刻就会有这种感觉。”加强了语气，继续说道：“但现在我可没有那种感觉了。我竭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乐观、爽朗、没有忧愁的人，一个已经从不幸经历中走出来的勇士。但当我书写自己的故事时，我却不得不面对另一个自我，一个整日忧心重重，害怕癌症重返的自我。我已经出现腕骨管综合症，它可能是化疗的后遗症。并且，我现在晚上出虚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过早进入绝经期的反应——化疗的另一件礼物，或者是癌症重现的征兆。对不起，但癌症并没有提升我的生活，我也不能将其视为一件礼物。带着这些感觉，我这些年来过得很艰难。我认为它对我的精神和身体以及我的家庭来说都起到了负面作用。”

塞尔维亚开始哭了起来。我拍着她的肩膀，递给她一张面巾纸。我们相对无语地坐了一会儿，悲伤笼罩着我们二人。想到必须充当指导者的角色，我强忍住眼泪。“你还打算继续这个计划吗？”我轻柔地问，“它触痛你了？”

“哦，不，不，我必须要继续下去”，她坚定地回答，尽管嗓音发颤。“我的经历对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很难伪装。有时我想我是不是疯了。但现在我认识到我没必要伪装自己。还有很多其他的故事值得体验和书写。或许通过我的写作和与别的女性交流她们的体验，我就能找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可能会有助于我走出困境更好地生活的生活方式。或许就像亚瑟说得那样，我能以一种更加深刻、更有意义的方式来刻画出一个作为幸存者的本我。你知道，我很想了解其她女性（乳腺癌手术、化疗）出院后这么多年是怎么过的。这场经历是如何影响她们的？她们又是如何应对的？成功了，还是失败了？这些都是我想知道的”，塞尔维亚说着说着，眼泪又下来了。“她们是不是像我一样对这场经历仍然感到历久如新，并深受其害而不能自拔呢？或许我能通过书写我们亲身体验的方式来为学术做出一点儿贡献，同时也能帮助那些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受害者。我现在整天生活在自欺之中，但生活本不应该是这样。”

“很好,现在让我们换个话题吧”,我轻柔地说。“我想你已经有目标了。我能想象出其他女性在分享你的真情独白后,一定会丢掉假面具来向你敞开心扉的”,我接着说道,想到假如癌症与我不期而遇,并挥之不去的情形,我下意识地打了个寒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知道那些癌症长期存活者的经历体验呢?”

“我打算找些 5 年以上的幸存者做深度访谈”,塞尔维亚很有把握地回答道,“包括一名非洲裔美国女人——几乎没有关于她们的资料,或许再包括一个女同性恋,因为我想她们的经历体验将会十分不同。我需要多少个案呢? 25 个够吗?”

“哦,不,不需要”,我笑了。“如果你打算做深度访谈的话,那只需要很少的个案就可以了,也许包括你自己在内 5 ~6 个就足够了。你需要花较多的时间来与每个女性交流以建立信任关系。并且在你开始访谈以前,她们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阅读你给她们的资料,并做出反应。”

“我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其间呢?”

“全方位的参与,我想访谈应该是互动式的,但你必须学会用心倾听。你应该把自己的经历体验嵌入每个访谈对象的生活之中,时刻考虑哪些东西能有助于她讲述自己的故事,这里不需要卖弄什么方法技巧之类的。如果你是这么做的,在一些案例中,被访谈者会感到很舒服。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更常见的是那种居高临下式的‘权威式访谈’,我们对此都很熟悉,有些受访女性也一样,她们会把你当做权威来看待,并会问你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一些人会不停地追问你的故事。其余的人则会为终于能有个机会来倾诉自己的故事而感到过度兴奋而顾不上关注你的故事。她们会希望你既是研究者,又是精神治疗专家。或许会有很少数女性希望书写自己的故事。记住提醒我下次给你带一篇关于‘互动式访谈’的文章来,那是我和克里斯蒂娜·凯丝英格(Christine Kiesinger)、莉萨·蒂尔曼—海丽(Lisa Tillmann-Healy)在一次晚餐时谈论到饮食失调后合写的一篇文章。它会让你思考进行‘互动式访谈’的形式和困难,比如介入的时机,做出何种情感承诺,如何在一个如此私人的领域中处理好道德困境。我还要给你一篇我和亚瑟合写的关于如何共同建构叙事的文章,那篇文章描述了看似个人独立完成的故事其实是个双面过程,即既与被访者分享故事,又是和她们共同建构完成的。”

“那么我猜就没有访谈提纲了?”塞尔维亚问道,“那么论文的章节该如何安排呢? 我的故事又该在何处出现呢?”

“论文的写作形式是根据研究过程决定的。你可以从一个简短的个人小故事开始你的论文,向读者简单介绍自己,或者也可以详细讲述你的故事来作为一章;你还可以将自己的故事插入每个被访者的故事之中,每个故事都可以独立成为一章;或者还可以把你的故事同一个和你有着类似经历的被访者的故事进行比较,就像克里斯蒂娜·凯丝英格在她的关于饮食失调的研究中那样。或许你论文每章的写作形式都会不一样,只要它们能反映出每个访谈中你获得的不同

体验与感悟",我继续说道,"或者反映出每个被访者的特性就行了。例如,假如一个被访者在讲述她的故事时并没有太多地与你沟通、互动,你可以写一些你在听她讲述过程中的感想以及对你的生活的影响。假如另一个被访者与你互动的很好,那你就可以写出你们对话内容,用以展示你们之间沟通与理解的过程。如果你成功了,其意义不仅限于只是'揭开'你自己和被访者的面具而已,而且就像哈罗德·罗森(Harold Rosen)所说的那样,你发现的是被掩盖的全部事实的真相。"

"或者",我犹豫了一下,继续说道,"你也可以像埃斯纳所主张的那样,以一种小说的形式来写你的论文。情节可以依你的研究历程而展开,你应该让读者们跟着你走,比如你的研究意义、你问的问题、被访者的回应、她们的回答对你的影响、从中激发出的新问题,以及你对她们的故事的解释。在这种写作形式中,你可以在论文的最后部分写上你自己的故事以作为对比,并要说明当你了解了其他女性的故事并与之进行互动后,你的故事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当然,要注意的是不要让你的故事遮蔽其他人的故事。"

"很有意思,但恐怕很难让我的答辩委员会成员去买一本小说呀。"

我点头表示同意,然后提醒她,"无论你怎样讲故事,写作风格都必须是引人入胜和能激发无穷回忆的。社会科学家们过去没有被教会以此种方式进行写作。从根本上说,你必须通过阅读小说,以及亲自动笔写作、得到反馈意见后修改、再等待反馈意见、再修改,如此往复才能彻底学会这种风格的写作方式。当然,我会提供反馈意见的,但你或许可以考虑同时再加入一个写作兴趣小组。"

"这是个好主意",塞尔维亚一边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下这几点,一边问道,"那我就不需要再按传统方式写作了吧?但分析又在哪里呢?请举例说明一下。我是在做扎根理论研究吗?"

"嗯,我敢打赌你的答辩委员会希望有一章是用来起分析作用的。我也认为你需要这样的一章。我的那篇关于'污名化'的文章使我确信在'叙事的知识'与'范畴化的知识'之间存在着互补性,尽管我不认为它在所有的研究中都是必需的。"

我迟疑了一下,继续说道,"你也可以做单纯的扎根理论分析。那你就需要按着概念的出现来划分章节,或者按不同的类型,或者按着某种范畴来划分章节。或者每一章都可以代表病患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就像大卫·卡普(David Karp)在他的关于抑郁症的研究中所做的那样。假如你选择了扎根理论,那你需要花费很多精力来解读自己的故事,也要费很大劲儿来比较、分析你所获得的他人的资料。并且,你要用权威式的声音来写那些你看到的范型。如果你选择这种研究策略,我推荐你就按着凯茜·卡梅兹(Kathy Charmaz)在新一版的 *Handbook* 中所描述的研究程序那样去做就行了。"

"但那些被访女性的故事又该被置于何处呢?我自己的故事呢?"

"嗯,所有这些故事将会被拆成片断,然后被插入每一章节中去。"

塞尔维亚迟疑了一下,又飞快地记录起来,她若有所思地说道:"我不这样认

为。这种做法看上去会让我距离故事的应有之意越来越远,故事应该具有引人深思的本质,而这种本质存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故事中(不能割裂它),这才是我研究的价值之所在。除此之外,尽管我知道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的合作者讲她们自己的故事,但她们才是故事的主体……"

"我同意",我如释重负地打断道,"应该牢记你的研究计划的本质和目标。分析是必要的,但要清楚,我们并不一定要按传统的方式来进行分析。为什么不试试让你所有的被访者相互阅读别人的故事,然后使她们聚在一起来讨论,录下所有讨论内容呢?这可能会成为你分析的基础——你的分析会'扎根'在所有被访者和你自己的相互理解之间。你会对她们的回应提出自己的解释。"

"太好了",塞尔维亚向前探了探身子,兴奋地说道。"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观点。我将邀请她们共进晚餐。在这之前,我会寄给她们我写的有关每个人的故事。然后……"

"先要取得她们的同意",我提醒道。

"哦,当然,我知道这很重要。或许我会先寄给她关于她自己的故事。"塞尔维亚忽然停住了,然后脱口而出,"如果某人不愿意让我把她的故事全部发表,那该怎么办呢?"

"那你应该删掉它,或者让她来帮助你重新改写。或者你还可以虚构一些情节,这些情节足以掩盖真实的事件,但依然可以表达你想表达的意思。或者使用假名,或者把几个人物角色糅杂在一起来写,如果这有帮助的话。"

"我还会告诉她们我对这些故事所做的解释,并想听听她们的回应。但是假如她们不同意我的分析呢?"她忽然皱着眉头问道。

"会有这种事儿发生,因此你必须事先考虑好该如何应对这种局面。也许你应该在文本中同时提供两种解释版本,你的和她们的。或者你可以不告诉她们你的解释,先来听听她们的解释。"

"举个例子",我说,"蔡思(Chase),一个社会学家,她在论文出版之前就没有将自己的解释与分析告诉她的合作者,尽管她事先得到允许来引用其合作者的话语,并且也给了她们一个修正其叙事的机会。蔡思的分析目的在于发掘出文化是如何左右叙事进行的,而她的合作者讲述自己故事的目的则在于表达自己的生活体验,蔡思对这二者做了区分。"

"无论如何",我继续说道,"你需要在你的论文中说明你是在何种意义上做结论的,以及你的理由何在。这是你对读者应尽的义务。"

"你很难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我接着说,"我的意思是说,既给读者提供他们想知道的信息,又不辜负合作者的信任。就像约塞尔森(Ruth Josselson)说的那样,当我们进入写作阶段时,我们就倾向于与合作者脱离关系,转而开始与读者建立关系了。那种对合作者背叛的感觉总是挥之不去的,我们又何以解脱呢?"

看到塞尔维亚一边用手挡住张大的嘴,一边怀疑地摇着头,我继续说道:"还有比这更复杂的呢。我们还没有谈到你的家庭成员,他们会是你非常个性化的

故事的中心人物。假如你丈夫或女儿不愿意你暴露有关他们或者他们和你的关系方面的隐私,那你怎么办?"

"哦,我,我还没想过这些",塞尔维亚轻轻地说。"但我必须谈到我的家庭,这样才能更深刻地表达我的经历体验。如果连我都做不到这一点,我又怎么能要求我的合作者做到呢?"

"这是此类研究中最大的伦理困境之一。因为和以前不一样的是,我们现在不是在谈论一些无特征化、匿名化和不能对号入座的研究对象。你的研究对象都是一些非常熟的人。当她们同意你写她们时,她们难道没有同样的担忧吗?"

"当然有……"

"你是否有权力不顾别人的反对而坚持要写出一个'更好'的故事呢?它比个人的隐私权更加重要吗?"

当发现塞尔维亚脸上呈现出一种斗败了的神情时,我意识到我有些太急于求成了。"好了,这些困难不可能在今天都得到解决。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未来可能遭遇的困难而已。我们会在这些困难到来时一一讨论它们,力求做出一个理想的、符合道德规范的决定。"

抢在塞尔维亚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之前,我又补充道:"但在我们下次见面继续讨论之前,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件事情是如何让你的研究计划通过你们学校的'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查。你要去读一读第 2 版的 *Handbook* 中对'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讨论。你的研究计划书必须写得策略一些,因为该委员会最关注的就是你与该计划有无利害关系。他们会问你要一份你的访谈计划副本。虽然 IRB 的初衷是保护被调查者,但有时他们似乎更倾向于保护自己。他们会要求你明确告知被调查者参加调查可能存在的风险,并提供一份有被调查者签字同意的声明,如果你的调查对象是老人、病人、儿童、囚犯等'高危群体',IRB 的审查会更加严格。这样一来,万一出事,他们就可以不承担责任了。显然,一些被调查者可能会因此知难而退了。但我们必须完成这个过程来保护学校和我们自己,特别是你这次的研究对象恰恰是'高危群体'。委员会将会关心你怎样来保护你的合作对象,比如如何避免破坏他们的自我认同?如何保持他们的生活一如既往而不起波折?他们会要求你至少要为你的合作对象提供一名心理治疗师。我想象不出当你告诉审查委员会你就是那名心理治疗师时,他们会做何反应?"我笑起来,然后更加严肃地说,"但的的确确,如何保护好你的合作对象以及你的家人是摆在你我面前的一件大事。"(注意到塞尔维亚暗示她要走了,我翻出一本关于如何写作研究计划的书放在桌子上。)

"我想我现在已经知道该怎样写我的研究计划书了,你已经教会我了。"我听后笑了起来,拿起桌子上的那本书递给塞尔维亚。她则递给我一叠纸,然后说:"这是我写的一首关于失去乳房的诗。我知道这算不上研究,但……"

"它当然算研究了。你可以考虑把它加进你的故事里。你读过任何劳拉·里查德森那富含民族志色彩的诗歌作品吗?"

我正要滔滔不绝之际,塞尔维亚眨了眨眼睛,问道:"那么你愿意参加我的答

辩委员会了?"

"当然,除非你不坚持做下去",我说,我们一起咯咯地笑起来,然后互相告辞。

## 捍卫并扩展自我的民族志(一年之后)

"嗨,亚瑟,我必须给你打个电话。"

"为什么? 出了什么事情?"

"我刚参加完塞尔维亚的论文答辩会回来。实际上,比我想象的要好,塞尔维亚干得不错。嘿,让狗们都安静一些,我听不见你的声音。"

"哦,好的。看起来你为圣诞节而购买的'反犬吠机器'是我们购买的所有装置里最不干活的。里克、崔夫、安迪、桑亚——你们都静一静,你们的妈妈正在打电话呢",亚瑟命令道,令我吃惊的是狗立即不叫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是第一个发问的,开始一切都很好。答辩委员会成员们看起来理解了我们想要干什么。但轮到他们提问题时,话题忽然转移了,从谈论乳腺癌的经历体验转向谈论偏差、有效性、(成员)资格标准、操作化、控制变量、干扰因素、建立模型、可重复性、客观性。作为回应,我则大谈特谈富含想象力的写作、文学的破格、激发回忆的、脆弱性、叙事的真实性、逼真、互动的、诊疗性的。"

"想想这些冒险的尝试在别处的冷遇吧,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使你认识到我们是多么的幸运啊! 在我们系里,用不着再为此进行讨论了,这种研究的价值性已经不言而喻了",亚瑟答道。

"的确如此,其他大学的学生和年轻教师想从事此类研究需要克服多少困难啊,这次的经历让我对他们充满同情。"

"但是",我继续说道,"答辩快结束时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当那位肿瘤学家正在谈论预测与控制时,我就在想这些目标在他的日常工作中是多么重要呀。因此我没有再做长篇大论,而是问当他不得不告诉女患者一个坏消息,不得不随时面对疾病和死亡时,那种感觉是什么? 其实我已经知道答案了,因为我们答辩前有过一次谈话就涉及感情问题、他的工作面对的情感困境,以及他如何想做的更好一些。他给我讲了一个发生在昨天的使他十分沮丧的故事:当时他必须告诉一个 34 岁,有两个小孩的妇女,她可能活不过 6 个月了,那名妇女却为耽误了他那么多时间而向他道歉,那时刻他的感觉坏透了。他是含着泪水讲述这个故事的。我提到了罗伯特·科尔(Robert Cole)主编的书,他告诉我他读过那本《故事的召唤》(*The Call of Story*),并说他很钦佩其中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作品。我力图给他指出塞尔维亚作品的目的与科尔的主张完全一致,那就是努力用故事来揭示应该如何使我们生活更有意义。我感到我已经触及他的灵魂深处了,他也是有主观性的,也是饱含感情的。然后答辩会的局势为之一变,我们两人似乎都忘记了各自的角色,开始作为'人'而互

相沟通起来。”

“那情景一定十分感人。”

“是的,你知道,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将来要做的。我们必须让个人的民族志走进日常生活的实践情境中去,走进那些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管理者和教师中去,因为这会对他们的工作大有裨益。”

“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亚瑟回应道。“我认为民族志不应局限于学术领域,应该扩展民族志的外延,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学习,不能仅仅把它看成是学术活动。许多服务行业的从业者和社会工作者的工作难道不正是民族志吗? 为了更高效的工作,服务业的工作者们必须跨越诸如年龄、能力、民族、阶级、种族的障碍,并在情境中达致主体间性的理解。我的意思是说你工作上的任何成功都需要先有一种跨文化的理解能力,然后再运用民族志的移情技巧。那些心理治疗师们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他们自己不正是民族志学者吗?”

“当然。还有好的教学也离不开民族志”,我补充道,“你过去一直在努力超越陌生、距离感和差异带来的阻碍,力求找到一条富含协作、理解、开放和共享的精神之路。当我们学会怎样才能正视自己,怎样才能相互之间敞开心扉时,我们就会发现说服自己接受那些曾经抗拒的不同思想并非难事。我喜欢在课堂上创造出一种充满个性化的、亲密的、心会神移般的民族志式的感觉。”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一直在研究私营老年健康照顾中心的经营者们,我的做法和你的做法非常相似”,亚瑟回答道。“健康照顾中心的老人与其家人往往相隔甚远,那些经营者们需要周旋于二者之间,这样他们就变成了关于老龄的民族志学者。但他们不是学术圈中人,不搞学术研究,也不写文章。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们所思与所做都与民族志学者毫无区别。对于每个老人及其家属来说,他们都扮演着沟通通道的作用。老年人总会面临一些不测之事,他们会把老人所遇到的情感、经济、医疗以及社会方面的困难传递给其家属,以供其家属商讨对策。他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动态的、通盘考虑的以及积极乐观的视角。他们既是参与者,又是观察者,他们的职业行为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私人生活。作为故事讲述者和自我的民族志者,他们在教会我们了解老年人真实的日常生活细节方面一点儿也不比那些老龄问题研究专家少,如果不是更多的话。”

“我们常常认为自己比公众懂得多,其实只要留心一下,就会发现也有很多东西是他们知道我们反而不知道的”,我补充道。“但我知道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就像埃斯纳讨论过的——说服学者和美国公众放弃一种注重测量、比较和结论的观念是非常困难的。”

“但我认为通过我们的努力,坚冰正在渐渐融化”,亚瑟带着鼓励说道。“我们已经开启了一条将传统社会科学写作与文学联结起来的道路,并且已经激起了更多的关于主观与客观、情感与理智、自传与文化的讨论。看看我们收到的这么多手稿吧,这些都是对我们系列作品的回应。我认为这非常强有力地证明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同写作可以用心来进行,可以用第一人称来叙述,可以融合艺术与科学。我认为这种趋势不可能倒退回原来的模式,就像生活不会倒流

一样。”

“是的,我们鼓励著者们写可读性强的、激发回忆的、充满激情的和体现个体意义的民族志作品,并且效果非常不错。自我的民族志作品正在被研究生和本科生们广泛阅读着。现在到了向公众们展示自我的民族志的优点的时刻了。有趣的是,一些主流社会学刊物也有相同的看法。你读过《当代社会学》上的关于‘使公众加入社会对话’的专题讨论吗?”我问道。

“读过,昨天刚读的。或许我们的努力正在引起些变化。毕竟,那是我们在‘民族志选读系列读本’中想要做的,我们的目的不就是出版一些充满意义感的书籍,并吸引一大批阅读者吗?”

“比如迈克·安格罗西诺的关于成年弱智者的故事。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让那些为弱智者提供服务和制订关于弱智者政策的人读一读这本书。”

“我不知道我们为 *Handbook* 写的这一章会不会也起点儿作用”,亚瑟说道。“但它会鼓励更多的人来做自我的民族志研究,并会为那些试图尝试做这种研究的学生和年轻教师们提供合法性,你不是一直为此而担心吗? 这些就是我们力求在这一章里达到的主要目的。我很高兴我们能写这一章。”

“我也是”,我说,想到亚瑟早先不愿意写这一章,我不禁笑了。

“那么,我们写完后该如何庆祝一下呢?”亚瑟问道。

“这样好不好”,我回答道。“让我们犒劳自己一下,去海边度周末吧。我们需要从办公室中逃出来,投入到别的生活经历中去,或者将来我们唯一会写的东西就是‘写作’。”

“但那样的话,我们已经答应为《痛苦与精神创伤手册》(*Handbook of Loss and Trauma*)和《人际沟通手册》(*Handbook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各撰写一章的事何时启动呢? 我们真的要快点开始了”,亚瑟说道。

伴随着敲门声,我的耳边传来亚瑟的笑声,我大声喊道:“亚瑟!”

## 参考文献


Abu-Lughod, L. (1993). *Writing women's worlds: Bedouin 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dler, P. A., & Adler, P. (1987). *Membership roles in field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Adler, P. A., & Adler, P. (1994). Observational techniques.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377-392). Thousand Oaks, CA: Sage.

Allison, D. (1994). *Skin: Talking about sex, class, and literature.* Ithaca, NY: Firebrand.

Angrosino, M. (1998). *Opportunity House: Ethnographic stories of mental retardation.*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Anzaldúa, G. (1987). *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San Francisco: Aunt Lute.

Atkinson, P. (1997). Narrative turn in a blind alley?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7, 325-344.

Austin, D. (1996). Kaleidoscope: The same and different. In C. Ellis & A. P. Bochner (Eds.),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pp. 206-230).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Austin, D. (1998). *Understanding close relationships among African America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Million Man March.*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Bakhtin, M. M. (1981).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M. Holquist, Ed.; M. Holquist & C. Emerson, Tran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Banks, A., & Banks, S. P (Eds.). (1998). *Fiction and social research: By ice or fire.*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Barthes, R. (1977). *Image, music, text* (S. Heath, Trans.). New York: Hill & Wang.

Behar, R. (1993). *Translated woman: Crossing the border with Esperanza's story.* Boston: Beacon.

Behar, R. (1996). *The vulnerable observer: Anthropology that breaks your heart.* Boston: Beacon.

Behar, R., & Gordon, D. A. (Eds.). (1995). *Women writing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nson, P. (Ed.). (1993). *Anthropology and literatur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Berger, B. (Ed.). (1990). *Authors of their own lives: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ies by twenty American sociologis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ger, L. (1997). Between the candy store and the mall: The spiritual loss of a father. *Journal of 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Loss*, 2, 397-409.

Berger, L. (1998). Silent movies: Scenes from a life. In A. Banks & S. P. Banks (Eds.), *Fiction and social research: By ice or fire* (pp. 137-146).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Bochner, A. P. (1981). Forming warm ideas. In C. Wilder-Mott & J. H. Weakland (Eds.), *Rigor and imagination: Essays from the legacy of Gregory Bateson* (pp. 65-81). New York: Praeger.

Bochner, A. P. (1994). Perspectives on inquiry II: Theories and stories. In M. L. Knapp & G. R. Miller (Eds.), *Handbook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2nd ed., pp. 21-41). Thousand Oaks, CA: Sage.

Bochner, A. P. (1997). It's about time: Narrative and the divided self. *Qualitative Inquiry*, 3, 418-438.

Bochner, A. P., & Ellis, C. (1992). Personal narrative as a social approach to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2, 165-172.

Bochner, A. P., & Ellis, C. (1999). Which way to tur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8, 500-509.

Bochner, A. P., Ellis, C., & Tillmann-Healy, L. (1997). Relationships as stories. In S. Duck (Ed.), *Handbook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ory,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s* (2nd ed., pp. 307-324). New York: John Wiley.

Bochner, A. P., Ellis, C., & Tillmann-Healy, L. (1998). Mucking around looking for truth. In B. M. Montgomery & L. A. Baxter (Eds.). *Dialectical approaches to studying personal relationships* (pp. 41-62).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Bochner, A. P., & Waugh, J. B. (1995). Talking-with as a model for writing-about: Implications of Rortyean pragmatism. In L. Langsdorf & A. R. Smith (Eds.), *Recovering pragmatism's voice: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Rorty, and the philosophy of communication* (pp. 211-233).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Bowen, E. S. (1954). *Return to laughter: An anthropological novel.* New York: Harper & Row.

Brady, I. (Ed.). (1991). *Anthropological poetics.* Savage, MD: Rowman & Littlefield.

Brandes, S. (1982). Ethnographic autobiographies in American anthropology. In E. A. Hoebel, R. Currier, & S. Kaiser (Eds.), *Crisis in anthropology: View from Spring Hill*, 1980 (pp. 187-202). New York: Garland.

Broyard, A. (1992). *Intoxicated by my illness and other writings on life and death.* New York: Fawcett-Columbine.

Bruner, J. (1990). *Acts of mean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runer, J. (1993). Introduction: The ethnographic self and the personal self. In P. Benson (Ed.), *Anthropology and literature* (pp. 2-26).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Buford, B. (1996, June 24). The seductions of storytelling. *New Yorker*, pp. 11-12.

Butler, S., & Rosenblum, B. (1991). *Cancer in*

*two voices*. San Francisco: Spinster.

Carr, D. (1986). *Time, narrative, and hist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Charmaz, K. (1991). *Good days, bad days: The self in chronic illness and tim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Chase, S. (1996). Personal vulnerability and interpretive authority in narrative research. In R. Josselson (Ed.), *Ethics and process in the narrative study of lives* (pp. 45-59). Thousand Oaks, CA: Sage.

Church, K. (1995). *Forbidden narratives: Critical autobiography as social science*. Newark, NJ: Gordon & Breach.

Clandinin, D. J., & Connelly, F. M. (1994). Personal experience methods.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413-427). Thousand Oaks, CA: Sage.

Clough, P. T. (1994). *Feminist thought: Desire, power and academic discourse*. Cambridge, MA: Blackwell.

Clough, P. (1997). Autotelecommunication and autoethnography: A reading of Carolyn Ellis's *Final negotiation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8, 95-110.

Cohen, A. (1992). Self-conscious anthropology. In J. Okely &: H. Callaway (Eds.), *Anthropology and autobiography* (pp. 221-241). London: Routledge.

Coles, R. (1989). *The call of stories: Teaching and the moral imagin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llins, P. H. (1986). Learning from the outsider within: The soc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black feminist thought. *Social Problems*, 33, 14-32.

Cook, J. A., & Fonow, M. M. (1986). Knowledge and women's interests: Issues of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in feminist sociological research. *Sociological Inquiry*, 56, 2-27.

Couser, G. T. (1997). *Recovering bodies: Illness, disability, and life writing*.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Crapanzano, V. (1980). *Tuhami: Portrait of a Morocc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rawford, L. (1996). Personal ethnography.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63, 158-170.

Crites, S. (1971). The narrative quality of experien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39, 291-311

Deck, A. (1990). Autoethnography: Zora Neale Hurston, Noni Jabavu, and cross-disciplinary discourse. *Black American Literature Forum*, 24, 237-256.

Denzin, N. K. (1989). *Interpretive biography*. Newbury Park, CA: Sage.

Denzin, N. K. (1997). *Interpretive ethnography: Ethnographic practices for the 21st century*.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Eds.). (1994).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rrida, J. (1978). *Writing and difference* (A. Bass,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errida, J. (1981). *Positions* (A. Bass,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eVault, M. (1997). Personal writing in social science: Issues of prod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R. Hertz (Ed.). *Reflexivity and voice* (pp. 216-228). Thousand Oaks, CA: Sage.

Diamond, S. (1982). *Totems*. Barrytown, NY: Open Book/Station Hill.

Dumont, J.-P. (1976). *Under the rainbow: Nature and supernature among the Panare Indian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Dumont, J.-P. (1978). *The headman and I: Ambiguity and ambivalence in the fieldworking experienc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Eisner, E. (1996). Should a novel count as a dissertation in education? *Research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30, 403-427.

Eisner, E. (1997). The new frontier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y. *Qualitative Inquiry*, 3, 259-273.

Ellingson, L. (1998). "Then you know how I feel": Empathy, identification, and reflexivity in fieldwork. *Qualitative Inquiry*, 4, 492-514.

Ellis, C. (1986). *Fisher folk: Two communities on Chesapeake Bay*.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Ellis, C. (1991a). Emotional sociology. In N. K. Denzin (Ed.),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A research annual* (Vol. 12, pp. 123-145). Greenwich, CT: JAI.

Ellis, C. (1991b). Sociological introspection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Symbolic Interaction*, 14, 23-50.

Ellis, C. (1993). "There are survivors": Telling a story of sudden death.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4, 711-730.

Ellis, C. (1995a). Emotional and ethical quagmires in returning to the fiel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4, 711-713.

Ellis, C. (1995b). *Final negotiations: A story of love, loss, and chronic illnes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Ellis, C. (1995c). The other side of the fence: Seeing black and white in a small, southern town. *Qualitative Inquiry*, 1, 147-167.

Ellis, C. (1995d). Speaking of dying: An ethnographic short story. *Symbolic Interaction*, 18, 73-81.

Ellis, C. (1997). Evocative autoethnography: Writing emotionally about our lives. In W. G. Tierney & Y. S. Lincoln (Eds.), *Representation and the text: Reframing the narrative voice* (pp. 115-142).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Ellis, C. (1998a). Exploring loss through autoethnographic inquiry: Autoethnographic stories, co-constructed narratives, and interactive interviews. In J. H. Harvey (Ed.), *Perspectives on loss: A sourcebook* (pp. 49-62). Philadelphia: Taylor & Francis.

Ellis, C. (1998b). "I hate my voice": Coming to terms with minor bodily stigma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9, 517-537.

Ellis, C., & Bochner, A. P. (1992). Telling and performing personal stories: The constraints of choice in abortion. In C. Ellis & M. G. Flaherty (Eds.), *Investigating subjectivity: Research on lived experience* (pp. 79-101). Newbury Park, CA: Sage.

Ellis, C., & Bochner, A. P. (Eds.). (1996a).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Ellis, C., & Bochner, A. P. (Eds.). (1996b). Taking ethnography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pecial issu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5(1).

Ellis, C., & Flaherty, M. G. (Eds.). (1992). *Investigating subjectivity: Research on lived experience.* Newbury Park, CA: Sage.

Ellis, C., Kiesinger, C., & Tillmann-Healy, L. (1997). Interactive interviewing: Talking about emotional experience. In R. Hertz (Ed.), *Reflexivity and voice* (pp. 119-149). Thousand Oaks, CA: Sage.

Engaging publics in sociological dialogue [Symposium]. (1998).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7, 435-462.

Foucault, M. (1970).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Frank, A. (1991). *At the will of the body: Reflections on illnes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Frank, A. (1994). Reclaiming an orphan genre: The first-person narrative of illness. *Literature and Medicine*, 13, 1-21.

Frank, A. (1995). *The wounded storyteller: Body, illness, and eth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reeman, M. (1993). *Rewriting the self: History, memory, narrative.* London: Routledge.

Freeman, M. (1998). Mythical time, historical time, and the narrative fabric of self. *Narrative Inquiry*, 8, 27-50.

French, D. (1998).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comic mask: An ethnographic exploration of the identity of a stand-up comedia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Friedman, N. (1990, Spring). Autobiographical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st*, 21, 60-66.

Gadamer, H.-G. (1989). *Truth and method* (2nd rev. ed.; J. Weinsheimer & D. G. Marshall, Eds. & Trans.). New York: Crossroad.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Gergen, K. J. (1994). *Realities and relationships: Soundings in social constru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lassner, B. (Ed.). (1997). Qualitative sociology as everyday life [Special issue]. *Qualitative Sociology*, 20(4).

Goetting, A., & Fenstermaker, S. (1995). *Individual voices, collective visions: Fifty years of women in sociolog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Goldman, A. (1993, Fall). Is that what she said? 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ve autobiography. *Cultural Critique*, pp. 177-204.

Gonzalez, M. C., & Krizek, R. L (1994). *Indigenous ethnograph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Western States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an Jose, CA.

Gravel, A. (1997). *The ideological functions of autoethnograph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Wisconsin-Whitewater.

Gubrium, J. F., & Holstein, J. A. (1997) *The new language of qualitative metho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cking, I. (1995). *Rewriting the soul: Multiple personality and the sciences of mem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arding, S. (1991).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Thinking from women's liv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arrington, W. (1997). *Intimate journalism: The art and craft of reporting everyday life.* Thousand Oaks, CA: Sage.

Hartsock, N. C. M. (1983).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Developing the ground for a specifically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S. Harding & M. B. Hintikka (Eds.), *Discovering reality* (pp. 283-310). Amsterdam: D. Reidel.

Harvey, J. (Ed.). (in press). *Handbook of loss and trauma.* London: Taylor & Francis.

Hawkins, A. H. (1993). *Reconstructing illness: Studies in pathography.* West Lafayette, IN: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Hayano, D. M. (1979). Auto-ethnography: Paradigm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Human Organization*, 38, 113-120.

Hayano, D. M. (1982). *Poker fac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eidegger, M. (1971). *On the way to language* (P. D. Hertz & J. Stambaugh, Trans.). New York: Harper & Row.

Herndon, C. (1993). *Gendered fictions of self and community: Autobiography and autoethnography in Caribbean women's writing.*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Hertz, R. (Ed.). (1996). Ethics, reflexivity and voice [Special issue]. *Qualitative Sociology*, 19(1).

Hertz, R. (Ed.). (1997). *Reflexivity and voice.* Thousand Oaks, CA: Sage.

Higgins, P., & Johnson, J. (Eds.). (1988). *Personal sociology.* New York: Praeger.

Hollway, W. (1989). *Subjectivity and method in psychology: Gender, meaning and science.* London: Sage.

Hurston, Z. N. (1991). *Dust tracks on a roa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2)

Jackson, A. (Ed.). (1987). *Anthropology at home.* London: Tavistock.

Jackson, M. (1989). *Paths toward a clearing: Radical empiricism and ethnographic inqui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Jackson, M. (1995). *At home in the world.*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Jago, B. (1996). Postcards, ghosts, and fathers: Revising family stories. *Qualitative Inquiry*, 2, 495-516.

Jones, S. H. (1998). *Kaleidoscope notes: Writing women's music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Josselson, R. (1996). On writing other people's lives: Self-analytic reflections of a narrative researcher. In R. Josselson (Ed.), *Ethics and process in the narrative study of lives* (pp. 60-71). Thousand Oaks, CA: Sage.

Jules-Rosette, B. (1975). *African apostl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arp, D. (1996). *Speaking of sadn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erby, A. (1991). *Narrative and the self.*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Kiesinger, C. (1995). *Anorexic and bulimic lives: Making sense of food and eating.*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Kiesinger, C. (1998a). From interviewing to story: Writing Abbie's life. *Qualitative Inquiry*, 4, 71-95.

Kiesinger, C. (1998b). Portrait of an anorexic life. In A. Banks & S. P. Banks (Eds.), *Fiction and social research: By ice or fire* (pp. 115-136).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Kinkaid, J. (1988). *A small place*. New York: Penguin.

Kleinman, S. (1997). Essaying the personal: Making sociological stories stick. *Qualitative Sociology*, 20, 553-564.

Kolker, A. (1996). Thrown overboard: The human costs of health care rationing. In C. Ellis & A. P. Bochner (Eds.),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pp. 132-159).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Kondo, D. (1990). *Crafting selves: Power, gender, and discourses of identity in a Japanese workpla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rieger, S. (1983). *The mirror dance: Identity in a women's communi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Krieger, S. (1984). Fiction and social science. In N. K. Denzin (Ed.),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A research annual* (Vol. 5, pp. 269-286). Greenwich, CT: JAI.

Krieger, S. (1991). *Social science and the self: Personal essays on an art form*.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Krieger, S. (1996). *The family silver: Essays on relationships among wom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uhn, T.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ulick, D., & Willson, M. (Eds.). (1995). *Taboo: Sex, identity and erotic subjectivity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London: Routledge.

Lather, P. (1986). Research as praxi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56, 257-277.

Lather, P. (1993). Fertile obsession: Validity after poststructuralism.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4, 673-693.

Lejeune, P. (1989). *On autobiography* (K. Leary, Tr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Lewin, E., & Leap, W. L. (Eds.). (1996). *Out in the field: Reflections of lesbian and gay anthropologist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Lieblich, A. (1996). Some unforeseen outcomes of conducting narrative research with people of one's own culture. In R. Josselson (Ed.). *Ethics and process in the narrative study of lives* (pp. 151-184). Thousand Oaks, CA: Sage.

Linden, R. R. (1992). *Making stories, making selves: Feminist reflections on the Holocaust*.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Lionnet, F. (1989). Autoethnography: The anarchic style of *Dust tracks on a road*. In F. Lionnet, *Autobiographical voices: Race, gender, self-portraiture* (pp. 97-129).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opate, P. (1994). Introduction. In P. Lopate (Ed.), *The art of the personal essay: An anthology from the classical era to the present*. Garden City, NY: Anchor.

Lorde, A. (1980). *The cancer journals*. Argyle, NY: Spinsters.

Lyotard, J.-F.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G. Bennington & B. Massumi, Tr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acIntyre, A. (1981).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Mairs, N. (1986). *Plain text*.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Mairs, N. (1990). *Carnal acts: Essays*. New York: Harper.

Mairs, N. (1998). *Waist-high in the world: A life among the nondisabled*. Boston: Beacon.

Malinowski, B. (1967).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N. Guterman, Tra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Marcus, G. E., & Fischer, M. M. J. (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arkham, A. (1998). *Life online: Researching*

*real experience in virtual space.*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Mehan, H., & Wood, H. (1975). *The reality of ethnomethodology.* New York: John Wiley.

Merton, R. (1988). Some thoughts on the concept of sociological autobiography. In M. Riley (Ed.), *Sociological lives* (pp. 17-21). Newbury Park, CA: Sa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2)

Miller, L., & Taylor, J. (1997). Performing autobiography: Editors' introduction. *Text and Performance Quarterly*, 4, v-vi.

Miller, M. (1996). Ethics and understanding through interrelationship: I and thou in dialogue. In R. Josselson (Ed.), *Ethics and process in the narrative study of lives* (pp. 129-147). Thousand Oaks, CA: Sage.

Mink, L. (1969-1970). History and fiction as modes of comprehension. *New Literary History*, 1, 541-558.

Motzafi-Haller, P. (1997). Writing birthright: On native anthropologists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D. Reed-Danahay, *Auto/ethnography: Rewriting the self and the social* (pp. 195-222). Oxford: Berg.

Mukaia, T. (1989). A call for our language: Anorexia from within.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2, 613-638.

Narayan, K. (1993). How native is a "native" anthropologist?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5, 671-686.

Neumann, M. (1996). Collecting ourselves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In C. Ellis & A. P. Bochner (Eds.),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pp. 172-198).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Noddings, N. (1984). *Caring: 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akley, A. (1981). Interviewing women: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In H. Roberts (Ed.), *Doing feminist research* (pp. 30-61).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Oakley, A. (1984). *Taking it like a wom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Ohnuki-Tierney, E. (1984). Native anthropologists. *American Ethnologist*, 2, 584-586.

Okely, J. (1992). Participatory experience and embodied knowledge. In J. Okely & H. Callaway (Eds.), *Anthropology and autobiography* (pp. 1-28). London: Routledge.

Okely, J., & Callaway, H. (Eds.). (1992). *Anthropology and autobi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Parini, J. (1998, July 10). The memoir versus the novel in a time of transition.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p. A40.

Park-Fuller, L. (1998). *Introduction to session on arguing the shifting shapes and speaking tongues of autoethnographic performa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New York.

Payne, D. (1996). Autobiology. In C. Ellis & A. P. Bochner (Eds.),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pp. 49-75).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ersonal Narratives Group. (1989). *Interpreting women's lives: Feminist theory and personal narrativ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ratt, M. L. (1994). Transculturation and autoethnography: Peru 1615/1980. In F. Barker, P. Holme, & M. lverson (Eds.), *Colonial discourse/postcolonial theory* (pp. 24-46).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Quinney, R. (1991). *Journey to a far place: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Rabinow, P. (1975). *Symbolic domination: Cultural form and historical change in Morocc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abinow, P. (1977). *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in Morocc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eed-Danahay, D. (1997). *Auto/ethnography: Rewriting the self and the social.* Oxford: Berg.

Reinharz, S. (1979). *On becoming a social scientist: From survey research and participation to experiential analysi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Reinharz, S. (1992).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hett, K. (Ed.). (1997). *Survival stories: Mereoirs of crisi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Rich, A. (1978). *On lies, secrets and silence: Selected prose* 1966-1978. New York: W. W. Norton.

Richardson, L. (1990a). Narrative and sociolog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9, 116-135.

Richardson, L. (1990b). *Writing strategies: Reaching diverse audiences.* Newbury Park, CA: Sage.

Richardson, L. (1994a). Nine poems: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3, 3-14.

Richardson, L. (1994b). Writing: A method of inquiry.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516-529). Thousand Oaks, CA: Sage.

Richardson, L. (1995). Vespers. *Chicago Review*, 41, 129-146.

Richardson, L. (1996). Speech lessons. In C. Ellis & A. P. Bochner (Eds.),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pp. 231-239).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Richardson, L. (1997). *Fields of play: Constructing an academic lif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Richardson, L., & Lockridge, E. (1998). Fiction and ethnography: A conversation. *Qualitative Inquiry*, 4, 328-336.

Riemer, J. W. (1977). Varieties of opportunistic research. *Urban Life*, 5, 467-477.

Riley, M. W. (1988). *Sociological lives* Newbury Park, CA: Sage.

Rodriguez, R. (1983). *Hunger of memory: The education of Richard Rodriguez.* New York: Bantam.

Ronai, C. R. (1992). The reflexive self through narrative: A night in the life of an erotic dancer/researcher. In C. Ellis & M. G. Flaherty (Eds.), *Investigating subjectivity: Research on lived experience* (pp. 102-124). Newbury Park, CA: Sage.

Ronai, C. R. (1995). Multiple reflections of child sex abuse: An argument for a layered accoun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3, 395-426.

Rorty, R. (1979).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rty, R. (1982).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essays* 1972-1980).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Rose, D. (1991). In search of experience: The anthropological poetics of Stanley Diamond. In I. Brady (Ed.), *Anthropological poetics* (pp. 219-233). Savage, MD: Rowman & Littlefield.

Rosen, H. (1988). The autobiographical impulse. In D. Tannen (Ed.), *Linguistics in context: Connecting observation and understanding* (pp. 69-88). Norwood, NJ: Ablex.

Schneider, A. (1998, July 10). Jane Tompkins's message to academe: Nurture the individual, not just the intellect.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pp. A8-A10.

Schwandt, T. A. (1996). Farewell to criteriology. *Qualitative Inquiry*, 2, 58-72.

Shalit, R. (1998, February). The man who knew too much. *Lingua Franca*, pp. 32-40.

Shelton, A. (1995). Foucault's Madonna: The secret life of Carolyn Ellis. *Symbolic Interaction*, 18, 83-87.

Shostak, A. (Ed.). (1996). *Private sociology: Unsparing reflections, uncommon gains.* Dix Hills, NY: General Hall.

Shostak, M. (1981). *Nisa: The life and words of a ! Kung wom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hotter, J. (198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n "us": Problems of accountability and narratology. In R. Burnett, P. McGee, & D. Clarke (Eds.), *Accounting for relationships: Explanation, representation, and knowledge* (pp. 225-247). London: Methuen.

Smith, D. (1979). A sociology for women. In J. Sherman & E. Beck (Eds.), *The prism of sex: Essays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Smith, D. (1990). *The conceptual practices of power: A feminist sociology of knowledge.*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Smith, D. (1992). Sociology from women's perspective: A reaffirmation. *Sociological Theory*, 10, 88-97.

Sontag, S. (1978). *Illness as a metapho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Stake, R. E. (1994). Case studies.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Th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236-247). Thousand Oaks, CA: Sage.

Strathern, M. (1987). The limits of auto-anthropology. In A. Jackson (Ed.), *Anthropology at home* (pp. 59-67). London: Tavistock.

Tedlock, B. (1991). From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to the observation of participation: The emergence of narrative ethnography.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41, 69-94.

Tierney, W. (1998). Life history's history: Subjects foretold. *Qualitative Inquiry*, 4, 49-70.

Tierney, W. G., & Lincoln, Y. S. (Eds.). (1997). *Representation and the text: Re-framing the narrative voic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Tillmann-Healy, L. (1996). A secret life in a culture of thinness: Reflections on body, food, and bulimia. In C. Ellis & A. P. Bochner (Eds.),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pp. 76-108).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Tillmann-Healy, L. (1999). *Life projects: A narrative ethnography of gay-straight friendship.*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Tompkins, J. (1989). Me and my shadow. In L. Kauffman (Ed.), *Gender and theory: Dialogues on feminist criticism* (pp. 121-139) Cambridge, MA: Blackwell.

Toulmin, S. (1969). Concepts and the explanation of human behavior. In T. Mischel (Ed.), *Human action* (pp. 71-104).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Trinh T. M. (1989). *Woman, native, other: Writing postcoloniality and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Trinh T. M. (1992). *Framer framed.* New York: Routledge.

Trotter, M. (1992). *Life writing: Exploring the practice of autoethnography in anthropology.*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True confessions: The age of the literary memoir [Special issue]. (1996, May 12).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Turner, V., & Bruner, E. (Eds.). (1986). *The anthropology of experienc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Tyler, S. (1986). Post-modern ethnography: From document of the occult to occult document. In J. Clifford and G.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pp. 122-14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Van Maanen, J. (1988). *Tales of the field: On writing ethnogra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an Maanen, J. (1995). An end to innocence: The ethnography of ethnography. In J. Van Maanen (Ed.), *Representation in ethnography* (pp. 1-35). Thousand Oaks, CA: Sage.

Van Maanen, M. (1990). *Researching lived experience: Human science for an action sensitive pedagog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Wittgenstein, L. (1953).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G. Anscombe, Trans.). New York: Macmillan.

Zola, I. K. (1982). *Missing pieces: A chronicle of living with a disabili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Zussman, R. (1996). Autobiographical occasions.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5, 143-148.

# 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




DATA MANAGEMENT AND ANALYSIS METHODS

⊙ 杰瑞·W·瑞安　H·拉塞尔·伯纳德

## 文本就是我们

本章主要阐述了处理和分析定性数据的方法。我们用定性数据所指的文本是：报纸、电影、电视剧、电邮、民间故事、生活史。我们也指叙述——关于离婚、生病、并肩战斗中的幸存、卖春、努力戒烟的叙述。事实上，大部分在考古中可恢复的、关于人类思想和行为的信息都是文本，是社会科学的“良好素材”。

内容分析的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用电脑来做文本的统计分析（Pool，1959），但最新的技术进步正在改变社会科学的状况。今天的光学扫描可以轻松地将书面的文本转换成机器可读的形式。在未来几年，语音识别软件可以轻松转录开放式的访谈。这些技术忽略了认识论的差异。解释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都用这些技术来做文本分析，且今后会用得越来越多。

就像泰什（Tesch，1990）一样，我们将语言学传统和社会学传统区分开来，前者视文本为分析对象本身，而后者视文本为透视人类经历的一面窗户（图29.1）。语言学的传统分析方法包括叙事分析、对话分析、性能分析和正式的语言分析。该传统中的分析方法在这本书中随处可见。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社会学传统中的分析方法，即我们在社会科学的工作中采用的方法。

社会学传统有两种书面文本：①由系统引导的方法（systematic elicitation）产生的单词或词组；②自由组织的文本（free-flowing text），如叙述、谈话、对开放式访谈问题的回答。在下一个小节，我们将描述一些收集和分析单词或词组的方法。数据收集的方法包括自由列表（free lists）、归堆分类（pile sorts）、结构性引导（frame elicitation）、三个一组的测试（triad tests）。分析这类数据的方法包括主成分分析（componential analysis）、分类法（taxonomies）和心智图（mental maps）。

接着，我们转到对自由组织文本的分析上来。首先我们来看看那些采用原文本输入的方法——诸如上下文中的关键词、词语计数（word counts）、语义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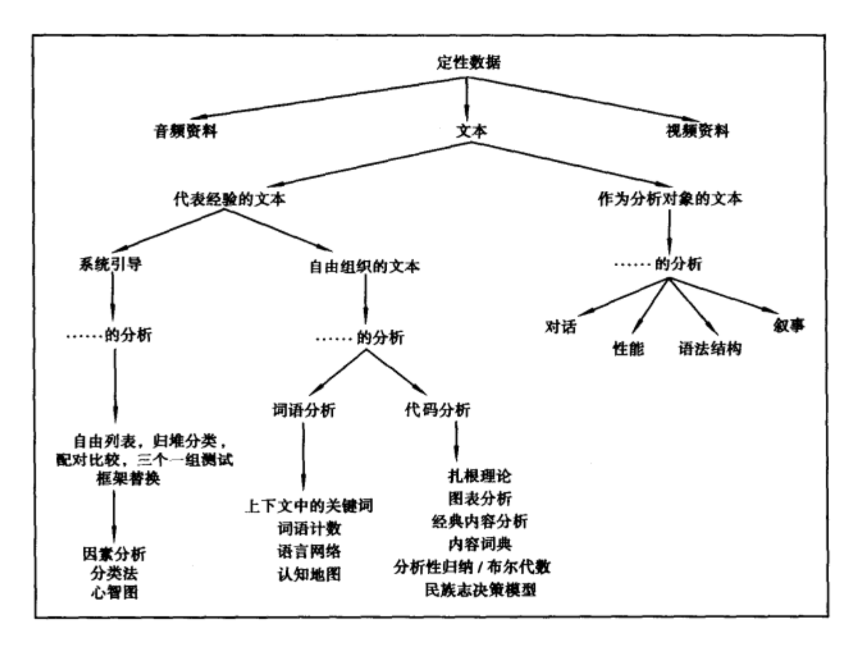



图 29.1 定性分析方法的类型学

分析(semantic network analysis)和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等方法。然后我们来描述那些需要将文本缩减为代码的方法。它们包括扎根理论、图表分析、经典内容分析、内容字典、分析性归纳和民族志决策模型(ethnographic decision models)。每一种分析方法都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有些适合于查数据,有些可用于比较分析,另外一些则适合于建构和测试模型。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做到面面俱到。

## 收集与分析单词或词组

### 系统引导的方法

研究者用系统引导的方法来识别属于一个文化范畴的条目列表(lists of items)并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对这些方法的详细评述,参见:Bernard,1994;Borgatti,1998;Weller,1998;Weller & Romney,1988)。文化范畴包含了一种语言中“属于一类(belong together)”的一系列单词。有些范畴(如动物、疾病、食物)很大而且内容丰富,而另一些范畴(如养在家里的动物、儿童患上的疾病、啤酒的品牌)相对而言就小得多了。有些名单(如家庭成员称谓的名单,或是所有大联盟棒球队的名称)在所有以某种语言为母语的人的口中是统一的;另一些(如木匠的工具)名单则代表高度专业化的知识,还有一些(比如说 20 世纪著名的左手

棒球投手的名单)则是讨论的热门话题。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些最常见的系统引导的方法,讨论研究者是如何分析由它们所产生的数据的。

### 自由列表

自由列表对于识别文化范畴的条目特别有用。为了得到范畴,研究者可能会问,“你知道哪些疾病?”调查中的一些简短的开放式问题可以被看成自由列表,就像那些在深入的人类学访谈和焦点小组中产生的一些回答一样。调查人员将清单中条目被提及的频率和顺序解释成条目显著性(对于显著性的测量请参见:Robbins & Nolan,1997;Smith,1993;Smith & Borgatti,1998)的指标。某些条目在不同的列表中同时出现以及在不同列表中出现相似的条目都可以用来测量条目间的相似性(Borgatti,1998;Henley,1969;清楚的例子请见:Fleisher & Harrington,1998)。

### 配对比较、归堆分类、三个一组测试

研究者用配对比较、归堆分析、三个一组测试来探究条目间的关系。这里是我们在一些水果的配对比较测试中可能提出的两个问题:①“按 1 到 5 的分值,柠檬和西瓜的甜度有多接近?”②“柠檬和西瓜哪一个更甜?”第一个问题产生了一套水果对水果的矩阵,每位答题者一个,输入的是所有这些配对的水果甜度近似性的分值。第二个问题给每位答题者带来的是对这些水果的一个完整排序。

在归堆分类中,研究者让每位答题者将一套卡片或事物分成若干堆。条目的相似性就是每对事物被放置在同一组中的次数(例子请参见:Boster,1994;Roos,1998)。在三个一组测试中,研究者拿出一系列的三件套物品让每位答题者或是“选出最相似的两件物品”或是“挑出差异最大的一件物品”。配对物品之间的相似性就是人们选择将这两件物品放在一起的次数(例子请参见:Albert,1991;Harman,1998)。

### 框架替换

在框架替换中(D'Andrade,1995;D'Andrade,Quinn,Nerlove,& Romney,1972;Frake,1964;Metzger & Williams,1966),研究者让每位答题者将一份清单中的一系列事物中的每个事物和一系列属性连接起来。丹德莱德(D'Andrade et al.,1972)给出了 30 种疾病的名称,让人们将其填入框架的空白处,如“你会从别人那里传染上____”,“你可能会得上____而自己永远都不知道”,以及“大多数人有时会患上____”(p. 12;框架替换的其他例子请参见:Furbee & Benfer,1983;Yong,1978)。

## *关于文化范畴的数据的分析方法*

研究者利用这些类型的数据来建构人们思维的模型。主成分分析产生出文化范畴中各要素的正式模型,分类法展示出某个范畴中各要素间的层级关系。

心智图是最好的用来展示模糊的结构和维度的方法。我们将依次讨论它们。

### 主成分分析

如我们在其他地方所概括的那样,主成分分析(或属性分析)是用于研究意义的内容的一种正式的定性研究方法(Bernard,1994;Bernard & Ryan,1998)。这种方法是被语言学家开发出来,用以识别可以将两种声音区别开来的特点和规则(Jakobson & Halle,1956),人类学家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对这种方法进行了改进(Conkin,1955;D'Andrade,1995;Frake,1962;Goodenough,1956;Rushforth,1982;Wallace,1962)(关于如何运用这一方法的特别好的描述请参见:Spradley,1979,pp. 173-184)。

主成分分析以有特色的特征为基础。任意两种事物(声音、亲属称谓、植物名称、动物名称等)都可以用一些最少组(2n)的二元特征——即存在或不存在的特征来加以区分。用两种特征可以区分四种事物(即 $2^2=4$),三种特征可以区分八种事物($2^3=8$),等等。技巧是用最少种类的特征去最清楚地描述所感兴趣的范畴。表 29.1 显示出描述马的种类只要三个特征。

表 29.1 对六种马的一个主成分分析

| 名字 | 母 | 阉割 | 成年 |
|---|---|---|---|
| 母马 | + | - | + |
| 种马 | - | - | + |
| 去势的雄马 | - | + | + |
| 去势的马驹 | - | + | - |
| 小雌马 | + | - | - |
| 小雄马 | - | - | - |

资料来源:改编自 D'Andrade(1995)。

主成分分析所产生的是以特征之间的逻辑关系为基础的模型。这些模型不能说明不同的人在词语意义理解上的差别。例如,如果我们要对 cattle 这个词(bull,cow,heifer,calf,steer,ox)进行构成分析,我们会发现,在美国,在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人(甚至是农民)中,对于 cow 和 heifer,steer 和 ox 之间的区别有分歧。当事物之间的关系没有很好地加以定义时,分类法或心智模型可能会派上用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主成分分析反映了"人们实际上是如何思考的"。

### 分类法

民俗分类法(folk taxonomies)是要在一系列的词语中抓住层级结构,通常以分叉的树形图来表示。图 29.1 是我们自己所理解的定性分析方法的分类,图 29.2 是我们改编自埃利克松(Erickson,1997)所做的研究,描述的是在临床医生和青少年中对避孕方法的理解所做的分类。研究者可以通过使用连续的归堆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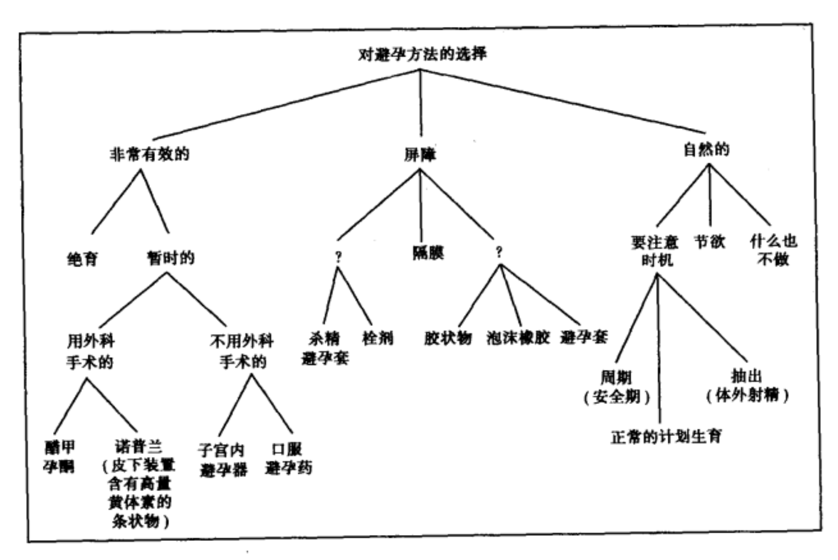



**图 29.2 临床医生对避孕方法的分类**

资料来源:Erickson(1997)。

类来(Boster,1994;Perchonock & Werner,1969)直接得出民俗分类法。这需要让人们不断地对成堆自由堆放的事物进行再分类直到每件事物都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可以根据配对比较、归堆分类和三个一组测试得出的相似度的数据进行聚类分析来创建分类模型。分层聚类分析(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Johnson,1967)建立了一个分类树,每件事物只出现在其中的一个集合中。

中间信息提供者的差异(interinformant variation)在民俗分类法中是常见的,即不同的人会用不同的词语来指同一类事物。埃利克松(Erickson,1997)的一些临床信息提供者(clinician informant)将"非常有效的"一组方法说成是"安全的"、"更可靠的"和"肯定能行"。类别标签并不一定是简单的词语,而可能是复杂的词组,例如图 29.2 中的类别包含了"要注意时机"的避孕方法。有时人们根本无法给某些类别加上标签——至少他们无法轻易找出来——这些类别就算是冠以称谓也可能是模糊不清的,并可能会与其他类别重叠。重叠聚类分析(overlapping cluster analysis)(Hartigan,1975)能识别出那些在几个集合中都会出现的事物。

### 心智图

心智图是对事物之间相似性的视觉展现,不论这些事物是否是按层级组织的。制作这些图的一个常用方法就是在一组对象中收集关于认知相似性或差异性的数据,然后将多维定标(multidimensional scaling)或 MDS 运用到相似性(分析)中(Kruskal & Wish,1978)。

认知地图与自然地图完全相似。考虑一下地图上关于所有各对城市间距离的图表。差异很大的目标(城市)之间的里程数大,在地图上相距较远;差异较小的目标(城市)之间里程数较小,在地图上距离要近一些;归堆分类、三个一组测试和配对比较测试都是认知距离的测量方法,例如,瑞安(Ryan,1995)让 11 个在喀麦隆的以 Kom 为母语的受过教育的人对 Kom 语中的疾病名称进行连续分类。图 29.3 给出了这些名称的总体心智图的 MDS 图。在圆圈中的五种主要疾病类型是根据得出这张 MDS 图表①所使用的同一个矩阵进行分层聚类分析来确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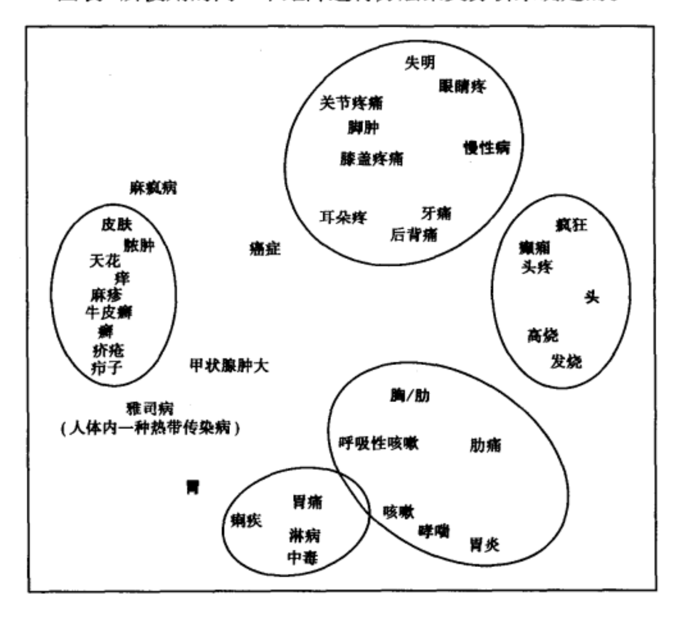



图 29.3 喀麦隆人的疾病术语的心智图

来自框架替换工作的数据可以用对应性分析(correspondence analysis)显示出来(Weller & Rommy,1990)②。对应性分析将行和列调整成同样的空间。例如,柯克勒(Kirchler,1992)分析了分别死于 1974、1980 和 1986 年的经理人的 562

① MDS 显示是非常醒目的(evocative)。他们寻求被解释。实际上,他们必须被解释。为什么有些疾病在图 29.3 的顶部,而有些在底部?我们认为,在顶部的疾病是更加慢性的类型,而那些在底部的疾病则是更加急性的。我们还认为,位于左边的疾病比位于右边的疾病要轻。我们让关键被调查者(key informants)帮助我们了解疾病在 MDS 图中的排列状况,这样我们就能检验我们的这些想法(关于心智图的更多例子,参见 Albert,1991;D'Andrade et al.,1972;Erickson,1997)。有一个正式的方法叫做特性适合分析(property fitting analysis)或 PROFIT,是用来检验 MDS 地图中的项目分布的。该方法是以线性回归为基础的(Kruskal & Wish,1978)。

② 作为选择,轮廓矩阵通常是社会科学中普遍存在的事物—变量特性矩阵,能被转换为相似矩阵(事物—事物矩阵,在其中,单元格包含的是对配对事物之间相似性的测量),然后用 MDS 进行分析(关于一步一步的操作指导,参见 Borgatti,1999)。

份讣告。他在讣告中用到的形容词中找出了 31 种描述类别，然后用对应性分析来展示，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类别是如何与这些男性和女性经理人联系起来的。图 29.4 显示，死于 1974 年和 1980 年的男性经理人被他们生前的朋友和家人看作是积极、聪明、杰出、负责任和经验丰富的专家。尽管死于 1986 年的经理人仍旧受到尊重，他们更多地是被描述成企业家，观念上的领袖和决策者。对女性经理人的理解也有变化，但她们也没有变得与男性经理人更像。在 1974 年和 1980 年，女性经理人因为是好人而被记住，她们和蔼可亲，受人敬慕。到 1986 年，女性因她们的勇气和奉献而被记住。柯克勒将这些数据解释为：性别模式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发生了变化。1986 年的时候，男性和女性经理人都被看作是为成功而工作，但男性以他们丰富的知识和专业性而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女性经理人则以动机和投入见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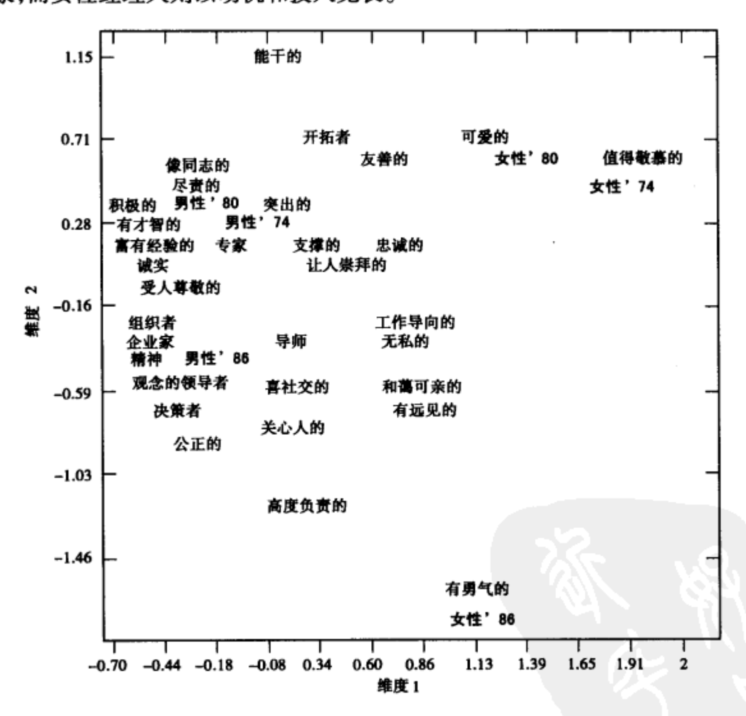



图 29.4 根据讣告发布的年份和性别对 31 个描述类别所做的对应性分析

# 自由组织文本的分析方法

尽管分类法、MDS地图和诸如此类的方法对于分析短语和单词很有用,但大多数定性数据都是以自由组织文本的形式出现的。一方面,文本被分割成最基本的有意义的单元:单词;另一方面,只有在大段的文本中才可以找出意义。

## 分析词语

分析词语的方法有上下文中的关键词、词语计数、结构分析和认知地图。下面我们逐一论述。

### 上下文中的关键词

研究者创建出上下文中的关键词清单,在文本中找到该关键词或词组所出现的所有位置,并在其出现处前后标上相应的数字(如30)。这就产生了索引(concordance)。著名的索引多出现在宗教书籍中,如旧约和新约全书(Darton,1976;Hatch & Redpathk,1954)和古兰经(Kassis,1983),也出现在文学名著中,从欧里庇得斯(Allen & Italie,1954)到荷马(Homer)(Prendergast,1971),到裴欧沃夫(Beowulf)(Bessinger,1980),再到戴兰·托马斯(Dylan Thomas)(Farringdon & Farringdon,1980)(关于索引在现代文学中运用的研究,请参见:Burton,1981b,1982;McKinnon,1993)。

### 词语计数

词语计数适用于揭示任何体裁文本中概念的组织模式(patterns of ideas),从田野笔记到对开放式问题的回答。大众传媒专业的学生曾经用这种方法来跟踪政治人物支持率随着时间变化的涨落(Danielson & Lasorsa,1997;Pool,1952)。莫斯泰勒和华莱士(Mosteller & Wallace,1964)就是根据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作品中惯常用词的差异断定美国北部联邦同盟盟员文件中的12篇出自麦迪逊而非汉密尔顿之手(有关作者身份研究的其他例子,请参见:Martindale & McKenzie,1995;Yule 1944/1968)。

词语分析(如持续比较、备忘录和其他方法)可以帮助研究者发现文本中的主题。瑞安和韦斯纳(Ryan & Weisner,1996)在洛杉矶指导青少年的父亲和母亲们:"描述你们的孩子。用你们自己的语言告诉我们。"从对这个包罗万象的问题的回答中,瑞安和韦斯纳辨别出所有独一无二的词语并且记录下父母们使用每个词的次数。例如,母亲们更多地使用诸如朋友、有创意、时间和诚实;父亲们则更多地使用诸如学校、好、缺乏、学生、欣赏、独立的和极端的等词。这表明,母亲在第一次提及中会表达出对人与人之间问题的关注,而父亲似乎将成就导向的和个人的问题放在首位。此类分析既不考虑词语出现的上下文,也不考虑词语

是被用作肯定还是否定,但这样的提炼可以帮助研究者识别出重要的结构,并能为组群间的系统比较提供数据。

### 结构分析和语义网络

网络分析或结构分析致力于研究从事物的关系中显现出来的性质。早在1959年,奥斯古德(Charles Osgood)就创建了词语联合发生矩阵(word co-occurrence matrices),并应用因子分析和空间图(dimensional plotting)来描述词语之间的关系。今天,语义网络分析是一个正处于成长中的领域(Barnett & Danowski,1992;Danowski,1982、1993)。例如,诺兰和瑞安(Nolan & Ryan,1999)让59个本科生(30个女性和29个男性)描述他们"最难忘的恐怖电影"。研究者辨别出在描述电影时使用得最普遍的45个形容词、动词和名词。他们产生了一个45(词语)×59(人)的矩阵,矩阵的单元格显示的是每个学生是否在他或她的描述中使用了各个关键词。最后,诺兰和瑞安以学生的描述中使用相同的词的情况为基础,创建了一个59(人)×59(人)的人的相似性矩阵。

图29.5显示了诺兰和瑞安的数据的MDS。尽管有一些重叠,也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在他们的研究中,男性和女性使用不同系列的词语来描述恐怖电影。男性更可能使用的词有:十几岁的青少年、烦扰的、暴力、乡下的、黑暗(的)、乡村、山里人;而女性更可能使用的词有:男孩、矮小的、恶棍、年轻的、恐怖、父亲、邪恶。诺兰和瑞安将这些结果解释为:男性对乡下人和乡村感到害怕,而女性更害怕隐私被出卖和精神上的占有(spiritual possession)(关于使用词语—词语矩阵的其他例子,请参见:Jang & Barnett,1994;Schnegg & Bernard,1996)。这个例子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将定性数据转化为定量数据的价值:这样做产生的信息能引起对原始定性数据意义的更进一步的解释。就像任何大规模的数字一样,在词语中也很难看到模式,除非先进行某些数据缩减工作。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下面将有更多论述。

就像词语分析一样,语义网络分析的一个吸引力在于:数据处理是由计算机来做的。在这个过程中引起的唯一的研究者偏差是,决定是将至少出现10次,或是5次或是其他多少次的词语包括在内(关于能产生词语—文本和词语—词语联合发生矩阵的计算机程序的讨论,请参见:Borgatti,1992;Doerfel & Barnett,1996)。然而,不能保证任何词语联合发生矩阵的输出结果都是有意义的,而它则因为能轻易地将模式(因而是意义)曲解为任何项目(item)而臭名远扬。

### 认知地图

认知地图分析结合了人类编码者的直觉知识和网络分析的定量方法。卡利(Carley)使用这种方法的研究是有启发意义的。卡利认为,如果认知模型或图式存在,它们就被表达在人们的讲话文本之中,并能被表现为概念的网络(Carley & Palmquist,1992,p. 602),丹德莱德(D'Andrade,1991)还提出了一种方法。在认知模型被广泛共享的意义上,卡利声称,即使是一块非常小的文本也将包含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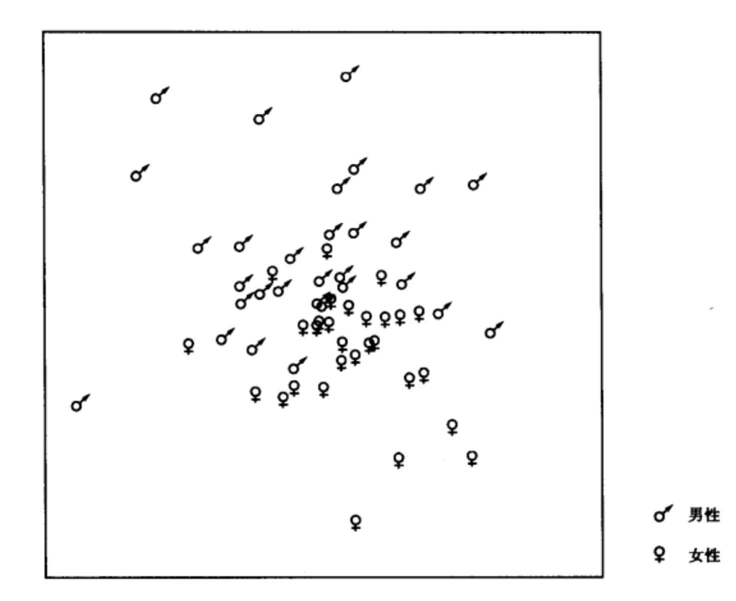



**图 29.5 根据在描述恐怖电影中使用的词语而确定的被调查者的多维定标**

资料来源:Nolan and Ryan(印刷中)

模型所必需的信息,特别是严密定义的生活舞台所必需的信息。

在一个研究中,卡利(Carley,1993)就科学家的研究工作问了学生一些问题。下面是她收集的两个例子:

> 学生 A:我发现科学家从事研究以发现和产生新思想。科学家所做的这些研究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常常需要和其他科学家进行合作,而由此产生的发现将使科学家出名。这样的合作可能是非正式的,也可能是正式的,前者如当他们在餐桌上交流思想时,后者如当他们是一篇论文的合著者时。
>
> 学生 B:对正在进行合作的著名科学家进行研究是一项困难的工作,我已经有了许多非正式的发现。我的研究表明:和其他科学家进行合作的科学家是至少一篇包含其新思想的论文的合著者。有些科学家得出了正式的发现并具有新思想(p. 89)。

卡利通过分析 11 个概念来比较学生们的文本:我、科学家、研究、艰苦的工作、合作、发现、新思想、正式、非正式、合著者、论文。她根据概念的强度、征兆(sige)(肯定的或否定的)、方向(一个概念是否在逻辑上先于其他概念),而不仅仅根据它们的存在来给概念编码。她发现,尽管学生们在他们的文本中使用相同的概念,但这些概念明显地具有不同的意义。为了显示理解上的差异性,卡利主张使用地图,它们能显示概念之间的关系。图 29.6 就是卡利关于两篇文本的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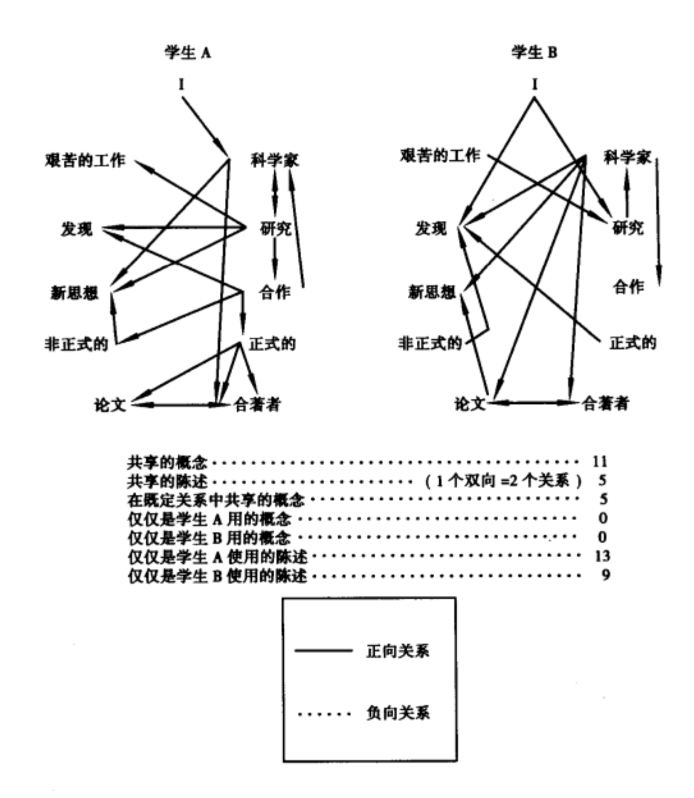



**图 29.6 两个学生文本的编码地图**

资料来源：Kathleen Carley(1993)

卡利的方法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将词语自动计数和人类直觉与解释的敏感性结合了起来。然而，正像卡利承认的那样，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进行编码。不同的编码者将因为做不同的编码选择而产生不同的地图。最后，本土语言能力是分析的基本方法的必要条件之一（Carley，1997；Carley & Kaufer，1993；Carley & Palmquist，1992；Palmquist，Carley，& Dale，1997）。

上下文中的关键词、词语计数、结构分析和认知地图都是将文本缩减到特定词语的基本意义。这种缩减能让研究者轻松地识别一般模式，并对不同文本进行比较。然而，除了上下文中的关键词之外，这些技术都是将词语从其出现的上下文中移开。微妙、细微的差别很可能因此而丢失掉——而这将促使我们对整个文本进行分析。

## 分析文本块：编码

编码是全文本分析的核心和灵魂。编码迫使研究者判断文本的邻近文本块

的意义。和编码相关的基本工作是抽样、识别主题、撰写编码手册、给文本做标记、建构模型(代码之间的关系)、用实证数据检验这些模型。我们将在下面详述每项工作。然后,我们要描述一些主要的编码传统:扎根理论、图式分析、经典内容分析、内容词典、分析性归纳、民族志决策树。我们想强调的是,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传统在文本分析方面都没有垄断地位。

## 抽 样

研究者首先必须确定一辑文本,然后在文本内选择分析单位。挑选可以是随机的,也可以是有目的的,但选择不是坚持某一个或其他认识论传统的问题。韦茨金和布里特(Waitzkin & Britt,1993)从 336 个医生和病人的见面录音中随机选择了 50 个文本,对病人和医生之间的见面做了一个彻底的解释性分析。特罗斯特(Trost,1986)运用经典内容分析来检验 5 个不同的二分变量如何影响青少年和其家庭的关系。5 个变量共有 32 个可能组合,他有目的地从每个组合中选取 5 个个案,做了 160(32 ×5)个访谈。

样本也能以极端的或异常的案例、能表明变量的最大变化的案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典型的现象案例、能证实或驳斥一种假设的案例为基础(关于非随机抽样策略的评述,参见:Patton,1990,pp. 169-186;Sandelowski,1995b)。一个案例可能就足以显示某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但莫斯(Morse,1994)建议,在一个试图理解经验的本质的研究中,要使用至少 6 个参与者。莫斯还建议,在民族志和扎根理论研究中使用 30 ~ 35 个访谈。发现主题和建构理论所要求的个案要少于进行不同群体比较及验证假设或模型所要求的个案。

一旦研究者已经确定了一个文本样本,下一步就是识别基本分析单位。分析单位可以是整个文本(书、访谈、一个调查中对一个开放性问题的回答)、语法片断(词语、词语意义、句子、主题、段落)、格式化的单位(行、列、页),或仅仅是能反映单个主题的文本块——克里普恩多夫(Krippendorf,1980,p. 62)所谓的词干单位。一般的,在旨在进行不同文本间比较的地方(如在经典内容分析中),分析单位必须是不重叠的(关于分析单位的其他类型的讨论,参见:Krippendorf,1980,pp. 57-64;Tesch,1990)。

## 寻找主题

主题是研究者在收集数据之前、之中和之后所识别的抽象的(并且常常是模糊的)结构。文献评述是主题的丰富来源,就像研究者自己关于主题问题的经验一样。然而,研究者时常从文本本身归纳出主题。

有不止一种归纳主题的方法。扎根理论者建议在寻找方法、行动、假设和结果时,仔细地逐行阅读文本。图式分析者建议寻找隐喻、词语的重复使用、内容的转换(Agar & Hobbs,1985)。内容分析者已经使用上下文中的关键词来识别不同的意义。斯普拉德利(Spradley,1979,pp. 199-291)建议寻找社会冲突和文化矛盾的证据、社会控制的非正式方法、人们为维系非个人的社会关系所做的事情、

人们获得和维持成功的和自致的地位所使用的方法、关于人们如何解决问题的信息。这些领域都可能在文化中产生主要主题。巴尔金、瑞安和葛尔伯格(Barkin, Ryan & Gelberg, 1999)用多个独立的编码者将被调查者的声明分门别类、形成词干堆。然后,他们在按堆分类的数据上使用多维定标和聚类分析,来在不同的编码者之间识别共享的副主题(关于其他的例子,参见 Patterson, Bettini, & Nussbaum, 1993)。

威廉姆斯(Willms et al., 1990)及迈尔斯和休伯曼(Miles & Huberman, 1994)建议,研究者开始要通过阅读文献来获得一些一般主题,然后在进行下去时增加更多的主题和副主题。舍利(Shelley, 1992)在她的关于社会网络如何影响晚期肾病病人的研究中遵循了这个建议。她运用"文化资料的提纲"(Murdock, 1971)作为其主题编码的基础,然后通过进一步阅读文本来增加另外的主题。布尔默(Bulmer, 1979)列出 10 个不同的主题来源,包括文献述评、专业定义、本土的常识架构(local commonsense constructs)、研究者的价值观和先前的经验。他同样注意到,研究者的一般理论倾向性、现有文献的丰富性,以及正在被研究的现象的特征会对研究者可能发现的主题产生影响。

无论研究者实际上怎样做归纳编码(inductive coding),当她/他已经识别了主题并将它们提炼到可以应用于整个文本时,就已经做了很多解释性分析。迈尔斯和休伯曼(Miles & Huberman, 1994)精辟地概括为"编码就是分析"(p. 56)。

### 撰写编码手册

编码手册仅仅是组织好的代码列表(常常是层级式的)。戴伊(Dey, 1993, pp. 95-151)、克拉布特里和米勒(Crabtree & Miller, 1992),以及迈尔斯和休伯曼(Miles & Huberman, 1994, pp. 55-72)等人详细阐述了一个研究者应该怎样做一个编码手册。麦奎因、麦克莱伦、凯以和米尔斯坦(MacQueen, McLellan, Kay & Milstein, 1998)认为,一个好的编码手册应该包括对每个编码的详细描述、包含和排除的标准、每个主题在真实文本中的模本。如果一个主题特别抽象,我们建议研究者也要提供关于主题边界的例子,甚至提供那些和主题密切相关但不包含在主题内的案例。编码应该是数据的缩减,而不是增加(Miles, 1979, pp. 593-594)。代码本身是被用来识别或标记文本中特定主题的记忆策略。它们可以是词语或数字——研究者所发现的最易于记忆和应用的任何东西。

作为一个团队进行工作的定性研究者需要就将什么包含进编码手册的问题达成一致。莫斯(Morse, 1994)建议在开始时开一个团体会议。麦奎因(MacQueen et al., 1998)建议某一个团队成员应该被指派为"编码手册的负责人"——我们非常同意这一点。

好的编码手册是在研究进行中被逐步展开和精炼的。库拉萨基(Kurasaki, 1997)访谈了 20 名 sansei——第三代美籍日裔——并用一种扎根理论方法来进行她的种族身份研究。她开始时使用 7 个主题。当分析进行时,她将主题分成副主题。最后,她将两个主题合并,而变成 6 个主要主题和总计 18 个副主题

(Richards & Richards,于 1991 年讨论了数据中出现的、和层级编码结构相关的理论原则。Araujo 于 1995 年以他自己对英国传统制造工业的研究为例子,来描述构思和提炼层级代码的过程)。

代码种类的逐步展开和精炼长期以来都是经典内容分析的中心任务(参见:Berelson,1952,pp. 147-168;Holsi,1969,pp. 95-126),并且在概念词典的建构中特别重要(Deese,1969;Stone,Dunphy,Smith,& Ogilvie,1966,pp. 134-168)。克里普恩多夫(Krippendorf,1980,pp. 71-84),以及卡利、摩根和奥克斯托比(Carley,Morgan & Oxtoby,1996)注意到,编码手册的精炼大量来自于培训编码员对文本进行标注的过程,以及检查编码员之间协调的过程。当编码手册模糊或易于混淆时,多个编码员之间就会出现不一致。第一轮运作也让研究者鉴别出好的例子,以收进编码手册。

### 标注文本

编码包括将代码分配给文本的连续单元。在定性研究中,编码服务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目的。首先,代码充当标记符用于在全部资料中标注文本,以便于以后检索。标记符不和任何固定的文本单元发生联系;它们能标注出简单的短语,或在多页之间延伸。第二,代码充当值被分配给固定的单元(Bernard,1991,1994;Seidel & Kelle,1995)。在这里,代码是被应用到固定的、不重叠的分析单元中的名义的、定序的或定比的值。不重叠的单元可以是文本(如段落、页、文件)、情节、案例或人物。作为标记符的代码是和扎根理论及图式分析相联系的(下面有评述),作为值的代码是和经典内容分析和内容词典相联系的。这两种类型的代码不是互相排斥的,但如果对这两个概念使用一个注释——代码——则可能令人误解。

## 分析文本块:建构概念模型

一旦研究者识别了一系列东西(主题、概念、信仰、行为),下一步就是明确在一个理论模型中这些东西是怎样相互联系的(Miles & Huberman,1994,pp. 134-137)。模型是一系列抽象的建构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Bulmer,1979)。扎根理论、图式分析、民族志决策模型和分析性归纳都包括模型建构阶段。

一旦一个模型开始形成,研究者就要寻找负面案例——那些不符合模型的案例。负面案例或者驳斥模型的某些部分,或者暗示需要建立新的连接。无论哪种情况,负面案例都需要加以调和。负面案例的分析有:Becker,Geer,Hughes & Strauss(1961,pp. 37-45);Strauss & Corbin(1990,pp. 108-109);Lincoln & Guba(1985,pp. 309-313);Dey(1993,pp. 226-233);Miles & Huberman(1994,p. 271);Becker(1998)等。并且这些案例被图式分析者(Quinn,1997)、民族志决策模型的使用者(Gladwin,1989)和使用分析性归纳的学者(Bloor,1976;Gressey,1953/1971;Lindesmith,1947/1968)所使用。

在民族志决策模型和经典内容分析中,模型是建立在一组数据和彼此检验

的基础上的。在他们最初的表述里，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ser & Strauss，1967）强调，建构扎根理论模型是研究过程中的一个步骤，需要对模型进行验证。今天的扎根理论学者和图式分析学者更可能通过寻求专家支持，而不是通过分析一堆二手数据来验证模型。例如，卡尼、墨菲和罗森鲍姆（Kearney，Murphy & Rosenbaum，1994）通过将"优秀母亲的经验"模型提交给熟悉这个研究的、知识渊博的回答者来检验其模型的有效性。

无论可靠性和有效性检验的性质如何，模型是对现实的简化。它们能被做的或多或少复杂一点、能捕捉到给定的一组数据中全部或仅仅是一部分变化。这由研究者和她/他的伙伴们决定一个特定的模型应该被怎样描述。

下面，我们评述了一些最普遍的研究者用来分析文本块的模型。它们包括扎根理论、图式分析、经典内容分析、内容词典、分析性归纳和民族志决策树分析。

### 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学者试图以一种尽可能严格和详细的方式来了解人们的经验。他们试图识别在文本中出现的范畴和概念，并将这些概念连结进独立存在的、正式的理论。方法的最初表达（Glaser & Strauss，1967）仍然是有用的，但后来的作品更易于阅读，也更具有实用性（Charmaz，1990；Lincoln & Guba，1985；Lonkila，1995；Strauss，1987）。斯特劳斯和考宾（Strauss & Corbin，1990）、Dey（1993）和贝克（Becker，1998）提供了特别有用的指导（关于最近的扎根理论研究的一些例子，参见：Hunt & Ropo，1995；Irurita，1996；Kearney et al.，1994；Kearney，Murphy，Irwin，& Rosenbaum，1995；Sohier，1993；Strauss & Corbin，1997；Wilson & Hutchinson，1996；Wright，1997）。

扎根理论是一个反复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分析家越来越"扎根"于数据中，并发展出日益丰富的概念以及关于正在被研究的现象实际如何运作的模型。为了做这些工作，扎根理论学者收集访谈的逐字抄本、通读文本的小样本（通常是逐行逐行的）。桑德罗斯基（Sandelowski，1995a）观察到，文本的分析开始于校对材料和仅仅划出关键短语，"因为它们具有尚未成型的意义"（p. 373）。在一个被称为"开放编码"的步骤中，研究者通过将文本中的真实例子拖在一起来识别潜在主题（Agar，1996；Bernard，1994；Bogdan & Biklen，1992；Lincoln & Guba，1985；Lofland & Lofland，1995；Strauss & Corbin，1990；Taylor & Bogdan，1984）。识别被调查者自己所使用的范畴和术语的过程被称为"在活的有机体内进行编码"（Strauss & Corbin，1990）。当扎根理论学者发展他们的概念和范畴时，他们常常断定他们需要从被调查者那里获得更多的数据。

当编码类型出现时，研究者将它们连结在一个理论模型中。一个方法是比较和对比主题与概念。什么时候、为什么、在什么情况下这些主题会出现在文本中？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zer & Strauss，1967，pp. 101-116）将之称为"持续的比较方法"，它类似于斯普拉德利（Spradley，1979，pp. 160-172）建议研究者询问被

调查者的对比问题(关于比较方法的其他好的描述,参见:Glaser,1978,pp. 56-72;Strauss & Corbin,1990,pp. 84-95)。

建构理论模型的另一个有用的工具是由斯特劳斯和考宾(Strauss & Corbin,1990,pp. 158-175)所描述的条件矩阵(conditional matrix)。条件矩阵是一组同心圆,每个层次都对应一个不同的影响单元。在中心的是行动和互动,外层的环代表国际和国内关系,内层的环代表个人和小团体对行动的影响。矩阵被设计用来使研究者对条件、行动/互动、一个现象的结果更敏感,帮助研究者将这些条件和结果系统地安排进理论中。

写备忘录是记录主题之间关系的主要方法之一。斯特劳斯和考宾(Strauss & Corbin,1990,pp. 18,73-74,109-129,197-219)讨论了三种备忘录:编码笔记、理论笔记和操作笔记。编码笔记描述了在"发现扎根理论的过程中"正在被发现的概念。在理论笔记中,研究者试图概括她/他的关于在文本中接下去会发生什么的思想。操作笔记则是关于实际问题的。

一旦一个模型开始形成,研究者就使用负面案例分析来识别问题,并做适当的修正。扎根理论的最后结果常常通过文本片段的表达来显示——从被调查者那里逐字引用——作为概念和理论的范例。这些例证可能是中心趋势的典型例子,或者他们可能代表规范(norm)之外的例外。扎根理论研究者还通过在地图上展示主要类别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来显示其理论结果(Kearney et al. ,1995;Miles & Huberman, 1994, pp. 134-137)。这些"概念地图"类似于列恩哈特(Leinhardt,1987,1989)、斯特劳斯(Strauss,1992)和丹德莱德(D' Andrade,1991)(下面将看到)等人描述的个人语义网络(personal semantic networks)。

### 图式分析

图式分析将语言学元素和社会学传统结合了起来。它基于这样的思想:人们必须运用认知简化(cognitive simplifications)来帮助搞清楚他们所经常面对的复杂信息(Casson,1983,p. 430)。尚克和阿贝尔森(Schank & Abelson,1977)假定,先验图式(schemata)——或像人们所称呼的手稿——让熟悉文化背景的人们去填充一个故事或事件的细节。沃达克(Wodak,1992,p. 525)说,是我们的先验图式引导我们将蒙娜丽莎的微笑解释为她困惑或绝望的证据。

从方法角度看,图式分析类似于扎根理论。它们都开始于对文本的逐字仔细阅读,寻求发现主题,并将主题连结进理论模型。在一系列文章中,奎因(Quinn,1982,1987,1992,1996,1997)已经分析了上百个小时的访谈以发现作为美国人婚姻基础的概念,并揭示这些概念是怎样被结合在一起的。奎因(Quinn,1997)的方法就是"在他们告诉我们的关于共享知识(shared cognition)的日常谈话中发现线索——收集人们为了说明他们所做的事情而必须记住的东西"(p. 140)。开始,她考察谈话的模式和关键词语和短语的重复使用,特别注意被调查者所使用的关于婚姻推理的隐喻以及共同特征(commonalities)。奎因发现,她的整个文本中的上百个隐喻正好适合八个连结在一起的种类,她称之为永久性、

共享性、兼容性、互惠性、困难、努力、成功(或失败)和失败的风险。

隐喻和谚语不是唯一的被用来从文本中推断意义的语言学特性。丹德莱德(D'Andrade,1991)注意到,"在自然的谈话中,语义组织的最简单、最直接的指征可能就是联想的连接(associative linkages)的重复使用"(p. 294)。他观察到,"实际上,任何一个听过长篇谈话的人——不管是一个朋友、配偶、同事、被调查者还是病人说的——都知道,人们是如何频繁地在围绕着同一个思想网络兜圈子"(p. 287)。

在一个对美国罗得岛州的蓝领工人的研究中,斯特劳斯(Strauss,1992)将这些思想称为"个人的语义网络"。她从她的一个被调查者开始来描述这样的网络。在重读她对一个工人的深度访谈时,斯特劳斯发现,她的被调查者重复地提到与贪婪、钱、商人、同胞以及"存在差异"等概念相联系的思想。她在一张纸上写下这些概念,并且用线和解释将它们连接起来,用以显示这些思想之间的关系。

普莱斯(Price,1987)观察到,当人们讲故事时,他们认为他们的听众和他们共享许多关于这个世界如何运作的假设,因此,他们省去那些"每个人都知道"的信息。因此,她寻找什么是没有说出的信息,用以识别潜在的文化假设(p. 314)。

关于在文本中寻找先验图式的更多的例子,参见霍兰德(Holland,1985)关于被美国人用于解决人与人之间问题的推理的研究、肯普顿(Kempton,1987)关于普通美国人对住宅热度控制的理论的研究、斯特劳斯(Strauss,1997)关于化学工厂的工人及其邻居对自由企业体系的看法的研究、阿加和霍布斯(Agar & Hobbs,1985)关于一个被调查者如何变成夜贼的分析。下面我们将转到社会科学中用于分析文本的另外两个方法:经典内容分析和内容词典。

#### 展示概念和模型

视觉展示是定性分析的一个重要部分。挑选重要引文作为范例、创建矩阵或表格、用流程图或地图的形式来展示理论都是在视觉上和别人交流思想的有效方法。通常用方框和箭头来展示模型,方框里面是主题而箭头代表它们之间的关系。线条可以是单向的或双向的。例如,分类法是用线条表明项目之间的上下级关系的模型。关系能够包括因果关系、联合、选择和时间等。

一个被广泛使用的用于描述主题的方法是从回答者那里直接引用陈述——这些引用能引导读者迅速了解研究者花了几个月或几年所领会到的东西。研究者选择文本片段——从回答者那里逐字引用——作为概念、理论和负面案例的例子。瑞安(Ryan,1999)已经使用多个编码者来识别典型的引用(typical quotes)。他让10个编码者在同一个文本集中标出三个主题。瑞安辩称,所有编码者都标出的文本代表了抽象结构的中心趋势或典型例子,而只有少部分编码者标出的文本则代表了不太典型的例子,更可能是结构"边缘"的典型。

表格能够被用来组织和显示原始文本,或能被用来从多个维度(行、列)概括定性数据。单元格能用逐字引用(verbatim quotes)(Bernard & Ashton-Voyoucalos,

1976;Leinhardt & Smith,1985,p. 254;Miles & Huberman,1994,p. 130)、概括陈述(Yoder,1995)或符号(Fjellman & Gladwin,1985;Van Maanen,Miller,& Johnson,1982)来填充(关于一系列表达格式,参见:Bernard,1994;Miles & Huberman,1994;Werner & Schoepfle,1987)。

### 经典内容分析

扎根理论牵涉数据归纳假设的发现,而经典内容分析则包含将文本缩减为一个单元矩阵(unit-by-unit matrix)的方法,以及定量地分析该矩阵以验证假设的方法。研究者通过将一组代码应用到一组定性数据上(包括书面文本和视频、音频媒体)而创建一个矩阵。不同于扎根理论或图式分析,内容分析方法认为,兴趣的代码(the codes of interest)已经被发现并描述了。

一旦研究者已经选择了文本的一个样本,经典内容分析的下一步就是在编码手册中对每个主题或变量的每个单元进行编码。这产生了可以用多种统计方法进行分析的单元—变量矩阵。例如,考恩和奥布赖恩(Cowan & O' Brien,1990)验证男性和女性谁更可能成为暴力影片中的幸存者。传统的关于这些影片的常识暗示,受害者大多数是妇女,而施暴者则大多数是男人。考恩和奥布赖恩选择了56个暴力影片并确定了474个受害者。他们将每个受害者按性别和幸存进行编码。他们发现,施暴者大多数是男人,但男性和女性有同样的可能成为受害者。幸存的妇女较少可能被显示从事性行为,也较少可能比她们的没有幸存的搭档在肉体上更有吸引力。男性受害者则是愤世嫉俗的、自我本位的和独裁的。考恩和奥布赖恩总结道,在暴力影片中,在性方面纯洁的妇女幸存了下来,而"冲动的男性"则走向死亡(p. 195)。

文本的编码通常被分配给多个编码者,这样研究者就能看到正在被研究的结构是否是共享的,多个编码者能否可靠的使用同一个代码。典型地,研究者首先计算编码者对每个变量或主题编码一致的百分比。然后他们用一个修正公式(correction formula)来考虑这个事实,认为小部分一致常常可能是出于偶然。一致的那一小部分的数量取决于编码员的数量和每个代码测量的精确性。如果两个人对存在的或不存在的同一个主题编码,其余情况相同,他们可能会有25%的机会在任何答案上都一致。如果一个主题,如财富,是按顺序测量(低、中、高)的,则几率一致性(chance agreement)的可能性也会相应改变。科恩(Cohen,1960)的 Kappa,或者 $K$,是一种流行的将这些几率都考虑进去的测量方法。当 $K$ 为零时,一致性可能就是预期的几率。当 $K$ 为负数时,观察到的一致性的水平低于预期的几率。编码者之间有多大的一致性就足够了呢?标准仍然是特别的,但克里普恩多夫(Krippendorf,1980,pp. 147-148)主张至少应该有 0.7 的一致性,并且注意到有些学者(如,Brouwer,Clark,Gerbner,& Krippendorf,1969)使用 0.8 作为分界点。弗雷斯(Fleiss,1971)和莱特(Light,1971)扩展了 Kappa 来操纵多个编码员。关于编码员之间一致性的其他测量方法,参见:Krippendorf,1980,pp. 147-154;Craig,1981。

可靠性“所关心的是，一个实验、试验，或任何测量程序在重复试验时产生相同结果的程度”（Carmines & Zeller，1979，p. 11）。编码者之间一致性水平较高说明一个主题有一些外部效度，而不仅仅是研究者凭空想像出来的虚构的事物（Mitchell，1979）。毫不奇怪的是，研究者已经提出许多方法来评估效度（关于关键问题的评述，参见：Campbell，1957；Campbell & Stanley，1963；Cook & Campbell，1979；Denzin，1997；Fielding & Fielding，1986；Guba，1981；Guba & Lincoln，1982；Hammersley，1992；Kirk & Miller，1986；Lincoln & Guba，1985）。伯纳德（Bernard，1994）认为，最终，一个概念的效度取决于测量这个概念的方法的有用性以及科学共同体的集体判断：认为一个概念和它的测量是有效的。他说：“最后，我们被迫研究我们判断的结果，那是它应该成为的样子。有效的测量得到有效的数据，但有效性本身取决于研究者的集体评判。”（p. 43）概括涉及结果对其他人员或样本的适用程度。它取决于原始数据在多大程度上是更大规模的人口的代表。

关于内容分析的著作的评述，参见：Pool，1959；Gerbner，Holsti，Krippendorf，Paisley & Stone，1969；Holsti，1969；Krippendorf，1980；Weber，1990；Roberts，1997。经典内容分析的例子可以在媒体研究（Hirschman，1987；Kolbe & Albanese，1996；Spiggle，1986）、政治修辞（Kaid，Tedesco，& McKinnon，1996）、民间传说（Johnson & Price-Williams，1997）、商业关系（Spears，Mowen，& Chakraborty，1996）、卫生保健法（Potts，Runyan，Zerger，& Marchetti，1996；Sleath，Svarstad，& Roter，1997）、法律（Imrich，Mullin，& Linz，1995）中找到。经典内容分析也是人类学家验证跨文化假设（Bradley，Moore，Burton，& White，1990；Ember & Ember，1992；White & Burton，1988）的基本方法。早期对这个方法基本的批评内容，参见：Kracauer，1953；George，1959。

**内容词典**

以计算机为基础、多种用途的内容分析词典能让研究者自动操作文本的编码。为了创建这样的词典，研究者根据一系列规则，用手工将词语分配到一个或多个类别中（在用计算机处理过的内容分析词典中，典型的有 50 ~ 60 个类别）。这些规则是一个计算机程序的一部分，该程序能解析新的文本，将词语分配到类别中。

关于内容词典方面的成果是综合查询系统（general inquirer），它开始于 1960 年代，并沿用至今（Kelly & Stone，1975；Stone et al.，1966；Zuell，Weber，& Mohler，1989）。综合查询系统是一种能使用一部词典（《哈佛心理社会词典》，*Harvard Psychosocial Dictionary*）来解析文本，并将其分配到编码好的类别中的计算机程序。随着时间流逝，该词典已经被升级了。最新的版本（哈佛Ⅳ）包含了超过 10 000个词语，并能辨析词语的多重意义（Rosenberg，Schnurr，& Oxman，1990，p. 303）。由于这些词典没有包含英语语言的所有词汇，研究者可以将未被认可的词语分配到他们认为合适的类别，这是一个进一步修改“编码手册”的过程。

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词典究竟效果如何？用 66 个自杀短信（遗言）来对综合

查询系统的早期版本进行测试——33 个由实际上已经自杀的人所写,另外 33 个是由人模仿自杀短信所写。该程序对文本进行解析,并挑出了当时 91% 的实际的自杀短信(Ogilvie,Stone,& Schneidman,1966)。内容词典并不需要太大。科比(Colby,1966)创建了一个简单的词典来辨别纳瓦霍人和祖尼人对词干理解测试的回答。关于内容分析的专用词典的其他例子,参见:Fan & Shaffer,1990;Furbee,1996;Holsti,1966;Jehn & Werner,1993;Laffal,1990,1995;McTavish & Pirro,1990;Schnurr,Rosenberg,Oxman & Tucker,1986。

内容词典富有魅力,因为它们是完全可靠的,并且是自动操作的,但是,就如沙波罗(Shapiro,1997)所辩称的那样,这一点可能会被效度的下降所抵消。由于时间关系,只有人类能够解析上下文中反映出来的意义的某些精妙之处(Viney,1983),但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词典始终在不断改进。例如,现在可以利用 Gottechalk-Gleser 心理量表测量各种形式的焦虑和敌意,由计算机给文本打分,可靠性高于 0.8(Gottschalk & Bechtel,1993)。

**分析性归纳和布尔检验(boolean tests)**

分析性归纳是通过对案例的仔细研究来对现象进行因果解释的一种正式的、非定量的研究方法。它是由兹纳涅茨基(Znaniecke,1934,pp. 249-331)作为统计分析的一种选择方法提出的,并由林德史密斯(Lindesmith,1947/1968)和克雷西(Cressey,1953/1971)进行了修改,由邓津(Denzin,1978)、布卢默(Bulmer,1979)、曼宁(Manning,1982)、贝克(Becker,1998)及其他人进行了讨论(关于这种方法的评论,参见:Robinson,1951)。这种方法是一种正式的负面案例分析。

这种方法可以通过一系列步骤来描述:首先,定义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并提出一个解释。其次,检查一个案例来看看这个解释是否符合。如果符合,检查另一个案例。在一个新的案例宣告一个解释为假之前,它就是被承认的。当发现一个案例不符合时,那么根据分析性归纳的规则,可供选择的就是改变解释(这样你就能包括新的案例)或者重新定义现象(这样你就能排除损害(解释)的案例)。在理想状态下,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直到获得针对一个现象的所有已知案例的一个普遍解释。通过宣告案例都是独特的来解释案例是一个诱人但不合理的选择。分析性归纳的经典例子包括林德史密斯(Lindesmith,1947/1968)对吸毒成瘾者的研究、克雷西(Cressey,1953/1971)对挪用公款者的研究,以及麦克里利(McCleary,1978)所研究的,当假释官员所监管的人违反假释条款时,他们如何决策。关于这个方法的特别清楚的例子,请参见布卢尔(Bloor,1976,1978)关于医生如何决定是否摘除儿童扁桃体的分析。

拉津(Ragin,1987,1994)通过使用布尔方法而将分析性归纳的逻辑正式化,罗米(Romme,1995)将这个方法运用到原文数据中。布尔代数仅包括两个状态(真和假、存在的和不存在的),但即便使用如此简单的输入,事情也会变得非常复杂、非常快。仅用三个二分的原因条件(A 和非 A、B 和非 B、C 和非 C)和一个结果变量(D 和非 D),就有 16 种可能的个案:A、B、C、D,A、非 B、C、D,A、B、非

C、D,等等。布尔分析包括建立一个公认的事实表格,或一个实际结果对可能结果的矩阵(更多的关于事实表格,以及它们如何与负面案例分析相联系的情况,参见:Becker,1998,pp. 146-214)。

施韦策(Schweizer,1991,1996)将这种方法运用在他的关于中国陈村居民的冲突和社会地位的分析中(关于施韦策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的讨论,参见:Bernard & Ryan,1998)。这个政治戏剧中参与者的所有数据都摘录自关于陈村的历史叙述。像经典内容分析和认知地图一样,分析性归纳要求人工编码者能阅读文本、给文本编码,然后产生一个事件—变量的矩阵。然而,分析的目的不是显示所有代码之间的关系,而是要发现概念之间逻辑关系的最小的组,而这能说明单个的因变量。有三个以上的变量时,分析就变得更加困难。计算机程序如 QCA(Drass,1980)和 ANTHROPAC(Borgatti,1992)能检验所有可能的多变量假设,并找到最佳解决方案(在 Weitzman & Miles,1995 中对 QCA 有评述)。

### 民族志决策模型

民族志决策模型(EDMs)是能在特定环境下预测行为选择的定性、因果分析。一个 EDMs 经常被称为一个决策树或流程图;它包含了一系列嵌套的"如果—就"陈述,它们将标准(和标准的结合)连接到感兴趣的行为上(图 29.7)。EDMs 已经被用来解释渔夫如何决定到哪里捕鱼(Gatewood,1983)、人们给他们的产品定什么价格(Gladwin,1971;Quinn,1978),以及人们为一个疾病选择什么治疗方法(Mathews & Hill,1990;Ryan & Martinez,1996;Young,1980)。

EDMs 结合了很多运用在扎根理论和经典内容分析中的方法。格莱德温(Gladwin,1989)展示了建立一个民族志决策树模型的基本步骤(关于这些步骤的其他清晰的描述,参见 Hill,1998;Ryan & Martinez,1996)。

EDMs 要求探索性地收集数据、建构初步模型和检验模型。首先,研究者识别他们想要研究的决策,以及可得的其他选择。典型地,EDMs 是基于简单的是/否类型的行为而做出的。然而,它们能被用于预测多种行为(Mathews & Hill,1990;Young,1980),也能预测多种行为的次序(Ryan & Martinez,1996)。

其次,研究者进行开放式访谈,来发现人们在多种备选事物中进行选择的标准。研究者首先让人们回忆最近发生的真实的——不是假设的——行为,并回忆他们为什么做或者不做这个行为。这是我们最近所做的一个研究中的例子:"回想一下最近一次你手里拿着的一听饮料——苏打、果汁、水、啤酒,或任何东西。你让这个罐子进入再循环了吗?为什么(为什么没有)?"这种问题产生了一系列决策标准。为了了解这些标准是怎样被连接的,EDMs 的研究者们让人们将最近的决策和过去的类似决策进行比较。有些研究者已经用小插图来得出各种标准之间的关系(如,Weller,Ruebush,& Klein,1997;Young,1980)。

手里有了一系列决策标准,研究者们的下一步就是可能从一个新的人群中,系统收集关于每个标准怎样被用于或没有用于某个行为的最近例子的数据。"再循环的垃圾箱便利吗?"和"你通常在家里将罐子重复利用吗?"是我们关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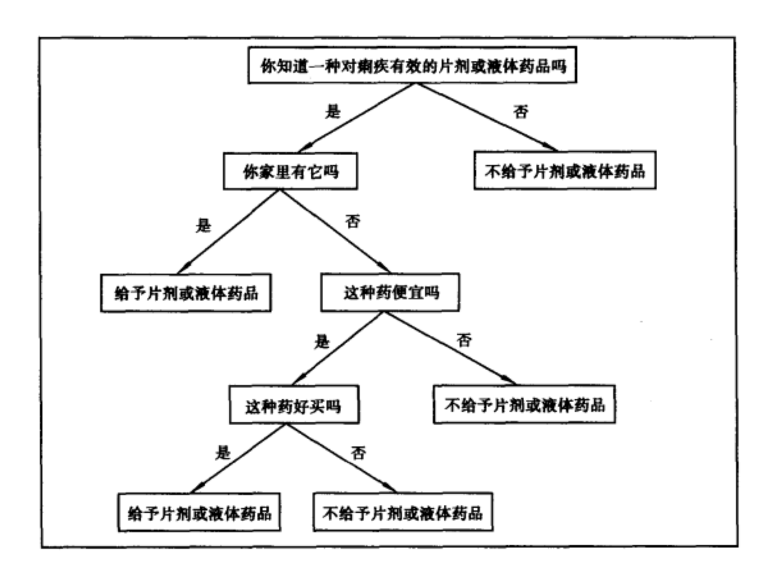



**图 29.7 在墨西哥农村,为治疗儿童腹泻而给母亲开药的限制决策模型**

资料来源:Ryan & Martinez(1996)。

再循环行为研究的 30 个问题中的两个。这个阶段得到的数据经过仔细审查,被用来建立一个关于行为的决策程序的初步模型。仔细检查不符合这个模型的案例,并对模型进行修正。研究者调整,或调节模型,直到他们获得一个令人满意的事后预测的(postdictive)精确度水平——EDMs 研究者认为至少是 80%。经济的(parsimonious)模型比复杂的模型更受青睐(关于建构和调整决策树的自动操作方法,参见:Mingers,1989a,1989b)。

过程到此还没有结束——同样的数据被用于建构初步模型和检验其事后预测的精确度。当 EDMs 研究者对其模型感到自信时,他们就用独立样本对模型进行检验,看它的预测是否和事后预测的一样好。典型地,EDMs 能预测 80% 以上的被模拟的任何行为,大大高于我们根据几率所预期的水平(关于如何在 EDMs 中计算精确度的更详细的讨论,参见:Ryan & Martinez,1996;Weller et al.,1997)。

因为牵涉高强度的劳动,EDMs 已经被必要的限制在较小且具有同质性人群中的相对简单的决策。然而,最近我们发现,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中,我们能有效地检验关于是否要回收罐头、是否要在杂货店中使用纸袋或塑料袋的民族志派生(ethnograhically derived)的决策模型(Bernard,Ryan,& Borgatti,1999)。

EDMs 能作为决策树(如 Gladwin,1989)、决策表格(Mathews & Hill,1990;Young,1980),或作为"如果—就"陈述中的一系列规则(Ryan & Martinez,1996)来展示。像主成分分析、民俗分类,和图式分析一样,EDMs 代表了一种聚合的决策过程,而并不必然代表人们头脑中正在进行的过程(Garro,1998)。

# 打破边界

作为一种研究策略的文本分析渗透进了社会科学，而进行文本分析的一系列方法是令人鼓舞的。研究者检查词语、句子、段落、页、文件、思想、意义、泛语言学特性(paralinguistic features)，甚至文本中漏掉的东西。他们进行解释、标注、检索和计数。他们轮流使用解释性分析和数字分析。他们将文本分析用于探索性和证实性目的。研究者确定主题、对其进行描述，并在个案和人群之间对它们进行比较。最后，他们将主题结合进概念模型和理论来解释和预测社会现象。

图29.1描述了在社会科学中发现的很大范围的分析方法。为了使我们的介绍和关于定性方法的文献一致，我们根据研究者的目的以及方法所典型适用的文本的类型来组织这些方法。

在本章中，我们集中于社会学传统，而非语言学传统，前者将文本看作“透视经验的窗口”，而后者描述文本是如何被逐步展开和组织起来的。研究者从社会学和语言学两个取向来分析诸如谈话、表演和叙事这样的文本。尽管研究者的程序可能不同，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我们描述的许多社会学方法在语言学传统中没有用，反之亦然。

我们也区别了那些和系统得出的数据相联系的分析方法及那些和自由组织的文本相联系的方法。然而，我们认为，这些数据分析的配对是一些惯例而不是必需。研究者想要①识别关键项目和概念的范围和显著性(salience)，②发现这些项目和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③建构将这些概念连接在一起的模型，并对之进行检验。他们使用自由列表、上下文中的关键词、词语计数、扎根理论的探索阶段、图式分析和EDMs来揭示潜在有用的主题和概念。

研究者运用归堆分类、配对比较、三个一组的检验、框架替代、语义网络、认知地图、内容分析和内容词典、扎根理论的建模阶段、图式分析和EDMs来揭示抽象的概念是如何彼此联系的。他们将关系展示为模型或框架。这些框架包括依靠布尔逻辑(主成分分析和分析性归纳)的正式模型、分层模型(分类学和民族志决策模型)、概率模型(经典内容分析和内容词典)，以及更加抽象的模型，如那些由扎根理论及图式分析所产生的模型。下面我们描述两个重要的相关研究的例子，在这些例子里，研究者将方法结合起来运用以便更全面地理解其数据。

杰恩和杜塞(Jehn & Doucet, 1996, 1997)运用词语计数、经典内容分析和认知地图来分析中国和美国的商业合作伙伴之间的冲突。他们让76个曾经在中美合资企业工作的美国经理来描述他们和商业伙伴之间最近的人际冲突。每个人描述了和一个相同文化的经理及一个不同文化的经理相处的一种状况。研究者确信，每个被访的经理包括的信息有：她/他与其他人的关系、谁是有关的、冲突是什么、什么导致了冲突、冲突是怎样解决的。

在收集了叙述之后，杰恩和杜塞让他们的被调查者帮助确定叙述中的内在

主题(emic themes)。首先,他们从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文化内冲突的叙述中产生分开的词语列表。他们让三个移居国外的经理充当鉴定人,来确定和冲突有关系的所有词语。他们从不同文化的列表中确定了 542 个冲突词语,从文化内的列表中决定了 242 个冲突词语。杰恩和杜塞然后又让这三个鉴定人将这些词语归堆或分类。专家们在文化之间冲突的数据中识别了 15 个子种类(如冲突、期望、规则、权力和易变),在文化内冲突的数据中识别了 15 个种类(如冲突、需要、标准、权力、有争议的、失败)。考虑每个数据集合中词语的总数量,冲突词语在文化内冲突的访谈中更经常被使用,而解决性术语则更可能被用在不同文化之间冲突的访谈中。

杰恩和杜塞也使用传统的内容分析方法对他们的数据进行分析。他们让两个编码者阅读 152 个关于冲突的情节(76 个文化内冲突和 76 个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用他们已经从文献中确定的 27 个不同主题对每个冲突情节进行评估(用 5 分制)。这产生了两个 76×27 的情节—主题的轮廓矩阵(profile matrices)——一个是文化内冲突,一个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矩阵的前三个因素反映了:①人际间的仇恨和敌意,②恶化,以及③冲突的不稳定性质。文化内冲突矩阵的前两个因素反映了:①具有不稳定性质的仇恨和憎恶,②语言的激烈程度很小的、表现平静的冲突。

最后,杰恩和杜塞确定了他们感觉最清晰、最精炼的 30 个文化内情节和 30 个文化之间的情节。他们招募了 50 多个移居国外的经理来评估 60 ~ 120 对随机抽取的情节的相似性(用 5 分制)。当将不同的被调查者结合在一起时,经理们的判断产生了两个集合的情节—情节相似性矩阵——一个是文化内冲突,一个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不同文化相似性的数据的多维定标确定了四个维度:①欢迎变化 *vs* 拒绝变化,②情境性原因 *vs* 个人特性,③基于信任的高水平解决能力 *vs* 低水平解决能力,和④基于忍耐的高水平解决能力 *vs* 低水平解决能力。文化内相似性的数据的定标确定了四个不同的维度:①高度合作 *vs* 低度合作,②高水平对抗 *vs* 低水平对抗,③解决问题 *vs* 接受问题,和④已解决 *vs* 对正在进行的。

杰恩和杜塞的研究给人们以深刻印象,因为分析从这些工作中产生的数据已经产生了不同系列的主题。所有三个主位归纳的主题系列都有一些直觉的吸引力,而这三个都产生了有用的分析性结果。研究者也可能已经用扎根理论或图式分析的方法来揭示甚至更多的主题。

杰恩和杜塞不是唯一的曾经将不同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的研究者。在一系列关于年轻成年人的"非经常性的"药品使用者的文章中,阿加(Agar,1979,1980,1983)使用了扎根理论方法来建构行为模型。然后,他使用经典内容分析方法来检验他的假设。阿加对他的三个被调查者进行了访谈,并转录了三个访谈。在他 1979 年的文章中,阿加描述了他最初的、直觉的分析。他抽出了与被调查者的互动或其他人的评价有关的所有陈述。然后,他着眼于这些陈述,并根据它们的内容将其分成堆。他给每个堆命名一个主题,然后评判这些主题如何互动。他发现他有三个堆:第一堆包含的陈述是被调查者所表达的,对处于支配社会地

位的人的负面情感;第二堆的陈述强调了他人的知识和意识(awareness);第三小类中的陈述强调了改变或对新经验开放的重要性。

从这个直觉分析中,阿加认为他的被调查者正在告诉他:那些处于权威地位的人只对展示他们的权威有兴趣,除非他们有知识或意识;知识或意识来自于对新经验的开放;多数处于权威地位的人是拒绝新经验或改变的。

为了检验他对数据的直觉理解,阿加(Agar,1983)使用了来自一个被调查者的所有陈述,并根据它们的所有角色类型(家族、朋友/熟人、教育的、职业的,或其他)、权力(支配的、对称的、从属的、未决定的)和情感(积极的、消极的、矛盾的,或缺乏的)对这些陈述进行编码。阿加特别感兴趣的是,(人们)是否会向那些具有支配的社会角色的人表达负面情感。对于一个被调查者,阿加发现,有超过 40 个陈述被编码为支配的、32 个被编码为消极的、8 个被编码为积极的。在被编码为对称的 36 个陈述中,20 个被编码为积极的、16 个被编码为消极的,这对他最初的理论给予了支持。

接下来,阿加仔细考虑了异常案例——被调查者对一个具有支配角色的人表达了积极情感的 8 个陈述。这些反例暗示,当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他人拥有被调查者所重视的知识,或者和被调查者沟通过这些知识时,他就会得到积极的情感。

最后,阿加(Agar,1980)设计了一个更系统的问卷来进一步验证他的假设。他选择了 12 个陈述,先前确定的控制、知识和变化主题中各有 4 个陈述。他将这些陈述和来自被调查者的记录的八个角色(父亲、母亲、雇主、教师、朋友、妻子、合作者、队友)相匹配。然后阿加返回到被调查者那里,询问他们作为结果的陈述是真实的、虚假的,还是不相关的(没有被调查者报告是"不相关的")。然后,阿加将被调查者的回答和他的原始假设进行对比。他发现,总体而言,他的假设是正确的,但他的预期和他的结果之间的差异暗示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这些例子表明,研究者能运用一种方法来分析不同类型的数据,他们也能用多种方法来分析同一个数据。文本分析被自称实证主义者的人和类似解释主义者的人所使用。就像我们在别的地方(Bernard,1993;Bernard & Ryan,1998)讨论的,方法仅仅是工具,它们属于每一个人。

## 下一步是什么

我们不想减少实证主义者和解释主义者在认识论立场上的深刻的智力差异。然而,我们认为,当研究者能在定性和定量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之间轻松而不费力的转换时,两个认识论立场之间的差别将会具有较少的实践重要性(practical importance)。换句话说,当研究者承认了他们可任意使用的全部工具,并且当这些工具易于使用时,研究的实用主义将减少定性数据和定量数据及其分析方法之间的差异。

目前正在开发越来越多的用于定性数据分析的有用的软件工具——并且正在加快速度。有用的工具创造出市场,而市场需要又创造了日益增加的有用的工具。定性数据分析软件包(ATLAS/ti,NUD · IST,Code-A-Text,the Ethnograph,AnSWR,和其他工具)在过去短短几年中已经快速改进了(Fischer,1994;Kelle,1995;Weitzman & Miles,1995)。这些产品,包括其他产品,让研究者确定主题、编撰编码手册、标注文本、创建备忘录和发展理论模型越来越容易。松散的以一种对定性分析的扎根理论式的方法为基础,许多程序组合最近已经包容了来自经典内容分析的方法。例如,有几个程序能让研究者将数据输出为矩阵,然后,他们就能用其他程序对其进行分析。

然而,研究者仍然受程序定义的分析单位的限制——通常是标注的文本块或被调查者。研究者需要灵活性来根据要求创建矩阵,它们可能是用于词语分析的词语—主题矩阵或词语—被调查者矩阵,它们也可能是用于内容分析的句子—代码矩阵或段落—代码矩阵。一系列的词语分析功能将极大地提高存在于程序中的自动编码性能,而这些程序是切合扎根理论学派的学者的兴趣的。研究者应该能够运用扎根理论对文本的一个片断进行编码,然后,确定和每个主题相联系的关键词。他们应该能够使用关键词在一大集文本中检索主题的额外出现情况。

当程序允许使用多个编码者,并轻松地、系统地识别编码者之间的一致和不一致时,研究者将能更好地描述主题、训练助手。增加多种方法来测量编码者之间的一致性也同样有用,这只有某些程序能做。有些程序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选项,用它可以记录多个编码者的标注行为,但没有提供测量编码者之间一致性的直接方法。

文本分析软件的发展仅仅是一个开始。大约 15 年前,拼写检查程序、辞典、可升级的字体都是分开售卖的。今天,这些功能被整合进了一个性能完备的文字处理软件包。仅仅大约 10 年前,绘图程序是和做统计分析的程序分开售卖的。今天,绘图功能被整合进了性能完备的统计分析软件包。当文本分析软件的程序员为市场份额而竞争时,软件包将变得更加具有包容性,变得能将来自两种对立的认识论的方法融合到一起。这不久就会发生。

Agar, M. (1979). Themes revisited: Some problems in cognitive anthropology. *Discourse Processes*, 2, 11-31.

Agar, M. (1980). Getting better quality stuff: Methodological competition in an interdisciplinary niche. *Urban Life*, 9, 34-50.

Agar, M. (1983). Microcomputers as field tools.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17, 19-26.

Agar, M. (1996). *Speaking of ethnography*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Agar, M., & Hobbs, J. (1985). How to grow schemata out of interviews. In J. W. D. Dougherty (Ed.), *Directions in cognitive anthropology* (pp. 413-431).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Albert, S. M. (1991). Cognition of caregiving

tasks: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of the caregiver task domain. *The Gerontologist*, 31, 726-734.

Allen, J. T., & Italie, G. (1954). *A concordance to Euripid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raujo, L. (1995). Designing and refining hierarchical coding frames. In U. Kelle (Ed.), *Computer-aide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Theory, methods and practice* (pp. 96-104). London: Sage.

Barkin, S., Ryan, G. W., & Gelberg, L. (1999). What clinicians can do to further youth violence primary prevention: A qualitative study. *Injury Prevention*, 5, 53-58.

Barnett, G. A., & Danowski, J. A. (1992). The structure of communication: A network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 164-285.

Becker, H. S. (1998). *Tricks of the trade: How to think about your research while you're doing i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ecker, H. S., Geer, B., Hughes, E. C., & Strauss, A. L. (1961). *Boys in white: Student culture in medical schoo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erelson, B. (1952). *Content analysi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Glencoe, IL: Free Press.

Bernard, H. R. (1991). About text management and computers. *CAM Newsletter*, 3(1), 1-4, 7, 12.

Bernard, H. R. (1993). Methods belong to all of us. In R. Borofsky (Ed.), *Assessing cultural anthropology* (pp. 168-178). New York: McGrawHill.

Bernard, H. R. (1994). *Research methods in anthropology: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2nd ed.).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Bernard, H. R., & Ashton-Voyoucalos, S. (1976). Return migration to Greece. *Journal of the Steward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8(1), 31-51.

Bernard, H. R., & Ryan, G. W. (1998).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of text analysis. In H. R. Bernard (Ed.), *Handbook of method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pp. 595-646).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Bernard, H. R., Ryan, G. W., & Borgatti, S. (1999). *Green cognition and behaviors.* Report submitted to Ford Research Laboratories, Dearborn, MI.

Bessinger, J. B. (1969) *A concordance to Beowulf.*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Bloor, M. (1976). Bishop Berkeley and the adenotonsillectomy dilemma. *Sociology*, 10, 43-61.

Bloor, M. (1978). On the analysis of observational data: A discussion of the worth and uses of inductive techniques and respondent validation. *Sociology*, 12, 545-557.

Bogdan, R. C., & Biklen, S. K. (1992). *Qualitative research for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methods* (2nd ed.). Boston: Allyn & Bacon.

Borgatti, S. P. (1992). *ANTHROPAC* 4.0. Columbia, SC: Analytic Technologies. Available Internet: http://www.analytictech.com

Borgatti, S. P. (1998). The methods. In V. C. De Munck & E. J. Sobo (Eds.), *Using methods in the field: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and casebook* (pp. 249-252).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Borgatti, S. P. (1999). Elicitation methods for cultural domain analysis. In J. Schensul, M. LeCompte, S. Borgatti, & B. Nastasi (Eds.), *The ethnographer's toolkit: Vol. 3. Enhanced ethnographic methods* (pp. 115-151).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Boster, J. (1994). The successive pile sort. *Cultural Anthropology Methods Journal*, 6(2), 11-12.

Bradley, C., Moore, C. C., Burton, M. L., & White, D. R. (1990). A cross-cultural historical analysis of subsistence chang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2, 447-457.

Brouwer, M., Clark, C. C., Gerbner, G., & Krippendorf, K. (1969). The television world of violence. In R. K. Baker & S. J. Ball (Eds.), *Mass media and violence: 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Violence* (pp. 311-339, 519-591).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Bulmer, M. (1979). Concepts in the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data. *Sociological Review*, 27, 651-677.

Burton, D. M. (1981a). Automated concordances and word indexes: The early sixties and the early centers.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15, 83-100.

Burton, D. M. (1981b). Automated concordances and word indexes: The process, the programs, and the products.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15, 139-154.

Burton, D. M. (1982). Automated concordances and word indexes: Machine decisions and editorial revisions.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16, 195-218.

Campbell, D. T. (1957). Factors relevant to the validity of experiments in social setting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54, 297-312.

Campbell, D. T., & Stanley, J. C. (1963). *Experimental an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for research.* Chicago: Rand McNally.

Carey, J. W., Morgan, M., & Oxtoby, M. J. (1996). Intercoder agreement in analysis of responses to open-ended interview questions: Examples from tuberculosis research. *Cultural Anthropology Methods Journal*, 8(3), 1-5.

Carley, K. (1993). Coding choices for textual analysis: A comparison of content analysis and map analysis. In P. Marsden (Ed.),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pp. 75-126). Oxford: Blackwell.

Carley, K. (1997). Network text analysis: The network position of concepts. In C. W. Roberts (Ed.), *Text analysi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Methods for drawing statistical inferences from texts and transcripts* (pp. 79-100).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Carley, K., & Kaufer, D. S. (1993). Semantic connectivity: An approach for analyzing semantic networks. *Communication Theory*, 3, 182-213.

Carley, K., & Palmquist, P. (1992). Extracting, representing, and analyzing mental models. *Social Forces*, 70, 601-636.

Carmines, E. G., & Zeller, R. A. (1979).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ssessment.* Beverly Hills, CA: Sage.

Casson, R. (1983). Schemata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2, 429-462.

Charmaz, K. (1990). "Discovering" chronic illness: Using grounded theory.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30, 1161-1172.

Cohen, J. (1960). A coefficient of agreement for nominal scales.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20, 37-48.

Colby, B. N. (1966). The analysis of culture content and the patterning of narrative concern in text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8, 374-388.

Conklin, H. (1955). Hanunóo color categories. *Southwest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1, 339-344.

Cook, T. D., & Campbell, D. T. (1979). *Quasi-experimentation: Design and analysis issues for field settings.* Chicago: Rand McNally.

Cowan, G., & O'Brien, M. (1990). Gender and survival versus death in slasher films: A content analysis. *Sex Roles*, 23(3-4), 187-196.

Crabtree, B. F., & Miller, W. L. (1992). A template approach to text analysis: Developing and using codebooks. In B. F. Crabtree & W. L. Miller (Eds.), *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93-109). Newbury Park, CA: Sage.

Craig, R. T. (1981). Generalization of Scott's index of intercoder agreement.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5, 260-264.

Cressey, D. R. (1971). *Other people's money: A study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embezzlement.* Montclair, NJ: Patterson Smith.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3)

D'Andrade, R. (1991). The identification of schemas in naturalistic data. In M. J. Horowitz (Ed.), *Person schemas and maladaptive interpersonal patterns* (pp. 279-30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Andrade, R. (1995).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anthrop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ndrade, R., Quinn, N., Nerlove, S., & Romney, A. K. (1972). Categories of disease in American-English and Mexican-Spanish. In A. K. Romney et al. (Eds.),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2, pp. 9-54). New York: Seminar.

Danielson, W. A., & Lasorsa, D. L. (1997). Perceptions of social change: 100 years of front-page content in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Los Angeles Times*. In C. W. Roberts (Ed.), *Text analysi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Methods for drawing statistical inferences from texts and transcripts* (pp. 103-116).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Danowski, J. A. (1982). A network-based content analysis methodology for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 illustration with a computer bulletin board. In M. Burgoon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6* (pp. 904-925). Beverly Hills, CA: Sage.

Danowski, J. A. (1993). Network analysis of message content. In W. D. Richards & G. A. Barnett (Eds.), *Progress in communication science* (Vol. 12, pp. 197-221). Norwood, NJ: Ablex.

Darton, M. (1976). *Modern concordance to the New Testament*.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Deese, J. (1969). Conceptual categories in the study of content. In G. Gerbner, O. R. Holsti, K. Krippendorf, W. J. Paisley, & P. J. Stone (Eds.), *The analysis of communication content: Developments in scientific theories and computer techniques* (pp. 39-56). New York: John Wiley.

Denzin, N. K. (1978). *The research act: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methods* (2n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Denzin, N. K. (1997). *Interpretive ethnography: Ethnographic practices for the 21st century*.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y, I. (1993).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 user-friendly guide for social scientist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Doerfel, M. L., & Barnett, G. A. (1996). The use of Catpac for text analysis. *Cultural Anthropology Methods Journal*, 8(2), 4-7.

Drass, K. (1980). The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data: A computer program. *Urban Life*, 9, 332-353.

Ember, C. R., & Ember, M. (1992). Resource unpredictability, mistrust, and war: A crosscultural stud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6, 242-262.

Erickson, P. (1997). Contraceptive methods: Do Hispanic adolescents and their family planning care providers think about contraceptive methods the same way? *Medical Anthropology*, 17, 65-82.

Fan, D. P., & Shaffer, C. L. (1990). Use of open-ended essays and computer content analysis to survey college students' knowledge of AIDS. *College Health*, 38, 221-229.

Farringdon, J. M., & Farringdon, M. G. (1980). *A concordance and word-lists to the poems of Dylan Thomas*. Swansea, England: Ariel House.

Fielding, N. G., & Fielding, J. L. (1986). *Linking data*. Beverly Hills, CA: Sage.

Fischer, M. D. (1994). *Applications in computing for social anthropologists*. London: Routledge.

Fjellman, S. M., & Gladwin, H. (1985). Haitian family patterns of migration to South Florida. *Human Organization*, 44, 301-312.

Fleisher, M. S., & Harrington, J. A. (1998). Freelisting: Management at a women's federal prison camp. In V. C. De Munck & E. J. Sobo (Eds.), *Using methods in the field: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and casebook* (pp. 69-84).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Fleiss, J. L. (1971). Measuring nominal scale agreement among many rater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76, 378-382.

Frake, C. O. (1962). The ethnographic study of cognitive systems. In T. Gladwin & W. C. Sturtevant (Eds.), *Anthropology and human behavior* (pp. 72-85). Washington, DC: Anthropology Association of Washington.

Frake, C. O. (1964). Notes on queries in ethnograph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6, 132-145.

Furbee, L. (1996). *The religion of politics in Chiapas: Founding a cult of communicating sain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96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Furbee, L., & Benfer, R. (1983). Cognitive and

geographic maps: Study of individual variation among Tojolabal Mayan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85, 305-333.

Garro, L. (1998). On the rationality of decision-making studies: Part 1. Decision models of treatment choice.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12, 319-340.

Gatewood, J. B. (1983). Deciding where to fish: The skipper's dilemma in Southeast Alaskan salmon seining.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Journal*, 10, 347-367.

George, A. L. (1959).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es to content analysis. In I. de S. Pool (Ed.), *Trends in content analysis* (pp. 7-32).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Gerbner, G., Holsti, O. R., Krippendorf, K., Paisley, W. J., & Stone, P. J. (Eds.). (1969). *The analysis of communication content: Developments in scientific theories and computer techniques* New York: John Wiley.

Gladwin, C. (1989). *Ethnographic decision tree modeling.* Newbury Park, CA: Sage.

Gladwin, H. (1971). *Decision making in the Cape Coast (Fante) fishing and fish marketing system.*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Glaser, B. G. (1978). *Theoretical sensitivity.* Mill Valley, CA: Sociology Press.

Glaser, B. G., & Strauss, A. L.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Chicago: Aldine.

Goodenough, W. H. (1956). Componential analysis and the study of meaning. *Language*, 32, 195-216.

Gottschalk, L. A., & Bechtel, R. J. (1993). *Psychological and neuropsychiatric assessment applying the Gottschalk-Gleser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verbal sample analysis using the Gottschalk-Bechtel computer scoring system.* Palo Alto, CA: Mind Garden.

Guba, E. G. (1981). Criteria for assessing the trustworthiness of naturalistic inquiries.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Journal*, 29, 75-92.

Guba, E. G., & Lincoln, Y. S. (1982).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bases for naturalistic inquiry.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Journal*, 30, 233-252.

Hammersley, M. (1992). *What's wrong with ethnography? Methodological explorations.* London: Routledge.

Harman, R. C. (1998). Triad questionnaires: Old age in Karen and Maya cultures. In V. C. De Munck & E. J. Sobo (Eds.), *Using methods in the field: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and casebook* (pp. 121-138).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Hartigan, J. A. (1975). *Clustering algorithms*, New York: John Wiley.

Hatch, E., & Redpath, H. (1954). *A concordance to the Septuagint and the other Greek versions of the Old Testament.* Graz, Austria: Akademische Druck-u. Verlagsanstalt.

Henley, N. M. (1969).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the semantics of animal terms.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 8, 176-184.

Hill, C. E. (1998). Decision modeling: Its use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In V. C. De Munck & E. J. Sobo (Eds.), *Using methods in the field: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and casebook* (pp. 139-164).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Hirschman, E. C. (1987). People as products: Analysis of a complex marketing exchange. *Journal of Marketing*, 51, 98-108.

Holland, D. (1985). From situation to impression: How Americans get to know themselves and one another. In J. W. D. Dougherty (Ed.), *Directions in cognitive anthropology* (pp. 389-412).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Holsti, O. R. (1966). External conflict and internal consensus: The Sino-Soviet case. In P. J. Stone, D. C. Dunphy, M. S. Smith, & D. M. Ogilvie (Eds.), *The General Inquirer: A computer approach to content analysis* (pp. 343-358). Cambridge: MIT Press.

Holsti, O. R. (1969). *Content analysi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Hunt, J. G., & Ropo, A. (1995). Multi-level leadership: Grounded theory and mainstream theory applied to the case of General Motors.

*Leadership Quarterly*, 6, 379-412.

Imrich D. J., Mullin, C., & Linz, D. (1995). Measuring the extent of prejudicial pretrial publicity in major American newspapers: A content analysi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5 (3), 94-117.

Irurita, V. F. (1996). Hidden dimensions revealed: Progressive grounded theory study of quality care in the hospital.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6, 331-349.

Jakobson, R., & Halle, M. (1956). *Fundamentals of language*. The Hague: Mouton.

Jang, H.-Y., & Barnett, G. A. (1994, September).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emantic network analysis. *Bulletin de Méthodologie Sociologique*, 44, 31-59.

Jehn, K. A., & Doucet, L. (1996). Developing categories from interview data: Part 1. Text analysis and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Cultural Anthropology Methods Journal*, 8(2), 15-16.

Jehn, K. A., & Doucet, L. (1997). Developing categories for interview data: Part 2. Consequences of different coding and analysis strategies in understanding text. *Cultural Anthropology Methods Journal*, 9(1), 1-7.

Jehn, K. A., & Werner, O. (1993). Hapax Legomenon II: Theory, a thesaurus, and word frequency. *Cultural Anthropology Methods Journal*, 5(1), 8-10.

Johnson, A., & Price-Williams, D. R. (1997). *Oedipus ubiquitous: The family complex in world folk literatur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Johnson, S. C. (1967).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schemes. *Psychometrika*, 32, 241-253.

Kaid, L. L., Tedesco, J. C., & McKinnon, L. M. (1996). Presidential ads as nightly news: A content analysis of 1988 and 1992 televised Adwatche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Electronic Media*, 40, 297-308.

Kassis, H. (1983). *A concordance of the Qur'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earney, M. H., Murphy, S., Irwin, K., & Rosenbaum, M. (1995). Salvaging self: A grounded theory of pregnancy on crack cocaine. *Nursing Research*, 44, 208-213.

Kearney, M. H., Murphy, S., & Rosenbaum, M. (1994). Mothering on crack cocaine: A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38, 351-361.

Kelle, U. (1995). An overview of computer-aided method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U. Kelle (Ed.), *Computer-aide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Theory, methods and practice* (pp. 1-18). London: Sage.

Kelly, E. F., & Stone, P. J. (1975). *Computer recognition of English word sense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Kempton, W (1987). Two theories of home heat control. In D. Holland & N. Quinn (Eds.), *Cultural models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pp. 222-24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irchler, E. (1992). Adorable woman, expert man: Changing gender images of women and men in manage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2, 363-373.

Kirk, J., & Miller, M. L. (1986).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Kolbe, R. H., & Albanese, J. P. (1996). Man to man: A content analysis of sole-male images in male-audience magazines.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5(4), 1-20.

Kracauer, S. (1953. The challenge of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6, 631-642.

Krippendorf, K. (1980). *Content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to its methodology*. Beverly Hills, CA: Sage.

Kruskal, J. B., & Wish, M. (1978).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Beverly HillS, CA: Sage.

Kurasaki, K. S. (1997). *Ethnic identity and its development among third-generation Japanese American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ul University.

Laffal, J. (1990). *A concept dictionary of English, with computer programs for content analysis*. Essex, CT: Gallery.

Laffal, J. (1995). A concept analysis of Jonathan Swift's *A tale of a tub* and *Gulliver's travels*.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29, 339-361.

Leinhardt, G. (1987). Development of an expert explanation: An analysis of a sequence of subtraction lessons. *Cognition and Instruction*, 4, 225-282.

Leinhardt, G. (1989). Math lessons: A contrast of novice and expert competence. *Journal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20(1), 52-75.

Leinhardt, G., & Smith, D. A. (1985). Expertise in mathematics instruction: Subject matter knowledg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77, 247-271.

Light, R. J. (1971). Measures of response agreement for qualitative data: Some generalizations and alternativ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76, 365-377.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Beverly Hills, CA: Sage.

Lindesmith, A. R. (1968). *Addiction and opiates*. Chicago: Aldin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7)

Lofland, J., & Lofland, L. H. (1995). *Analyzing social settings* (3rd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Lonkila, M. (1995). Grounded theory as an emerging paradigm for computer-assiste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In U. Kelle (Ed.), *Computer-aide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Theory, methods and practice* (pp. 41-51). London: Sage.

MacQueen, K. M., McLellan, E., Kay, K., & Milstein, B. (1998). Codebook development for team-based qualitative research. *Cultural Anthropology Methods Journal*, 10(2), 31-36.

Manning, P. K. (1982). Analytic induction. In R. Smith & P. K. Manning (Eds.), *Handbook of social science methods: Vol. 2. Qualitative methods* (pp. 273-302). New York: Harper.

Martindale, C., & McKenzie, D. (1995). On the utility of content analysis in author attribution: The Federalist.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29, 259-270.

Mathews, H. F., & Hill, C. (1990). Applying cognitive decision theory to the study of regional patterns of illness treatment choi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1, 155-170.

McCleary, R. (1978). *Dangerous men: The sociology of parole*. Beverly Hills, CA: Sage.

McKinnon, A. (1993). The multi-dimensional concordance: A new tool for literary research.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27, 165-183.

McTavish, D. G., & Pirro, E. B. (1990). Contextual content analysis. *Quality and Quantity*, 24, 44-63.

Metzger, D., & Williams, G. (1966). Some procedures and results in the study of native categories: Tzeltal "firewoo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8, 389-407.

Miles, M. B. (1979). Qualitative data as an attractive nuisance: The problem of analysi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4, 590-601.

Miles, M. B., & Huberman, A. M. (1994).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n expanded sourcebook*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Mingers, J. (1989a). An empirical comparison of pruning methods for decision tree induction. *Machine Learning*, 4, 227-243.

Mingers, J. (1989b). An empirical comparison of selection measures for decision-tree induction. *Machine Learning*, 3, 319-342.

Mitchell, S. K. (1979).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reliability, and generalizability of data, collected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6, 376-390.

Morse, J. M. (1994). Designing funded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220-235). Thousand Oaks, CA: Sage.

Mosteller, F., & Wallace, D. L. (1964). *Inference and disputed authorship: The Federalist Paper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Murdock, G. P. (1971). *Outline of cultural materials* (4th rev. ed.). New Haven, CT: 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

Nolan, J., & Ryan, G. W. (in press). *Fear and*

*loathing at the cinemaplex: Differences in gender perceptions and descriptions of slasher films.* 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Ogilvie, D. M., Stone, P. J., & Schneidman, E. S. (1966).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genuine versus simulated suicide notes. In P. J. Stone, D. C. Dunphy, M. S. Smith, & D. M. Ogilvie (Eds.), *The General Inquirer: A computer approach to content analysis* (pp. 527-535). Cambridge: MIT Press.

Osgood, C. (1959). The representational model and relevant research methods. In I. de S. Pool (Eds.), *Trends in content analysis* (pp. 33-88).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almquist, M., Carley, K., & Dale, T. (1997). Applications of computer-aided text analysis: Analyzing literary and nonliterary texts. In C. W. Roberts (Ed.), *Text analysi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Methods for drawing statistical inferences from texts and transcripts* (pp. 171-189).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Patterson, B. R., Bettini, L., & Nussbaum, J. F. (1993). The meaning of friendship across the life-span: Two studie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41, 145-160.

Patton, M. Q. (1990).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2nd ed.). Newbury Park, CA: Sage.

Perchonock, N., & Werner, O. (1969). Navaho systems of classification. *Ethnology*, 8, 229-242.

Pool, I. de S. (1952). *Symbols of democrac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ool, I. de S. (Ed.). (1959). *Trends in content analysi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otts R., Bunyan, D., Zerger, A., & Marchetti, K. (1996). A content analysis of safety behaviors of television characters: Implications for children's safety and injury. *Journal of Pediatric Psychology*, 21, 517-528.

Prendergast, G. L. (1971). *A complete concordance to the Iliad of Homer.* Hildesheim, Germany: G. Olms.

Price, L. (1987). Ecuadorian illness stories. In D. Holland & N. Quinn (Eds.), *Cultural models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pp. 313-34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Quinn, N. (1978). Do Mfantse fish sellers estimate probabilities in their heads? *American Ethnologist*, 5, 206-226.

Quinn, N. (1982). "Commitment" in American marriage: A cultural analysis. *American Ethnologist*, 9, 755-798.

Quinn, N. (1987). Convergent evidence for a cultural model of American marriage. In D. Holland & N. Quinn (Eds.), *Cultural models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pp. 173-19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Quinn, N. (1992). The motivational force of self-understanding: Evidence from wives' inner conflicts. In R. D'Andrade & C. Strauss (Eds.), *Human motives and cultural models* (pp. 90-126).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Quinn, N. (1996). Culture and contradiction: The case of Americans reasoning about marriage. *Ethos*, 24, 391-425.

Quinn, N. (1997). Research on shared task solutions. In C. Strauss & N. Quinn (Eds.), *A cognitive theory of cultural meaning* (pp. 137-18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agin, C. C. (1987).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agin, C. C. (1994).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T. Janowski & A. M. Hicks (Eds.), *The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elfare state* (pp. 299-31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ichards, T. J., & Richards, L. (1991). The NUD · IST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system. *Qualitative Sociology*, 14, 307-325.

Robbins, M. C., & Nolan, J. M. (1997). A measure of dichotomous category bias in free listing tasks. *Cultural Anthropology Methods Journal*, 9(3), 8-12.

Roberts, C. W. (1997). A theoretical map for selecting among text analysis methods. In C. W. Roberts (Ed.), *Text analysi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Methods for drawing statistical inferences from texts and transcripts* (pp. 275-

283).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Robinson, W. S. (1951).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analytic indu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6, 812-818.

Romme, A. G. L. (1995). Boolean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data: A methodological note. *Quality and Quantity*, 29, 317-329.

Roos, G. (1998). Pile sorting: "Kids like candy." In V. C. De Munck & E. J. Sobo (Eds.), *Using methods in the field: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and casebook* (pp. 97-110).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Rosenberg, S. D., Schnurr, P. P., & Oxman, T. E. (1990). Content analysis: A comparison of manual and computerized system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54, 298-310.

Rushforth, S. (1982). A structural semantic analysis of Bear Lake Athapaskan kinship classification. *American Ethnologist*, 9, 559-577.

Ryan, G. W. (1995).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among the Kom of Cameroon: Modeling how characteristics of illnesses, patients, caretakers, and compounds affect treatment choice in a rural communit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Florida, Gainesville.

Ryan, G. W. (1999). Measuring the typicality of text: Using multiple coders for more than just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checks. *Human Organization*, 58(3), 313-322.

Ryan, G. W., & Martínez, H. (1996). Can we predict what mothers do? Modeling childhood diarrhea in rural Mexico. *Human Organization*, 55, 47-57.

Ryan, G. W., & Weisner, T. (1996). Analyzing words in brief descriptions: Fathers and mothers describe their children. *Cultural Anthropology Methods Journal*, 8(3), 13-16.

Sandelowski, M. (1995a). Qualitative analysis: What it is and how to begin. *Research in Nursing and Health*, 18, 371-375.

Sandelowski, M. (1995b). Sample siz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Research in Nursing and Health*, 18, 179-183.

Schank, R. C., & Abelson, R. P. (1977). *Scripts, plans, goals, and understanding: An enquiry into human knowledge structures.*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Schnegg, M., & Bernard, H. R. (1996). Words as actors: A method for doing semantic network analysis. *Cultural Anthropology Methods Journal*, 8(2), 7-10.

Schnurr, P. P., Rosenberg, S. D., Oxman, T. E., & Tucker, G. (1986). A methodological note on content. analysis: Estimates of reliab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50, 601-609.

Schweizer, T. (1991). The power struggle in a Chinese community, 1950-1980: 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of the duality of actors and events.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Anthropology*, 3, 19-44.

Schweizer, T. (1996). Actor and event orderings across time: Lattice representation and Boolean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disputes in Chen Village, China. *Social Networks*, 18, 247-266.

Seidel, J., & Kelle, U. (1995). Different functions of coding in the analysis of textual data. In U. Kelle (Ed.), *Computer-aide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Theory, methods and practice* (pp. 52-61). London: Sage.

Shapiro, G. (1997). The future of coders: Human judgments in a world of sophisticated software. In C. W. Roberts (Ed.), *Text analysi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Methods for drawing statistical inferences from texts and transcripts* (pp. 225-238).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Shelley, G. A. (1992). *The social networks of people with end-stage renal disease: Comparing hemodialysis and peritoneal dialysis patient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Florida.

Sleath, B., Svarstad, B., & Roter, D. (1997). Physician versus patient initiation of psychotropic prescribing in primary care settings: A content analysis of audiotape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44, 541-548.

Smith, J. J. (1993). Using ANTHROPAC 3. 5 and a spreadsheet to compute a free-list salience index. *Cultural Anthropology Methods Journal*, 5(3), 1-3.

Smith, J. J., & Borgatti, S. P. (1998). Salience

counts—and so does accuracy: Correcting and updating a measure for free-list-item salience.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7, 208-209.

Sohier, R. (1993). Filial reconstruction: A theory on development through adversity.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3, 465-492.

Spears, N. E, Mowen, J. C., & Chakraborty, G. (1996). Symbolic role of animals in print advertising: Content analysis and conceptu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37 (2), 87-95.

Spiggle, S. (1986). Measuring social values: A content analysis of Sunday comics and underground comix.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3, 100-113.

Spradley, J. P. (1979). *The ethnographic interview.* New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Stone, P. J., Dunphy, D. C., Smith, M. S., & Ogilvie, D. M. (Eds.). (1966). *The General Inquirer: A computer approach to content analysis.* Cambridge: MIT Press.

Strauss, A. L. (1987). *Qualitative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rauss, A. L., & Corbin, J. (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Newbury Park CA: Sage.

Strauss, A. L., & Corbin, J. (Eds.). (1997). *Grounded theory in practice.* Thousand Oaks, CA: Sage.

Strauss, C. (1992). What makes Tony run? Schemas as motive reconsidered. In R. D'Andrade & C. Strauss (Eds.), *Human motives and cultural models* (pp. 191-22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rauss, C. (1997). Research on cultural discontinuities. In C. Strauss & N. Quinn (Eds.), *A cognitive theory of cultural meaning* (pp. 210-25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S. J., & Bogdan, R. C. (1984).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e search for meanings* (2nd ed.). New York: John Wiley.

Tesch, R. (1990). *Qualitative research: Analysis types and software tools.* New York: Falmer.

Trost, J. E. (1986). Statistically nonrepresentative stratified sampling: A sampling technique for qualitative studies. *Qualitative Sociology*, 9, 54-57.

Van Maanen, J., Miller, M., & Johnson, J. (1982). An occupation in transitio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forms of commercial fishing. *Work and Occupations*, 9, 193-216.

Viney, L. L. (1983). The assessment of psychological states through content analysis of verbal communication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4, 542-563.

Waitzkin, H., & Britt, T. (1993). Processing narratives of self-destructive behavior in routine medical encounters: Health promotion, disease preven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health care.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36, 1121-1136.

Wallace, A. F. C. (1962). Culture and cognition. *Science*, 135, 352-357.

Weber, R. (1990). *Basic content analysis* (2nd ed.). Newbury Park, CA: Sage.

Weitzman, E. A., & Miles, M. B. (1995). *Computer programs for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 software sourcebook.* Thousand Oaks, CA: Sage.

Weller, S. C. (1998). Structured interviewing and questionnaire construction. In H. R. Bernard (Ed.), *Handbook of method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pp. 365-409).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Weller, S. C., & Romney, A. K. (1988). *Systematic data collection.* Newbury Park, CA: Sage.

Weller, S. C., & Romney, A. K. (1990). *Metric scaling: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Newbury Park, CA: Sage.

Weller, S. C., Ruebush, T. K., & Klein, R. E. (1997). Predicting treatment-seeking behavior in Guatemala: A comparison of the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and decision-theoretic approaches.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11, 224-245.

Werner, O., & Schoepfle, G. M. (1987). *Systematic fieldwork: Vol. 2. Ethnographic analysis and data management.* Newbury Park, CA: Sage.

White, D. R., & Burton, M. L. (1988). Causes of polygyny: Ecology, economy, kinship, and warfar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0, 871-887.

Willms, D. G., Best, J. A., Taylor, D. W., Gilbert, J. R., Wilson, D. M. C., Lindsay, E. A., & Singer, J. (1990). A systematic approach for using qualitative methods in primary prevention research.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4, 391-409.

Wilson, H. S., & Hutchinson, S. A. (1996). Methodological mistakes in grounded theory. *Nursing Research*, 45, 122-124.

Wodak, R. (1992). Strategies in text production and text comprehension: A new perspective. In D. Stein (Ed.), *Cooperating with Written texts* (pp. 493-528).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Wright, K. B. (1997). Shared ideology in Alcoholics Anonymous: A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2 (2), 83-99.

Yoder, S. (1995). Examining ethnomedical diagnoses and treatment choices for diarrheal disorders in Lubumbashi Swahili. *Medical Anthropology*, 16, 211-248.

Young, J. C. (1978). Illness categories and action strategies in a Tarascan town. *American Ethnologist*, 5, 81-97.

Young, J. C. (1980). A model of illness treatment decisions in a Tarascan town. *American Ethnologist*, 7, 106-151.

Yule, G. U. (1968). *The statistical study of literary vocabulary.* Hamden, CT: Arch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4)

Znaniecki, F. (1934). *The method of sociology.*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Zuell, C., Weber, R. P., & Mohler, P. (Eds.). (1989). *Computer-assisted text analysi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General Inquirer* Ⅲ. Mannheim, Germany: Center for Surveys, Methods, and Analysis (ZUMA).

# 软件和定性研究 30

SOFTWAR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埃本·A·维茨曼

可用于支持定性研究者工作的一系列软件日趋成熟。现在,各种各样有用的工具可用于支持许多不同的定性研究方法。大多数定性研究者现在都能找到适合他们的分析计划、数据结构,且使用方便和费用低廉的软件。然而,要达到那种合适的匹配仍然需要系统地分析项目和研究者的需求,并且时刻留意这些需求,购买时仔细比较可以选择的软件。现在仍没有一个程序可以称得上最好。

为了帮助研究者了解在支持他们的研究方面,软件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让他们了解在定性研究项目中使用计算机的潜在好处和缺陷,并且能找到适合他们需要的软件,我在本章中提供了:①对于软件在定性研究中的角色的介绍和总体看法;②对使用定性数据分析(QDA)软件的影响和适当性的批评性争论和关注所进行的讨论;③选择与个体需求相一致的软件的指导意见;④对使用 QDA 软件的学问以及此类软件的发展方向。

## 计算机在定性研究中应用简史

传统上,定性研究者用手工来完成分析的技术性细节:将田野日记和访谈打成定稿进行复印,用标记或铅笔做标注来进行编码,将被标注的段落剪下来贴到文档卡片中,把卡片进行分类和重新排列,然后将他们的分析打成定稿。这种图景自 1980 年代早期到中期就已经慢慢改变了。在那时候,一些研究者正在开始使用文字处理器进行打印,只有一小部分人开始试验着用数据库程序来对其文本进行分类和存取。那时候,大多数定性研究方法的书(例如,Bogdan & Biklen, 1982; Goetz & LeCompte, 1984; Lofland & Lofland, 1984; Miles & Huberman, 1984)很少提及计算机使用方面的文献。

在 1980 年代早期,专门设计用于分析定性数据的两个程序开始出现了(Drass, 1980; Seidel & Clark, 1984; Shelly & Sibert, 1985)。早期的程序,如 QUALOG,Ethnograph 和 NUD · IST 的早期版本反映了那个时候的计算状态。研

究者完成文本编码的典型做法是通过命令提示的方式将数字和代码名称打印成一条直线(给大块的文本贴标签——代码——用以表明研究者想让它们归入的概念类别),这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用来做备忘、其他注解或文本置标的工具。与运用彩色铅笔标注文本相比,许多研究者觉得这种方法有些难,用计算机辅助分析视频或音频数据最多是一种幻想。

但是,由于软件和专门刊载软件的文献的发展,这种状况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在迈尔斯(Matt Miles)和我写作《定性数据分析的计算机程序》(*Computer Programs for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Weitzman & Miles, 1995b)的后期,我们评述了不少于24种分析定性数据有用的不同程序。这些程序中有一半已经被专门开发用于定性数据分析,而另外一半则已经被开发以适用于多种用途,比如文本检索和储存。从那时起,这个领域持续快速地发展着。程序定期被修订,每年有一至两个新程序面市,那些没有市场的则销声匿迹了。当一个程序中好的部分被其他程序的开发者效仿时,就已经出现了一些趋同的情况;而当开发者寻找新的、不同的方法来对分析辅助进行概念化时,也已经出现了分歧。

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工具来帮助那些运用各种各样研究和分析方法论——从扎根理论到文本分析,到叙事分析,再到诠释互动论——的研究者。值得强调的是,如果软件曾经是只和定性研究的"实证主义者"或"准实证主义者"的方法相关的东西,那么现在已经不是。如果你看到本章的语言不适合你的方法,你可能会发现,做一些推测性的转化是有帮助的。例如,如果讨论是关于"证明"和"假设检验"的,而你的方法是后现代的,那么这种讨论似乎是不相关的。但可能的情况是,存在一种方法来理解从你的视角出发有意义的概念,例如"看看是否存在更多的材料来支撑或驳斥某种假设或解释"。别人可能用来做经典的假设检验的同一个软件,对达到你的目的可能也非常有用。

现在的许多程序能让研究者详细说明代码之间的关系,并在分析中运用这些关系,也能让研究者写备忘录,并将备忘录和原文及代码连接起来。有些程序能让研究者在文本(超文本)不同的点之间创建链接。有少量,但日益增多的软件允许使用音频和视频来代替文本,或对文本进行补充。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将类别数据和定量数据(如人口统计状况、测试得分、数量等级)及文本联结起来,并且为了输出类别数据和定量数据(如词的频率或编码的摘要),将它们和统计分析的定量分析程序联系起来。最后,现在仍有一些免费程序使用方便,特别是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EZ-Text和AnSWR,前者集中于定性调查,后者旨在用于更广泛的定性数据。软件在持续地变化着,但没有一个能满足所有需求的最好的程序。和软件的发展平行的是,报道软件研究和软件评论的文献开始定期出现,已经涌现了一些杂志文章、一系列关于计算机与定性方法学的国际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有思想深度的书籍(Fielding & Lee, 1991, 1998; Kelle, 1995; Tesch, 1990; Weitzman & Miles, 1995b),以及专辑(Mangabeira, 1996; Tesch, 1991)。

评论员定期对可用软件的范围是否受特定方法、方法论或认识论的支配等

问题表示出担心(Coffey, Holbrook, & Atkinson, 1996; Lonkila, 1995)。尽管对支持某些特定的分析步骤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我在本章的后面提出了一些建议,出现在韦茨曼和迈尔斯(Weitzman & Miles, 1995b)的题为“反思和希望”的文章中的名单仅开始开列],但这些担忧无疑正迷失其目标。在本章中,我建议了各种类型的、可用来支持各种研究方法的程序。定性研究者并没有仅仅被局限于导向编码程序(coding-oriented programs),甚至没有被局限于那些很明显是卖给定性研究者的程序。例如,就像费尔丁和李指出的,对那些希望遵从科菲和阿特金森(Coffey & Atkinson,1996)的建议的人,有着各种各样的选择。科菲和阿特金森认为,对于内容分析而言,文本恢复者可能比编码—恢复程序(code-and-retrieve program)对话语分析更有用。费尔丁和李继续辩称:

> CAQDAS(计算机辅助定性数据分析软件)程序的开发者已经日益包括了邻近检索的功能和自动编码功能,前者可能有助于叙事分析,而后者可适用于某些类型的符号分析。CAQDAS程序中新功能的出现反映了这个领域的使用者和开发者之间一般是紧密的关系,反映了开发者想体现使用者所希望的功能的一般愿望,即便是使用者并不总和开发者的认识论偏好相一致。既然软件包日益支持那些对定性分析而言是全新的步骤、程序和功能,或者使那些没有计算机就不可行的步骤成为可能,那么,就越来越没有理由认为软件仅仅是编码—提取的辅助,或者认为编码—提取是定性研究的必要条件(Fielding & Lee, p. 175)。

我通过本章的大部分,特别是题为“错误的希望和恐惧”、“真正的希望”、“真正的恐惧”,以及后面的题为“本领域的争论”等部分,尽可能详细地提出了这些问题。

## 软件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简单地说,软件提供了帮助你分析定性数据的工具,但它不能替你做分析,当然这和统计分析软件包能做的分析,如SPSS和SAS能做多元回归,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许多研究者有一个希望——对其他人而言则是一个担心——计算机能够以某种方式阅读文本并且判断它的意思。通常来说,这不是问题①。因此,特别重要的是需要强调:使用软件不可能是学习数据分析方法的替代品,研究者必须知道需要做什么,并且去做它,而软件只为做这件事情提供了工具。

下面是能用计算机来帮助分析所做的一些事情(改编自Miles & Huberman, 1994, p. 44):

1. 在田野中做笔记。

① 我在下面的题为“错误的希望和担心”的子标题中,论述了一些例外。

2. 补写(writing up)或转录(transcribing)田野笔记。

3. 编辑:改正、扩充或修正田野笔记。

4. 编码:将关键词或标签贴到文本、图形、音频或视频的段落上,以便于日后重新查找。

5. 储存:将文本保存在一个组织好的数据库中。

6. 检索和重新获取:查找文本的相关段落,使之便于检查。

7. 数据"联结":将相关的数据段落互相联结起来,形成信息的类、丛或网。

8. 备忘:写下关于数据、理论或方法的某些方面的反思性注释,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基础。

9. 内容分析:计算词语或短语的频率、顺序和位置。

10. 数据显示:将选择或简化的数据置于一个压缩的、组织好的格式中,如矩阵或网络,以便于检查。

11. 得出结论和进行核实:帮助解释所显示的数据,检验或证实发现(结果)。

12. 理论建构:提出针对发现的系统的、概念一致的解释,验证假设。

13. 生动的绘图:创建能够描述发现或理论的图表。

14. 报告撰写:中期报告和最终报告。

显然,这些内容中的许多事情是研究者可以用文字处理器做的,作为本章焦点的其他软件则服务于其他任务。近年来所见到的发展已经能让研究者越来越容易、越来越有力地做这些事情。在下面的题为"QDA 软件的类型和功能"部分,你将发现关于软件能做什么的更多特定细节,但首先要考虑人们关于 QDA 软件的一些希望和担心,这些希望和担心既有真实的,也有错误的。

## 错误的希望和担心

我们曾经宣称:

> 就像普法芬伯格(Pfaffenberger)指出的那样,认为一个程序是一个中立的技术工具,或一个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怪物是同样天真的想法。这个问题就是了解一个程序的特性和假设,了解它们如何支持或抑制你的想法,从而产生出乎预料的结果(Weitzman & Miles,1995b,p. 330)。

就像已经提到的,许多人显然继续相信 QDA 软件是要做数据分析的。持怀疑态度的研究者对"将我的文本丢进一个程序,然后看看有什么结果"的观念提出了挑战。其他人所表达的更可能是一个希望,即如果他们买了合适的程序,那他们将不必从事那种对所有文本本身的、通常非常费时的分析过程。QDA 软件提供了帮你做这些事情的工具,但它不会为你做这些事情。

在这种关注的广义范围内,许多研究者担心软件仍需要更进一步发展并"建构理论"。但是,正如迈尔斯和我在 1995 年指出的那样:"软件将永远不会为你'做'理论建构的工作……但是,它显然能为你的智力努力提供帮助,让你更容

易、更连贯性地思考你的数据的意义"(Weitzman & Miles, 1995b, p. 330)。

这种情形在未来的几年内将会发生改变。最近的努力是要用人工智能(AI)方法来让计算机解读文本。例如,SPSS 模块的 TextSmart 运用词语发生的频率以及词语之间的接近性来自动地给文本反馈分类;微软文字处理软件 97 版有一个"自动总结"功能,它旨在根据一篇文档中词语的频率来识别最重要的"概念";其他的开发者正在考虑用人工智能技术让软件参与到研究者的理论构建过程中来。这些方法依靠一些东西,如用频率来显示重要性,用文本的接近性来显示关联度。对于某些定性研究者,这些是可接受的假设,但对其他的许多研究者来说,它们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对他们而言,这些方法的结果并不会产生有用的文本解释。

## 真正的希望

从软件的使用中我们真正期望获得的是什么? QDA 软件为检索、标注、联结和重新组织数据,以及描述和储存你自己的沉思、思想和理论建构提供了工具。它的某些部分给你提供了基于你的理论建构和解释工作而做进一步探索的工具——在有些情况下,这等于是假设检验或结论验证。

**连贯性**。软件能促进连贯性。如果我能检索出一个给定的关键词所出现的所有地方,或一个给定的代码或代码的联合所应用的所有地方,或者我总是能看到我所录数据的两个特征之间的关系,我就可能用两种方法来使数据变得更具有连贯性。我会更加谨慎,谨防漏掉那些能驳斥我出色的,但却是错误的新假设的证据。我能够轻而易举地回顾我赋予给特定概念类型或主题的所有数据,看它们是否①一起属于,以及②看起来仍然支持我所有开始的解释;如果不是,我就能轻松地对它们进行重新组织(注意:这仍然不能排除我做了一个糟糕的解释的可能。但是,这里提到的各种工具能极大地帮助有能力的研究者检查自身工作,也让其同事或研究参与者检查其工作并提供反馈)。

**速度**。计算机的速度是让 QDA 软件有用的关键问题。首先,告诫大家:要花些时间来学习使用一个程序,而如果你使用了它,就要花些时间来准备和建立数据以用于分析,但一旦做了这些工作,计算机的速度将能很快使你从那些投资中获益。QDA 软件能进行几乎即时的检索和再检索,鼓励研究者对那些真正能应用于特定问题的数据进行多重检索;能快速地对一个数据库进行重新分类、重新定义代码以及重新指定文本块;能够让,并且鼓励研究者在任何需要的时候重新修正其分析和有关思想;能够快速地将所有文本分单元一起拖进一个复杂的矩阵显示格式中;能够让,并且鼓励研究者更加经常,且花费更少时间去追溯有争议的线索和新的思想——包括那些担心现有的结论可能脱离了轨迹的想法。

一个来自定量研究的例子可能具有启发性。在计算尺(slide rules)时代,甚至是掌上计算器的时代,在能用统计软件之前,做因子分析是一项要花费数月的事。现在,在一个台式电脑上,一个因子分析在数分钟或数秒钟之内就可以运算完毕。结果,在同一个项目的多项评估分数上,研究者能够更经常地运用因子分

析,这是作为其他分析的一部分,而不是将它们自身作为主要任务。计算机的速度本身就能够改变研究者试图要做的事情。

**表达**。能够使研究者的思想得到动态的、实时的表达的软件是对理论建构具有重大价值的帮手。能够提供代码、文本段落,或个案之间关系的生动图形的软件能帮助研究者将其思想形象化,并延伸其关于手边的数据或理论的思想。研究者经常使用图形来描述这些关系,但是软件能够保存与基础方案结合的图谱,这样,图形联结的改变就能够改变数据库中对象之间的联结,反之亦然。

**合并**。最后,让研究者将田野笔记、访谈、代码、备忘录、注解、反思性的评论、图表、音频和视频录制品、人口统计学的变量、数据和理论的结构图谱全部记录在一个地方,对于分析过程而言是一个极有力的支持。如果程序的设计是这样的:它让研究者以最少的努力从一个智力活动转到另一个,并将一种思想的结果延续至另一个,那它就既能为重要的任务释放巨大的能量,又能帮助研究者察看并留意那些可能很轻易地脱离轨道的关系。

## 真正的担心

我们真正不得不担心的是什么?上面吹捧的许多优势也有其反面。正是软件的不费力、速度和能力有可能会助长我在上面的"错误的希望和担心"中提到的那种想法。尽管在现有研究的背景中,软件不能判断出一个关于孩童时期创伤的复杂报导究竟意味着什么,不费力地搜索关键词,并对它们"自动编码"可能会鼓励研究者走捷径。我们可能检查不出什么段落实际上是在自动编码过程中被编码的,并且也不能用它们自身的智能去分析它们是否合适。这有一个潜在的危害就是,我们将变得懒散。就如李和费尔丁(Lee & Fielding,1991)已经注意到的:"计算机的使用有可能引诱定性研究者进行'快速而肮脏'的研究,并有早熟的理论终止的危险"(p. 8)。

也有一种可能是,软件的唾手可得将引诱研究者跳过适当的学习研究的过程。下面这段话依然是来自李和费尔丁(Lee & Fielding,1991):

> 当然,这里的终极担心是弗兰克斯坦(Frankenstein)的怪物。它也受同样告诫的影响,就像那个怪物一样,程序被误解。程序是无罪的,是人们对它们的滥用造成了这样的威胁,是人类恶习的暴露导致了弗兰克斯坦创造物的威胁。同样的,未受训练就使用分析程序确实会产生平庸的、无启发性的、脱离目标的分析,但这个错误是由使用者造成的。这就是为什么教授研究新手使用程序的课程应该被纳入教学之中,这种教学有一种定性研究的范例的感觉,而不是被机械使用的技巧和技术。

最后一个包含某些事实的担心是程序背后的概念假设——如,代码之间的关系总是严格分层级的——将固化分析。这种担心既包含一定的事实,又经常被夸大。例如,如果程序让你直接表现代码之间的层级关系,而不是非层级关系,如循环的或未组织的网络,那么,这可能会鼓励你主要考虑或仅仅根据你的代码/概念之间的层级关系来进行思考。如果你知晓程序背后的假设,你就有两

个选择:可以选择另外一个程序,或者可以找到一种方法来围绕程序中的假设进行工作——例如,将常常变动的、非层级代码的地图钉到墙上。这在下面的题为“本领域的争论”一节中将有更详细的阐释。

## QDA 软件的种类和功能

在本节中,我对现有可用的软件进行了一个粗略的分类。当然,在类别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重叠,因为单个程序所具有的功能似乎从属于不止一种类型。然而,仍然有可能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程序的“心脏和灵魂”上:它主要想做什么。这个分类方案最初是由韦茨曼和迈尔斯(Weitzman & Miles,1995b)提出的。

### 文本取回(Text Retrievers)

文本取回专门用于在一个或多个文档的文本中查找某一单词或短语的所有情况。如它们还可以让你在一个指定的范围内(许多单词、句子、页等)搜索两个或多个词语或短语相一致的那些地方,并让你将作为结果的段落分为不同类的输出文档和报告。它们也可以做其他事情,例如,在一个上下文中计算、显示关键词,或形成索引的内容分析功能(在其上下文中排出所有词语和短语的列表),或者,它们可以让你将注解甚至变量值(如人口统计学数据或原始资料信息)贴到文本中的某些点上。文本取回的例子有 Sonar Professional, the Text Collector,以及 ZyINDEX;也可以在因特网上找到许多免费(但不好用)的 GREP 工具。

### 文本数据库管理器(Textbase Managers)

文本数据库管理器是专门以或多或少有组织的方式来储存文本的数据库程序。它们擅长于保存文本及其相关信息,让你能够快速地用各种方法对你的数据进行组织和分类,并根据不同的标准查找数据。有些程序更适合于那些能被组织成“记录”(即明确的个案)和“主题”(fields)(变量——每个记录中出现的信息)的高度结构化的数据,而其他程序则能轻松地处理“自由格式”的文本。它们可以让你用传统数据库的固定格式来定义主题(fields),如 Microsoft Access ® 或 FileMaker Pro ®,而且它们的灵活性很强,例如,允许不同的记录具有不同的主题结构(field structure)。它们的检索操作可能和一些文本取回一样好,有时候甚至优于后者。文本数据库管理器的例子有 askSam, Folio Views, Idealist, Info Tree32 XT 和 TEXTBASE ALPHA。

### 编码和取回程序(Code-and-Retrieve Programs)

编码和取回程序常常是由定性研究者开发专门用于定性数据分析的。这类程序擅长于让你对文本段落应用类别标签(代码),然后根据你的编码取回和显示文本。这些程序至少有一些搜索功能,能让你在文本中搜索代码、单词和短

语。他们可能有一种储存备忘录的性能。即使拿这些程序中最差的一个和旧的剪刀—纸张的方法相比也是有一个飞跃:它们更系统、更彻底、遗漏东西更少、更灵活,并且快得多。编码取回程序的例子有 HyperQual2, Kwalitan, QUALPRO, Martin,以及 the Data Collector。

### 以代码为基础的理论建构器(Code-Based Theory Builders)

大部分以代码为基础的理论建构程序也是以编码—取回模型为基础的,但它们超越了编码—取回程序的功能。它们不会,你也不想让它们为你建构理论。当然,它们具有一些特殊的、超过编码—取回程序的功能或程序(routines),来支持你的理论建构的努力。例如,它们可以为你描述代码之间的关系、建构更高序列的等级和种类,或明确地表达、检验关于数据的理论命题。它们可能比编码—取回程序具有更强的备忘功能(例如,让你给自己的备忘录分类或编码)或更复杂的搜索—取回功能。它们可能具有延伸的、复杂的超级链接功能,让你将文本的段落链接在一起,或在文本、图表、照片、视频、音频、网络以及其他形式的段落之间建立链接。它们也可以提供"系统闭合(system closure)"的性能,让你将分析结果(如搜索结果或备忘录)反馈到系统中作为数据。以代码为基础的理论建构器的例子有 AFTER, AnSWR, AQUAD, ATLAS/ti, Code-A-Text, Hyper R. ESEARCH, NUD · IST, Nvivo, QCA, the Ethnograph 和 winMAX。有两个程序, AQUAD 和 QCA,支持跨个案的结构分析(cross-case configural analysis)(Ragin, 1987),而 QCA 完全专注于这种方法,没有任何文本编码的性能。

### 概念网络建构器(Conceptual Network Builders)

概念网络建构器是强调网络显示(network displays)的创造和分析的程序。有些程序着重于让你创建网络图形:概念之间的关系的生动表达,这样的例子有 Inspiration, Meta-Design 和 Visio。其他程序则集中于认知或语义网络的分析,如程序 MECA。还有一些程序则提供了这两种方法的结合,如 SemNet 和 Decision Explorer。最后,在上面提到的以编码为基础的理论建构器 ATLAS/ti,也拥有很好的和你的文本、代码分析工作相联系的图形网络建构器。

### 总结

在对这五个主要的软件家族类型做总结时,我想强调的是,各类型的功能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例如,Folio VIEWS 能够编码和取回(retrieve),并且具有极好的文本搜索功能。ATLAS/ti, NUD · IST, Nvivo, the Ethnograph 和 winMAX 能形象地描述代码之间的关系,尽管在它们之中,只有 ATLAS/ti 能让你用图形工作,并操作图形①。The Ethnograph 和 winMAX 都具有将变量值(文本、日期、数字

---

① NVivo 的第一次发行的版本能让你画图,但你所画的任何连接都仅能在图形中表现,它们不是代码和其他项目之间的定义好的关系的表现,就像在 ATLAS/ti 中的那样。你能在一个有可扩张和可折叠分支的层级"资源管理器"(hierarchical "explorer")中,如 NUD · IST, the Ethnograph 和 winMAX 中,看到代码之间的真实关系。

等)粘贴到文本文件和/或个案中的系统。Sphinx Survey 让你用观察数据工作,这些观察数据是定性和定量数据的混合。建议:不要太早决定你想选择哪个软件家族,相反,要着眼于你所需要的功能。

**多媒体**。多媒体功能正作为软件选择中的一种重要因素而出现。现在,以编码为基础的理论建构器一类中,有一些程序能让你像使用文本一样将音频和视频作为数据:AFTER,ATLAS/ti 和 Code-A-Text 都能让你对音频和视频文件进行编码和注释,从中进行搜索和取回,所使用的方法非常类似于你操作文本的方法。HyperRESEARCH 的版本 2 同样如此,在写作本书时,它仍在开发中。在这些程序中,你能播放媒体文件(音频或视频),标注段落的起点和终点,并像处理文本段落一样来处理那些段落。有一个叫 InterClipper 的、正处于测试第 2 版的程序,主要是为音频文件设计的,它设想的是,你只需转录你所发现的最重要的段落(它是以商业环境中的焦点小组研究者为对象的,他们需要能迅速地产生分析和报告)。当它准备发行时,这个程序很可能将归入编码—取回家族。也有一个日益增长的软件领域,专门用于处理视频文件。

## 如何明智地、个性化地选择软件

在本章的开头我已经强调,不存在一个最好的用于分析定性数据的软件程序。进一步讲,也不存在一个最好的、用于特定类型的研究或分析方法的程序。研究者有时候会问,对于人类学学派,什么是最好的程序?或者,做扎根理论,什么是最好的程序?或者,分析焦点小组,什么是最好的程序?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相反,分析者需要根据数据的结构,他们想要做分析的特定事情,他们对一些问题的需求,如使用的简便性、费用、可用的时间和合作等来做出选择。

研究者可以问他们自己四个宽泛的问题,同时考虑两个交叉的问题来帮助自己选择(Weitzman & Miles, 1995a, 1995b)。这些选择指导从最初提出以来,在实践中已经被广泛应用,并且已经被证明能有效地指导研究者做出合适的选择。因为这种选择方法强调将功能,而不是特定程序与特定需求相匹配,在这里提及的作为例子的程序升级到新版本、新的程序面市很长时间之后,这些指导都能继续有用①。

当你要选择一个或多个软件包时,你需要提出并回答四个关键问题:

- 我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电脑使用者?
- 我是为某一个项目,还是为以后几年而选择(软件)?
- 我将运行的是哪种类型的项目和数据库?

① 这部分不包含太多的有关特定软件的介绍,既因为情况没几年就会发生改变,也因为单个的一章不足以在程序之间做可靠的比较。

- 我准备做哪些类型的分析?

除了这四个关键问题,头脑中要有这两个与之交叉的问题:

- 维持数据的"闭合性(closeness)"对你而言究竟有多重要?
- 当购买软件以及运行它所要求的硬件时,你的经济承受力是多少?

这些基本问题想清楚了,你就能以一种更积极、更深思熟虑的方式来考察特定的程序了,看什么能或不能满足你的需求。你可能会发现,将这些问题的答案组织在一个工作表上是非常有用的,比如像韦茨曼和迈尔斯(Weitzman & Miles, 1995b)所建议的工作表,其中行是问题,而列则是答案、建议/备注和备选的程序。你的工作从回答问题开始,到关于程序选择的那些问题的建议,再到备选程序。例如,如果你正在进行一个复杂的评估研究,是结构性访谈、焦点小组和个案研究的结合,你就需要一个较强的分析工具,在不同的文件之间追踪案例。你可能会在一个程序的代码结构中,或通过使用在整个数据库中追踪个体的讲话者识别符(speaker identifiers)来发现对这个需求的很好的支持(见下面的问题3)。对这些建议将在下面做详细阐述。

### 问题1:你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电脑使用者

你目前的计算机水平是你选择一个程序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如果你是新手,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根据朋友的建议选择一个文字处理程序,然后开始使用、学习使用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如MS-DOS,Windows,或者Mac),并能熟练地创建文本、在文本间进行移动和修改。这将使你达到我们所谓的水平1。或者你可能已经熟悉了几个不同的程序,能熟练地使用你的操作系统,并且有兴趣探究和学习新程序(水平2)。或者你可能是一个对程序运行的输入、输出有浓厚兴趣的人(水平3),并对用户化、写宏命令及类似事情感觉得心应手(在这里我将不涉及处于水平4的"电脑黑客",他以电脑为生)。

是一个新手并不意味着你必须选择一个"初级的"程序,甚至并不意味着你不该选择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毕竟,它只是意味着要拨出额外的学习时间,可能要多考虑用户界面,寻找能支持你学习的资源,如朋友或同事,或因特网上的在线讨论小组。处于不同水平的人似乎对同一个程序会有相当不同的反应,例如,一个处于水平2或水平3的人可能喜欢一个将最多的信息放在一屏的程序,因为这可以让他迅速地找到想要的东西,他学习这个程序可能非常快。而一个处于水平1的人,找到所有的信息是最开始时压倒一切的任务,正因为如此,他可能要花多一点时间去学习那个程序。但是,一旦他学会了这个程序,水平1的人也很可能和更高级的计算机使用者一样从这个版面中获益。

### 问题2:你正在为某一个项目,还是为以后几年选择(软件)

一个文字处理器并不关心你正在写的是什么,因此多数人挑选它并一直使用,直到一个更好的东西出现,并使他们感到有动力去学习它。但特定的定性分析程序倾向于对某些类型的分析有效。换来换去将花费你的学习时间和金钱,

考虑你应该选择针对这个项目最好的程序,还是应该选择能最好的涵盖你在未来几年所考虑要做的各种项目的程序。例如,一个特定的编码—取回程序对现有的项目而言是足够了,并且它比其他程序更便宜,似乎也更好学。但以后,如果你可能需要一个性能更全的以代码为基础的理论建构器(code-based theory builder),那么在一开始就选择其中的一个会更有意义(假定你选择了一个包含很好的编码—取回性能的程序)。

### 问题3:你将运行的是哪种类型的项目和数据库

现在,问题开始变得更明确了。当你查看详细的软件性能时,需要对照一系列具体的问题进行演示。鉴于计算机的性质,有必要非常了解定性数据丛(qualitative data sets)的性质和结构。这里的问题与数据的自然和逻辑形态(form)有关:它是如何被结构化并且相一致的,关于一个个案的数据是如何被组织的,等等。根据下面提出的问题,甚至在一个特定的分析方法内(如扎根理论、人类学方法或叙事分析),项目和项目之间都可能有很大的变化。认识论问题,如观察笔记、译码、备忘录或访谈数据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的解释性性质,尽管对研究者的方法论非常重要,但在这里并不起作用;问题是,你选择的程序是否为你想输入的文本、图形、音频、视频提供了编制的工具(organizational tools)。

**每个个案的数据源:一个对多个**。你可能会从许多不同的来源收集关于一个个案的数据(如,你的个案被定义为一个学生,你将和几个教师、学生的父母和朋友、校长、学生本人谈话)。有些程序是被特别设计用来处理像这样组织的数据的,另外一些没有这样设计,但能相当好地处理多重来源,而有些程序则确实不具有你所需要的灵活性。就如上面提到的,你应该寻找一个能在不同文档之间跟踪个案的强大工具。有些程序能在代码结构中(特别是那些有高度结构化代码系统的程序,如 NUD · IST 和 Nvivo),和层次低一些的有灵活性的代码系统的程序,如 ATLAS/ti,对这个需求提供很好的支持,有些则通过使用程序中的谈话者识别符来做到这一点,如 AFTER、the Ethnograph 或 Code-A-Text。寻找一个擅长于创建链接的程序,如那些具有超文本性能的程序,并寻找那些能粘贴"来源标签"以告知你信息来自何处的程序,也是一样的。

**一个个案 vs 多个个案**。如果你有多个个案,你通常想根据不同的模式或结构(configurations)来对他们进行分类,并且/或只使用其中的某些个案,并且/或做一些个案之间的比较。多个案研究能变得复杂化。例如,你的个案可能是学生(你可能从多个来源得到每个学生的数据),你的学生可能都被"嵌套(nest)"在教室里,教室可能被"嵌套"在学校里,而学校又可能被"嵌套"在行政区里。寻找那种能轻松地选择数据库的不同部分,并且/或者能在你的案例之间做结构分析(Ragin,1987)的软件,能帮你创建多个案矩阵显示——通常是将矩阵的不同格子中对应的数据集中在一起——的软件同样是有用的。

**固定的记录 vs 修订的记录**。你将要使用的数据是固定的(如官方文件或调

查的回答)还是将被修订的数据(有修正、增加的代码、注解、备忘录,等等)? 有些程序能使数据库的修改很容易,而另外一些软件则会使修改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有些程序能让你轻松地修改注解和编码,但不能修订基本文本(underlying text),而有些程序则让你两个方面都能修改。尽管到目前为止这已经成为一个强制性的问题(constraining issue),新的程序和现有程序的升级版本的趋势使你能轻松地修改基本文本。

**结构化的 vs 开放的**。你的数据是严格组织好的(如,对一个标准化问卷或访谈的回答)还是自由格式的(运行田野笔记、参与观察,等等)? 被高度组织的数据通常能够在为适应它们而设立的程序中被更容易、快速、有力地管理——例如,那些针对每个个案而"很好定义"的"记录"和针对每个记录的数据"主题"(或变量)。结构化的调查可能会受益于调查取向的程序,如 Sphinx Survey 或 EZ-Text,它们利用可预见的结构来提供很好的数据管理的工具。自由格式的文本则要求更加灵活的程序。有专门用于这种或那种类型数据的程序,而有些程序则对各种类型的数据都能运行得相当好。

**统一的条目 vs 多样化的条目**。你的数据可能都来自访谈,或者你可能有许多种类的信息:档案文件、田野观察、问卷、照片、录音带、录像带(这个问题与上面的"一个 vs 多个数据源"相重叠)。有些程序能轻松地处理各种各样的数据类型,而有些程序则要求比较严格。如果你有多样化的条目,就要寻找那种被设计用来处理多重来源和多种类型数据的软件,它在一个超文本的模式中,有很好的来源标签和很好的链接性能。处理"离线"数据的能力——向你提供那些实际上没有装载进你的程序的材料,这是一种附加功能。如果你对此比较精通的话,有许多程序都有做这件事的窍门。如果想能对音频或视频编码,然后取回,那你就寻找像 AFTER, ATLAS/ti, Code-A-Text 和 InterClipper 这样的程序,它们能让你像处理文本一样来处理这些媒体(文件)。

**数据库的大小**。一个程序的数据库容量可以用个案的数目、数据文件(文档)的数目、个体文档的大小和/或通常以千字节(K)或兆字节(MB)来表示的总体数据库的大小等术语来表示(粗略地说,不空行的打印文本的一页大概是 2 ~ 3K)。但不管通过以什么方式表示的程序限制(limits)来估计总体大小,数据库的大小至少翻倍。今天的多数程序从总体数据库的大小来说都是大容量的。当对待单个文本的大小时,有一些程序的容量仍然有限。例如,在有些程序中,当一个文件超过 10 页时,程序就会要求将它拆分成更小一些的块,或者只以"只读模式"浏览器打开它。

### 问题 4:你准备做什么类型的分析

就像上面所提到的,确定分析的方法论的名称在这里确实不会奏效。你对软件的选择取决于你希望如何着手进行分析。这并不是说要一个详细的分析计划,而是所预期的风格和方法的大体感觉,这将依次告诉你,你能用这些数据做什么事情。要得到对定性数据分析的一系列方法的好的总体看法,以及和它们

相联系的一些步骤的讨论，请参见费尔丁和李（Fielding & Lee，1998，chap. 2）的作品。

如果你要对数据编码，就需要这样一个软件，它能让你按自己的方法论所要求的方法进行编码。如果你正在做叙事分析，可能需要以某种方式追踪时间或叙事的结构。或者，作为一种理解你数据中的现象的方法，你可能正在致力于建立一个超文本链接的网，则创建和表现那种超文本网的一种或其他种方法能更好地满足你的需求。在现有的作品中，编码可能是得到最好支持的方法，许多使用其他方法的研究者可能会发现，最好的选择就是根据他们自身的目的使用一个"编码"系统——例如，标注出文本的叙事结构。下面的题为"展望未来"的部分将对之有详细阐述。

下面的子标题应该帮助你超越方法论的名称而行动，它展示了问题4的某些部分。它们或许可以帮助你识别你将需要的特定分析步骤，你将需要运行的特定操作，你将需要记录的洞察力、推论和解释的种类，你准备记录它们所使用的方式。换言之，它们或许可以帮助你明确如果手写工作，你所要做的事情，并且将这些事情转换进你要从软件那里得到的功能中。

**探索的 vs 证实的**。你是否主要准备在你的数据里"闲逛"，看看它们是什么样子，然后归纳性地展开你的思想？或者，你头脑中是否有和一个现存理论相联系的一些特定假设，用以演绎性地进行检验？如果是前者，则具有快速和强有力的搜索和取回性能，能轻松地进行编码和修改，并且有很好的文本和/或图形显示的程序对你来说就是特别重要的。

另一方面，如果你有一个起始理论（beginning theory），想验证一些特定的假设，则具有很强的理论建构和检验性能的程序就是更好的选择。要寻找那些能检验命题的程序，或那些能帮你发展和延伸概念网络的程序。

**一开始就有固定的编码方案 vs 逐步展开的编码方案**。你的研究是否有一个被很好定义的、可能是从理论中推导出的、预先的编码（类别、关键词）方案，并且将应用到你的数据中？或者，当你以扎根理论的风格、用"持续比较"的方法工作下去时，这个方案是否会发生变化（Glaser, 1965；Glaser & Strauss, 1967；Strauss & Corbin, 1998）？如果是后者，则你能轻松地在电脑屏幕上编码（而不是被要求在纸上编码，或必须处理一些麻烦的、在电脑屏幕上编码的程序），并具有支持轻松或自动的编码修改的性能，这是特别重要的。超文本链接功能在这里也很有用。"自动的"编码（在这里，程序根据你设定的规则应用代码，如某个短语或其他代码的结合应何时存在）在其他场合同样有用。

**多重编码 vs 单个编码**。有些程序能让你将几个不同的代码分配给文本的同一个段落，包括更高层级的代码，也可以让你将编好码的"块"（你将代码应运用的文本的范围）进行叠置或嵌套。其他程序则比较严格：一块一个代码。还有一些程序允许你将多个代码运用到一块上，但不"知道"这个块上有多个代码——它们将它作为两个块来处理，一个块对应一个代码。

**多个路径 vs 一个路径**。你是否想且你是否有时间在数据中连续穿行几次，

采用不同的、修正过的路径？或者,你是否要将自己限定在一个路径里？多路径的意图应该将你引向那样一些程序,它们能很好地显示你原先的编码,它们是灵活的、鼓励重复运行,它们能让编码修改变得轻松,它们有很好的搜索和自动编码性能,它们能让你用超文本来跟踪文本的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而当你离开时,它们会保存你的工作记录(也可参见:固定的记录 vs 修订的记录)。

**分析的精细性**。你的分析是集中于特定的词语？文本的行？句子？段落？页？整个文档？看看程序允许(或要求,或禁止)你做什么,它的灵活性如何？你能在你的数据中看到不同大小的块吗？你能轻而易举地定义自由格式的段落吗？当你第一次输入数据时,有些程序让你选择你的可编码的段落的大小,而有些程序在你进行时,则能让你混合、匹配块的大小。

**对数据上下文的兴趣**。当程序根据你的搜索要求抽出文本的块时,在多大程度上你想得到其周围的信息？你是否只需要词语、短语或行本身？你是否想要前面的和后面的行/句子/段落？你是否想看到整个文档？你是否需要能直接跳到文档中的某个地方,然后做某些工作(如编码、编辑、注解)？你是否想给信息标上"来源标签"以便知道它来自何处(如"和 Janice Chang 的第三次访谈"第22 页的第 6 行)？或者,你是否仅仅想得到信息来源,而不是文本自身？各种程序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很大。

**显示的意图**。当你能在一个地方看到组织好的、压缩的信息,而不是一页一页的没有缩减的文本时,分析能做得更好。有些程序以列表(文本段落、采样数、代码等的列表)的形式产生输出结果,有些程序能帮你产生出矩阵显示。它们可能会列出一个矩阵中每个单元格的文本段落或代码,尽管你实际上得在一个供显示的矩阵中排列它们。寻找那些在你用文字处理器将采样数输入一个充满文本(text-filled)的矩阵中之前,能让你编辑、缩减,或概括采样数的程序。有些程序能以矩阵的形式给出定量数据(一般是频率),有些程序能给出网状的或分层级的图表,这是数据显示的另一种主要形式。

**只有定性数据或包含数字**。如果你的数据和/或你的分析包括数字处理的可能性,则要看程序是否能计数,和/或它是否能和定量分析程序如 SPSS 或 SAS 共享信息。仔细考虑你将做什么类型的定量分析,要确保你正在考虑的程序能恰当地处理数据,还要考虑该程序是否能够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根据你正在采用的分析方法)来连接定性和定量数据。例如,你是否需要根据定量分数或人口统计学数据来在你的定性数据中筛选子集？或者,你是否需要运用定性代码来产生等级变量,以用于 SPSS 上的统计分析？或者,你是否想产生词语或代码的频率表,以用于统计分析？

**协作**。如果你是和一个团队一起工作,且有不止一个人从事数据分析,则要看看程序如何支持协作工作。有些程序是很好的,如果你只是想将工作进行分割,让你们中的每个人对数据的不同部分编码,然后将工作合起来;有些程序能比较多个研究者对同一个数据的解释;有些程序能允许多个使用者通过网络进入共享的数据库;其他程序则能允许你定期将不同研究者一直所工作的数据库

的分散副本合并起来。程序的不同在于,在合并过程中,它们给予你多大程度的控制。有些程序让你详细了解程序要做什么,如果它在正被合并的每个副本中发现,比如说,相同名称的代码或备忘录;而有些程序则遵循固定的规则。有些程序擅长于让你分辨一个代码、备忘录,或其他对象是从哪个副本中来的;而其他程序则丢失了所有的识别信息,因此你必须用一些诀窍,如在每个副本中使用不同的名称(例如,我可能用我的姓名缩写作为我创建的所有代码的开头,而你则用你的姓名缩写作为你的代码的开头)。有些程序提供特殊的性能,它能让你比较两个不同的研究者的编码,例如,给你展示一个表格,从中你能看到每个人所做的编码。

**有争议的问题**(cut-across issues)

两个主要的有争议的问题是:和数据的接近性与财力资源(closeness to the data and financial resources)。第二个问题可以忽略不计。软件的价格变化非常大,我们评论的软件价格范围是每个使用者 0 美元到 1 644 美元(Weitzman & Miles,1995b),那只是一个范围(寻找给教育界使用者打折的软件,以及有多个使用者的“地点许可证”的软件)。另外,程序有效运行所要求的硬件差别很大。显然,你不可能使用一个对你而言太贵的程序,因为它要求的是一个你买不起的机器,或者它在一个错误的平台上运行——如 PC 而不是 MAC。令人高兴的是,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现在通过网络发行了两个免费程序:用于定性调查的 EZ-Text 和用于非结构文本的 AnSWR。同样幸运的是,从该领域传来的报告是:今天正在被销售的 Macintosh 计算机(G3 是今天最好的 Mac 计算机)能令人满意地用 PC“竞争”软件来运行最强的 PC 新程序。这种情况对 Mac 计算机的未来时代大概也同样合适。

剩下的问题是和数据接近性相关的,这更加复杂,我也将在下面的题为“本领域的争论”部分进行讨论。为了做出选择,请记住,考虑和数据的接近性是什么类型对你而言是重要的。许多研究者担心,在计算机上处理定性数据将带来的后果是:使他们和其数据疏离。实际上,这是事实。每次你可能只集中于查看文本的小块,甚至可能只查看文本所在的以行计的参考文献。这和那种通过阅读、翻遍整个纸质文档而深深沉浸在数据中的感觉相去甚远。

但其他一些程序能将这种后果减少到最低程度。典型的是,它们一直将你的数据文档保留在你的屏幕上;滚读你所需要的数据、显示你的搜索结果,这样你就能看到它完整的上下文;让你能在同一个数据查看屏幕上执行多数或所有动作。有些程序让你在数据中不同的点之间创建超文本链接,为你明了自己在数据库中的位置提供便利,显示你的编码和备忘录,让你将相关的数据迅速拖到一起,它们能在某些方面比纸质抄本更让你接近数据。如果你考虑到这一点来进行选择,软件能帮助,而不是妨碍你和数据保持近距离而进行工作,实际上,它能帮助你免于淹没在那些纸堆中。然而,拥有能增加和数据的接近感的软件对每个人来说可能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有些研究者并不介意过分依赖打印

稿来获得一种接近感,而有些人则认为这种过分依赖使 QDA 软件的目的丧失了。进一步来说,有些项目完全不要求和数据紧密接近。你也许正在做更加抽象的工作,实际上,可能想远离那些原始数据。

## 本领域的争论

在过去的 20 年中,在定性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中,就“使用软件是不是一个好主意,如果是,那么什么类型的软件是好的”这个问题发生了许多争论。在这里,我将提出四个争论的问题:与数据之间的接近性,软件是否会推动方法论,研究新手是否应该亲手做研究,软件是否真会影响到精确性、一致性和完全性①。

### 与数据之间的接近性

我在程序选择方面刚刚讨论过和数据的接近性问题,在过去数年中已经成为定性研究者提出的最大的关注点。有经验的研究者通常已经发现同样的困难,花费很多时间坐在地板上,周围被一堆一堆的纸质文档包围的过程。这是必要的,它将使研究者对数据完全熟悉。但就像我上面所尽力争辩的那样,软件没有必要削减这种熟悉,它既不会使它变好,也不会使它变坏,软件只是改变了它。尽管有些程序仍然会引起这样的感觉:你仅仅是从文本的一个小窗口开始工作的,对它周围的东西没有概念。但现在有许多程序能提供丰富的上下文信息(如来源信息,超文本链接的绘图,适于航海的略图、代码、文件,以及文本段落的链接列表),这实际上能帮助你比以前更好地了解数据。

### 软件是否会推动方法论

另一个关注点是,研究者可能会让他们的研究适应他们所使用的软件,而不是选择与研究合适的软件(Coffey et al,1996;Kelle,1997;Lonkila,1995)——简而言之,软件会强加一种方法论的或概念上的方法。实际上,软件开发者将假设、概念框架,有时甚至是方法论的或理论的意识形态加到其产品的开发当中。这些意味着一个特定程序的使用对你的分析有重要影响。然而,就像我在别处主张的那样,你不需要,实际上也不应该受这些假设和框架的限制;常常有多种方法让一个程序服从于你自身的目的(参见 Weitzman,印刷中)。例如,一个程序可能会让你只定义代码之间的层级关系。要做到这一点,可以在层级的不同部分创建多余的代码,或用备忘录和网络图表来了解你想定义的额外关系。

开发者将概念上的假设带入其作品实际上是这个领域的长处之一。许多开发者,特别是编码—取回程序和以代码为基础的理论建构器的开发者,就是研究者本人。他们已经花了大量的脑力劳动以找到适合不同类型的数据分析的工

① 对于任何像这样的警告,当你正在选择的时候要进行检查,看正在考虑的程序是否出现这个问题。开发人员经常产生这类问题,因此要我来指出特定的程序是不公平的,也是没用的。情况正在改变中。

具,使用者能极大地受益于他们这种投资。

有一点是正确的,即软件的设计能对分析施加影响。例如,不同的程序用不同的"隐喻"进行工作——这就是显示代码之间、代码和文本之间关系的不同方法。Kwalitan,NUD · IST,the Ethnograph,以及 winMAX 都允许代码之间存在层级关系。对于那些正在分层级地组织你的概念类型的研究,这些程序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你想表现非层级的关系,即使你试图围绕这个隐喻进行工作,那也不如使用一个像 ATLAS/ti 这样的程序方便,ATLAS/ti 显然能支持更灵活的网络。HyperRESEARCH 强调的是代码和个案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代码和文本块之间的关系。当你对一个文本块进行编码时,就创建了一个条目,它对一个特定个案而言就像一个索引卡片。这强烈地支持和鼓励一种思想,即强调个案现象和跨个案现象,但它让寻找和思考一个文本内代码之间的关系变得困难(尽管本书写作时仍正在开发中,版本 2 似乎能解决这个问题)。最后,Code-A-Text 提出了一系列相当不同的编码隐喻:①代码被组织进"等级"(通常,如果你想在考虑很多因素的基础上做出相互唯一的判断,并据此对文本块进行编码,你只能从每个等级中分配一个代码给一个文本段落);②根据文本中的词语被编码;③你所写的对每个文本块的开放式"解释"。用这些编码隐喻进行工作可能会让你用与上面描述的那些隐喻有些不同的方式来思考你的文本。

类似的问题存在于其他类型软件的选择中,如文本数据库管理器。Info Tree32 XT 让你用一种层级树的方式组织文本,并让你能将文本到处拖动来重新组织它们。Folio Views 也可让你创建一个层级性的大纲,但提供额外的功能,即创建多重的、非连续的文本"群",你能在任何想要的时候激活它们。Folio Views 和 askSam 能让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在任何给定的记录中插入主题,而 Info Tree32 XT 则要求你在整个数据库中使用一个标准的主题设置(你自己设计的)。理想主义者不仅能让你为每个记录定制主题设置,还能让你创建许多记录类型,每个记录类型都有自己的主题设置,并将它们混合到同一个数据库中。最后,尽管大多数程序每次只显示一条记录,Folio Views 则能给你显示一个类似文字处理器的形式,在这里,记录像段落一样,一个接一个出现。无疑地,每个程序都会给你显示相当不同的数据形式,因此,每个程序可能都鼓励不同的方法来思考你的数据。不同的程序有不同的长处和弱点。有一点也是正确的,那就是一个聪明的使用者能让每个灵活的软件包服从于相当不同的任务的需要,克服它们之间的很多差异。

每个假设对一些分析模型来说既是一种好处,也是一个约束,关键是不要被程序的假设所限制。如果你知道它们是什么,你就会聪明地利用它们进行工作。程序应该服务于你的分析需要、目标和假设,而不是相反。对关于不同程序对研究的影响感兴趣的研究者还可以参考费尔丁和李(Fielding & Lee,1998)的作品。

### 研究新手是否应该亲手开始做研究

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的确,对于研究新手而言,重要的是开始要学

习如何做好研究,而不是仅仅知道如何使用一个程序。亲手去完成第一个项目,还是在同一过程中学习分析和软件,这个问题最好留给教师们。我已经讲授过这两种方法,根据我的经验,学生们会从手工方法的经验中获益良多,即便只是一些编码经验,也能使他们知道分析中所发生的事情,从而避免对使用软件的担忧。

### 软件是否真会影响到精确性、一致性、完全性

一些研究者认同这样的观点,即软件有利于更精确的研究。在联邦基金代理协会(federal funding agencies)甚至有谣言说,在批准的提案中要求使用软件。然而,就像我上面所说的,软件不会让一个差劲的研究者做出好的成果,软件实际上能帮助有能力的研究者去做比以前更加精确、一致和完全的分析。这个问题不应该被概念化为:软件是否能让研究更精确;而应该概念化为:研究者使用软件所做的研究是否比他/她没有使用软件所做的研究更精确。

## 展望未来

我希望未来能见证目前趋势的延续,无论是在学术方面还是在软件开发方面。下面略述了我的一些明确的希望。

### 这个话题对学术的要求

**正在进行的评论工作。**除了一些书,如韦茨曼和迈尔斯(Weitzman & Miles,1995b)及其即将出版的修订版(这是我和 Nigel Feilding 及 Ray Lee 合著的),提供了在特定时间能获得的软件的全面的比较性评论外,还需要定期出版的评论,它们是对出现的新程序、修订程序所进行的评论。杂志《田野方法》(*Filed Methods*,以前是 *Cultural Anthropology Methods*)提供了定期的软件评论(对定量分析程序和定性分析程序),就像许多杂志特写定期的书评一样。应该有更多的为定性研究读者服务的杂志走这个路子。

**关于方法论问题的争论。**本章提出的这种有争议的问题需要被提交到文献和研究者中进行继续讨论。我们既需要提防软件的无意识的影响,又要通过和开发者讨论我们需要什么,我们不喜欢什么,来积极参与到塑造软件未来发展的行动中。

**更多的实证性工作。**由费尔丁和李(Fielding & Lee,1998)、韦弗和阿特金森(Weaver & Atkinson,1995),以及沃克尔(Walker,1993)所开创的,关于软件对分析的影响的那种实证研究应该继续下去。关于软件影响的观点是很好的,但我们也需要继续让我们的假设去接受实证研究的检验。

### 对软件开发的需求

在这一点上,我们能确认的是:研究者的一些需求还没有得以实现。例如,

这个领域仍然落后于它对个案取向(case-oriented)的研究的支持。有一些程序具有在多个文件之间清晰地跟踪单个个案的性能,但很少有程序具有很强的个案取向的结构。

陈列的构造(building),特别是矩阵的构造,仍然需要很大的发展。在写作本书时新发行的产品 NVivo(来自 NUD·IST 的开发者),能让你建造一个互动的矩阵,在其中,你能通过点击单元格来唤起相应的文本。它与迈尔斯(Matt Miles)的关于一个程序的梦想仍有一步之遥,这个梦想是,程序能将这种功能性与给输出矩阵形成摘要文本(而不是转换到一个文字处理器)的能力结合起来。

叙事分析和话语分析的工具也仍然落后。使用这些方法的研究者继续要求那些能让他们灵活的描述文本和谈话的结构的性能,而纵向研究者想建造能随着时间而清晰地追踪个案的工具,在这方面他们还没有太大进展,尽管 NVivo 有一个"属性"性能,它能让你将日期值贴到代码或文件上。在每个个案中,研究者既可以根据自身需要改编编码系统,也可以寻找其他类型的、他们能使之适应自己需要的软件,如超文本创造程序(authoring programs)、项目调度程序等。

最后,因为没有一个程序能完美地做所有事情,研究者就需要开发者创造一种可能性,即将标注好、编好码、注释好的数据从一个程序输入、输出到另一个程序。部分的也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本书写作时,这已经初显端倪。Code-A-Text, the Ethnograph, winMAX 的开发者们已经同意在一个共同结构(common structure)上进行开发。ATLAS/ti 已经成为第一个能支持在 XML 上完全开发的项目输出的程序,XML 是一种新出现的语言,它能继承 HTML 和 World Wide Web 的格式化标准。一个像这样的公共标准,如果被其他开发者采用,将使研究者轻松地把成熟的项目从一个程序移到另一个程序中,就像我们现在能在多重的电子数据表和数据库程序之间移动表格数据一样。

## 结　论

和大约十年前的情况不同,定性研究者现在已经有了一系列非常好的软件工具来协助他们的研究,软件的使用——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处理器——似乎越来越成为定性研究过程中的常规部分。仍然没有一个"最好的"程序,甚至对一个特定的方法论而言,也没有最好的程序,但这也是好事。这意味着,研究者必须考虑其他方法,并选择适合它们的程序,应该让他们避免对软件的过分依赖。当研究者继续四处搜寻能为他们做事,且做得更好的软件时,软件开发者很可能继续做出反应,让他们的程序变得越来越有用。

在不久的将来,从使用者和开发者的这种协作中,我们还能期待什么?用于共享分析原始数据的更多、更好的工具,它可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即允许使用分析性标注、链接和备忘录来将项目数据库置入 World Wide Web,或者植入光盘,就像 ATLAS/ti 允许的那样;用于构造复杂报告的工具,该报告本身就包括了分

析和数据;用于支持研究团队之间的协作更多、更好的工具;能将被调查者带进研究过程而无需强化计算机训练的更多、更好的工具。




Bogdan, R. C., & Biklen, S. K. (1982). *Qualitative research for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methods.* Boston: Allyn & Bacon.

Coffey, A., & Atkinson, P. (1996). *Making sense of qualitative data: Complementary research strategi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Coffey, A., Holbrook, B., & Atkinson, P. (1996).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Technologies and representations.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1(1). Available Internet: http://www. socresonline. org. uk/socresonline/1/1/4. html

Drass, K. A. (1980). The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data: A computer program. *Urban Life*, 9, 322-353.

Fielding, N. G., & Lee, R. M. (Eds.). (1991). *Using computer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Fielding, N. G., & Lee, R. M. (1998). *Computer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Glaser, B. G. (1965). The 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 of qualitative analysis. *Social Problems*, 12, 436-445.

Glaser, B. G., & Strauss, A. L.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Chicago: Aldine.

Goetz, J. P., & LeCompte, M. D. (1984). *Ethnography and qualitative design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Horney, M. A., & Healey, D. (1991, April). *Hypertext and database tool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Chicago.

Kelle, U. (Ed.). (1995). *Computer-aide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Theory, methods and practice.* London: Sage.

Kelle, U. (1997). Theory building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computer programs for the management of textual data.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2(2). Available Internet: http ://www. socresonline. org. uk/socresonline/2/2/1. html

Lee, R. M., & Fielding, N. G. (1991). Computing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Options, problems and potential. In N. G. Fielding & R. M. Lee (Eds.), *Using computer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13). London: Sage.

Lofland, J., & Lofland, L. H. (1984). *Analyzing social settings: A guide to qualitativ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2nd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Lonkila, M. (1995). Grounded theory as an emerging paradigm for computer-assiste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In U. Kelle (Ed.), *Computer-aide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Theory, methods and practice* (pp. 41-51). London: Sage.

Mangabeira, W. (Ed.). (1996). Qualitative sociology and computer programs: Advent and diffusion of CAQDAS [Special issue]. *Current Sociology*, 44(1).

Miles, M. B., & Huberman, A. M. (1984).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 sourcebook of new methods.* Beverly Hills, CA: Sage.

Miles, M. B., & Huberman, A. M. (1994).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n expanded sourcebook*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Ragin, C. C. (1987).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eidel, J. V., & Clark, J. A. (1984). The Ethnograph: A computer program for the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data. *Qualitative Sociology*, 7, 110-125.

Shelly, A., & Sibert, E. (1985). *The QUALOG users' manual.*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School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trauss, A. L., & Corbin, J. (1998).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Tesch, R. (1990). *Qualitative research: Analysis types and software tools.* New York: Falmer.

Tesch, R. (1991). Computers and qualitative data II. *Qualitative Sociology*, 14(3).

Walker, B. L. (1993). Computer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data: A comparison of three package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3 (1), 91-111.

Weaver, A., & Atkinson, P. (1995). From coding to hypertext: Strategies for microcomputing an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In R. G. Burgess (Ed.), *Studies in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Greenwich, CT: JAI.

Weitzman, E. A. (1999). Analyzing qualitative data with computer software.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34(5), 1241-1263.

Weitzman, E. A., & Miles, M. B. (1995a). Choosing software for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n overview. *Cultural Anthropology Methods*, 7 (1), 1-5.

Weitzman, E. A., & Miles, M. B. (1995b). *Computer programs for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 software sourcebook.* Thousand Oaks, CA: Sage.

# 对话和文本分析 31

ANALYSING TALK AND TEXT

⊙大卫·西尔弗曼

在文本和对话中,实地资料的语言学特征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旨在考察假定的“外部事实”(如阶层、性别、权力),我们的原材料也无非是记载在文献中的文字或由访谈对象所讲述的话语。此外,虽然观察资料应该适当地包含对社会互动的来龙去脉的描绘[即斯廷森(Stimson,1986)所说的“空间和场所的社会学”],但我们在正式或非正式场合中的很多观察结果都将不可避免地由对话构成。

当然,如果我们的资料是录音带的副本,那么我们就直接面临着对话是如何建构起世界的问题。虽然对话有时候被认为没什么价值(“纯粹”的对话),但它已日益被看成是社会互动籍以发生的主要手段。在家庭和更加公众性的场合中,家人和朋友通过对话来安排活动。在工作中,我们互相交流并将我们的组织活动存档。正如赫里蒂奇(Heritage,1984)所主张的,“社会世界是一个充满着对话的世界,其中绝大多数的世界事务都是通过口头互动来进行的”(p. 239)。事实上,赫里蒂奇所称的“世界事务”包括传播消息,判断某人是否会自杀和孩子习知如何与母亲交谈等基本特征(见 Sacks,1992a;Silverman,1998b,第 1 章)。

然而在很多的社会研究中都弥漫着一种令人费解的前语言学情感。这种现象在那些青睐用“操作性定义”来武断地界定某一现象(语言学的传达)的定量研究者中比比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声称径直深入到了先前提到的外部“事实”的定性研究者所展示的参与者在“互动中的对话”却被忽略了。

这些“事实”通常只是被用来解释访谈对象的回答或对话的副本,很少或几乎没有涉及发言者是否(和如何)提到它们。例如我们的“认知”是发言者是一名女性并假定场景是一次医疗会诊,它们并不存在分析上的相关性,除非我们能证明有关群体的行为特征的关联性(Schegloff,1991)。

相比之下,20 世纪的思潮已经开始抵制如词语仅是“事实”的一种显而易见的媒介等诸如此类的研究假设。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1974)那儿,我们得知符号的意义是从它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关系衍生而来的。从哲学家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68)那儿,我们明白了一个文字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从

它的用途派生出来的。因此,正如维特根斯坦提出的:

> 当哲学家使用一个词语——"知识""存在""主体"等……——想尽可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时,那么他应该首先弄清楚:这个词语是不是的确曾经在它的发源地的语言游戏中以这种方式被使用过?
>
> 我们要做的是让词语从抽象的形态回归到它们的日常运用中去(第116节)。

当然,维特根斯坦对一些哲学家的批判也可以被用来反对那些定量研究者,他们甚至没有研究现象在"语言游戏"中的日常发源地的情况就武断地构造出了关于现象的"操作性定义"。但是,维特根斯坦的言辞也同样造成了对那些声称揭示了并不是由参与者所描绘的社会"事实"的定性研究者们的批判。

正如加芬克尔(Garfinkel,1967)所暗示的,无论是定量研究者的科学方法,还是定性研究者主张的"移情式理解",都很合乎常理,因为两者都换位站到了社会成员的理解力的角度来"看穿"表象进入到了潜在的事实。在这一点上,那些声称能进入到某些社会结构或资料"背后"的"情感"的社会研究人员和向观众讲述运动员的"感受"的体育电视评论员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双方都采用了(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资源)加芬克尔所说的"文献诠释法(documentary method of interpretation)"来获得他们的"发现"(本书第18章)。

社会研究和社会之间的关联不足为奇。像观察和访谈等并不是社会研究者特有的活动方式,正如福柯(Foucault,1977)指出的,对囚犯的观察一度是现代监狱改革的核心,访谈中的提问法再现了许多天主教忏悔或精神分析会诊的特点。访谈研究在当代众多社会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反映了它是盛极一时的。想一想,比如从"脱口秀"到"名人专访",访谈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大众媒体作品的核心(和流行)特征。也许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叫"对话社会"的世界中,在此,对话似乎是理解我们生活的关键(Atkinson & Silverman,1997)。

这种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也许能说明到底是什么在引诱着定性研究者把他们的方法定义为"移情式理解"和采用访谈等方法。当然,像文化和方法之间的关联性应该是我们反问自身的方法偏好的一个良机。然而,这些"自问"(常常是——错误地,我认为——像关于反省)本身并没有为我们的选择提供依据。正如我下面所说的,这样的依据取决于我们对社会成员获其所欲的实际方法加以描述的准备状态。

当然,这些牵涉面广泛的问题要融入到我们的资料分析中去。现在我把注意力转到这些问题上来,考察三种以语言传达的资料:访谈、文本和副本。和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显然我在这里注重的是对资料的分析,而不是资料的收集技巧。

## 访　谈

对定性思维的研究者而言,开放式访谈显然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更真实的注

视他人灵魂的机会。或者甚至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相互理解和支持的合理的政治对话的机会。深度访谈中的言语用这样的一些假设丛进行了反复的提示。我们在当代社会学中看到了一股顽强执着而又不切实际的冲动:经验主义作为现实的升华———一模一样的开场白能让电视脱口秀或新闻访谈充满吸引力。

这些定性研究者和调查研究人员一样,都假定访谈回答指明了某些客观现实(对后者来讲是"事实"或"事件",对前者来说是"感觉"和"意义")。两个群体都通过各种方法制定了研究计划以确保其解释的准确性。因此你能够通过像互操作指令协议和计算机辅助定性资料程序来尽可能地保证你准确地描绘出这些事实和经历。而且你还可以通过其他观察来核实访谈对象回答的正确性。让我们用这种唯实论的方法来解释访谈资料。

另一种方法把访谈资料当成是深入到人们用来描绘他们的生活世界的各种故事和讲述(Holstein & Gubrium,1995,1997)中去的途径。这种叙述性的方法声称,放弃把访谈对象的描绘当成是"现实"世界的潜在的"真实"画面的企图,我们通过访谈人员和访谈对象共同得出对世界的合情合理的描绘(Gubrium, 1993; Voysey, 1975)。

我知道很多读者都会赞同前一种方法。在这一点上,我想举一个真实的访谈研究最终是如何被推向描述性的方向的例子。米勒和格拉斯纳(Miller & Glassner,1997)描述了一个采用开放式深度访谈法考察一些自称和所在社区中的帮派有来往的年轻女孩(13 ~ 18 岁)的研究(Miller,1996)。米勒遵循调查访谈的完整过程实施了这些访谈。以下是米勒和格拉斯纳所描述的各种类型的资料的意义(1997):

> 调查访问收集到了大量的涉及不同主题的信息,包括个人的、她所在的学校的、朋友的、家庭的、邻居的、违法记录、拘留史、性生活史、受害史,以及帮派的信息,深度访谈还涉及青年帮派中的年轻女孩的角色和行为,以及她们所描述的在帮派交往中所形成的意义(p. 10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米勒在深度访谈中收集到的资料。下面是一个案例:

> 一个少女在描述她为何加入帮派时对米勒说,"我在家里得不到尊重。我想从其他地方其他人那里获得一些爱和尊重。"(p. 107)

这是另外一个访谈对象关于她为什么要加入帮派的解释:

> 我没有家……我一无所有(p. 107)。

当要求另一个女孩思索她为什么要加入帮派的时候,她回答说:

> 他们中的一些人和我一样,实在是没有一个最基本的家庭或稳定的家可去。你知道,他们在家里并没有得到多少爱和尊重,所以他们想在别的地方得到这些。而且,像我们在帮派中已经得到了家庭成员或像家庭成员这样的东西(p. 107)。

假设你已经收集到了这些资料,现在想着手分析。把它们置于最原始的形态,你怎么处理它们?

和现实主义的方法一样,你可以运用民族志和 NUD·IST 等程序(见本书第30章),把访谈对象加入帮派的各种原因进行编码。从这些资料来看,似乎有这样两个主导因素:"推"的因素(非支持性的家庭)和"拉"的因素(支持性的帮派)。

另外,假定你能够得到关于上述访谈对象的调查资料,现在你要做的是把每个因素同其各种各样的背景特征联系起来。这有可能使你的研究更具合理性。你不仅能够考察青年帮派的"主观"意义,而且还可以把这些现象和"客观"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因此,对那些把理论建立在(客观性的)社会结构对(主观性的)性情的影响之上的社会科学家而言,现实主义的方法极具合理性。而且,这种方法试图提供的研究结果,正好满足了那些希冀从社会科学研究中获得直接收益的社区"用户"的需求。

因为把他们的方法称为"倾听法",所以米勒和格拉斯纳(Miller & Glassner, 1997)主要关注的是如何从访谈对象的视角来考察世界(Glassner & Loughlin, 1987, p. 37)。在这方面,他们和其他的唯实论者都共同假定"经历"的"真实性",因此,无法对一些个人叙述中的特定要素进行文化(和本土)方面的检测。(Gubrium, 1993; Voysey, 1975)。

然而,我们并没有完全满足于现实主义表面的合理性。怎样才能让叙事法推动资料分析呢?米勒和格拉斯纳(Miller & Glassner, 1997, pp. 103-104)认为,着手分析的路径之一,就是考察访谈对象是如何运用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来构建他们的故事的。他们参考了里查德森的观点(Richardson, 1990),即"参与一种文化包括对该文化种种叙事的参与,那些叙事是对意义库和人际关系的通俗理解"(p. 24)。

那么,如何才能以这些方式阅读上述材料呢?方法是把访谈对象的回答看作是一个个的文化故事。这就意味着当访谈对象利用叙述来让自己的行为合情合理、通俗易懂,否则别人就无法理解的时候,需要考察访谈对象话语的修辞学功能(Miller &Glassner, 1997, p. 107)。

在上述资料中,米勒和格拉斯纳指出了研究对象以两种方式来让他人理解自己的行为。首先,他们并不打算把帮派的主流观点作为不好的观点加以反对。其次,他们真的反对访谈对象本人是邪恶的看法。然而,米勒和格拉斯纳(Miller & Glassner, 1997)指出并不是所有的研究对象都是圆滑地重复传统的文化故事。正如他们提出的,"一些年轻女性进一步描绘了她们帮派中的活动方式,这些描述直接向帮派群体天生就是坏的或反社会的,以及女性在帮派中的角色等盛行的刻板印象发起了挑战。"(p. 108)以下是一些访谈对象对自己想法的描述:

> 真的,这是很正常的生活。唯一的区别在于我们有聚会(p. 109)。
>
> (我们)打扑克,聚伙抽烟,搞化妆舞会,玩录像游戏,我们基本上整天都在玩耍。你肯定会很惊讶。这是一群大孩子。这是我的同伴中的一群年龄

较大的老小孩(p. 109)。

米勒和格拉斯纳断言,诸如此类的叙述对所谓的访谈对象清楚大众对青年帮派的看法是一个公开的挑战。女孩们并没有认可把她们的行为界定为"偏差行为"的传统观念,而是试图传达出正常的行为状态。

这些叙述向刻板的帮派文化故事发起了直接的挑战。在里查德森之后,米勒和格拉斯纳(Miller & Glassner,1997)把这样的叙述称为"抗拒关于群体的传统故事并讲述其他故事"的"集体故事"(Richardson,1990,p. 25)。米勒和格拉斯纳对各种观点从中产生的叙述形式所做出的敏感性陈述为对话分析提供了另外一条道路(一种更成熟的描述性方法,见 Gubrium & Holstein,1997)。

## 小 结

根据以上讨论,我建议访谈研究者也许该自问以下五个问题:

(1)你把资料置于哪种情景?很多访谈研究习惯于引诱访谈对象的直觉。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把单一的意义归之于他们的经历才是合适的?也许这里没有人们向研究人员、他们相互之间,或向监护人员描绘的那种具有多重意义的场景(如,生活在社区家庭)或活动(如成为一名足球迷)(Gubrium,1975/1997)?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即访谈回答究竟是要被当作直达"经验"的通道呢,还是作为主动建构起来的"叙事",后者牵涉到本身就有待分析的活动(Holstein & Gubrium, 1995; Silverman, 1993)。两种立场都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但是你需要去论证并解释你所持的立场。

(2)你的分析立场适合你实际关注的事情吗?如果你的目的只是对一个既定的社会问题做出回答的话,一些雄心勃勃的分析立场(如解释、对话分析)实际上可能会掩盖问题的实质(如老年人在社区中的生活和竞争,学生对评估和反馈的看法)。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要你决定把你的研究看成是一项基于某个很清楚的社会问题的描述性研究,就有可能轻易地确认还有更复杂的资料处理方式。

(3)访谈资料真的有助于澄清你的研究主题吗?如果你对学校课堂上发生的事情感兴趣,你是否该把访谈结果作为主要的资料来源呢?仔细想想你为什么要安排一项访谈研究。当然,它能以相对较快的速度收集访谈资料。但是,却不如收集文本和文献那么快。在方法上你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访谈优势的影响(Atkinson & Silverman, 1997)?

在教室的情景中,你是否无法通过观察人们的行为来取代问他们在想什么?或者收集他们在学校的日常行为档案,如学生报告,任务陈述等?当然,你可能仍然想开展一项访谈研究。但是,无论你的方法是什么,你都需要论证它,并表明你已经透彻地考虑过了与你的选择有关的实践和分析方面的问题。

(4)你正在为你的研究发表大规模的论断吗?尽量少做一些关于你的研究的局限性论断对你总是有好处的。格兰迪奥斯(Grandiose)关于社会问题的独特性、范围和适当性的论断都可能是不存在的。审慎地对待你是如何确定你所选择的方法的原因的论断。证明你明白了它构成了一种"切蛋糕"的办法,其他方

法用其他类型的资料也许还不具备直接的竞争力。

(5)你的分析超出了纯粹的列表的范围吗？根据理论方案应该只是资料分析的第一阶段的原理，确定出资料中的主要元素。通过考察这些元素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你就可以揭示出访谈对象和访谈工作者的生动活动，并可以如同他们一样按照原话、生动地讲述某事。

## 文　本

为了介绍一个独立的小节"文本"，现在我们开始看一些人为的东西。毕竟，当研究人员用打印资料做研究的时候，把对话当成是一个故事可能意味着要寻找出同样的文本特征。事实上，访谈副本的纯粹行为把它转化成了一个文字文本。在这一节中，我把文本作为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策略来验明由文字组成的资料，并想像在没有研究人员介入的情况下它们已经被录制下来了(如通过一次访谈)。

当然，任何一种观察方式也是一种非观察的方式。正如阿特金森(Atkinson，1992，p. 459)指出的，运用在访谈和文本分析中的编码方案的缺陷之一是由于它们建立在既定的类型丛的基础上，提供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强大的概念坐标系"。虽然这个坐标系对组织资料分析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它也遗漏了没有归入到类别中的活动。

从某种程度上说，阿特金森的批判使许多定量研究者企图尝试制造关于大样本文本的可靠证据的断言大打折扣。他们青睐的方法是"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在内容分析中研究人员建立了一个类型丛，然后计算归入到每个类型中的例子的数量。关键是要求类别应该足以精确到用材料中的任何一个部分(如报纸的标题)来验证都能得到相同结果的程度(Berelson，1952)。

内容分析的关键问题不是像阿特金森所指出的遗漏了某些类型那样简单，而是分析人员通常是如何单纯凭借换位思考的方式，从缄默的成员的知识角度出发来创造和运用他们所使用的各种类型的。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一次讲演中，萨克斯(Harvey Sacks)比较了社会心理学家贝尔斯(Bales，1950)倾向于制造"互动进程"的瞬时类别和由有经验的内科医师花费了相当长时间来读懂脑电波测量图输出结果的活动。根据萨克斯(Sacks，1992)的观点，我们不应该"归类……当它们出现的时候"(p. 28)。的确如此，如同我们马上要看到的，我们迅速归类的能力更应被看成是一个研究主题，而不是某种研究资源。

与之相反的是，在一些定性研究中，少量的文本和文献可以被用来分析迥然不同的意图。其目的是要去理解参与者的类型和看这些类别在讲述故事(Propp，1968；Sacks，1974)、收集文献(Cicourel，1968；Gubrium & Buckholdt，1982)、描述"家庭生活"(Gubrium，1992)等具体活动中是如何被运用的。这些定性研究人员的理论定位让他们更为关注通过文本来描绘的"现实"，而不是这些

文本是否存在真实的或虚假的陈述。正如阿特金森和克菲(Atkinson & Coffey, 1997)指出的:

> 然而,在给予了这些材料应有的关注后,我们务必深知它们的用途及局限性。由于它们是以社会有机化的方式被创造、共享和使用的,因此它们是“社会事实”,但不是组织惯例、决策过程或职业诊断的透明表象。它们构成了有自身传统的特殊类型的表象。

这一暗示是不言而喻的:

> 我们不应该把文献出处作为其他类型的资料的替代品。例如,我们不能仅凭日常记录去了解一个组织实际的日常运作。同样地,我们也不能把日常记录看成是他们的报告内容的强有力的证据……这种观点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忽略或贬低文献资料。相反,作为社会事实的存在警示着我们的确有必要去严肃地对待它们。我们不得不去搞清楚它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以及能用它们去实现什么东西(p. 47)。

弄清楚文本是什么样的意味着什么?潜在的例子是符号学,民族方法学取向的叙述性分析和文献分析。符号学以原材料的形式把文本看成是符号系统(Silverman,1993,pp. 71-80),描述性分析关注的是如何巧妙地运用本土文化资源进行叙述(Atkinson & Coffey,1997;Denzin,1990;Holstein & Gubrium,1997),文献分析关注的是如何通过解释技巧的运用、对记述中的利害关系的声明(Peter, 1997)和了解对象的意义(Prior,1997)而得出的关于生活世界的不同看法。

在我的兴趣转向民族方法学关注成员的方法之后,我将概略地介绍一个鲜见的例子——萨克斯对成员资格分类分析的叙述(Silverman, 1998b; Watson, 1997)。

## 成员资格分类分析

和某些关注于叙述性故事的当代人类学家一样,萨克斯(Sacks,1992b)相信问题并不在于事后去预测社会成员,而是要设法弄清楚“人们是如何制造出供其他人理解这些事情的行为类型的……(如)人们的亲昵行为……人们的撒谎行为等”(p. 119)。假设很多类型都能用来描述同样的人和行为,那么萨克斯的任务是“查明他们(成员)是如何在有效的类型丛中进行选择以领会某些事件的”(p. 41)。因此,萨克斯并不想暗示我们是“社会”决定了某人要选择哪一类型。相反,他想展示与任何描述和选择某一特定类型的本土含义有关的生动的解释活动。无论我们是否采用萨克斯的假定法,他都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激发人灵感的着手分析任何一个丰富内容的文本的方式。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编码”并不是科研人员的专长。我们都在对我们周围世界中的所见所闻进行“编码”。这是加芬克尔(Garfinkel,1967)和萨克斯(Sacks,1992a)所指的当他们说社会成员,如社会科学家,使世界值得加以关注和值得报道。简而言之,这就意味着研究人员必须慎重地对待他们使用类型的

方式。例如，萨克斯(Sacks,1992b)引用了两位表面上轻而易举地就能把特殊的(虚构的)言辞描绘成"简单的"、"复杂的"、"非正式的"和"正式的"的语言学家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对萨克斯而言(Sacks,1992a)，对资料如此迅速的描绘是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不用分析成员的行为就能知道(这样的类型是正确的)(p. 429)。

在这一点上，老练的研究者也许会说萨克斯对传统研究的描绘过于幼稚。尤其是很多研究人员都意识到了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声称要描绘的某一方面的"事实"和类型之间存在任何的一一对应关系都是危险的。相反，在韦伯(Weber,1949)之后，许多研究者声称他们只是运用假设性解释(或"理想类型")去判断它们的有效性，而不是它们的"正确性"或"真实性"。然而，萨克斯(Sacks,1992a)意识到了这个颇具争议性的问题：

> *在社会研究中，你用来分析手头资料的那种方法，如果它不是有意地对实际现象的分析，那么主张这种方法可以接受就是司空见惯的推进方法。也就是说，你能够拥有一种方法：它是一个"有效的假设构造"，可以为你分析点什么。*

相比之下，萨克斯对"假设构造"丛并不感兴趣。反而是一贯雄心勃勃地主张"论述现实世界"(p. 316)。因而他设计的方法没有被当作是多少有用的一套范畴，而被视为成员运用的实际类型和方法。

让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在萨克斯的两篇讲稿中，他提到了《纽约时代》就飞行员在越南战争中的使命对一个美国飞行员所进行的访谈活动的报道(Sacks,1992b,pp. 202-222,306-311)。萨克斯对报道中飞行员在这个问题的回答特别感兴趣：

当他知道无论他怎样竭尽全力只瞄准军事目标，依然可能有人将丧生于他的炸弹之下的时候，他会有何感想呢？

"我当然不喜欢自己可能正在杀人的想法"，他回答说。"但是我没有因此而夜不成寐，在这种事情上你必须去个性化。在北越我进行自我调节后把自己看成是被另一个像我这样的军人射杀的军人。"(Sacks,1992b,p. 205)

萨克斯请我们看飞行员的即兴回答("我当然不喜欢这个念头")是如何对新闻记者的提问所呈现出来的评价方案做出承诺的。比如，如果飞行员反问你，"你为什么要问?"他可能已经表明了他没有必要赞成和新闻记者一样的道德世界(以及通过暗示，文章的读者)(Sacks,1992,p. 211)。

正如萨克斯表明的，飞行员接受了这样的道德图式后，现在已经构造出了一种有利于赢得我们的赞同的回答。

"军人"的范畴有助于把他的轰炸行为辩护成受制于这一范畴的活动，从而提醒我们毕竟这是军人的行为。飞行员认为他的共同参与者是"另一个和自己一样的军人"的观念更强化了这一效应。这样，飞行员们用彼此认可的职责(互相轰炸或射击)创造出了一对搭档(军人/军人)。从搭档方面来说，另一方不能表示丝毫不满，或如同萨克斯所提出的，"从他们的职责来看，对他们的手段的过

失没有任何的抱怨,考虑到所采用的策略,除非他碰巧违反了有效的规则"(p.206)。

另外,要注意飞行员所提出的,"在这种事情上你必须去个性化。"留意"这一事务"的类别是如何建立起这一特定的军人搭档会立马运用的领域。因此,搭档中的任何一方都可能会有这种考虑。然而,正如萨克斯(Sacks,1992b)表明的,这就暗示着这一"事务"只是众多要求去个性化的事务之一,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仅仅为了这一使命你不得不在这一事情上不受个人情感的影响,因此最初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可能是错误的(p.206)"。

此外,关于去个性化是一种特殊的品质。萨克斯指出,我们听到飞行员说不幸的事情并不是他不能"亲自"杀人,而是卷入到这一"事务"中就意味着他不应该认为自己正在杀人(p.209)。然而,飞行员只是提出了军人和军人这一对搭档。在这一点上,他是在邀请北越人"玩一场游戏",就如同一个孩子可能对另一个人说"我是三垒手"一样。然而,正如萨克斯指出的(Sacks,1992a),在儿童棒球中,这样的提议会遭到拒绝:"如果你说'我是三垒手'的话,除非某人说'那么我是……'另一个位置,以及剩下的人说他们将打其余的位置,否则,你就不能够游戏。"(p.307)

当然,北越人民事实上是坚决抵制了飞行员的提议。他们反而提出这些飞行员的身份是"罪犯",而他们自己是在"履行警察的角色"。正如萨克斯观察到的,这些对抗性界定的暗示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宣传的范围。例如,如果飞行员被击毙了,那么只要他真的是一名"军人",而不是一个"罪犯",日内瓦大会就会随之对他采取合理的处置(p.307)。

和更加形式化的行动叙述不同(Mead,1934;Parsons,1937),萨克斯的分析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客观的方法,据此我们得以建构起道德世界,其中"包括恰当类型的行动和具有动机、欲望、感情、野心和正义感的特殊行动者"(J. F. Gubrium,私人交流,1997)。和加芬克尔一样,萨克斯希望能避免把人们看作是"文化情报",以文化要求的方式描绘这个世界。相反,萨克斯把"文化"当作一种"下结论的工具":一种在特定的背景中被运用和实施的描述性的工具。

## 小结

我将用更深入的总结性陈述来结束我对文本的讨论。这里我不用问题的方式,而是冒险提出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显露出的三条建议(作为这一主题的拓展,Silverman,2000)。

(1)有明确的分析方法。成功的文本研究重视一个有明确界定的方法的价值。在选定了方法后(如福柯式的文献分析,索绪尔式的符号学,萨克斯的成员资格分类分析),把它当作是一个提供一套概念和方法供你挑选资料来证明你的分析的"工具箱"。

(2)明白成功的分析要超出列表的范围。我并不为重复了我上述访谈研究的讨论中已经提出的观点而感到抱歉。我认为定性研究者能做出的突出贡献是

在对共享的公共资料的深度分析中运用他们的理论资源。这就意味着,和一些定量研究者相区别的是,我们不满足于对资料单一的编码。相反,我们不得不努力表明我们确认的基本原则是如何汇集在一起或互相制约的。

(3)限定你的资料。像其他一些定性方法一样,文本分析有赖于非常细致的资料分析。为了使这样的分析更有效,用圈空的资料去研究是很重要的。因此,尽管最初考察不同类型的资料是极为有益的(如新闻报道、教科书、杂志等),你做这些通常都应该只是为了建立起能使你能更有效地研究的资料丛。在选定资料丛后,你应该通过选择某些文本或文本的一部分(如标题)来进一步地限定你的素材。

## 副 本

这里探讨的三种类型的定性资料都是某种形式的文本。在访谈中,研究者经常要用到速记稿。同样地,对记录自然发生的互动的录像带的描述通常在分析之前。

贯穿所有录像带分析的两大社会科学传统是谈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CA)和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DA)。关于 CA 的介绍,可查阅特恩海弗(ten Have,1998);关于 DA,可查阅波特和韦瑟雷尔(Potter & Wetherell,1987)和波特(Potter,1997)。在这一章的余下部分,我就探讨两个更具实践意义的问题:①用记载自然发生的对话的录音带和文本进行研究的优点,②录音带分析的基本原则。

### 为何要用录音带

> 我处理的现象永远是以实际序列所发生的真实事件的副本(Sacks,1984,p.25)。

在当代哲学界,萨克斯痴迷于把对话当作一种行为的言—行理论。然而,奥斯汀(Austin,1962)和瑟尔(Searle,1969)并不研究实际对话,而是通过虚构的案例和自己的直觉来研究是什么使话语变得有意义的。萨克斯(Sacks,1992b)则截然不同地写道:

> 我们不能虚构出新的对话顺序且自我陶醉。你也许能够采取"一问一答"的形式,但如果我们必须拓展其深度,那么某人是否真的会说出像第五种观点等,就是我们不能肯定地证明的。我们没有强大的直觉来安排好对话的顺序(p.5)。

早期的人类学家通常通过实地记录来记载其观察结果。为什么萨克斯更热衷于用录音机呢?萨克斯的回答是我们不能完全依赖收集到的对话资料。当然,通过记忆,我们通常可以归纳出不同人士的言论。但是要记住(或甚至当场

记下)像停顿、重复和深呼吸等事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你认为这些类型的事情是否重要还取决于你能用或不用它们来证明什么。事实上你甚至有可能根本就不相信对话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主题。但是,通过研究对话的录音带,至少你能关注一部分社会生活的"真实细节"。正如萨克斯(Sacks,1992b)提出的:

> 我的研究仅仅是以这种补充的方式来开展的对话,我们能够获得录像带上的真实行为并或多或少地描述他们,并因此而找到入手之处。如果你无法对真实事件进行确切地描述,那么你就无法科学地解释社会生活(p.26)。

录像带和文本提供的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入手之处"。首先,它们是一个能为科学共同体所共享的公共记录,这是现场记录所不具备的。其次,可以重新回放它们并不断地完善副本,而且通过原始副本,能从各种不同的行动步骤出发进行分析。正如萨克斯对他的学生所说的:

> 我开始摆弄对话录音带,其唯一的优点是我能重放它们;我也许能把他们打印出来,进一步地研究它们,谁知道这将花多长时间呢……这并非出自对语言或某些需要被研究的理论建构的兴趣,而只是因为能重放它们。我能着手研究它,而且能反复地研究它。如果有人反对我的话,它的重大意义还在于能让其他人瞧瞧我所做的研究,从而理解它们的功用。

详尽副本的第三个优点是,如果你想查看话语的序列,可以不必受制于第一个研究者断章取义的局限。因为它在这些序列里面,而不是以单独对话的形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对话的意义。正如萨克斯(Sacks,1992b)指出的:

> 得到围绕着某个规定的话语的其他话语对于确定所说的内容是至关重要的。
>
> 如果你获得的只是你现在正在转录的片刻对话,那么你就会确定它的内容。

还可能潜存在着主要基于录像带的资料是不完整的指责。我们看看萨克斯在他的分析中对一个学生关于"忽略了面部表情等事件"的问题的回答(1992b, p.26)。萨克斯马上承认"研究它们(这样的事物)真是太棒了。这是一个缺失"无论如何,他为自己的资料构建了一个二分法的辩护。

首先,"完整"的想法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幻想。当然,不可能完全"完整"的资料有可能是一个"完美"的副本吗?其次,萨克斯(Sacks,1992b,pp.26-27)清楚地认识到了包括摄像机的定位和使用录像机的可能等不容质疑的技术问题。这些正是我们已经论述过的问题,如果没有解决,通过近来建立在录像带资料上的工作(e.g.,Heath,1986,1997;Heath & Luff,1992)。还有,如同科学的规律,任何事情都取决于你正在进行的努力和你有可能取得进展的东西。正如萨克斯(Sacks,1992b)所说的:"起点有可能决定一个人到达的终点。"(p.26)

不要以为副本的准备只是分析这一重要工作之前的一个技术细节。副本对

显在的目的的方便性不过是一个额外的优点。正如阿特金森和赫里蒂奇(Atkinson & Heritage,1984)指出的,副本的制作和使用都是必不可少的"研究活动"。它们包括仔细地、反复地聆听那些通常会透露出以前在对话活动中没有留意的反复出现的特征。这样的聆听在小组资料中是十分有利的。正如特恩海弗(ten Have,1998)描述的,这样的小组工作通常发端于一段副本的初稿和对副本不断改进的探讨。因此:

> 邀请参与者来发表他们对资料的意见。在选出一个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让他们感兴趣的片段后,发表他们对这个片段的理解和疑问。任何人都可以对这些评论进行回应,提供可供选择的方案,提出疑问或其他不同的观点。

然而,正如特恩海弗阐明的,这样的小组资料会议是一场所有在场者都参与了的混乱争吵:

> 一方面,参与者可以自由地发表他们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在掌握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观察,虽然他们可能会用自己基于资料得出的调查结果或出版的文献来支持那些观点(p. 124)。

## 录音带分析

和任何类型的资料一样,录音带和副本分析也取决于从一个特定的理论方向而言的研究问题的产生。就像实地写作表明的,录音和录像带的副本准备是一项充满了理论色彩的活动。当很多研究人员探讨你的所见所闻绝非单纯地资料整理的时候——这就是资料分析。

但是你如何超出一个你认可的副本范围来推进资料分析呢?一种诱惑是从你的副本的第一行着手,然后逐页进行,同时注意观察。然而,按这种方式进行的危险是你的观察结果很有可能是有目的性的安排的和常识性的结论。另外,如果你采用的方法(如 CA 或 DA)关注的是参与者是如何共同制造意义的话,那么从单独的话语开始将会使你误入歧途。

你还能如何进行资料分析呢?马森(Mason,1996)建议你可以以各种形式构造一个研究主题。证明一个问题也可以是一种促进副本分析的方式。一旦你发现了问题,最好的方式通常是反复的研究你的副本,看问题是怎么产生以及如何被解决的。这就暗示着这种类型的研究有一种很浓厚的归纳法的偏好。接着是任何研究声明都需要建立在对详细的副本的精确分析之上。因此我们需要避免做不成熟的理论建构和采用那些仅仅只运用了一般性的、不详的描述的理想化的材料。赫里蒂奇(Heritage,1984)把这些假设概括如下:

> 确切地说,分析主要是由资料来推动的——从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互动资料中显露出的现象发展而来的。相应地,这就存在着一种强烈地反对事先推测发言者的倾向性或动机,而赞同详细地考察交谈者的实际行动的偏见。因此,观察到的发言者的行动被当作是展开分析的重要资源。

赫里蒂奇补充道,实际上,这意味着需要证明所显示出来的描绘的规律性是参与者制造出来作为自己的推断和行为的根据的。此外,还需要确定和分析没有规律性的异常情况。

然而,CA 获得结果的方式和我们努力凭借直觉来分析对话的方式是迥然不同的。因此,如果我以提供一套粗略地关于如何做 CA 分析(表 31.1)和在做 CA 分析的时候要避免的一系列问题(表 31.2)的方式来结束这一节,也许是有益的。如果我们遵循了以下规则,对话分析并不需要特别的技巧。正如谢格洛夫(Schegloff,1992)在对萨克斯的《演讲集》的序言中指出的,我们所有要做的工作是"从观察着手,然后发现问题,因为这些观察能有助于……解决问题"(p. xlviii)。

表 31.1 如何分析对话

| |
|---|
| 1. 永远尽可能地确定好相关谈话的顺序。 |
| 2. 尽量通过谈话来考察发言者是如何担任某个角色和身份的(例如提问者/回答者或当事人/职业顾问等)。 |
| 3. 注意谈话中的特殊结果(如一次澄清要求、一个修正、一声大笑等),并回过头来追溯某一特殊结果籍以产生的发展轨迹。 |

资料来源:Silverman,1998a.

表 31.2 对话分析中的常见错误

| |
|---|
| 1. 通过引用发言者的目的来解释对话中的新情况(除了那些在对话中论及的目的)。 |
| 2. 通过提及发言者的角色或身份来解释对话中的新情况(如作为一名医生,或一名男性,或者一名妇女等)。 |
| 3. 企图脱离有关的对话而孤立地理解单独的一行文字或一句话的意思。 |

资料来源:Silverman,1998a.

这意味着开展 CA 要求的系统性分析并不是一项难得不可企及的活动。正如萨克斯(Sacks,1992a)曾指出的,在开展 CA 的过程中,我们只需要提醒自己那些我们已经知晓的事物:

> 假定我所列出的各种结果人们是可以亲眼目睹的。他们并不必为此担心。更不用妄想这些结果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可以亲自去看……(这)就如同我们发现了一种新型植物,也许它一直就长在你的花园里。但是你现在觉察到它与其他植物相比有些异样。你可以仔细地瞧瞧到底差别在哪里,以及是否有人曾以某种方式说过这种差别(p. 488)。

维特根斯坦(尽管在萨克斯的文章中只提到过两次),和他对收集我们已经知道的提示物的关心显然是相关的。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68)写到:"对我们来说,事情最重要的方面因其简单性和熟悉性而隐藏起来了。"(para. 129)当然,维特根斯坦指的是对思想家来说隐藏着的东西。但是对社会科学家来说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对他们来说事情可能"因其简单性和熟悉性而隐藏起来"。

# 结 论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几乎所有的定性研究都牵涉到对话和文本。然而，在这一章中，我拒绝了这种包罗万象的做法，而选择了更为严格地加以界定的方法来针对定性资料以语言为中介的特性。虽然我自己的方法源于加芬克尔和萨克斯的聚焦于成员的方法，但我依然尽量避免采用某种“接受或拒绝”的方法。另外我还特别强调要广泛综合其他各种不同的方法，包括以叙述为本的人类学、文献分析和符号学等。

最重要的是，我尽量给那些可能想从这个方向开始的新手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但我希望这一章是源自连贯的原理，而不仅仅是一本提供简单的技术指导的书籍。甘受罗嗦之嫌，我以对其中四个原则的陈述作为结束语。

- 最好把定性研究看成是建立在一些用分析方法来界定观点的基础之上的方法，而不是一套独立式的方法。
- 我认为无论是对研究者还是对参与者来说，定性研究的特殊功效在于它集中探讨了场景中的真实活动，及观察了社会互动是如何以日常生活的方式展现出来的。
- 通行的以人们是如何“理解事物”的方式对定性方法的界定忽略了人们是如何“处理事情”的重要性。这就意味着对采用开放式访谈的非定量社会科学的明显支持，还需要进行重新审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此杜绝访谈法，毋宁说，我们起码应该首先考虑其他的替代方法。
- 定性研究人员应该对纯粹“探索性的(exploratory)”和“轶事性(anecdotal)”的常识予以质疑。个案研究法可以用于大型资料丛的分析，其信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有条理的资料副本来验证(Peräkylä,1997; Silverman,1993,pp.144-170)。

## 参考文献


Atkinson, J. M., & Heritage, J. C. (Eds.). (1984). *Structures of social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tkinson, P. A. (1992). The ethnography of a medical setting: Reading, writing and rhetoric.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2,451-474.

Atkinson, P. A., & Coffey, A. (1997). Analysing documentary realities. In D. Silverman (Ed.),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pp. 45-62). London: Sage.

Atkinson, P. A., & Silverman, D. (1997). Kundera's *Immortality*: The interview society and the invention of self. *Qualitative Inquiry*, 3, 304-325.

Austin, J. L.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Clarendon.

Bales, R. F. (1950). *Interaction process analysis.* Cambridge, MA: Addison-Wesley.

Berelson, B. (1952). *Content analysis in*

*communicative research*. New York: Free Press.

Cicourel, A. (1968).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juvenile justice*. New York: John Wiley.

Denzin, N. K. (1990). Harold and Agnes: A feminist narrative's undoing. *Sociological Theory*, 8, 198-216.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A. Sheridan, Trans.). New York: Pantheon.

Garfinkel, H.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Glassner, B., & Loughlin, J. (1987). *Drugs in adolescent worlds: Burnouts to straights*. New York: St. Martin's.

Gubrium, J. F. (1992). *Out of control: Family therapy and domestic disorder*. Newbury Park, CA: Sage.

Gubrium, J. F. (1993). *Speaking of life: Horizons of meaning for nursing home residents*.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Gubrium, J. F. (1997). *Living and dying at Murray Manor*.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5)

Gubrium, J. F., & Buckholdt, D. (1982). *Describing care: Image and practice in rehabilitation*. Cambridge, MA: Oelschlager, Gunn & Hain.

Gubrium, J. F., & Holstein, J. A. (1997). *The new language of qualitative metho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ath, C. C. (1986). *Body movement and speech in medical inter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ath, C. C. (1997). Using video: Analysing activities in face to face interaction. In D. Silverman (Ed.),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pp. 183-200). London: Sage.

Heath, C. C., & Luff, P (1992). Collaboration and control: Crisis management and multimedia technology in London underground line control rooms. *Journal of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1(1-2), 69-94.

Heritage, J. C. (1984). *Garfinkel and ethnomethodology*. Cambridge: Polity.

Holstein, J. A., & Gubrium, J. F. (1995). *The active interview*. Thousand Oaks, CA: Sage.

Holstein, J. A., & Gubrium, J. F. (1997). Active interviewing. In D. Silverman (Ed.),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pp. 113-129). London: Sage.

Mason, J. (1996). *Qualitative researching*. London: Sage.

Mead, G. H.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 (C. W. Morris,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iller, J. (1996). *Female gang involvement in the Midwest: A two-city comparis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Miller, J., & Glassner, B. (1997). The "inside" and the "outside": Finding realities in interviews. In D. Silverman (Ed.),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pp. 99-112). London: Sage.

Parsons, T. (1937).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Peräikylä, A. (1997).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research based upon transcripts. In D. Silverman (Ed.),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pp. 201-220). London: Sage.

Potter, J. (1997). Discourse analysis as a way of analysing naturally-occurring talk. In D. Silverman (Ed.),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pp. 144-160). London: Sage.

Potter, J., & Wetherell, M. (1987). *Discourse and social psychology: Beyond attitudes and behaviour*. London: Sage.

Prior, L. (1997). Following in Foucault's footsteps: Text and context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D. Silverman (Ed.),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pp. 63-79). London: Sage.

Propp, V. I. (1968). *The 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 (L. A. Wagner, Ed.; 2nd rev. ed.).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Richardson, L. (1990). *Writing strategies: Reaching diverse audiences*. Newbury Park, CA:

Sage.

Sacks, H. (1974). On the analyzability of stories by children. In R. Turner (Ed.), *Ethnomethodology* (pp. 216-232). Harmondsworth: Penguin.

Sacks, H. (1984). Notes on methodology. In J. M. Atkinson & J. Heritage (Eds.), *Structures of social action: Studies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pp. 21-2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cks, H. (1992a).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G. Jefferson, Ed.; Vol. 1). Oxford: Blackwell.

Sacks, H. (1992b).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G. Jefferson, Ed.; Vol. 2). Oxford: Blackwell.

Saussure, F. de. (1974).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London: Fontana.

Schegloff, E. A. (1991). Reflections on talk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D. Boden & D. Zimmerman (Eds.), *Talk and social structure: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and conversation analysis* (pp. 44-70). Cambridge: Polity.

Schegloff, E. A. (1992). Introduction. In H. Sacks,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G. Jefferson, Ed.; Vol. 1). Oxford: Blackwell.

Schegloff, E. A. (1998). Reply to Wetherell. *Discourse and Society*, 9, 413-416.

Searle, J. R. (1969). *Speech a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ilverman, D. (1993).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data: Strategies for analysing talk, text and interaction.* London: Sage.

Silverman, D. (1998a). Analysing conversation. In C. Seale (Ed.), *Researching society and culture* (pp. 261-274). London: Sage.

Silverman, D. (1998b). *Harvey Sacks: Social science and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mbridge: Polity.

Silverman, D. (2000). *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A practical handbook.* London: Sage.

Stimson, G. (1986). Place and space in sociological fieldwork. *Sociological Review*, 34, 641-656.

ten Have, P. (1998). *Doing conversation analysis: A practical guide.* Thousand Oaks, CA: Sage.

Voysey, M. (1975). *A constant burden.* London: Routledge.

Watson, R. (1997). Ethnomethodology and textual analysis. In D. Silverman (Ed.),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pp. 80-98). London: Sage.

Weber, M. (1949).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 A. Shils & H. A. Finch, Eds. & Trans.). New York: Free Press.

Wetherell, M. (1998). Positioning and interpretative repertoires: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post-structuralism in dialogue. *Discourse and Society*, 9, 387-412.

Wittgenstein, L. (1968).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女权主义研究中的焦点小组法



FUCUS GROUPS IN FEMINIST RESEARCH

⊙ 埃斯特·麻德里兹

我更喜欢这样交流,和一群妇女一起……如果单独和访谈者在一起,我会觉得很恐慌、很害怕。如果他们打电话访问,我是绝不会回答他们的提问的。我怎么知道他们究竟要干什么或他们是谁?

费尔南德斯(Maria Fernandez),25岁,多米尼加妇女(参加了1995年春我在纽约市华盛顿海特区开展的焦点小组访谈)

参与观察和个案访谈是研究者用来收集定性资料的两种主要方法。焦点小组法,或群体访谈在保持自身特性的同时,还兼具了上述两种方法的特点(Morgan, 1988)。焦点小组法本质上是一种倾听、了解他人的方法(Morgan, 1988,p.9)。正如费尔南德斯的话语所表明的,焦点小组法提供了一条深入到那些在一对一、面对面的互动中感到恐慌和害怕的参与者中去的途径。通过多向交流,群体访谈给诸如Maria这样的参与者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们可以和那些与自己具有相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和性别背景的群体成员相互交流思想、信仰和看法。一些采用焦点小组法的研究也证实了参与者在群体访谈中要比在个案访谈中表现得更兴奋、更活跃(Morgan,1988;Wilkinson,1998)。

这一章专门论述了源于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研究框架的焦点小组法。女权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最为关注的是在访谈过程中所出现的伦理上的两难境地和访谈者的角色定位问题。这些问题使得参与者的所言所感都显得格外重要(Fontana & Frey,1994)。另外,在认识到了那些被忽视了的,但却长期困扰着某些人群,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的各种隐性社会科学因素之后,女权主义研究者和后现代主义研究者们已经把研究者和被研究对象的种族问题列为了他们的研究重点。

长期以来,有色人种女性的呼声在大多数研究项目中都被忽略了。而焦点小组法不仅揭示了这些女性所遭受的压迫,还揭示了她们日常用于反抗这些压制的方式,这些都可能会有力地促进有色人种女性“共同书写文化”。在这一点上,我认为焦点小组法可以有力地推动女性社会公正地发展,因为它可以揭示并证实有色人种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所遭受的压迫,以及她们个体的和集体的反抗

策略。

焦点小组法是一种把参与者的各种不同的态度、经历和信仰作为研究重点的集体式研究方法,而非个案式的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中,个案式的研究方法由于某些原因曾风靡一时。首先,在实证主义、定量研究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尤其是在美国,个案问卷调查曾是最流行的、广为接受的资料收集方法。其次,即使是在定性研究者当中,运用得最广泛的研究方法也是一对一、面对面的互动。集体证词和集体叙述只是近年来才在定性研究中得到了有限的增长。即便是重视女性共同生活特征的女权主义学者,她们也自相矛盾地认为个案访谈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Finch,1984;Oakley,1981;Wilkinson,1998)。作为一个拉丁美洲女权主义者,我是把焦点小组放在集体证词的前因后果和对群体反抗的叙述中来研究的。他们通常可以用来揭示女性,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的日常生活、感受、看法、愿望和梦想等特殊,而又较少受到关注的方面。

焦点小组法的独特之处是可以让社会科学家观察到最重要的社会学过程——人类的集体互动。另外,它还能使研究者在有限的时间内收集到大量的互动资料。然而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虽然焦点小组法在市场研究领域早已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定性研究者和人类学社会研究者却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才逐渐认可、了解了焦点小组法。因此,现有的关于焦点小组法的资料不仅稀少,而且缺乏系统性。正如摩根(Morgan)和克鲁格(Krueger)所言,目前,社会科学和评估性研究关于焦点小组法的知识大多还停留在源于个人经历而非系统化的调查研究阶段。然而,在过去的五年里,群体访谈在一些女权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社会研究者中是大行其道。

与参与观察法相比,焦点小组法有这样几点不足之处:有时候,典型的社会互动是发生在群体访谈的场景之外,因此,通过群体访谈收集到的行为类资料是很有限的——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收集到的资料只局限于口头交流、身体语言和自我陈述的资料。另外,由于主持人的在场效应,使焦点小组中社会互动的真实性无从判断。然而,最糟糕的,也是参与观察法不可避免的一个缺陷,是研究者的在场有可能导致被观察对象的行为发生改变。

与个案访谈相比,焦点小组法在让研究者观察参与者的社会互动过程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这些过程通常包括群体成员在讨论的过程中进行自我放松的一些应急反应。另外,群体成员的互动还可以减少主持人和群体单个成员之间的互动频率。研究者影响力的降低,必然使参与者的看法在访谈过程中显得更为重要。

## 焦点小组法的历史

摩根(Morgan,1988)阐明了焦点小组法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在20世纪20年代期间,社会科学家根据研究的需要而采用了各种不同的研究方

法,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问卷调查的发展。第二阶段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焦点小组访谈主要被市场调查员用来了解人们的需求意向。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焦点小组访谈已被各个行业的专业人士用来开展关于健康、性行为等社会问题的研究。事实上,社会科学家近年来已经逐渐意识到了焦点小组法是一种重要的定性研究方法。

虽然一些早期的实证研究者已经采用了小组访谈法,但很少有人把它作为一门独特的方法学而予以详细的介绍。如文化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在 Trobriand Islands 的当地人中开展了小组访谈活动,但他在报告中并没有详细地描述这些小组访谈的独特之处(Frey & Fontana,1993)。怀特,《街角社会》(Whyte,1943)的作者,运用小组访谈研究了波士顿的一个帮派,但他也没有详细地描述小组访谈这一独特的研究方法的功用是什么。

在19世纪40年代初,默顿(Robert Morton)和拉扎斯费尔德(Paul Lazarsfeld)把小组访谈法引入了社会科学领域。在他们的开创性工作中,默顿和拉扎斯费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无线电广播研究所运用焦点小组法,考察了一个群体对战时无线电广播节目的反应。从那以后,焦点小组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特别是市场研究员认为它是一种最好的定性研究方法(Morgan,1988)。

大约在默顿和拉扎斯费尔德的研究之后的40年里,再很少有人认为小组访谈是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然而,从19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又重新兴起了一股把焦点小组法作为一门可接受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而大力加以推广的热潮。这股热潮不单只席卷了社会学界和人类学界。实际上,许多社会科学家和其他行业的专业人士都发现了这一定性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如政治学家正在运用焦点小组法考察公众对政治候选人和某些特殊问题的看法。斯图尔特和萨达森(Stewart & Shamdasani,1990)在文章中介绍了在1980年代的里根总统政府时期,政府是如何利用焦点小组法来了解苏美两国人民关于两国关系的民意的。同样地,他们还证实了这一方法对于了解消费者对新型汽车的购买需求所起的重要作用。总之,对社会科学研究者和其他行业的专业人士来说,无论他们的研究领域有多么特殊,焦点小组法都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Frey & Fontata, 1993; Morgan, 1998)。

在社会科学领域,小组访谈作为一种收集个案信息的方法有保留地得到了发展。这种保留集中体现在访谈者对参与者的影响和由于封闭式问题所造成的局限性。采用高度结构式问卷的传统访谈法,有一个主要的缺陷——访谈者的访谈框架、观点和信仰,无论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都影响了提问的效果和为参与者提供的选项(Krueger,1994)。很少有能得到较好地反映访谈者的现实生活的回应的指导方法。

正如克鲁格(Krueger,1994)所言,对定性研究方法,尤其是对焦点小组法的接受过程之所以如此缓慢,是由于实证主义把个案的数量作为公认的测量社会现实的传统及对定量研究方法的强调,认为定量研究方法比定性研究方法更为科学。虽然定量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在美国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很

多当代社会科学研究者对了解、研究参与者的观点、态度和日常互动更感兴趣。尤其是女权主义研究者和后现代主义研究者认为传统的研究方法不适合用来研究社会边缘人群，也不适合用来获取边缘人群的意见，由于某些原因，这些方法把研究者的安排强加于参与者，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安排（Maynard & Purvis，1994）。更重要的是，女权主义研究者和后现代主义研究者认为传统的研究方法无法收集到高质量的资料（Wilkinson，1998）。

## 焦点小组法、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

受女权主义研究和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研究的影响，一些社会研究者已经重新认识了焦点小组法，而且在一些特殊的研究领域中正在大量地运用这一方法。对那些试图缩小和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尽可能地保持日常生活事件原形的后现代主义人类学者来说，这一方法更为有效。相信通过把权力杠杆向群体成员倾斜，群体情景有可能会降低访谈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由于焦点小组法注重的是共性，而不是个性，所以他们提倡并鼓励群体成员大胆地畅所欲言（Denzin，1986；Frey & Fontana，1993）。

女权主义学者在意识到了实证主义研究脱离了女性的生活经历和生存状态，以及在考察女性的生活经历和生存状态方面无能为力的事实后，也转而倡导更具解释力的经验性研究。如关于女性的日常生活经历这一重要的研究领域就需要认真地挑选研究方法。在众多的方法中，人类学一直被认为是最适合女权主义研究的（Stacey，1991，p. 112）。女权主义者的许多观点也证明了他们对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偏爱要远甚于传统的调查研究方法。首先，他们指出了一对一的访谈有可能重新形成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的权力关系（Finch，1984；Oakley，1981；Wilkinson，1998）。女权主义者认为，在一对一的访谈中，从主题的确定、方法的选取和所提问题的选取，到把自己的研究框架强加于研究发现，通常都是由研究者在主导着整个研究过程。而焦点小组法通过缩小研究者对参与者的权限，降低了研究者在资料收集阶段的这种控制权。小组访谈的集体特性使参与者能够一起证实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看法。

此外，女权主义研究还试图缩小传统性研究在思想与情感、人身与政治、价值中立性（客观性）研究与价值偏好性（或主观性）研究上的分歧。把女性对自己生活经历的主观看法作为研究的核心（Stacey，1991）。女权主义者并没有把研究看成是直线式的、单边的进程，而是高度强调研究过程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然而，要指出的是，女权主义研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方法，还存在着一些相冲突的观点。奥利森（Olesen，1992，p. 163）把女权主义研究概括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强调把妇女所熟知的日常生活经历作为研究核心，女性不断地塑造和重塑着这些生活经历。第二类是恪守现行定性研究准则的女权经验主义研究，这类研究也引发了一些使研究发现更具可信度、新颖而又严格的研究活动。第三

类是把事件、叙述和知识的建构与再现作为研究核心的后现代女权主义研究。尽管有差异,但女权主义研究者都共同把女性的不同观点及日常生活经历作为研究的重心和难点。我相信小组访谈能满足以上三种不同类型的女权主义研究的要求。通过那些充满了文化象征、文字、符号和思想观念的集体事件和关于抵抗的叙述,小组访谈能更好地揭示女性的日常生活经历。因为这些文化象征、文字和思想观念充分反映了造成妇女日常生活经历的各种统治权限。

然而,正如女权经验主义者所提出的,为了提高定性研究的规范性,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以下问题:社会科学家是怎么开展那些既把研究对象作为信息提供者,又把他们作为促进社会变迁潜在力量的伦理性研究的?通常是小组访谈和定性研究的哪些潜能促进了这些变迁?除了通过交流与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人们的自我意识以外,焦点小组法还是否是一种有效的资料收集方法?焦点小组法是否是一种有效地降低研究者的权限和影响的研究方法?

黑人女权主义者(如:Collins,1986;hooks,1990),拉丁美洲女权主义者(如:Benmayor, 1991; Garcia,1989;Madriz,1997),和亚洲女权主义者(如:Chow,1987; Espiritu,1997)提醒我们有色人种女性正在遭受着基于阶级、种族和性别的三重压迫。研究者在选取关于女性生活的研究方法时,应该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并不是所有的方法都适合女性访谈的,尤其是不适合那些在和访谈者谈论她们生活的时候会理所当然地感到害怕的有色人种女性。正如科林斯(Collins,1998)指出的,当前关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论争,实际上反映了在什么是男性和什么是白种人问题上的两极分化现象,以及在什么是软弱的、主观的、女性的,甚至可能在什么是黑人、拉丁美洲人、亚洲人等问题上的片面观点。

很多研究者都证实了拉丁裔、非洲裔美国女性反对参与调查研究和一些实证主义研究的事实。而且这种反对在无合法居住权的女性、不会说英语或英语说得不太流利的女性,以及参与非传统活动、从事不正规的经济活动或地下经济活动的女性中表现得尤为强烈(Madriz,1998)。针对这一现象,一些女权主义研究者提倡在女性访谈中采用焦点小组法(Fine, 1994; Jarrett, 1993; Madriz,1997, 1998;Wilkinson,1998)。贾雷特(Jarrett,1993)已经强调了焦点小组法在研究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女性,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的时候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参见:Madriz,1998)。

焦点小组法不仅使研究者能倾听到受压迫者的心声,而且还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适合有色人种女性的独特性及其生活经历的研究方法。在历史上,早就有女性通过社交活动来反抗她们所遭受的压迫。如非洲裔美国女性、拉丁裔美国女性和亚洲裔美国女性,一直把交流作为一种重要的共同勇敢面对和忍受她们的边缘性地位的方式。在历史上,曾有女性聚在一起探讨重大问题,并参与了一些政治活动。吉尔克斯(Gilkes,1994,p. 235)在文章中描述了非洲裔美国女性在奴隶制终结之后,教会妇女及教员们是如何聚集起来发动了横贯整个美国南部的组织运动的。妇女俱乐部也是女性用来探讨在现存的男性控制的组织中如何向男权统治挑战的重要场所。同样地,墨西哥妇女也通过聚餐、组织生日宴

会、周年庆典、交谈和保持丰富而生动的口语等方式保留了很多传统活动(Dill,1994)。另外,艾斯比利图(Espiritu,1997,p.39)还介绍了受雇于圣弗朗西斯科唐人街的妇女在1937年是如何自发地组织起来,为反对隶属于国有一元店的一家服装场而罢工的。所有这些例子都证明了女性的集会和交流是有可能引发社会变革运动的。

## 促进社会变迁的去除异己化

和其他研究方法一样,焦点小组法使研究者了解了研究对象的思想、观点、态度,以及他们个人的生活经历。另外,焦点小组法还为研究者提供了许多关于研究对象个人的和集体的生活事件。然而,作为一种定性研究方法,焦点小组法还能为那些对建立新的社会研究范式、推动社会变迁等感兴趣的研究者提供大量的资料。显然,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无法促进这类变迁。但我认为有些研究方法更适合于粉碎那些不断再现研究主体和其他人的生活景象的殖民化论文(Fine,1994;Madriz,1998)。

一些采用过焦点小组法的女权主义研究者披露了参与者是如何迫不及待地探讨她们感兴趣的话题的。如格里芬(Griffin,1986)在关于年轻女性生活经历的焦点小组访谈中发现,一些参与者的谈话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想。因此,小组访谈增强了参与者把握讨论的内容和方向的可能性。

正如法恩(Michel Fine)所强调的那样,定性研究者在自我—他人这一连字词的构造中相互协作。研究者和参与者的关系实际上是再现了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结构。我认为群体访谈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自我和他人之间的距离。首先,参与者的多方发言限制了主持人的控制权,主持人在小组访谈中的权限明显小于在个案访谈中的权限(Holstein & Cubrium,1995;Wilkinson,1998)。其次,焦点小组法的访谈手册(女权主义人类学者青睐的一种研究手段)的非结构化特征削弱了研究者对访谈进程的控制。而由封闭式或开放式问题构成的结构式问卷,把研究者的预想、观点,甚至是词汇和概念都带到访谈过程中来,这无疑就增强了研究者对访谈方向的控制权。实际上,组织一个没有访谈手册的焦点小组,完全排除研究者在互动中的个人偏见也不是不可能的(Morgan,1988;Wilkinson,1988)。另外,焦点小组法不仅牵涉到垂直互动(或主持人与访谈对象之间的互动),还涉及群体参与者之间的水平互动。这有可能会暴露出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即便如此,也只是他们在自身构造的等级制度中的权力关系。实际上,观察和记录这些等级制度的发展过程也许能给研究者提供一些重要的信息。

焦点小组法并不是倾听和了解他人,而是尽可能地听取那些"作为知识的建构者和知识的化身"(Fine,1994,p.75)和作为社会变迁动力的他人的各种看法。基茨因格(Kitzinger,1994)阐明了群体情景是如何确保特权是被赋予等级制度中的关键人物的,他们用自己的文字、语言和方式来描述他们的生活经历。要敏感

的理解他人生活就需要有共享的符号、意义和词汇,这就使得语言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参与者在资料收集阶段拥有的权限就不仅仅是职业规则的问题了。许多研究者也报道了怎样通过参与者的互动来收集高质量的资料(Wilkinson,1998)。参与者通过提问互相诘难。在我采用焦点小组法所开展的关于对犯罪活动的恐惧的研究中,参与者用这样的方式互相质问:

玛利亚:不,我告诉你,正好相反,我根本不怕犯罪活动。

朱安娜:哦,你说你不怕犯罪活动。那么,在这之前你为什么说你不愿意在夜间独自外出呢?

罗莎:恩,你刚才是这样说过。

玛利亚:好吧,那我说得更清楚些,我是努力使自己不害怕。

在诸如此类的例子中,参与者相互就一些在特定场合下言行不一致的现象进行反驳。

在让研究者亲眼目睹一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过程——社会互动方面,小组访谈的意义尤为重要(Berg,1998)。和面对面的访谈等传统研究方法不同的是,研究者在小组访谈中可以观察到参与者是怎样加入到对话中的,然后又是怎样相互交流思想、看法和各自的生活经历的,甚至还可以观察到参与者是怎样相互争执的。实际上,正是这种交流产生了邓津(Denzin,1989)所说的“解释性互动主义者”所需的社会结构性互动活动。在焦点小组法中,大量角色的介入使整个访谈过程变得更加生动,从而促进了意义的社会建构(Holstein & Gubrium,1995)。因此,群体互动成为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推动了同一种族文化的发展(Holstein & Gubrium,1995,p.71)。这种同一种族的文化对历史与文化的撰写是不可或缺的。那些有色人种女性的生活经历——既是研究的主体又是研究的客体——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一直没有受到关注。这种生活经历的描述有助于揭露有色人种女性所面临的三重交织在一起的边缘性地位:女性、有色人种,而且通常是穷人。

焦点小组法显然不能完全呈现他人的生活经历。但在资料收集阶段,它们有助于研究者听取参与者的各种不同观点(Fine,1994,p.75)。群体情景中的多方发言证实了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和种族背景相同的个体具有类似的生活经历。这一证实使参与者能推动旨在促进社会公正的研究议事日程的建构(West,1988)。在一种强调个体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文化中,改变研究议事日程的集体性和一致性实质上是有害的。

在参与性观察中,研究者可以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观察到社会过程的进展。这在焦点小组法的情景中是不会出现的,因为在焦点小组法中成员聚集的地点是由研究者决定的。正如弗雷和方塔纳(Frey & Fontana,1993)所说的,可以把定性研究方法看作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在焦点小组法中所采用的情景的熟悉程度要高于其他研究方法,但没有实地研究和人类学研究情景的熟悉程度高。显然,在研究者如何运用焦点小组法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有的甚至试着采用单面镜、录音机等特殊的设备来创造一个更为陌生的情景。但是,女权主义

研究者和后现代主义研究者都倾向于采用参与者自己的生活场景来开展"实地性"的小组访谈。我在研究中刻意采用了参与者熟悉的情景，如他们的起居室和厨房、老年人用餐区、教会地下室、教室，甚至青少年的卧室等。采用参与者熟悉的情景可以更加弱化研究者的权限，减少"异己化"的可能性。

## 焦点小组法作为集体证词的运用

女权主义研究者反对在女性研究，尤其是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下的有色人种女性研究中采用传统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Etter - Lewis,1991;Fonow & Cook,1991; Reinharz, 1992)。女权主义者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女性的日常生活状况及其特征，因此这就产生了如何进入到她们的生活中去的问题。所以，女权主义者正在尝试着采用，并发展能更有利于妇女之间相互交流的方法。女权主义研究者提的最普遍的问题有这样几个：研究是为谁实施的？由谁来实施？如何实施？谁更有发言权(Benmayor,1991)？女权主义研究的一条准则可以用这个短语来表达，"关于妇女，为了妇女，妇女来研究"(Acker, Barry & Esseveld, 1983; Harding,1987)。这样就产生了大量基于口述故事、深度访谈和陈述等方式所描绘的妇女日常现实生活的相关文献。耐人寻味的是，在女权主义研究方法的专著中，几乎没有关于如何使用焦点小组法的探讨(Wilkinson,1998)。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为数不多的非洲裔、拉丁美洲裔、亚洲裔和本土的美国女性开始前所未有的进入到社会科学领域中，这就使先前关于有色人种女性在许多研究项目，以及关于殖民地特征的研究项目中缺席现象的批判更为猛烈。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者也加入到了研究项目的后殖民主义性质的批判中来。

作为一名拉丁美洲女权主义研究者，我认为焦点小组法是一种集体证词。多义交谈(multivocal conversations)是女性世代用来和她们的母亲、姐妹、女邻居和女性朋友交流的方式。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中，女性的这些交流被嘲讽成是"闲扯"，甚至是"传播流言蜚语"。然而，女性已经习惯用这种会谈来面对她们所遭受的社会隔离和压迫。因此，无论是个体的或是集体的陈述，都有助于了解女性所面临的来自社会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及人权方面的挑战(Randall,1980)。

群体内部的互动强调移情作用和经历的共同点，并促进了自我展示和自我证实。女性之间的交流可以是一个觉醒的过程和增强自我意识的重要手段。它赋予了妇女证实自己经历的权力，让这种经历建立在相互之间的观点和看法的基础上(Oakley,1981)。知道其他女性也经历了类似的问题，或是有类似的想法，对女性来说是相当重要的，这让她们意识到了自己的想法是合法的、正确的。这种意识可能会让女性进一步地认识到这些并不是她个人的问题，而是结构性的问题，是其他女性都共有的问题。这种意识还事关与社会变革运动相关的社会研究议事日程。

如拉丁美洲女性,生活在以家庭和社区为本位的文化中(Heyckm, 1994; Marin & Vanoss Marin,1991;Moore,1970)。由于都是扩大化亲属群体,从而使交流成为一种惯例性活动。但对拉丁美洲人而言,和其他女性交流显得更为重要。在许多拉丁美洲家庭中,妇女们围坐在餐桌边准备膳食,喝咖啡,讲故事,互相问候。因此,焦点小组可以被认为是许多拉丁美洲女性能够接受的一种交流方式。在经历了几百年压迫和世袭奴隶制的非洲裔美国女性中,我们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和其他女性交流是非洲裔美国女性对付压迫的重要手段。而且,正如格伦(Glenn,1986)所指出的,通过烹饪民族食物、组织传统庆典、实施民间治疗方法和传播民间故事等活动,亚洲裔美国女性还保持着许多风俗习惯(p. 196)。在和其他女性对话和会谈的时候,她们都在进行着这些活动。

本迈耶(Benmayor,1991),波多黎各学者,是为数不多的指出集体口头故事的改革功效的研究者之一。本迈耶断言,无论是从个体角度还是从集体角度来说,集体证词都增强了人们的权力。"社会授权使人们敢说而且成为了雄辩的授权者"(p. 159)。作为一种集体宣言,焦点小组法通常可以成为一种授权体验。对有色人种妇女来说尤其如此。

## 焦点小组法在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有色人种女性研究中的运用

科林斯(Collins,1998)认为"打破沉默能够使个别的非洲裔美国女性通过强调黑人女性存在的客观性来增强其实力的方式恢复人权"(p. 47)。同样的话语也可以用于拉丁美洲裔美国女性和美国本土女性,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下的女性。通过集体演说,有色人种女性不仅恢复了人权,还意识到了她们的弱势地位和所遭受的压迫而增强了力量。

我之所以采用焦点小组法是基于以下理论上和方法上的考虑。首先,对犯罪活动的恐惧是和她们的弱势地位相关联的,所以,我认为能接近那些由于自身的种族、阶层特征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是最关键的。而且,就我的研究目标而言,最重要的是要采访那些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拉丁美洲裔和非洲裔美国妇女。其次,我担心那些比其他群体的成员更害怕犯罪活动的有色人种女性在面对面、一对一的访谈中会感到恐慌。事实也证明几名女性同时在一个房间里绝对可以减轻她们的担忧。另外,应该把那些处于特殊的社会经济状况、在政治上属于弱者的无合法居住权的女性也囊括在内。我相信无合法居住权的女性在研究项目中的其他无合法居住权的女性和有合法居住权的女性的陪同下,肯定要比我单独访问她的时候更愿意加入到研究中来,也更愿意畅所欲言。

科林斯(Collins,1990)曾专门撰文写了不平等制度和统治的起源问题。就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有色人种女性而言,种族、阶层和性别等诸多因素使她们处于一种极端不利的境地。这就经常会导致研究者无法深入到她们的生活中来。

至于拉丁美洲裔和亚洲裔的无合法居住权的美国女性，由于她们在美国没有合法的居住权而被认为是非法的、有罪的，从而处于一种极为无助的境地。事实上，诸多相互交织的不利因素使社会地位低下的拉丁美洲裔和亚洲裔的无合法居住权的美国女性处于一种极端的异己化的处境。Aura 是一名生活在纽约市布鲁克林拉丁美洲人居住区的 16 岁波多黎各少女，参与了我的焦点小组研究。她生动地表达了对自己所遭受的多种压迫的感受：

> 就像我母亲说的，你与生俱来就有两大不幸：波多黎各人，且是个女人。因此，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没有人会帮助你。我想我们拉丁美洲人还要更为不幸，因为我们处于黑色人种和白色人种之间……因此，我们似乎遭受着来自两方面的不幸，你说呢（引自 Madriz，1997，p. 54）？

总之，我深信传统的方法并不适合我的研究。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我希望能尽可能地缩短我和参与者之间的距离。尽管我本人是一名致力于改变这种分离的中产阶级教授。

我相信焦点小组法可以限制我把自己的观点和信仰强加于那些女性，并在削弱我对访谈过程的影响的同时，扩大了参与者的权限。观察参与者的互动，亲眼目睹她们的互相作用及其是怎样建立在彼此的话语、想法和感受之上的，这对我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下面是一个关于开展保护措施的对话例子。参与者都是拉丁美洲的青少年：

> 卡曼：我通常带点什么在身上。
> 伊莎贝尔：比如像武器什么的。
> 葛洛丽亚：我也带武器……像钥匙或其他锐利的东西来保护自己。
> 卡曼：得了！说实话吧。
> 葛洛丽亚：好吧，我带了一把刀子。
> 卡曼：她还带了一把小手枪（引自 Madriz，1997，p. 141）。

对我的研究来说，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怎样才能接近这些社会地位低下的有色人种女性。作为一名拉丁美洲研究人员，我确信非私人关系的征集参与者战略——通常被实证主义研究者所青睐——对社会地位低下的有色人种女性，尤其是对无合法居住权的女性来说却并不奏效。一些开展过有色人种女性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也深有同感（Cannon，Higginbotham，& Leungm，1988；Jarrett，1993）。贾里特认为非私人的征集参与者战略不适合研究收入微薄的少数人群。在她所做的关于低收入的非洲裔美国女性的研究中，她访问了整个芝加哥贫穷街区中的优先救济项目享受者，直截了当地给她们介绍她的研究，希望她们能参与进来。

我征集的参与者都是来自私人的关系网，如工作在非赢利性社团组织中的朋友、学生、社团领导和朋友的朋友等。和参与者的初次接触通常是面对面的，有时候是电话接触。万一我自己不认识她，我会让我的朋友和学生先和她们接触。他们会把我的名字告诉参与者，简要地说明我是一位教授，正在做一项关于

对犯罪活动的恐惧的研究,并告诉他(或她)我将随后给他(或她)打电话。正如我的一些学生说的,“我告诉组织的负责人你是可靠的”。这种私人性质的接近方法对那些不愿意,且对参加研究很担心的有色人种,尤其是对无合法居住权的女性是极为有效的(Zinn,1979)。

虽然这种个体主义的方法更容易接近有色人群,但还是很难让一些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如处于社会底层的拉丁美洲人参与进来。一些人很怕参加群体讨论,尤其是新近移民、无合法居住权的女性,以及依靠福利事业维持生活、从事一些非规范的行为、从事地下(隐性)经济活动的人群。我认为经济刺激可以提高她们的参与热情。而且我觉得把经济刺激作为对占用她们时间的一种酬劳,也是理所当然的。

一些社会科学家声称拉丁美洲人更愿意加入到研究项目中来(Marin, Perez-Stable, & VanOss Marin,1989)。然而,我开展的关于低收入拉丁美洲人的焦点群体研究的经历却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有这样几个因素影响着拉丁美洲人的参与意愿。首先,一些拉丁美洲人,尤其是那些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拉丁美洲人,在家庭中扮演着传统角色,实际上,大多数女性都是在全职性地照顾孩子和家庭。其次,传统的拉丁美洲家庭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男性被认为是一家之主。通常,拉丁美洲人在家中行使权力(Heyck,1994)。在传统的拉丁美洲家庭中,即使在双职工家庭中,妇女通常还承担着更多的家务活(Pesquera,1993)。拉丁美洲妇女要履行许多职责,如母亲、看护者、厨师和管家等。她们必须随时听命于自己的配偶和孩子,这就使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拉丁美洲女性很难参加户外活动。另外,与其他女性相比,她们在时间上有更多的不可预知的要求,很难安排她们的时间表(Krinitzky,1990;Stack,1974)。因此,我的体会是拉丁美洲女性经常是要么不能来参加访谈,要么就是迟到。根据我的经验,除非你征集了很多人,一般都只有 12 ~ 15 个人会参加访谈。通过给参与者提供交通工具,或者派车、派司机把她们接到访谈地点,或者给她们报销交通费用的话,可以提高参与率。但最好是到她们最方便的地方,如她们就餐的救济贫困者的施粥处,或者教堂,或者她们就读的外国语学校。

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女性缺席率高的一个原因是她们不习惯说“不”和不习惯拒绝别人的要求。如在拉丁美洲,拉丁美洲人非常注重真诚的、亲切的关系。但是,这可能会影响参与者的征集,因为社会更赞同她们同意和接受邀请。因此,她们可能会承诺参加焦点群体,但后来却没有履行诺言(Marin & VanOss Marin,1991,p. 13)。

另外,我发现在最后时刻常常会有一些突发事件使这些妇女无法参加小组访谈,如孩子生病了或孩子在学校出事了,一个亲戚要她帮忙照看孩子,或要她陪同去参加约会,或家里的水、电等基础设施出了故障等。

对我的研究来说,参与者在年龄、阶层、种族、性别方面的一致性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和自己具有同样背景的女性交流的时候,她们显然会更随意地发表自己关于犯罪活动、罪犯和受害者的看法和见解。然而,向应征者解释这一要求却

成了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你要求整个小组的成员都是拉丁美洲人?或者为什么只有黑人少女?在多数情况下,在我把研究主题的特点作了详细的介绍后,应征者都能理解一致性的必要性。

我曾主持了一个由5~12岁的白人、黑人和拉丁美洲女性参与的焦点小组。我之所以没有采用更大规模的群体,是因为人多有可能会增加处理讨论和把谈话控制在研究主体范围内的难度。除了有一次是由一个担任研究助理的学生主持外,其他所有的焦点小组访谈都是我主持的。讨论持续了90~120分钟。在得到参与者的许可后,我们把讨论用磁带录了下来,并随后整理打印了出来(Madriz,1997)。在资料收集的过程中,一个主要的难题是主持人和参与者相冲突的种族问题。我的这一体会在其他的研究中也随处可见。主持人和参与者的种族一致性通常有助于增强二者之间的友好关系,并能提高参与者的回答意愿(Jarrett,1993)。主持人和参与者同样的种族背景会让参与者觉得他和自己有着共同的经历。虽然我知道对许多研究方法来说,和参与者建立友好的关系是获得高质量的资料的关键,但这一点对焦点小组法来说显得更为重要。虽然关于拉丁美洲人和访谈者的种族的研究比较稀少,但关于非洲裔美国女性的研究却表明了访谈者的种族对参与者的回答有一定的影响(Jarrett,1993)。如一项有关非洲裔美国女性对种族相关问题的态度的研究表明,当访问者是白种人而不是非洲裔美国人时,她们更有可能保持沉默(Anderdson,Silver, & Abramson,1988)。

我为我的焦点小组法做了一个带有开场白的非结构化的访谈指南。我先问参与者一个很普通的问题,即他们对所在地区的犯罪活动的看法。在把主题确定好之后,我才开始问他们对犯罪活动的恐惧、感想,以及与这些恐惧相关的文化解释等具体问题。因为对犯罪活动的恐惧这一主题与参与者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他们都很愿意参与讨论。参与者的回答经常游离在访谈指南之外,讨论了一些我意料之外的话题。这无疑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料,从而拓宽了我的思路。

运用群体访谈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妇女已经世俗地保留了她们的真实想法,因此她们更有可能不参与讨论。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就很难得到这些特殊女性的回应。她们在群体中可能会感得不自在,尤其是要她们在陌生人面前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时候。而且,一些女性在反对别人观点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不自在,这都会妨碍她们在群体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受。当群体中有一些胆小的或沉默寡言的参与者的时候,互动就不再是自发的、活跃的、动态的,而主要是由主持人在引导。这个问题在来自同一种族、性别和阶级,并且是同一种族文化和语言的群体中可能会有所好转。断定不同种族背景的拉丁美洲人是属于同一群体——如加勒比海女性和墨西哥女性——可能就是个错误的结论。因为不同的拉丁美洲群体之间也存在诸多的差异。例如,语言上的差异可能导致交流上的困难。在不同的拉丁美洲人群之间的互动规则也是不一样的。有的群体可能更喜欢别人用正式的代词 *usted* 称呼自己,而另外一些群体可能更喜欢别人用非正式的代词 *tu* 称呼自己。

我发现让群体成员了解其他参与者的观点对于研究项目是很重要的,而且是很有价值的。另外,我还强调对我的问题而言,所有的回答都无所谓"对"或"错",因为群体讨论的一个障碍是人们在同意他人观点的时候可能会感到压力,因此让参与者知道这是可以接受的是很重要的——而且事实上是有必要的——让他们提出异议。研究者通过反对意见得到了关于一个问题的不同观点。这一点在对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女性采用焦点小组法的时候显得尤为重要,她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很世俗地表面上同意他人的观点,而实际上却保留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最后,特别要指出的是,在西班牙语种、汉语语种和其他非英语语种的人们之间开展焦点群体时可能会出现额外的费用。如雇佣双语主持人、双语研究助手和翻译等。另外,如果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女性群体的话,那么你会发现当你限定了访谈时间和提出多种要求的时候,取消访谈就成为常事了。那么你就需要找到一个替补群体,这意味着研究者又需要额外的花费。在多数社会研究中,经费都是很紧张的,任何非预算的支出都会导致研究经费的紧张。研究者应该理所当然地把这些可能的费用考虑进去。像我这样的担任教授职务的社会研究者的研究时间都相当有限,所以访谈的取消就会在他们紧张的时间表上雪上加霜。

## 焦点小组法和赋权于有色人种妇女的伦理观

一些学者已指出了社会理论在描绘社会不平等景象中的作用(Collins,1998;van Dijk,1993)。根据科林斯(Collins,1998)的观点,精英理论代表了那些在种族、经济阶层、性别和国籍方面享有特权的特权等级者的利益(pp. 44-45)。几百年来,证明种族劣势和性别劣势的存在是合情合理的社会理论比比皆是。如在我的研究领域中,犯罪学和生物学理论都认为黑人和其他非白种人更有可能从事犯罪活动。同样地,女性犯罪行为理论通常认为处于劣势地位的女罪犯是出于"阴茎崇拜"而与男犯人竞争,或是一些社会不适应者的行为不符合主流社会的性别期望。因此,女犯人通常被认为是"坏女孩"(Klein,1995)。

那些精英人士的社会理论同样也是服务于维持不平等制度的。传统的研究方法在再现种族不平等、阶级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那些永远荒谬的、虚妄的关于特定群体的资料外,由实证主义得出的知识倾向于再现那些反对其成员没有按照社会期望行动,或者是不符合研究者的陈腐观念的群体的歧视和偏见。

定量研究和一对一访谈的主要作用是导致美国的社会科学家们采用了大量的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这种个体主义曾经充斥了人类学研究和女权主义研究,然而,正如威尔金森(Wilkinson,1998)所指出的,"把个体从她们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孤立出来的研究方法显然不适合"女权主义研究(p. 111)。这种观点对有

色人种女性和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女性研究来说是更为正确。在许多有色人种女性是属于同一种文化的情况下，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会让她们陷于一种不自然的、陌生的，甚至是“危险”的情景中。

正如本迈耶（Benmayor，1991）所言，集体证词具有直接影响个人和集体权限的潜在功能（p. 159）。我相信焦点小组法在研究女性生活，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生活的时候，也具有这种潜在功能。小组访谈中的共同对话、集体事件和认知有助于这些女性建立起一种自我认同感、团结感，以及意识到她们经历的普遍性。焦点小组法致力于为参与者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让她们在与自己一样的女性面前能敞开心扉，畅所欲言。

虽然焦点小组法的运用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但它仍然不失为一种较适合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有色人种女性研究的方法。焦点小组法有可能揭示造成有色人种女性个人生活经历的和共同生活经历的各种复杂因素。因此，焦点小组法固有的特征使它成为了一种敏感的文化资料收集方法。美国有色人种女性的生活经历是由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等级制度造成的，如与文化、语言和法律地位等相关的性别、种族和阶级等。许多有色人种女性，如在美国的亚洲裔移民和拉丁美洲裔移民，正在努力适应异国文化并接受她们脆弱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从制度上贬低妇女的意见和担忧已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在这里，我认为焦点小组法总体上是一种适合女性研究，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有色人种女性研究的方法。焦点小组法通过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能更好地理解这些女性的生活、感受和想法。焦点小组的共同经历使参与者能控制讨论的进程，把会谈的主题引向与他们相关的领域，有时候她们鼓动，甚至是迫使研究者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关于某个问题的看法。通过提供一种独特的把个案放在它所处的社会关系中来研究的机会，通过高质量的互动资料，通过促进意义的社会建构，通过了解女性共享的且常常被漠视的种族文化，焦点小组法有助于消除社会研究中的个人偏见。

## 焦点小组法的未来

虽然焦点小组法为有色人种妇女研究提供了一种比较好的研究方法，但它们将来的具体运用还有赖于研究者对于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下是适合采用焦点小组法等问题的认知能力。一些研究者之所以采用了这种方法，可能主要是出于我们在这一章中所列出的几点考虑：参与者是否喜欢参与讨论，收集资料的数量和质量，同时访谈几个对象和亲眼目睹她们互动的可能性，参与者的权限，对所研究的问题的热心程度等。但是研究者应该意识到有些研究方法，如个案访谈，在某些时候可能更适合研究目标。如当研究者需要参与者详细地描述其生活状况的时候，焦点小组法就不是最适合的方法。另外，当参与者相互感到不自在的时候，研究者也应该避免运用焦点小组法。例如，在某些研究情景中，个

案在她们的主管人面前可能会觉得很拘束而无法畅所欲言(Morgan,1998)。研究者应该避免把一些对立的或互相充满敌意的个体组织到同一个小组中。最后,焦点小组法也不适合研究者需要能推广其研究结果的研究。在要推广的情况下,研究者必须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和足够多的样本。

由于能听取多种不同的意见,焦点小组法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它还让研究者能听到那些渴望倾诉的被压迫者的观点。许多人都渴望政治家、政策制定者、学者,及当权者能倾听他们的诉说(Krueger,1994)。虽然焦点小组法无法解决受压迫者所受到的压制,但却有助于这种倾听。由于一些社会科学家对社会变革比较感兴趣,所以焦点小组法仍然有望促进个体对他所受压迫的认知和觉醒。通过自己的语言和理论框架,这种觉醒有可能促使参与者投身到一些推动其所属社区变革的活动中来。


Acker, J., Barry, K., & Esseveld, J. (1983). Objectivity and truth: Problems in doing feminist research.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6, 423-435.

Anderson, B. A., Silver, B. D., & Abramson, P. R. (1988). The effects of the race of the interviewer on race-related attitudes of black respondents in SRC/CPS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2, 289-324.

Benmayor, R. (1991). Testimony, action research, and empowerment: Puerto Rican women and popular education. In S. B. Gluck & D. Patai (Eds.), *Women's words: The feminist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 (pp. 159-174). New York: Routledge.

Berg, B. L. (1998).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Boston: Allyn & Bacon.

Cannon, L. W., Higginbotham, E., & Leung, M. L. A. (1988). Race and class bia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women. *Gender & Society*, 2, 449-462.

Chow, E. N. (1987). The development of feminist consciousness among Asian American women. *Gender & Society*, 1, 284-299.

Collins, P. H. (1986). Learning from the outsider within: The soc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black feminist thought. *Social Problems*, 33, 14-32.

Collins, P. H. (1990).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 Hall.

Collins, P. H. (1998). *Fighting words: Black women and the search for justi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Denzin, N. K. (1986). A postmodern social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 4, 194-204.

Denzin, N. K. (1989). *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 Newbury Park, CA: Sage.

Dill, B. T. (1994). Fictive kin, paper sons, and compadrazgo: Women of color and the struggle for family survival. In M. B. Zinn & B. T. Dill (Eds.), *Women of color in U. S. society* (pp. 149-169).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Espiritu, Y. L. (1997). *Asian American women and men: Labor, laws, and love.* Thousand Oaks, CA: Sage.

Etter-Lewis, G. (1991). Black women's life stories: Reclaiming self in narrative texts. In S. B. Gluck & D. Patai (Eds.), *Women's words: The feminist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 (pp. 43-58). New York: Routledge.

Finch, J. (1984). "It's great to have someone to talk to": The ethics and politics of interviewing women. In C. Bell & H. Roberts (Eds.), *Social*

*researching: Politics, problems, practice* (pp. 70-87).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Fine, M. (1994). Working the hyphens: Reinventing self and other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70-82). Thousands Oaks, CA: Sage.

Fonow, M. M., & Cook, J. A. (Eds.). (1991). *Beyond methodology: Feminist scholarship as lived researc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Fontana, A., & Frey, J. H. (1994). Interviewing: The art of science.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361-376). Thousands Oaks, CA: Sage.

Frey, J. H., & Fontana, A. (1993). The group interview in social research. In D. L. Morgan (Ed.), *Successful focus groups: Advancing the state of the art* (pp. 20-34). Newbury Park, CA: Sage.

Garcia, A. M. (1989). The development of Chicana feminist discourse 1970-1980. *Gender & Society*, 3, 217-238.

Gilkes, C. T. (1994). "If it wasn't for the women...": African American women, community work and social change. In M. B. Zinn & B. T. Dill (Eds.), *Women of color in U. S. society* (pp. 229-246).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Glenn, E. N. (1986). *Issei, nisei, war bride: Three generations of Japanese American women in domestic servic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Griffin, C. (1986). Qualitative methods and female experience: Young women from school to the job market. In S. Wilkinson (Ed.), *Feminist social psychology: Developing theory and practice* (pp. 173-191). Milton Keynes, Engl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

Harding, S. (1987). Introduction: Is there a feminist method? In S. Harding (Ed.), *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Social science issues* (pp. 1-14).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Heyck, D. L. D. (1994). *Barrios and borderlands: Cultures of Latinos and Latina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Routledge.

Holstein, J. A., & Gubrium, J. F. (1995). *The active interview.* Thousand Oaks, CA: Sage.

hooks, b. (1990). The politics of radical black subjectivity. In b. hooks, *Yearn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pp. 15-22). Boston: South End.

Jarrett, R. L. (1993). Focus group interviewing with low-income minority populations: A research experience. In D. L. Morgan (Ed.), *Successful focus groups: Advancing the state of the art* (pp. 184-201). Newbury Park, CA: Sage.

Kitzinger, J. (1994). The methodology of focus groups: The importanc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research participants.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16, 103-121.

Klein, D. (1995). The etiology of female crime: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In B. R. Price & N. J. Sokoloff (Eds.),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nd women: Offenders, victims, and workers* (pp. 30-53). New York: McGraw-Hill.

Krinitzky, N. (1990). *Welfare dependence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 study of Puerto Rican women in New York Cit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Krueger, R. A. (1994). *Focus groups: A practical guide to applied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Madriz, E. (1997). *Nothing bad happens to good girls: The impact of fear of crime on women's liv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adriz, E. (1998). Using focus groups with lower socioeconomic status Latina women. *Qualitative Inquiry*, 4, 114-128.

Marin, G., Perez-Stable, E. J., & VanOss Marin, B. (1989). Cigarette smoking among San Francisco Hispanics: The role of acculturation and gender.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79, 196-198.

Marin, G., & VanOss Marin, B. (1991). *Research with Hispanic populations.* Newbury Park, CA: Sage.

Maynard, M., & Purvis, J. (1994). Doing feminist research. In M. Maynard & J. Purvis (Eds.), *Researching women's lives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pp. 1-9). London: Taylor & Francis.

Merton, R. (1987). Focused interviews and focus groups: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1, 550-566.

Moore, J. W. (1970). *Mexican-American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Morgan, D. L. (1988). *Focus groups as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Morgan, D. L. (1998). *The focus group guidebook.* Thousand Oaks, CA: Sage.

Morgan, D. L., & Krueger, R. A. (1993). When to use focus groups and why. In D. L. Morgan (Ed.), *Successful focus groups: Advancing the state of the art* (pp. 3-19). Newbury Park, CA: Sage.

Oakley, A. (1981). Interviewing women: A contradictions in terms. In H. Roberts (Ed.), *Doing feminist research* (pp. 30-61).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Olesen, V. (1994). Feminisms and model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58-174). Thousand Oaks, CA: Sage.

Pesquera, B. M. (1993). In the beginning he wouldn't even lift a spoon: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In A. de la Torre & B. M. Pesquera (Eds.), *Building with our hands: New directions in Chicana studies* (pp. 181-19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andall, M. (1980). *Todas estarnos despiertas.* Mexico City: Editorial Siglo XXI.

Reinharz, S. (1992).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cey, J. (1991). Can there be a feminist ethnography? In S. B. Gluck & D. Patai (Eds.), *Women's words: The feminist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 (pp. 111-119). New York: Routledge.

Stack, C. B. (1974). *All our kin: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Stewart, D. W., & Shamdasani, P. N. (1990). *Focus groups: Theory and practice.* Newbury Park, CA: Sage.

Van Dijk, T. A. (1993). *Elite discourse and racism.* Newbury Park, CA: Sage.

West, C. (1988). Marxist theory and the specificity of Afro-American oppression. In C. Nelson & L.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pp. 17-29).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Wilkinson, S. (1998). Focus groups in feminist research: Power, interaction, and the co-construction of meaning.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21, 111-125.

Whyte, W. F. (1943). *Street corner societ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Zinn, M. B. (1979). Field research in minority communities: Ethical, methodological 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s by an insider. *Social Problems*, 27, 209-219.

# 应用民族志 33

APPLIED ETHNOGRAPHY

⊙厄弗·钱姆伯斯

在社会科学中，关于本章题目中这两个词语的界定或其价值并无一般化的共识。人们假设这两个词汇具有共同的涵义，但同时也包括许多相互冲突及隐含的意义区分。因此，此章主题需对二者皆有阐述。比如对于“应用”而言，它包括了什么样和什么类型的研究呢？“民族志”又指的是什么呢？

社会调查如何得以应用的问题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它包括研究意图的考虑，以及研究设计和结果。在此，笔者倾向于做更广泛意义上的界定，即应用性工作帮助人们做出决定，同时引导着政策选择或者变迁的可能结果。这些结果或许是预期如此的（比如在对策研究或预测中），或者是从回顾中获得的（如在评估研究中）。在本章中，我考察了应用民族志的多种取向，而首要关注点则放在认知取向、微观/宏观分析，以及行动或临床模式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主要差异存在于判断它们的重要性标准上。对基础研究而言，衡量其重要性的基本原则是要看其研究成果对理论和学科知识的贡献。而对应用研究而言，最直接的衡量即是它对决策的贡献。这不是说不能同时用两种标准来评判一次研究，而是因为这样是没有必要的。无论如何，从联邦政府的科层制到地方行动组织，民族志者工作于其中的这些环境也应该有助于他们决定所研究的问题以及理解那些问题的方法论取向。

我对“应用研究”这个术语的运用是为了在决策环境中推行调查，它所针对的是一个或多个对象的利益。当然，基础研究亦可得到应用，但是为了实现潜在用途和实际用途之间的转换，还必须进行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的有目的的转化。这一转化可通过各种“实践”而得以实行，其中人们带入了关于人类特定问题的民族志知识。尽管通过各种方式，人们已经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E. Chambers，1985），但在这里我还是首先从临床实践模式的环境出发来展开讨论。

与上述内容相反，我对民族志的界定对于一些读者来说似乎过于狭窄。这是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民族志实际上被认为与定性研究是同义的。按照沃尔科特（Wolcott，1995）明白易懂但却常被忽视的意见，我把这一术语的用法限定在调查的多样化意义上，它的目标是描述与解释人类事务中的文化地位。换句话说，

民族志主要应以其研究对象来界定,即民族或者文化,而非以其方法论来界定,它常常用但并非必然用定性的方法。

文化这个术语本身是很模糊的,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每一种释义都有不同的方法论取向。我认为,文化应当由对判断可识别群体的特征的理解以及理解方式所构成。由此,文化是一种以不同的效果应用于小群体(如教室文化)和大群体(如民族、国家)的抽象概念;而作为一个可操作性定义,当发现任何给定群体具有一种明显的共享意义时,文化就凸现了出来。在多数文化的定义中,要求它的特征中具有一些持久的特性——足够持久,至少对于群体的新来者而言,他们可以获得这些特性。此外,认识到文化理解能够从各种数据中获得也是很重要的。例如,它可以从人类行为的可观察的模式中抽离出来;可以从明确的价值、行为标准中的“本土”记述中得到;也可通过某群体特定的规则识别或解释规范中发现;或通过对认知或符号过程中更多默许层面的学习而意识到。在实践中,当给定特定的研究目标时,民族志研究者常常用一种他们认为具有建设性的方式来整合这些数据。

将文化的概念当作一种抽象概念而归属于特定的社会或者群体,对于实际行为的预期而言是没有帮助的,这种期望似乎总是来源于文化群体之间的互动。多数人类学家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认识到,这一概念被用到实际的文化沟通过程时会更有用,并更具代表性。因此,把文化归结为群体中的共享意义并不必然意味着民族志学者只对描述那些孤立的群体感兴趣。实际上,他们对此越来越无兴致。对持续程度的预期,并非表示某群体的文化不会发生变迁。早期的民族志学者一般都强调那种纯粹的边界文化的唯一性,他们常常假定文化模式深深地植根于人类意识中并且抵制变迁。他们对描述持久和明确的文化单位更感兴趣,而不去强调使文化变得有意义的过程。然而,近来许多民族志学者亦开始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这些过程问题,试图去理解文化如何被建构及沟通,尤其是将其视为一种群体互动的结果时(或文化之间的互动)。现在还不完全清楚这种转变对于应用民族志中的特殊利益集团来说意味着什么,早期的应用民族志常常把它与资助者以及与公众的关系建立于倡导文化理解重要性的基础上。

## 民族志取向的早期应用

尽管民族志不再是人类学家的唯一选择,但在学科范围内它们显然形成了亲密的关系,人类学将研究对象定位于传统及非西方的社会,随之民族志得以最初应用。当人类学基于自身权利成为一门学科时,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这些社会中的人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成为政治或经济意义上的研究客体。毫不奇怪,最初应用民族志与殖民或者半殖民体系紧密相关,以便对这些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们进行管理。对于将应用“人类学”(即民族志)用于管理目的的问题,有两种早期的辩护理由,既包括他们论点的合理性,也包括基于应用民族志学者所收集资

料的相反论点。

首先是马林诺夫斯基的文章"实践人类学(Practical Anthropology)"(1929),作者提出如何用民族志的理解来协助非洲的英国殖民地管理者。对于在殖民地的管理中民族志资料的用途,马林诺夫斯基的论点主要依赖于人类学家对常被称为"本土观念"的假定性掌握。由于人类学家(或多或少)生活在本土社区中,并经常参与观察本土居民的实践行为,所以他或她可以更好地在一个文化环境中去解释他们的行为的意义和可能结果。但是,应用民族志则有赖于民族志学者是否愿意将其研究兴趣转向对管理者事务的关注。马林诺夫斯基指责他的同事,认为他们对语言的细微之处关注甚少,忽略了一些重要的行政管理问题,比如关于土地任期、劳工、正义等地方的实际事务。他并没有去挑战殖民地规则的前提,但他认为更具实践性的民族志应当为行政管理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各种信息,以帮助他们对土著人群做出更有效和更加人道的决策。

马林诺夫斯基对于应用民族志的辩护主要依赖于民族志学者在一个更大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去观察行为者和解释其功能重要性的能力。应用民族志的另一种合理性由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在其文章"文化转换和行政监督问题"(Covert Culture and Administrative problems,1947)中提出。根据他与在美国印地安服务人员的生活经验,克拉克洪指出行政代理者在整合文化概念和民族志资料方面已有相当的努力,并将它们作为政策和项目发展的一部分。他认为如果民族志学者更多的注意到文化的转换,或者注意到超越了人们自身文化意识的那些文化构成,他们便可取得更多的进步。这对于仅仅依靠本土观念的应用民族志来说是一个迥然不同的判断。克拉克洪认为,民族志的特殊之处是它可以明晰那些影响人类行为的文化构成,尽管人们并没有清楚认识到或轻易地将其视为"本土的"。在文化构成存在明显区别的群体之间,如某印地安群体和主要是白人的管理者之间,这种阐释便是特别有用的——克拉克洪提供了两个例子,包括纳瓦霍人(Navajo)的文化构成——它将性别权利与产权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及纳瓦霍人的社会中作为激发或约束因素之"罪感"的相对缺乏。克拉克洪在提及可能有助于更好理解使文化转换的各种民族志方法时是模糊不清的。他鼓励民族志学者不要将自身限制在那些可以"测量或者用定量验证"的文化特征上,同时,他提出在与另一种文化建立长期熟知的基础上再做充分的推测或许是较为适当的。

塔克斯(Tax,1958)提出了应用民族志的第三个明确取向,这是他与美国依阿华州(Iowa)的狐部落(Fox Indian)人一起共事的结果。塔克斯描述了其研究队伍既作为"行动人类学"也作为"参与性介入"的努力,他们把"参与观察"当作民族志技术的一个主要支柱。尽管行动人类学并不是什么新的方法论取向,但它的确指出了一种应用民族志技术之明显不同的方式。狐(Fox)项目开始于1948年,那时民族志多致力于梳理美国印地安社区的文化传统,塔克斯的研究队伍则将兴趣朝向狐部落所面临的问题上,包括内部宗派主义的影响以及与白人关系上的困难。研究者所使用的研究方式和行动让他们可以在"帮助中学习"。

在应用民族志的革新中,塔克斯显然试图弄清研究队伍可在什么程度上放弃他们对调查方向的控制,而它日益依赖于狐部落如何对他们自身的问题做出回应。伴随狐部落项目[以及社会学家科特·勒温(Kurt Lewin)的工作]而提出的行动人类学为后文所提及的许多合作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动力。

在美国,许多应用民族志的扎根工作是在"二战"以后的十年期间发展起来的。除了以上所提及的贡献以外,这一时代的民族志学者投入到各种广泛的应用研究中,包括工业关系与组织行为的研究(Whyte,1984);大规模的营养学研究(Montgomery & Bennett,1979);有关日本战俘的战争权威分配的研究(Leighton,1945;Spicer,1979);在美国新取得的太平洋托管领土上的民族志研究(Barnett,1956);大量乡村和国际发展的项目(比如,Foster,1969;Holmberg,1958;Spicer,1952)等。在这个时期,对应用民族志兴趣的日益增长至少有一部分可以归结为美国的兴起,它作为全球性的权力体,对文化差异的进一步了解具有实践性的认知需要。这一时期的研究接受方对作为一个特定方法的民族志并不是特别感兴趣,而仅仅是顺承此时多数"文化专家"的方法论偏好而已。

## 从停滞到进展

如上所述,民族志方法和策略的发展与人类学紧密地维系在一起。人类学家一直坚持将他们的调查与基于行为和价值的文化理解连接起来,在此他们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也因此将民族志从广义的定性研究方法范畴中分离了出来。根据同样的特征,应用民族志也从来不能仅仅界定为人类学的一个属性。比如,建立于 1941 年的应用民族志协会是一个致力于以文化为基础的研究与实践的组织,应用民族志协会的创立者不同于这个时期其他人类学家的专业组织领导者,他们较少关注学科的边界划分或在学科之间保持方法论的区别,而是着力于将文化当作人类变迁和适应事务中的一个重要变量。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类学家与其他人对文化及其在人类关系中重要性的思考方式发生了转向,它导致了民族志研究的种种革新。前文讨论的各种调查建立在一种假设的基础上,即认为民族志的实践价值是提供不同人类群体的文化概貌,它们能够为负责那些影响人们生活的政策或者项目的决策者提供信息。然而,尽管塔克斯的行动人类学与其他人一样,通常从一种非西方的、传统的文化基础上看待研究对象,但它仍然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例外。

早期的人类学关注那些由于西方文化的扩展而被边缘化的人们,其学科的普遍兴趣是希望在传统文化整体消失之前对它们进行描述[这是早期应用人类学的另一种表现,有时也被称为"野蛮人的人类学(salvage anthropology)"],当时的应用民族志受到这种关注点的广泛影响。其研究逻辑,如果不是有意如此的话,乃是依据假定为持久和同质的文化想象和行为去描述一个人群。他们假定这些"文化"在与西方文化接触之前变化很少,文化的行为标准一般被描述为在

规定的地位和角色中的一致性。当时通常的民族志专论都用“民族志现状(ethnographic present)”的称谓来讨论问题,实际上是将过去的民族志理想化,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了,很少或几乎没有考虑到目前被西方文化频繁“掺杂”下的文化状况(Rosaldo,1989);对文化的印象则是它不会有内部的变化动力,也抵制外部的变迁。因此,当时许多的应用人类学致力于提供各种文化信息,以帮助管理者对必然要面临的文化抵制作出反应。

只要人类学家将他们的注意力放在小规模的社会中,并坚持所研究文化(通常是错误的)的前提假定:同质性的、与其他主要的文化影响相隔绝、在西方文化侵入以前变迁很少等,那么他们的研究方法便主要基于其对“身处彼地”的信诺,基于研究者在行为发生的文化背景下系统地观察它们的能力。人类学通常强调(无疑也将其浪漫化)孤独的田野工作者进入另一种文化中的地位,以及他或她通过参与观察而发现文化之特定模式的能力。通常,人类学学生在进入田野以前很少接受方法上的训练,同时,在田野工作上,如何在另一种社会中生存的实际事务指导和调查方法上的指导一样少。两种方法差不多是一样的,并经常类比为自然主义者所使用的方法,它假设在所观察到的属类行为模式中很少发生重要的变化。

人类学中的次级目标也影响了早期的民族志研究。人类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反对种族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特别是当这些价值观引起对其他文化的误解时。这一目标使许多人类学家强调文化的独特性,强调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而非相似性,并为这种差异性辩护及将其合理化,作为调查者的人类学家则在此寻求过程中扮演着有意义的角色。民族志常常被当作一种叙述来书写,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过程中则通过重申他或她自身的天真、误解和最后的启示,以证实人类差异的合理性,适合此种视角的最好方法似乎是最具非形式化的、经验性的以及反思性的。

尽管早期的人类学家有时的确将民族志方法应用到上述偏爱描述以外的各种情境,但直到1960年代末,那种模式还占据着主导地位。不过在那时,有一些现象促使了民族志方法及其所使用的场所的转型。其中的一个现象,便是相对于民族志调查而言出现了更多的系统性方法,包括人种志方法(ethnoscientific),或认知性的研究方法,以及不断增长的对田野资料量化的重视等(Poggie, DeWalt, & Dressler 1992)。同时,人类学则经历了更加深刻的转变,在方向上从强调小规模、相对隔离的社会转变为日益增加的对更加复杂和异质性社会群体的兴趣。对于人类学家来说,它并非一个全新的环境,但逐渐获得的合法化可以帮助人类学通过三种主要的方式来实现学科性的转换。首先,当人类学家试图把握更大、更具分层性的,以及更加多样化的群体时,对于田野研究和民族志方法而言,便需要一种系统性以及更加规范的方法取向。这些新的研究兴趣也使人类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从业者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有时是合作关系,有时则是直接的竞争。其次,是与特定的应用研究策略的密切联系。如评估研究和社会效果评价等,它鼓励一些应用民族志学者去适应他们的调查模式。最后,

也是十分重要的,是在异质性社会中做研究的经验,会导致一些人类学家挑战早期他们在小规模社会中"单纯的",并似乎是被动性的假设。

在应用民族志方法的发展中,这些转型是特别明显的。对于人类学家而言,更大的和最明显的机会乃是在解释边缘群体的行为时,尽力去协助改变行动者。然而,它已经不再过多地关注传统文化,至少不会再花很多精力去理解这些群体是如何在更大的政治、经济系统中适应、参与和互动的,显然研究者也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比如,在致力于农业发展的民族志中,最初的问题集中于传统文化的什么因素阻碍了他们充分地参与到新的发展计划中? 而新的研究问题被放在一个既定的环境里,其中研究对象被当作发展进程中的理性行动者(Bartlett,1980;Warren,Slikkerveer,& Brokensha,1995)。

所有的这些因素都导致研究重点迅速地转换。对于许多应用民族志学者来说,研究客体发生了变迁,它们从特定的文化或社会群体转变到了特定人类问题的文化过程上。应用民族志学者的兴趣也日益放在社会群体如何在变迁的环境中相互冲突和融合;利益群体或者股东之间互动结果的文化意义等。他们不再坚持将文化当作一种由人所拥有的实体(或者反过来说,拥有了人的实体),而更感兴趣于将文化意义当作一种内部的问题解决方式,探讨它们如何实现交换和协商的。这些意义上,许多应用民族志学者对文化的描述发生了变化,从传统上持久的知识库存转变为一种变化和不稳定的过程,人们在这一过程中积极努力从持续变迁的关系和环境中获得意义。

## 各种各样的应用民族志

民族志的许多价值存在于它的叙述中——基于文化表达的故事讲述中。传统的民族志几乎只关注对"他者"及远距离人群的故事讲述,然而,当代的民族志研究则趋于关注人们从经验领域中所形成的文化展现方式,意义在其中经常处于冲突状态,文化也永远处于建构状态。对于应用民族志而言尤其如此,它本质上是干预主义及入侵性的。如前文所述,应用民族志学者的问题已经很大程度上从讲述"他者"转变为描述文化系统的交叠而引发的现象,这种交叠是一种有意而为的、全新的或期望介入的结果。

### 认知取向

在应用民族志的发展中,认知的、符号的和语义的取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为了提供一种特定介入的"本土观点"(马林诺夫斯基所赞成的),这些取向遵从了各种语言或者话语模型及民族志的方法论。在这个脉络下的比较经典性的民族志研究包括:"买醉人生:城市流浪者的民族志"(*You owe Yourself a Drunk:An Ethnography of Urban Nomads*,Spradley,1975),"抢夺与逃跑:城市海洛因成瘾者的正式民族志"(*Rapping and Running:A Formal Ethnography of Urban Heroin*

*Addicts*, Agar, 1973)，以及"警察工作：警察的社会组织"(*Police Work: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Policing*, Manning, 1977)。这些研究与标准的(即非应用性)民族志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们所关注的研究总体至少有一部分可以界定在更大的社会"问题"中。斯普拉德利(Spradley)的研究基于公众对街头酗酒问题和通过警方解决问题的方式(大部分是以监禁的方式)的看法。阿加(Agar)的研究建立于对海洛因成瘾者的一种治疗方式基础上。其他的民族志，诸如曼宁(Manning)对警察工作的研究；阿加最近的文章(Agar, 1986a)，关注那些受制于公众兴趣或制度介入的特定职业群体——比如，阿加对受到联邦交通制度影响的自雇卡车司机的关注。

在应用层面，认知取向对民族志的价值在于它们常常从对象群体中揭示出文化建构的模式来，这不同于外来者对群体的解释，尤其是研究中的那些对对象群体具有权威性的人的解释。民族志研究经常发现，在对象群体的政策、程序或措施与提供一种文化的视角并有助于决定群体行为的真实世界之事件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不一致。在笔者看来，这些民族志中最具吸引力的地方是它们将文化看作一个介入实践的结果(包括十分有意义的研究性介入)。如阿加(Agar, 1994)在对"文化间实践者的角色"(ICP)的讨论中指出，文化不应当被当作隶属于某一特定群体的一套抽象原则，而应该指向对差异的消弭和化解。

文化是 ICP 创造的，是由他或她所讲述的故事，它强调并解释那些引致断裂的差异性。文化不是人们所拥有的事物，它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空间中所填充的事物。文化也不是对任何事情的一种充分描述，它关注差异、丰富的观点，从事物到事物及从群体到群体的变化的差异(p. 236)。

应用民族志的认知取向中许多实践的意义来源于对沟通失效或文化"断裂"社会事实的关注倾向(Agar, 1986b; Briggs, 1986)。这些失效很容易反映到应用环境中去，而认知的民族志方法似乎也适合运用到由于某一群体试图介入另一群体而造成的特定情境与沟通的困境。尽管这种取向似乎又回到了马林诺夫斯基依照"本土观念"对应用民族志的辩护，但是与之相应的是，克拉克洪也试图描绘出应用民族志学者的独特角色，他们有能力去展现文化中意会的一面。认知和基于语言的民族志倾向于关注沟通断裂的问题，研究者具有遇到问题的直接经验，通过他们对问题何以产生的理解可以消解这些问题。而从应用取向来看是不一样的，这一取向将问题看作研究主体或者他们试图改变的对象群体所进行的表达。这也是一个不十分清楚的假设，即认为民族志学者比那些群体成员更加适宜解决群体之间沟通失序的问题。因为研究者较少被困于期望行动之中，而且他们对情境一开始便了解很少，所以对丰富资料中所出现的问题与错误更可能有第一手的体验，并直接面向沟通问题的解决。而与问题联系更紧密的局内人则可能已发展出认知性的保护，这使得他们与沟通问题的直接体验相分离，它们构成了资料和理解的重要部分。如斯普拉德利(Spradley, 1979)指出他自己对种族语义的引申技术似乎是，当民族志学者在进入一个文化情境之前具有很少的相关知识时运作的最好。

**微观/宏观分析的取向**

尽管在传统上,民族志植根于地方层面并严重依赖于定性研究的技术与方法,但应用民族志当前的各种取向已在调查的对象和方法上进行了扩展。在这一变迁中,有两个因素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第一个因素是社会科学中近来的一种趋向:在地区、国家乃至全球事件的背景下重新定位地方层次。这一关注点与应用研究和行动似乎尤为相关,它们的介入和促使变迁的努力总是与更大的影响总体领域之努力有关。应用民族志日益与这些范围维系在一起,而非与封闭状态下的特定群体或总体经验相联。另一个因素是应用民族志在方法论研究上的扩展趋向,它不仅使用了更多复杂的定性方法,也采用或至少接纳了更多定量研究的方法。这种转向的部分原因可归结为社会科学家和实践者对应用研究参与方式的变革(需要重申的是,我所论述的内容主要源于我对应用人类学的体验,尽管我对这些评论在社会科学一般层面上的应用亦持保留态度)。在过去,当要求人类学家根据他们对一个特定人群的知识提供专业性知识时,他们通常参与到应用研究中去。当发现一些事情的进展出现错误以后,他们最有可能参与到某个项目中,并且他对整个项目或者研究活动的参与常常是微不足道的。换句话说,他们的民族志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更大规模的介入,此外,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也主要是专家审视或者错误修正。

这种情况也有例外,而且现在例外成了规则。应用民族志学者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比如从一开始便参与到一个项目或研究进程中并在研究设计上发挥一定的作用。他们也更有可能对应用性研究进程进行分析或解释。应用民族志在更大的研究项目和介入上的更多整合意味着,如今以定性、田野调查为基础的应用民族志与其他研究取向的关系获得了较大进展。其中一种方式是应用民族志学者作为定性研究者而参与到更大、更具定量化的研究活动中。另一种取向是应用民族志学者本人主动采用定量方法,将其作为他们民族志研究计划的一个部分——这种情况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一些应用民族志现在主要依靠定量而非定性方法(谨记此点仍然是重要的,即在这一章里民族志被界定为它的研究对象,而非作为一个特定类型的方法论)。

从方法论的创新之处来看,民族志调查包括了定性和定量取向及多层次的分析,而且更有意义的是民族志学者在研究设计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并因而在文化分析中占据主要的地位。在人类学中,民族志关注应用的定性/定量取向在下列研究中得到较为全面的论述,包括:佩尔图双氏(Pelto & Pelto)《人类学研究:调查的结构》(*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The Structure of Inquiry*,1978),伯纳德(H. Russell Bernard)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的取向》(*Reserch Methods in Anthropology: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1994),以及伯纳德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手册》(*Handbook of Research Method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1998)等。人类学从地方层面或共同体层面的分析到包含几个纬度(空间、因果、时间)的"宏观"分析的转换则可从以下研究中看出:德沃尔特和佩

尔图(DeWalt & Pelto)的《人类学的微观与宏观分析:理论和研究中的问题》(*Micro and Macro Levels of Analysis in Anthropology: Issu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1985)以及波奇(Poggie)所编《人类学研究:过程与应用》(*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Process and Application*,1992)等。

对于应用民族志学者而言,这些研究经验提供了将定性方法整合到更大研究活动的机会。例如,定性取向在研究的起始阶段是非常有用的,它们经常有助于界定清楚调查研究的要素(Kempton, Boster, & Hartley, 1995)。在其他研究中,定性田野工作也在研究的分析阶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利于解释具有反常特点的资料,尤其是那些严重依赖于来自各个地方所公布的资料的研究,因为关于这些地方对资料的发布要求如何阐释的变化并没有在资料上反映出来。

当研究需要准确地描述成员的价值或观点时,定性民族志的资料通常被认为比调查资料更好一些,尤其当考察对象需要进行长期的田野观察,以及被访者可能由于感到风险性或其他原因而不愿意正确作答,或他们"更真实"的回答可能需要时间来获得时。在本章后面我也将会讨论到,在某些情况下,定性民族志资料对于特定的研究对象或要求来说更加可信。

我们很少看到有对在同样的应用研究项目中所获得的定性和定量数据作清楚比较的研究。而斯克林肖(Scrimshaw,1985)则提供了这样的实例,她的研究是关于厄瓜多尔人在引入流产上的行为和态度的。她指出,通过与那些在更大和更严格的抽样程序中获得的结果相比,民族志(即田野为基础的)资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效的。另一方面,斯克林肖也谨慎地指出,当少数情况下两种结果之间存在较大反常性时,民族志资料也许要更准确一些。比如被调查对象的行为和态度可能十分敏感或者有某种难言之隐,这时,通过长期的熟悉和了解,民族志体验可以让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态度辨识获得更加深入和准确的结果。

### 行动和临床的取向

对于应用民族志而言,当前许多取向遵循着早期由泰克斯(Tax,1958)所提出的行动或倡导模式。另外,心理学家勒温(Lewin,1948)也曾经在另外的场合下讨论,并强调,基于委托方而解决特定社会问题的尝试中参与研究的重要性。其中一些模式直接来源于早期的研究,而其他情况则受到部分研究基金与机构的兴趣导向,尤其是一些联邦政府机构,它们资助那些参与性的以及和对研究"对象"有直接影响或介入调查的一个或几个阶段的应用性研究。这些研究活动所需要的实际参与程度有很大的不同,在某些情况下对"参与"的委托研究获得了表面的声誉,而实际上它与早期在公共决策中对"公民参与"的号召没什么两样。

关于行动或倡导研究并非一定是民族志的,尽管一些研究者认为民族志研究策略或许比其他策略更易进入。此外,在解释阶段,对于那些没有受到过社会科学训练的参与者或社区成员来说,民族志提供的各种资料可能更加令人信服。对于这里讨论的应用研究的其他取向来说,许多被认为是应用"民族志"的研究

实际上与上文我们所提供的定义是不相吻合的——它们可能是好的,且资料丰富的定性式研究,但是它并未与使其成为民族志研究的对文化过程的理解联系在一起。

尽管存在着许多限制性的条件,但仍然有很多的例子表明,应用民族志方法已经与行动和倡导性的研究策略整合在一起了。申绪尔(Schensul,1985)描述了在整合模式情境下的行动导向研究,其中研究者和社区行动者形成"政策研究群",关注一些重要的社区问题。她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传播/功利环境的社会和政治现实等田野环境的制约"以及研究是否违反了社区"文化准则"的顾虑都在一定程度上型塑着民族志(p. 193)。怀特(Whyte,1984)提供了一个类似的模式,他将其称为"参与行动研究"。阿吉里斯(Argyris,1990)则提出了或许是对行动环境下应用民族志的最详细描述,而且她指出,行动研究的主要目标是鼓励参与者在涉及特定社会问题时去检验他们自身的"理论运用"。

对于得自于行动模式的应用民族志而言,其主要革新乃是趋向于将一些并非专业社会科学家的研究者包括进来,他们也参与到研究的多种阶段包括项目选择和设计、田野工作以及研究分析中。相应地,倡导性研究者也作为代表自身权利的社会科学家导致许多传统研究对象实现了专业主义——这种实践层面的扩展又一次让我们回到泰克斯,在他工作的最后一些年份,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来促进社会科学和其他领域美国本土学生的教育。格林伍德和勒温(Greenwood & Levin,1998)则进行了一项行动研究调查,它们关注科学证据及研究进程民主化承诺的标准。

在许多方面,行动和倡导性研究的结合对应用民族志而言是一种临床取向,这是试图在最简单的层面训练人们用民族志的策略来更好地理解自身的文化环境或更充分地了解那些影响他们参与对象的文化过程。临床模式多数是指鼓励不同类别的专业人员在民族志层面上思考他们的实践行为,它经常被应用在碰到相当大的文化差异的环境中,就如同在医疗和健康(Shimkin & Golde,1983)、教育(Heath,1982),以及社会工作(Green,1982)领域中一样。斯坦(Stein,1982)将临床模式描述为一种"民族志的教学",其中鼓励专业人员(这里指的是医学院的学生)使用民族志视角以及至少某些民族志调查的方法以首先实施一种"自我民族志",而后把民族志原则应用到对临床环境下文化差异的理解上。

施恩(Schein,1987)曾指出临床视角的细微差异。他所谓的临床医生是指依赖于施恩所声称的在一些方面不同于那些民族志学者的实地考察工作取向的组织性的研究者和建议者。然而,很难确定施恩是怎样获得民族志模式的——他所称的临床模式的反面,实际上似乎与本章所论述的应用民族志取向非常相似。

当社会科学家认识到应用研究不仅仅是一种附属于现存人类问题研究范式的事物时,人们便会日益注意到作为一种思考和问题解决方式的民族志。在前文所引用的例证中,民族志的视角是为了在多种领域中助行为者一臂之力,可能有助于增加他们对有关文化差异和文化过程问题的敏感性。同样,认识到实践者亦具有其改变和介入的自身模式也是很重要的,这些模式或许与民族志视角

相冲突，并阻碍临床或应用环境下民族志的有效运用。例如，里格比和塞瓦赖德（Rigby & Sevareid，1992）就对比了律师和民族志学者在处理“事实”与“证据”上的差别；此外，德拉克（Drake，1988）也对比了民族志学者和政府官员的不同思考方式。

## 应用民族志中的主要问题

在应用研究中，民族志方法和视角使用的不断增长导致了许多问题的出现，其中一些是有关民族志取向的独特问题，而其他的则是与应用性和基础性研究之间的差别相关的一般问题。

### 应用研究中对民族志的批评

对于应用研究中民族志取向的应用来说信度和内在效度的问题仍然引起人们较大的关注。当民族志学者更多地参与到包括持定量视角的社会科学家的研究队伍中时，它们便日益成为主导性的问题。尽管一些民族志学者认为，民族志研究需要有判断方法有效性的标准（Guba & Lincoln，1989），但同样，就某些民族志学者而言，这种感受是促使民族志日益精密的部分原因，它既可以扩展他们的方法论体系，也使他们在调查的定性方法层面能够更好地把握对信度和效度的测量（Bernard，1994；Kirk & Miller，1986）。如哈默斯利（Hammersley，1992）所述，有效性的标准有他们对“真理”概念的参考标准。这必须考虑到“真理”是从企图理解并解释文化不同于其他现象中获得的可能性（Geertz，1983）。它也赞同确定性的存在，即一般来说，应用研究的真理比来自于“纯粹”及学科限制的研究框架更具随意性，并更受制于效用标准的变化（参看下文）。假如有效性并未完全存在于旁观者的视野中，那么真理便无疑会存在于特定的应用研究活动之需要和判断中。

另一种对民族志的批判与资料的丰富性有关，这些资料一般由应用民族志学者整理，尤其是当他们参与到大规模的研究中时。他们可能在几年的时间里进行资料收集工作，许多民族志学者或者定性研究者还从不同研究场所中获得资料。早期，这种工作的问题经常是，开始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以后该如何来分析这些田野资料，或者是没有注意到不同的田野工作者在不同场所所收集数据之间的可比性。最近，基于计算机的民族志程序的采用，比如 NUD · IST 和 Ethnograph 被证明是很有用的，包括对民族志数据的管理和使初级资料的分析变得更容易等。民族志在应用研究中的运用也因为要花太长时间而无法作为一个决策的有效工具，及其关注点太过广泛（民族志学者并不总是把研究放在研究资助者所要求的特定问题上）而受到批评。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提高“迅速评价”步骤，尤其是发展研究和资源管理领域，民族志学者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而在维护其广泛或宏观的关注性上，民族志学者指出他们的方法对于探索在应

用研究中所界定的问题被误解或脱离规范的程度是极为重要的——这种观点可能是相当有价值的,但是对一些研究资助者来说,并不是特别符合要求。

在应用民族志研究和实践中,研究者潜在的观念超越了信度和效度的问题范畴。无论他们的成果是否得以应用,民族志学者都通常被视为他们所研究对象的倡导者,至少一些民族志学者对此种宣称并无异议。在人类学的研究中,它似乎是千真万确的,表达和保护人类学家所研究人群的"最优"利益通常是其学科标准的一个方面。尽管民族志学者当然需要注意他们倡导性的传统可能引致偏见,但同样需要看到,对可能偏见的批评也许只针对的是民族志学者所导向的各种结论中的一种。在应用场景中,民族志的长处在于它能够辨识那些为人类价值和行为提供理由和意义的文化模式。而对于应用研究而言的交易代理商和其他可能的资助者常常对问题无所知晓,他们对被研究的价值和行为有自己的解释。民族志则可以提供另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可能受到一些研究资助者的热烈欢迎,也可能由于偏见而与资助者的期望无法吻合并被彻底的抛弃。

### 应用研究中民族志的辩护

针对应用研究中民族志价值的批评中,许多问题也同时是其特定方法的优势之处。与研究对象较长时期以及相对密切的接触等,它提供了研究对象丰富以及具有情境化的信息,可以增加我们对其认识的深度。在某些特定的研究环境中,研究对象面对调查问卷的方式不可能不偏不倚地回答问题,或在对直接问题的适当回应、调查的道德规范的文化差别甚至特定问题与回应的意义等问题的解释上,都可能存在显著的差异,在这些情况下,民族志和定性研究取向都已经得到成功地应用。在对研究结果的分析和解释方面,民族志增加了一个在其他取向中有可能缺失的文化维度。

应用民族志近来的研究取向有助于人们(包括资助者、研究对象等)去思索文化观念、文化如何"运作"以及文化的逻辑必然性问题。在某些情形下,它需要民族志学者去协助其他人忘掉早期民族志学者,尤其是人类学家所教导的流行的、更加静态性的文化概念(Chambers,1986)。

### 研究资助者和应用民族志方法

基础研究方法通常是在学科边界内以及独立于同时代观念的研究对象中发展起来的,然而应用研究却总是需要让研究资助者来明确研究策略的适当性和有效性。它要求民族志学者的方法要适应资助者所表达的特定需要和限制。例如,快速的民族志方法取向便来自于特定资助者希望在有限时间内获得资料的需求(R. Chambers,1985; Harris,Jercom, & Fawcett,1997; van Willigan & Finan,1991)。同样,民族志方法也已适应了某些资助者的特殊需要,他们认为有必要对那些针对其干预行为的潜在社会或文化影响的评估进行引导和管理(Cernea,1985;Cochrane,1979)。

快速研究包括各种各样的技巧,但是与民族志相关的最常用方法包括:

(a)焦点小组访谈;(b)"逐级(stepwise)"研究,其中简洁的民族志"访问"代替了长期的田野调查,以解决一个连续研究项目中的特定问题;(c)参与研究策略,即在研究地进行资料收集的工作。在范威利根和费南(van Willigan & Finan,1991)的著作中,这些应用民族志研究相关的方法得到了详尽的讨论。

应用民族志学者并非只是考虑自己的研究取向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与研究资助者的期望相适应。比如,沃尔科特(Wolcott,1994)即表达出在教育领域中评估研究模型对民族志研究的影响的担忧,并提出一个更具描述性和非评价性的方法。而与此相对,也有其他学者将他们的应用民族志取向直接建立在评估研究的模型上(如,Fetterman 1984; Ryan, Greene, Lincoln, Mathison, & Mertens, 1998)

## 应用民族志中的效用标准

大体上,应用民族志学者并没有在证明其调查价值上投入太多的注意力。尽管对民族志研究可能是有用的方式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讨论,但相对来说,在其实际运用的实现上面仍然努力甚少。在人类学里,讨论实际民族志运用的常用题材是个案研究,它强烈依赖于民族志之解释合理性的建立,而很少说明这些解释实际上是否与资助者的决策、政策建构或者项目干预相互协调。不过,著作《让我们的研究可用:人类学知识运用的个案研究》(*Making Our Research Useful: Case Studies in the Utilization of Anthropological Knowledge*, van Willigan, Rylko-Bauer, & McElroy, 1989)则是一个例外。尽管在这本书中作者明确了许多影响民族志运用的因素,但很多论述仍然围绕在合作和沟通问题的周围。民族志的有效应用似乎与研究资助者积极参与研究努力的程度有关;与民族志学者是否愿意作为其研究的倡导者以及愿意同各种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以不同方式进行相互沟通有关。

同样,我认为效用标准对于有效的应用研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它也是建立科学的信度和效度之常用及可变标准(Chambers,1985)。我区分出了五个这样的标准:研究发现的可用性是指对于那些在有关变迁的研究项目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成员而言,知识在某种适当的方式下是可用的;此外,应用民族志应当具有与研究成员和资助者的目标、规定活动之间的相关性;同时,还需要对有关行动重要性的不同要求进行回应(比如,要理解这种情形,即保持历史结构重要性的要求,在历史保护主义者和急切需要现代购物中心的社区成员之间是不同的);第四点,为了回应研究者资助者所倾向的事件和证据,应用民族志应该符合信度的标准;最后,应用研究需要着重于展望和判断,或者,换句话说,要理解这一点,即研究资助者更感兴趣于将会怎样,或甚至是应当怎样的问题,而非目前怎样。

## 什么类型的科学

就我所知,应用民族志学者从来没有就其所从事的科学的类属达成一致的意见。我相信,在人类学中这是确实存在的。以前认为是从解释性,甚至推测性科学(Kluckhohn,1947)到仿照自然科学家所认为的精确性和可预测性的模式

(Chapple,1941)最近的应用民族志则遵循着这些模式的一种或另一种,一些研究者将他们的研究基于自然科学的范式,其重点乃放在对文化过程之可检验性和因果性陈述的搜寻上(Bernard,1994; Poggie,1992)。同时,其他研究者则关注于解释性模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强调的是特定文化环境和事件的独特性(Agar,1996; Wolcott,1994)。沃尔科特及时讨论了这样的问题,即关于应用民族志有效性的先入之见是否有可能削弱民族志学者对理解的探求。

在这两种模式中,定性民族志展现方式上的主要区别是其方法与研究项目整合的方式。对于自然科学模式而言,定性民族志经常伴随着更加定量的方法,或者有时由后者所主导;而解释性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则更倾向于把定性取向作为他们调查的基础。

与在社会科学中一般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相反,后现代主义在应用民族志的进一步发展中扮演着相对微弱的角色,并且在一些地方对于此种取向存在着公开的敌对性(Young,1998)。其他人则认为,后现代的一些批判或许有助于对应用民族志学者在调查过程中自身的位置进行更加批判性的理解,并有助于探求一个对于文本表达来说的替代取向(Johannsen,1992)。

### 伦理和道德问题

对于那些成为其关注对象的人们,应用研究经常得出直接的推论。在许多情况下,应用民族志被当作知识基础的一部分,根据它做出有关社区及其环境的决策,而伦理和道德的考虑可能会使其有所顾虑。应用民族志常常在计划或非计划的变动中进行,社区则在其中经历着生活被分裂和被操控的压力。是力图去理解所进行的研究工作还是努力去帮助人们减轻痛苦?民族志学者对于他们在这种环境下的主要角色的理解有相当大的差异。

在影响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一般问题以外,应用民族志学者还面对着许多伦理和道德上的困境,它源于研究者与研究资助者之间的特殊的关系。更令人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民族志学者是否应当从事那种资助者的政策或行动可能与专业或个人道德标准不一致的研究。当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1929)提出人类学家可以服务于在非洲的英国殖民地行政目的的观点时,他走在合谋者和帮助殖民地使团更加人性化之间的那条狭窄的道路上。同样,在“二战”中为日裔美国人建立的安置营中,作为社区分析者的社会科学家们力图与政策保持距离,并将他们自己描述成日本俘虏和战争安置权威之间的“文化经纪人(Cultural brokers)”(Spicer,1979)。尽管也有人指出协作与合谋乃是一回事,并建议应用研究者将自己从资助者大量的要求中脱离出来,但参与比抵制更好的观点仍然在当前许多应用研究中普及开来(Berreman,1991; Escobar,1991)。

对于应用民族志学者而言,有三个专业伦理问题被证明是特别困难的。一是被访者知情同意的原则。在人类学中,弗路尔-洛班(Fluehr-Lobban,1994)指出田野工作者抵抗知情同意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假定,其在决定和减轻研究的潜在的负面影响上,比其研究对象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上。她谴责这种态度是一

种不适当的家长作风。另一方面，韦克斯(Wax,1995)认为，许多例子发现，严格遵循被访者的知情同意原则将使田野工作变得很困难，甚至根本不可能——特别是当民族志学者调查一些非法的活动或者调查精英(即“上行研究”,studying up)时，因为这些人可能会抵制调查。

应用民族志学者还面临着关于研究对象的隐私保护之伦理困境。当研究资助者已经或要求接触能识别研究对象的记录的情况下，一般就会涉及研究对象。它也关系到一些特定的研究对象，由于他们在一个制度中的特殊地位而无法隐藏自己的身份。美国人类学协会及应用人类学协会都曾经明确表明，在所有的情况下研究对象的隐私皆应被维护，然而，这种专业的指示近来也得以修正：当可能无法确保研究对象的隐私时至少应该告知他们。

总体上，社会科学专业鼓励研究结果的开放和公共的分享。在 1960 年代，美国人类学协会就联合禁止“秘密”性的研究。这一禁令对于一些应用民族志学者似乎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发现资助者在法律上拥有研究资料的所有权，如致力于对市场新产品的检验的研究，对咨询及磋商的市场技术之评价的研究，以及长时段的社会实验研究，而初步结果的早期发布可能会对实验造成影响。这些声明具有一定的价值，多数专业协会，包括在 1998 年修正了其专业责任原则的美国人类学协会在内，都修改了它们的条文，如果所有权利益是合法的，那么允许研究者保留其研究结果。

## 结 语

早期将民族志研究应用到问题解决和社会干预的尝试归纳出了三种保留很大影响力的主要原则，这些方面是民族志的优势，它们可以发掘“本土的观念”，揭示出更多意会的文化维度，促进合作或“行动”的研究策略。另一方面，民族志视角上的一个主要变化是逐渐地从把文化看作一个相对封闭的和地理限定的体系转向关注作为干预或者变迁程序结果的文化过程。在这一点上，应用民族志研究与文化表达的地方或全球的相互影响等更加综合性的趋向保持了同步。

过去二十年来，应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提高。这些变化包括了下面几个方面：

- 对应于干预和问题解决而在文化(和认知性)模式的发展上出现的日益增加的精确性。
- 研究方法论和技术上更加多样化，包括了定量和定性取向以及计算机辅助的民族志研究项目的运用。
- 民族志学者更完整的参与在应用研究的多种阶段中(项目设计、分析、发放等)，从而对特定的应用和政策导向研究策略有了更多的理解。
- 民族志学者更倾向于成为研究团队的成员，或在其自己的学科框架下，或作为交叉学科研究的参与者。

- 民族志学者更加倾向于关注将研究策略与特定资助者对信息及视角的需要相匹配的重要性,同时也留意到“效用的标准”。
- 在将民族志方法应用到参与和“行动”研究策略上具有日益增长的经验。

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学中,这个时期同样也被看作日益将特定的应用研究当作一个合法和重要的事业而接纳的时期。除了学科以外的日益增长的兴趣以外,应用民族志学科内部的支持以及制度化的增加表明,现时期取得的进步亦将持续到未来。

是否应用民族志还存在没有获得进展的其他领域和方面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其中一个便是许多民族志学者没有继续将他们的贡献运用于实际。除了一些边角料和逸闻趣事外,从应用民族志的实践中并没有得出清楚的对效用的概念化。如同它过去一样,民族志学者似乎更满足于强调假设的调查用途,而非从经验性上探求当他们的知识进入具有冲突性的公共认知、干预和决策时会发生什么。从这一方面看,许多应用民族志似乎被锁定在“实证主义者”的假设上,认为好的知识就会有好的运用,而调查者毋需更多的努力或承诺。同时,我们还非常需要对更多的民族志实际运用(以及误用)的批判性分析。

与此相关联的是应用民族志的伦理和道德的立场。尽管应用民族志被引向为那些在公共事务中的弱势群体进行辩护,但他们并没有解决其自身在调查中的适当角色之类令人困惑的问题。他们是否在知识的生产方面具有特殊性呢?他们是否如同医生和律师一样,尽力平等地对待所有潜在的顾客,而没有任何歧视呢?或者他们只与他们认为是适合的顾客去合作?尽管这些问题永远不能在抛开个体选择层面以外而得以解决,但是在更高一级的层次上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将是十分有益的。

另一个我们取得一些进步的领域是将民族志的视角转向研究以外的临床实践模式。尽管对于这种模式的兴趣具有优先性,以上我们也讨论过,而且,我们努力去理解民族志调查怎样才能够更好地指导个体进入人类服务、计划和决策等的实践过程,但在这种努力的情境中,我们并未能明确自身的性质。比如,在人类学中,学术实践的主导任务已开始屈从于对此学科来说比较适合的更广泛意义的职业过程。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如民族志这种专业和明显不同的调查模式如何使个体适应那些新的职业模式——同时也增加我们对超越“方法”正规应用的特点之可能性的重视。

如果能够预测出十年以后我们所研究的田野将归于何处的话,我当然希望这个领域能够取得各种提高和进步。除此以外,我认为其还具有以下几个趋向:①研究方法和技术上不断增加的精确性,以及在问题解决上,民族志调查和其他取向整合性的提高;②在研究导向上,将更多地力图使决策者和研究资助者确信“本土知识体系”的重要性,它们不仅是一种让人们得以更充分地理解其需要和社区生活的手段,而且对于社区问题的解决的可能性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资源。更多情况下,试图解决社会问题的“从上到下”方式已经侵蚀甚或破坏了那些有助于使问题社区保持生存的社会和文化资源以及生存策略。

Agar, M. H. (1973). *Ripping and running: A formal ethnography of urban heroin addicts.* New York: Seminar.

Agar, M. H. (1986a). *Independents declared: The dilemmas of independent trucking.*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gar, M. H. (1986b). *Speaking of ethnography.* Beverly Hills, CA: Sage.

Agar, M. H. (1994). The intercultural fram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8, 221-237.

Agar, M. H. (1996). *The professional stranger: An informal introduction to ethnography.*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Argyris, D. (1990). The ethnographic approach to intervention and fundamental change. In C. Argyris, R. Putnam, & D. M. Smith (Eds.), *Action science* (pp. 158-189).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Barnett, H. G. (1956). *Anthropology in administration.* Evanston, IL: Row, Peterson.

Bartlett, P. F. (Ed.). (1980). *Agricultural decision making: Anthrop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rural development.*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Bernard, H. R. (1994). *Research methods in anthropology: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2nd ed.).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Bernard, H. R. (Ed.). (1998). *Handbook of research method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Berreman, G. D. (1991). Anthropological ethics in the 1980s: A positive approach. In C. Fluehr-Lobban (Ed.), *Ethics and the profession of anthropology: A dialogue for a new era* (pp. 36-71).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Briggs, C. L. (1986). *Learning how to ask: A sociologuist appraisal of the role of the interview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ernea, M. M. (Ed.). (1985). *Putting people first: Sociological variables in rural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mbers, E. (1985). *Applied anthropology: A practical guide.*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Chambers, E. (1986). The cultures of science and policy. In W. N. Dunn (Ed.), *Policy analysis: Perspectives, concepts, and methods* (pp. 93-110). Greenwich, CT: JAI.

Chambers, R. (1985). Shortcut and participatory methods for gaining social information for projects. In M. M. Cernea (Ed.), *Putting people first: Sociological variables in rural development* (pp. 515-53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ple, E. D. (1941). Anthropological engineering: Its use to administrators. *Applied Anthropology*, 2(2), 23-32.

Cochrane, G. (1979). *The cultural appraisal of development projects.* New York: Praeger.

DeWalt, B. R., & Pelto, P. J. (Eds.). (1985). *Micro and macro levels of analysis in anthropology: Issu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Boulder, CO: Westview.

Drake, H. M. (1988). *Mainstreaming anthropology: Experiences in government employment.*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Escobar, A. (1991). Anthrop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encounter: The making and marketing of development anthropology. *American Ethnologist*, 18, 658-682.

Fetterman, D. M. (Ed.). (1984). *Ethnography i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Beverly Hills, CA: Sage.

Fluehr-Lobban, C. (1994). Informed consent in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We are not exempt. *Human Organization*, 53, 1-10.

Geertz, C. (1983).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Green, J. W. (1982). *Cultural awareness in the human servic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Greenwood, D. J., & Levin, M. (1998). *Introduction to action research: Social research for social change.* Thousand Oaks, CA: Sage.

Guba, E. G., & Lincoln, Y. S. (1989). *Fourth generation evaluation.* Newbury Park, CA: Sage.

Hammersley, M. (1992). *What's wrong with ethnography? Methodological explorations.* London: Routledge.

Harris, K. J., Jerome, N. W., & Fawcett, S. B. (1997). Rapid assessment procedures: A review and critique. *Human Organization*, 56, 375-378.

Heath, S. B. (1982). Questioning at home and at school: A comparative study. In G. Spindler (Ed.), *Doing the ethnography of schooling.*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Holmberg, A. R. (1958).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change. *Human Organization*, 17, 12-16.

Johannsen, A. M. (1992). Applied anthropology and post-modernist ethnography. *Human Organization*, 51, 71-81.

Kempton, W., Boster, J. S., & Hartley, J. A. (1995). *Environmental values in American culture.* Cambridge: MIT Press.

Kirk, J., & Miller, M. L. (1986).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Kluckhohn, C. (1947). Covert culture and administrative problem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45, 213-229.

Leighton, A. H. (1945). *The governing of me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ewin, K. (1948). *Resolving social conflicts.* New York: Harper & Row.

Malinowski, B. (1929). Practical anthropology. *Africa*, 2, 23-38.

Manning, P. K. (1977). *Police work: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policing.* Cambridge: MIT Press.

Montgomery, E., & Bennett, J. W. (1979).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food and nutrition: The 1940s and the 1970s. In W. Goldschmidt (Ed.), *The uses of anthropology* (pp. 124-144).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Pelto, P. J., & Pelto, G. H. (1978).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The structure of inquiry*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ggie, J. J., Jr., DeWalt, B. R., & Dressler, W. W. (Eds.). (1992).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Process and applica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Rigby, P., & Sevareid, P. (1992). Lawyers, anthropologists, and the knowledge of facts. In R. F. Kandel (Ed.), *Double vision: Anthropologists at law* (pp. 5-21).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Rosaldo, R. (1989). *Culture and truth: 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lysis.* Boston: Beacon.

Ryan, K. E., Greene, J. C., Lincoln, Y. S., Mathison, S., & Mertens, D. (1998). Advantages and challenges of using inclusive evaluation approaches in evaluation practice. *American Journal of Evaluation*, 19, 101-122.

Schein, E. H. (1987). *The clinical perspective in fieldwork.* Newbury Park, CA: Sage.

Schensul, J. J. (1985). Systems consistency in field research, dissemination, and social chang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9, 186-204.

Scrimshaw, S. C. M. (1985). Bringing the period down: Government and squatter settlement confront induced abortion in Ecuador. In B. R. DeWalt & P. J. Pelto (Eds.), *Micro and macro levels of analysis in anthropology: Issu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pp. 121-146). Boulder, CO: Westview.

Shimkin, D. B., & Golde, P. (Eds.). (1983). *Clinical anthropology: A new approach to American health.*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Spicer, E. H. (1952). *Human problems in technological change.* New York: John Wiley.

Spicer, E. H. (1979). Anthropologists and the War Relocation Authority. In W. Goldschmidt (Ed.), *The uses of anthropology* (pp. 217-237).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Spradley, J. P. (1975). *You owe yourself a drunk: An ethnography of urban nomads.* Boston: Little, Brown.

Spradley, J. P. (1979). *The ethnographic interview.*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Stein, H. F. (1982). The ethnographic mode of teaching clinical behavioral science. In N. J. Chrisman & T. W. Maretzki (Eds.), *Clinically applied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ists* Chrisman & T. W. Maretzki (Eds.), *Clinically applied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ists in health science settings* (pp. 61-82). Boston: D. Reidel.

van Willigan, J., & Finan, T. L. (Eds.). (1991). *Soundings: Rapid and reliable research methods for practicing anthropologist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van Willigan, J., Rylko-Bauer, B., & McElroy, A. (Eds.). (1989). *Making our research useful: Case studies in the utilization of anthropological knowledge.* Boulder, CO: Westview.

Tax, S. (1958). The Fox Project. *Human Organization*, 17, 17-19.

Trend, M. G. (1978). On the reconcili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A case study. *Human Organization*, 37, 345-354.

Warren, D. M., Slikkerveer, L. J., & Brokensha, D. (Eds.). (1995).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development: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s.* London: Intermediate Technology.

Wax, M. L. (1995). Informed consent in applied research: A comment. *Human Organization*, 54, 330-331.

Whyte, W. F. (with Whyte, K. K.). (1984). *Learning from the field: A guide from experience.* Beverly Hills, CA: Sage.

Wolcott, H. F. (1994). *Transforming qualitative data: Description,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Wolcott, H. F. (1995). Making a study "more ethnographic." In J. Van Maanen (Ed.), *Representation in ethnography* (pp. 44-72). Thousand Oaks, CA: Sage.

Young, J. (1998). SfAA president's letter. *Society for Anthropology Newsletter*, 9(4), 1-2.